回顾与反思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

PETER SCHWEIZER

[美] 彼得·施魏策尔 著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新 华 出 版 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

(美)彼得·施魏策尔 著

殷 雄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美)施魏策尔著;殷雄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2

ISBN 7-5011-5173-3

Ⅰ.里… Ⅱ.①施…②殷… Ⅲ.-美苏关系-研究
Ⅳ.D87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378 号

Victor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Peter Schweizer

Copyright © 1994 by Peter Schweizer

Copyright © 2001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

(美)彼得·施魏策尔 著

殷 雄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60 千字

2001 年 2 月第一版 2001 年 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173-3/D·818 定价:22.00 元

绪　论

前苏联克格勃（KGB）将军奥列格·卡卢金说："美国在80年代的政策成为苏联解体的催化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高级官员叶夫根尼·诺维科夫认为，里根政府的政策"是苏联体制消亡的主要因素。"前苏联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诸如"战略防御倡议（SDI）"①之类的计划，加速了苏联的衰落。

苏联从世界地图上被抹掉，并不是因为其改革过程或者一系列的外交协议。它的消亡并不是谈判造成的，而是自身无法维持下去了。导致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因素到底是哪些呢？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破产吗？是由于共产主义违反人性而命中注定要失败吗？是苏联经济的钙化与生锈最终使其不堪负重而发生内部爆炸，就如同一个不结实的屋顶因不堪积雪的重压而轰然倒塌一样吗？历史学家们可能对这一问题争论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

简而言之，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限于所有这些解释，而是还有更多的解释。显而易见，克里姆林宫在其生存的最后十年中所面临的一个核心和长期的问题，便是资源危机。在70年代之前，苏联体制就只能一瘸一拐地跛行了。当然，无休止的食品短缺与

---

① 俗称"星球大战计划"。1983年3月23日晚，美国总统里根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说明苏联战略核威慑力量"已大大超过美国"。他表示，美国应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战略进攻性武器，同时要加紧研制和部署空间时代的超级武器，建立有效的战略防御体系。由于这个空间立体防御网类似于一种"天网"，因此美国新闻界形象地将这一倡议称为"星球大战计划"。——译者注

工厂缺乏效率的问题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但是，到了80年代，这些经济困难变得更加棘手了。正是由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①]为了试图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才引发了改革与公开性。如果没有这场体制危机，那么戈尔巴乔夫也决不会沿着这条改革之路走下去。

在美国政策的范围之外调查苏联解体的原因，有点像调查一起突发的、始料不及的和不可思议的死亡事件，却不对发生谋杀的可能性进行调查，或者对灾祸的周围环境不进行最起码的调查。即使受害者已经病入膏肓，验尸官也有责任对所有的事情进行调查。导致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受害者是否正在获得可能是必需的药物？是否存在着与死亡有关的任何不同寻常的情形或者动机？

在美国历史上反对共产主义最坚决的总统当政8年之后，苏联就立即解体并且随即被埋葬了，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需要对此进行调查，特别是要根据刚刚开始出现的事实进行调查。迄今为止，对里根政府关于苏联解体的政策所进行的调查，还远远不够，而是把调查焦点几乎专门集中到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上了。这与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研究南方的解体稍微有点类似，当时就把研究焦点集中到了罗伯特·E·李[②]将军

---

① 原苏联领导人(1931—)。1985年3月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90年3月当选苏联总统。1991年12月25日宣布辞职，至此，苏联也停止存在。199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2000年3月12日，被正式推选为社会民主党总书记，这意味着在经过几年沉寂之后，他又重返政坛。著有《改革与新思维》、《生活与改革》等。——译者注

②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著名军事将领（1807—1870）。李历来反对占有奴隶和民族分裂，也反对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纠纷。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后，林肯总统恳请他出任北军司令，但李反对用内战方式解决民族纠纷，拒绝率领军队开进宣布脱离联邦的南部各州进行镇压，毅然辞去36年的军职，在给林肯的辞职信中说：“除了保卫我的家乡弗吉尼亚外，我决不拔出我的剑。”1862年出任南军总司令，曾取得过辉煌战果。后被北军司令格兰特打败而投降。战后接受华盛顿学院（后改为华盛顿和李大学）校长职务，后半生致力于教育工作，很有建树。——译者注

的政策上了，而对尤利塞斯·S·格兰特[1]将军的战略，则连一点起码的调查都没有进行。

有些人认为，美国在80年代的政策与苏联的解体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什么瓜葛。正如斯特罗布·塔尔博特[2]在现场访谈节目"华盛顿内幕"中所指出的那样："从克里姆林宫的立场来看，保守的共和党政府与开明的民主党政府关于……的区别，并没有那么大。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几乎呈一边倒的态势，这是因为苏联与苏联体制自身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或者压力。即使吉米·卡特[3]再次当选，并且沃尔特·蒙代尔[4]在卡特之后继续当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事情也可能发生。"

前苏联官员不同意这种观点。事实上，里根政府关于苏联的政策在许多方面都与过去进行了彻底的决裂。这个观点也具有讽刺意味，即那些现在认为美国的政策对于苏联的内部活动很少产生作用的人士，他们在70年代和80年代却建议对克里姆林宫采

---

① 美国南北战争后期的联邦军司令、美国第18任总统（1822—1885）。他由于在南北战争期间的超一流表现，成为战斗英雄，国会授予他五星上将军衔。1868年当选美国总统，时年46岁，是此前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1872年再次当选。1880年再次竞选总统失败。——译者注

② 克林顿政府副国务卿，酷爱俄罗斯历史，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1969年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时，翻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回忆录。曾经担任过《时代》周刊记者。1999年3月23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开始之后，他负责与俄罗斯进行谈判。——译者注

③ 美国第39任总统（1924—）。1976年当选总统后强调人权外交，后又转向强调实力，采取防止苏联扩张的政策。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他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措施，禁止美国谷物输往苏联，并抵制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1980年援救被扣留在伊朗的美国人质的行动失败，使其声望剧降，年底竞选连任失败。著有《守信》、《亚伯拉罕的血——中东问题透视》。——译者注

④ 美国律师、副总统（1928—）。1976年作为卡特的竞选伙伴当选副总统，1980年谋求连任时失败。1984年获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但在选举中被里根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此后一直操律师职业。——译者注

取缓和的姿态，因为这样将缓和苏联的行为。里根被称为“鲁莽的牛仔”，因为他可能将我们大家引向核战争的边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发生在罗纳德·里根当政的8年之后，这一事实也被描述为“歪打正着”。然而，我们可以理智地回想一下，当一位法国司令官明显不受其同事欢迎时，其功绩也被视为“运气”而不予考虑，拿破仑却反驳说：“那么，给我弄一些更为‘幸运的’将军们吧。”

苏联领导层在80年代所面临的“资源危机”，并不是美国的政策所造成的，而是这种体制的一种内禀特征。但是，现在仅仅披露出来的事实是，美国具有一项加剧这种危机的政策。这项政策有许多形式：隐蔽外交、秘密行动、科技潮流与持续不断地增强防御力量，以及一系列向苏联经济的转动装置上撒沙子的行动。同时，华盛顿卷入了许多高赌注的计划，旨在侵蚀苏联的外围地带，不仅要在第三世界、而且要在苏联帝国的心脏地带努力击退苏联式共产主义。

罗纳德·里根（明显地表现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经验”的强烈厌恶。他认为共产主义政体不是乔治·凯南[①]所说的“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政府”，而是一种荒谬的畸变行为。“里根总统简直有一种天生的感觉，认为苏联不应该或者不能够幸存”，乔治·舒尔茨[②]回忆道，“那种感觉不是基于有关苏联的详细知识，而仅仅是出于一种本能。”这种观点不仅仅是一种事后

---

① 美国外交官（1904—），于1947年提出了遏制政策，主张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颠覆、特别是局部性的军事干涉和持续的政治冷战，来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影响，加强美国对西欧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控制。这一政策对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时期的美国外交方针曾有一定影响。——译者注

② 美国经济学家、教育家和企业家（1920—），1982年接替辞职的亚历山大·黑格出任国务卿，并且在里根政府的第二个任期继续担任此职。素以稳健的作风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而著称。——译者注

诸葛亮的看法，而是一种记录在案的客观事实。

对于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来说，罗纳德·里根是一个先天性的白痴，他却令人惊讶地对苏联政体的弊端做出了正确的估价。“今后几年对于我们国家，自由的理想和文明的传播将是非常重要的，”他于1981年5月在圣母大学对学生们说，“西方将不会容忍共产主义，我们将战胜共产主义。我们不会因公开谴责它而感到麻烦，我们将把它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悲哀和奇异的篇章而予以删除，即使现在还在书写这个篇章的最后一页。”1982年6月，他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时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尔·马克思是正确的。我们今天正在目睹着一场重大的革命危机——一场对于经济秩序的需求正在与政治秩序的需求发生直接冲突的危机。但是，这场危机不是发生在自由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而是发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种不再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结构，一个生产力被政治所牵制的社会。”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并且预测东欧和苏联自身将因“反抗镇压而反复爆炸”。1983年3月8日，里根在他那次著名的“邪恶帝国”的演讲中再次声明：“我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另外一个悲哀和奇异的篇章，即使现在还在书写这个篇章的最后一页。”

现在让我们把那些声明与美国主流知识分子的观点做一个对照。阿瑟·施莱辛格[①]在1982年访问莫斯科之后宣称：“我在商店里看到了更多的商品，在市场上看到了更多的食品，在大街上看到了更多的轿车——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比以往更多，只有鱼子酱除外，这不知是何缘故。”他在进行总结时，锋芒直指里根政

① 美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和政府官员（1917—）。因《杰克逊时代》（1946）一书获得普利策奖。肯尼迪政府时期担任拉丁美洲事务特别助理，因《肯尼迪在白宫一千天》（1965）一书而再获普利策奖。——译者注

府："美国有些人认为苏联正处于经济与社会崩溃的边缘，只要用力推一下就把它翻到悬崖下面去了，但这些人……只是在自欺欺人。"施莱辛格将这些美国人与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的苏联人相比较后指出，双方都有一些"痴心妄想者"，他们"总是看到别人的社会比他们自己的更脆弱。实际上每一个超级大国都有经济麻烦，只是双方都还没有倒在缆索上而已。"

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①]于 1984 年做出了一个相似的估价。"俄罗斯体制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与西方工业经济大不相同的是，这种体制充分地利用了它的人力"，他指出，"苏联经济体系在最近几年中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苏联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的休厄林·比亚勒在《外交事务》（1982）杂志上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现在的苏联在下一个十年中将不会在一场真正的体制危机中苦苦挣扎，因为它以自己拥有强大的、未经使用的政治与社会稳定的潜力而感到自豪，这种潜力足以使苏联忍受最大的困难。"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②]在他的教科书《经济学》（1981）中将这一点说得更为激烈："如果认为大多数东欧人生活在悲惨之中，那么它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莱斯特·瑟罗早在 80 年代末期就在他的教科书《经济问题》中声称："指令性经济能够显著地增强和促进经济的增长过程吗？苏联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表明这是可以

---

① 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主要代表人物（1908—），著作甚丰，在 1967 年出版的《新工业国家》一书中，提出用知识上和政治上的新措施来解决美国经济竞争衰减的问题，展示了美国"管理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日益增多的相同点。——译者注

②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15—），1970 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美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20 世纪现代主流经济学集大成者，现代经济学之父，因提出统一的经济活动理论而被称为经济界中的爱因斯坦。他的著作《经济学》是一本学习经济学的必读经典，首版至今逾 50 年，总销量达数千万册，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其思想影响了几代人。——译者注

的。1920年，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只占有较小的份额。今天，它的经济成就却可以与美国相媲美。”

当《时代》周刊宣布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十年风云人物”时，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在一篇引起强烈争议的文章中宣称：“鸽派人物在过去40年的激烈争论中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他认为，那些与里根政府中一样的反共产主义人士，他们的观点是基于一种“对苏联行为所作的怪诞夸张。他们认为苏联拥有无限的和致命的实力，包括自信心、杰出才能以及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资源。”然而，记录表明与此相反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真实的。自由主义或者左翼一贯过高估计苏联的实力。属于自由主义或者左翼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伦纳在《争鸣》杂志上承认：“一个人看起来越接近右翼，就越有历史的预见性；越接近左翼，这种历史预见性就越少。”

罗纳德·里根坚信苏联体制具有一种根本性的弱点，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演说中，而是更多地转化为美国的政策。里根政府试图利用苏联的弱点，以确立美国的战略优势。共产主义被致命的矛盾所撕破了，它虽然在全球事务和军事方面野心勃勃，但也面临着国内经济与资源方面的难题。如果施加足够大的压力，那么克里姆林宫将在维持其全球帝国和解决其国内难题这两者之间面临着抉择。

1982年初，里根总统和几位重要顾问开始制订一项战略，对苏联体制的基本经济与政治弱点进行攻击。“我们采取了一项包括经济战在内的全面战略，用以攻击苏联的弱点，”卡斯帕·温伯格[①]回忆道，“它是一场无声的战役，与盟国一道开展工作，并且要使用其他措施。”这是一种战略攻势，其目的就是要把超级大国的斗争矛头转向苏联集团、甚至苏联自身。

---

① 在里根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译者注

这一攻势的目标与手段被概述为一系列绝密的国家安全决策指示（NSDDs），由里根总统在1982年和1983年签署。（NSDDs是一种总统对他的高级顾问与部门就主要外交政策事务做出指示的正式书面命令。在诸如这类情形中，这种书面命令通常属于绝密级。）在许多方面，这些指示标志着美国前不久实施的政策基本上结束了。总统于1982年3月签署的NSDD—32号指示声称，美国将设法“抵消”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并且批准采取隐蔽行动和其他手段，以支持该地区的反苏组织。里根总统于1982年11月批准的NSDD—66号指示声称，通过对苏联经济赖以生存的“战略性三位一体”的关键性资源进行攻击，进而瓦解苏联经济，这将成为美国的政策。1983年1月，里根草签了NSDD—75号指示，要求美国不要只是与苏联体制共存，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它。好几份这类命令都是将一项富于攻击性的美国政策用于击退苏联的势力，并且从事一场反对苏联的经济战或者资源战。里根政府虽然没有给苏联造成危机，但是加剧了苏联体制的崩溃。

当开始实施这项战略时，存在着一个简单的分工问题。从未有一个人了解全部详情，里根决定着轨道该通向哪里，国家安全委员会（NSC）[①]的成员负责修筑轨道，威廉·凯西[②]与卡斯帕·温伯格确保火车到达目的地。

---

① 美国总统行政部门中的一个机构，1947年根据《国家安全法》而建立，就内政、外交及军事政策等有关国家安全的部分向总统提出建议。美国总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其他成员包括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局长及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同意的其他官员。——译者注

② 里根政府中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1913—1987），是一个有影响和有争议的人物。1941—1946年，到欧洲为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工作，指挥从伦敦派遣到欧洲大陆的间谍。中央情报局在他的领导下，加强了对各种反共组织的支持。在伊朗门事件中，他被认为是关键人物。1986年12月在预定为此事到国会作证之际患脑溢血，第二年去世。——译者注

由于里根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采取隐蔽行动，因此中央情报局（CIA）[①]局长凯西就处于执行这项战略的核心地位。在美国历史上，他无疑是一位最有权势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并且可以亲自接近总统。由于这项战略的全面性以及使用隐蔽方法，因此凯西时常冒险涉足传统上由其他内阁成员所把持的外交政策领域。“比尔·凯西在某种程度上把他自己当作了国务院和国防部，”80年代担任总统情报监督委员会主席的格伦·坎贝尔回忆道，“他无处不在，无事不做。‘中央情报局局长’只是一个标签，而不是一种职业。”

凯西所涉及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秘密的，甚至对总统的一些高级助手也是保密的。“你从来不知道比尔·凯西的活动，”担任里根第一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理查德·阿伦回忆道，“他有一架不起眼的黑色飞机，一年到头要在其上度过四分之一的时光。他在全世界周游，办理一些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情。有时甚至连总统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正是凯西掌管着里根战略的几个关键因素，包括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所采取的隐蔽行动。“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能使苏联陷入麻烦，他都会去做，”里根的密友、担任过财政部长和总统办公厅主任的唐纳德·里甘回忆道，“他总是在思考这件事情，并且被它搅得心神不宁。”

凯西对苏联所抱有的成见并不新鲜。他的这种经历可以回溯

---

① 美国政府的主要间谍和反间谍机构。1947年正式成立，其前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略情报局（1942年由罗斯福总统下令组建）。该局的任务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事宜提供咨询意见，提出有关协调政府各机构的情报活动的建议，核实和估价各类情报并负责在政府内部的正当传递，以及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达的其他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职能。由4个部门组成：负责情报分析的情报处，负责秘密活动的行动处，负责技术设备和科技支持的科技处以及负责行政管理和安全保卫的行政处。——译者注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在战略情报局（OSS）[①]供职。对于凯西来说，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新的威胁，而是纳粹德国所造成的威胁的主要部分。“他明确地将此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的一项未竟事业，”在转到中美洲之前、直到80年代中期仍在阿拉伯半岛活动的阿朗·菲耶尔说，“这就是为什么他盯着这个局长的职位，他要把它作为一种继续战斗的机会。”

另外一位是卡斯帕·温伯格，他长期以来一直是里根的朋友与助手。温伯格对技术创新怀有一种强烈的感激之情，并且不喜欢共产主义。在他的心目中，技术创新是美国的一种独特优势，能够也应该用它来损耗苏联的经济。“以己之长击彼之短，这是一种思想，”温伯格回忆道，“而我们的长处就是经济与技术。”这就意味着要把东西方军事竞争的重点从数量转向质量。温伯格认为，美国的技术创新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如果不受阻碍，那么就可以把莫斯科远远地抛在后面。在五角大楼的绝密文件中，温伯格将此称为“经济战”的一种方式。他知道苏联体制的技术弱点，并且打算利用这一点。

温伯格所主持的国防建设，并不是单纯地表现为增加预算。花了多少钱与拥有多少钱是同等重要的。按照马赫穆托·艾哈迈托维奇·哈列夫将军的看法，困扰莫斯科的是国防建设“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步伐与形式……急剧地加强。”温伯格也坚定地认为，苏联如果从西方得不到贷款与技术，那么它的日子就无法再过下去了。只要有可能，他就抓住每一次机会努力争取对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进行限制。

---

①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的间谍和反间谍活动从前由陆军、海军和联邦调查局分别进行，机构重叠，相互竞争，缺乏协调。1942年6月，罗斯福总统下令组建战略情报局。该军事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外国情报，进行反宣传和秘密活动。其活动范围涵盖除拉丁美洲和太平洋战区以外的全球各地，在欧洲的活动最为频繁。该局人员最多时达12000人。1945年10月，该局解散。——译者注

只要看一看凯西和温伯格是里根第一个任期的内阁成员，并且与总统一道进入第二个任期，那么就知道他们两人在制订战略的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显赫地位了。按照惯例，应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制订战略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里根的老朋友、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威廉·克拉克虽然没有领受制订外交政策的任务，但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这项战略的某些最重要部分的制订进行监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诸如约翰·波因德克斯特、罗伯特·麦克法兰、罗杰·鲁滨逊、理查德·派普斯、比尔·马丁、唐纳德·福捷以及文森特·坎尼斯特拉罗，对这项战略的制订都起了关键作用。麦克法兰和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上将在克拉克之后先后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们使这项战略的关键部分得以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并且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内予以实施。

这项攻势战略是在里根当政的初期策划的，1987年初的进攻势头有所衰减，当时由于伊朗反政府人员、重要高级官员的流失以及政府内部分工等问题的联合重压，有力地抑制了它的进攻势头。这项战略打击了苏联体制的核心，包括：

- 以隐蔽手段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活动予以财政、情报和后勤方面的支持，以确保反对派在苏联帝国的心脏得以生存；
- 对阿富汗抵抗组织提供切实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也对穆斯林游击队提供支持，把战争引向苏联自身；
- 通过与沙特阿拉伯合作而压低石油价格，并且限制苏联向西方出口天然气，从而发起一场使苏联的硬通货收入显著减少的战役；
- 发动一场圆滑而详细的精神战，在苏联领导层中间煽风点火，使他们变得优柔寡断和担心害怕；
- 发动一场包括秘密外交在内的全面的全球性战役，

从而极大地减少苏联获得西方高技术的可能性；

- 发动一场广泛散布假技术情报的战役，企图瓦解苏联的经济；
- 开展一场具有进攻性的高技术国防建设，使苏联在经济上感到严重的压力，并且加剧其资源危机。

这些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在很多情况下只限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阁中的少数人。“这些倡议几乎没有在内阁会议上讨论过，”克拉克回忆道，“总统只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与二、三个顾问做出决定。”例如，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只比公众提早几个小时获悉“战略防御倡议”的有关情况。美国为波兰团结工会提供秘密援助的事情，也只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少数几个人知道。鼓励与援助穆斯林游击队在苏联境内发动军事进攻的关键性决定，从来没有在内阁成员中进行过讨论，总统只是与克拉克和凯西进行讨论后就做出了决定。

有关美国政策与冷战结束之间的关系的许多文学作品，包括唐·奥伯多弗的《转折》以及迈克尔·贝斯洛斯和斯特罗布·塔尔博特的《高层内幕》，几乎都专门涉及到了外交手段的细微差别。这类手法更多地反映的是作者的观点，而不是里根政府的观点。罗纳德·里根或许是当代总统中很独特的一位，他不把军备控制协议与条约看作他在外交事务中取得成功的手段。对于大多数军控协议，他很少花时间进行研究，而是把东西方之间的斗争看作一场善良与邪恶之间的生死战斗。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不打算探究在冷战结束前就已经反复挖掘过的外交与军备控制领域了。这一关键时期也不是美苏关系的历史，相反，这是一份旨在击退并削弱苏联势力而在经济、地缘政治和精神战线展开秘密进攻的记录。

然而，小心谨慎的记录井井有条。正如肯·奥莱塔写道：“没

有一位记者能够百分之百地准确再现以前某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记忆可能与事件的亲历者开玩笑，当事件的结果已经变得清晰可见的时候更是如此。一位记者可能试图通过核对各种各样的资料来防止错误的发生，但是，由于新闻从业人员所受到的局限性，因此这些错误的资料对于一位读者（以及一位作者）来说还是很有用的。”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19)
第三章 …………………………………………… (28)
第四章 …………………………………………… (49)
第五章 …………………………………………… (62)
第六章 …………………………………………… (79)
第七章 …………………………………………… (95)
第八章 …………………………………………… (112)
第九章 …………………………………………… (132)
第十章 …………………………………………… (149)
第十一章 ………………………………………… (171)
第十二章 ………………………………………… (195)
第十三章 ………………………………………… (211)
第十四章 ………………………………………… (228)
第十五章 ………………………………………… (238)
第十六章 ………………………………………… (250)
第十七章 ………………………………………… (271)
第十八章 ………………………………………… (284)
后　记 …………………………………………… (311)
致　谢 …………………………………………… (316)

第一章

1981年1月，华盛顿特区的天气冷得出奇。夹着雨水的雪正在结冰，凛冽的寒风顺着波托马克河呼啸而下。尽管如此，在首都却涌动着一股与任何一次权力交替相伴相随的热切期望。罗纳德·里根在其总统就职典礼仅仅两天之后，就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召见了他所任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总统刚一上任就私下里会见中央情报局长，不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非同寻常的。要知道，当时还需要总统签署一项预算，并且政府里剩余的职位亟待任命。新政府关注的中心问题应当是经济，但是，罗纳德·里根所接见的人不仅是他的中央情报局长，而且还是他所信任的一名亲密顾问。

里根对于凯西的这种信任贯穿于长期竞选活动的始终。1980年1月，当凯西接任里根的总统竞选委员会主席一职时，该委员会出现了分裂并且处于混乱状态。“许多人忘记了，1980年初罗纳德·里根没有多少当选总统的希望，”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阿伦回忆道，“比尔·凯西帮助扭转了这种局面。”在竞选活动的后期，里根听从了凯西的忠告。总统知道，他今天之所以能够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部分原因就在于比尔·凯西把他的管理经验与政治敏锐性注入到了竞选活动之中。里根的一位顾问与竞选官员马丁·安德森说：“罗纳德·里根对比尔·凯西怀着一种感恩之情，这是任何一位竞选成功的领导人对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们都会做的事情。”然而，在1980年大选后的几周内，正当令人垂涎的内阁职位处于分配过程之中，凯西越来越感到失望了。他原

以为凭着他与总统之间的相互信任与认同，他应该被任命为国务卿，这是凯西所觊觎的职位。但是里根选择了以戏剧性的方式退役的前北约盟军司令亚历山大·黑格，此人的明显特点就是遵守纪律。在许多方面，黑格与里根都没有什么关系，他在竞选活动中没有发挥作用，既不是里根的朋友也不是里根的敬慕者。当然，他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被认为对于国务卿的工作是重要的，这就是他的经验与风度。

到了 11 月底，总统终于点到了比尔·凯西，但是为他提供的职位非常不合这位前竞选委员会主席的心意。中央情报局长这个差使更多的是作为仆人，而不是作为决策者。这个角色很少能够进入总统周围的圈子或者权力中心，因为中央情报局长通常就是对情报做出评估。在里根定了调子之后，凯西告诉他："让我想一想，然后再答复你。"

比尔·凯西想来想去，总觉得按照惯例来看，中央情报局长这个职位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但是，综合考虑所有的安排与计划，67 岁高龄的他已经没有进入国家权力核心的其他选择了。因此，他决定充分利用这个职位，挤进核心决策集团之中。

在里根提出这个职位的几天之后，凯西给当选总统回电话，说他在三个条件之下将接受这个职位。他补充说，这三个条件是不能够商量的。第一个条件是在任何重要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中，他要完全享有内阁成员的级别与席位，因为他不想使自己被排斥在决策圈子之外。

凯西提出的第二个条件是，要在白宫有一个综合办公室。他想容易地接近白宫人员和总统，而不想被流放到兰利[①]。政治就像商业房地产一样，职位就是一切。他可以未经通报就随便进出椭圆形办公室，这可以对美国政策产生非正式的影响。但是，他

① 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Langley）。——译者注

想在白宫找一块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总统外交情报顾问委员会供职的马丁·安德森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回忆道："凯西在老行政办公大楼（OEOB）的三楼拥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和秘书，这就意味着他随时可以私下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任何成员交换意见。凯西也可以在他的办公室里召开会议，以避开他所领导的那个官僚机构。他在老行政办公大楼里拨打与接听的电话完全是保密的，就像在中央情报局总部那样不用录音带录音，只是仔细地进行记录。"

凯西提出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条件是"门户开放"：凯西要总统向他保证，他可以随时直接进入椭圆形办公室。"他不想在其他人通报后才能与总统谈话，"凯西在中央情报局的特别助理赫布·迈耶说，"他想要独自给总统打电话，或者直接面晤总统。"

对于凯西的这些要求，里根马上就同意了。这样一来，凯西立即就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了。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凯西处于外交政策的权力核心。凯西与总统达成的这个协议，使他在内阁中获得了一个席位，也成为更加唯我独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更为重要的是，他成为不久之后成立的国家安全规划小组（NSPG）的一员，这个小组真正掌握着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其成员仅限于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现在又加上比尔·凯西。

但是，凯西除了掌握延伸到老行政办公大楼的办公室的正式权力之外，他之所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中央情报局长，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与总统的亲密关系，这是凯西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优势。"他们两人性情相投，"赫布·迈耶说，"他们都是爱尔兰裔美国人，一起度过了大萧条的年代，具有共同的世界观。在里根当政的时代，他们两人每周会见两次，而且常常是单独会见。他们经常在电话里交谈。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

总统那里来来往往，而每次在那里总可以看到比尔·凯西。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中央情报局长。”凯西、阿伦、温伯格这些人都强烈主张对苏联的挑战予以回击，他们都能够接近总统。

凯西到中央情报局在兰利的总部与大家见面之后，便快速地钻进了一辆没有标记的奥尔兹[①] 98 型汽车的后座里。总统在 1 月底对他任命之后，中央情报局对这辆车进行了彻底的安全检查。这辆车的窗玻璃呈深蓝色，既防弹又防爆，而且派有全副武装的安全保卫人员。有一个人持枪坐在司机旁边，并且抱着一个弹药筒。在后座上有好几部可供凯西打到兰利总部和白宫的电话，以及一部他想找谁就找谁的保密电话。这辆奥尔兹汽车后面跟着一辆安全保卫车，坐着 4 位保安人员，每人背着一个弹药筒，并且也带着一支隐藏在特大型公文包中的乌齐[②]冲锋枪。距离宾夕法尼亚大街 1600 号[③]两个街区的地方，司机称其为“白宫安全区”。“男爵”（凯西的代号）很快就到达了。

凯西与总统的会面有点晚了。只见他急匆匆地迈上了白宫北入口的台阶，微微躬身向上走着，手臂随着脚步随意摆动。在一只臂膀下面夹着几个马尼拉麻纸信封，手里拿着一支钢笔，从引导车里出来几个保安人员紧紧地跟了上去。凯西迅速地走进白宫，几个保安人员第一次目睹了里根的间谍首领。光秃秃的头顶上有几缕白发，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露出一副像他这种已届退休年龄的老人所常有的和蔼面容。他此时还没有领受任务。

---

① 由美国发明家、汽车制造商兰塞姆·奥尔兹（Ransom Olds, 1864—1950）设计、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种汽车。奥尔兹首创流水线装配法，于 1899 年创建奥尔兹汽车工厂，1904 年创建里俄汽车公司。——译者注

② 为世界各地警察和特种部队使用的一种小型自动枪械。“乌齐（Uzi）”得名于其设计者、以色列陆军军官乌齐尔·加尔少校。1948 年阿以战争后，他在早期捷克冲锋枪的基础上设计了这种枪，其特点是自动射击时稳定、准确。——译者注

③ 美国总统官邸白宫位于首都华盛顿市宾夕法尼亚大街 1600 号。——译者注

但是，所有的朋友和敌人仅仅是暂时被他那种和善的外表所蒙蔽。他一旦开口说话，那个狡猾而犀利的头脑就会把一个真实的威廉·凯西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他与理查德·阿伦和白宫律师埃德温·米斯简短交谈之后，就去见里根了。

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凯西一边向总统问候，一边与他亲切握手。他们相互之间开了一两个爱尔兰式的玩笑，然后很快就进入正题。由于里根的一只耳朵有点背，因此即使说话最清脆、最准确的谈话者，他也要努力倾听才行，还不时要求他的助手们说话大声一点。凯西在说话时咬字不清，语无伦次，因此总统听起来就更为费力。（里根经常开玩笑说，比尔·凯西是第一位不需要保密电话就可以与其通话的中央情报局长。）在总统竞选活动的后期，凯西学到了一个对他在其后作为政府官员非常有用的重要窍门。他总是设法呆在里根的旁边，这样里根就可以清楚地听到他所说的话了。

里根的听力不佳与凯西的话语含混，使得后来人们做出这样的推测，即总统真正通知的事情就是比尔·凯西所建议或者正在做的事情。一位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说道："有时候我们怀疑总统是否完全听懂了比尔所说的话，但是只要他对某件事情点一点头，国家就要这么去做。"

凯西的文件夹塞满了为新任总司令准备的一些地图、表格图和曲线图。他还带着一些涉及苏联经济的原始资料与报告。"总统先生，"凯西一边翻阅着他的文件夹一边开了腔，"我想花一点时间向你汇报一下有关苏联人的最新情况。他们的境况非常不好，正在苦苦挣扎。"他将一些有关苏联制造业的瓶颈与缺陷的原始资料以及从情报中摘录的一些有关趣闻轶事的材料呈给总统，同时呈给总统的还有一张苏联硬通货收入升降情况的图表。"苏联人的情况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糟糕，"他告诉里根，"我想让你亲眼看一看他们的经济是多么的病态，因而是多么的脆弱。

他们由于过分扩张，因而使其经济步履蹒跚。波兰发生了动乱。他们在阿富汗陷入了困境。古巴、安哥拉和越南成为这个帝国的负担。总统先生，我们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我们能够使他们受到严重的损害。”

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停顿。凯西继续说道：“总统先生，我每周都给你呈送一些有关事情进展的原始资料——一些未经过滤的资料。我也正在整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它们涉及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我们如何利用这一点来增强我们的优势。”

凯西在其中央情报局长的整个任期内，每周五都将一些原始资料呈送总统，这一举动对里根及其对于苏联的看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基于一种特定的目的而阅读原始资料，这对于一位美国总统来说是空前的，但这对于他了解苏联的相对弱点是关键的第一步。1982 年，当威廉·克拉克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这种源源不断的情报进一步增加了。“总统喜欢阅读有关苏联经济的原始资料，”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回忆道，“特别是一些趣闻轶事，诸如工厂由于缺乏备品备件而停工、硬通货匮乏以及排队购买食品等，这使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有助于使他相信苏联的经济面临着很大的麻烦。”根据里根在其私人日记中的记载，这种看法是站得住脚的。1981 年 3 月 26 日，里根在日记的开头写道：“苏联经济情况汇报会。他们的境况极其糟糕，如果我们能够切断对他们的信贷，他们就不得不呼喊‘大叔’，不然就得挨饿。”由凯西亲自挑选的情报以及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挑选的情报，都呈送到椭圆形办公室里了。

在听取了凯西 20 分钟的汇报后，总统说：“比尔，你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提交给国家安全规划小组呢？”于是，在 1 月 30 日召开的国家安全规划小组会议上，关于对苏联采取隐蔽战略进攻行动的主题首先被提出来了。除总统之外，当时这个小组的成员

还有布什副总统、卡斯帕·温伯格、亚历山大·黑格、比尔·凯西和理查德·阿伦。当时苏联人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了阿富汗，因为他们在那里有 89000 人的部队。苏联军队仍然聚集在波兰周围，一场军事入侵的前景正在明朗化，而西欧对此似乎不感兴趣，继续给莫斯科贷款以修建一条粗大的天然气管道。

国家安全规划小组的全体成员都认为有必要增加国防预算，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这种趋势在卡特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大家都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恢复我们的实力，”温伯格回忆道，“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这次会议是由阿伦主持的，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美国对于苏联的政策存在着战略性的缺陷。在对预算问题的讨论结束后，阿伦对美国的目标进行了广泛的分析。“讨论非常热烈，”温伯格回忆道，“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们决定有必要在波兰与苏联进行对抗。不仅要防止苏联人的入侵，而且要设法破坏他们在波兰的影响。”

美国对苏联的这种政策还没有进行一般性的推动，能言善辩的国务卿黑格就在为一种“冷静的缓和”政策寻找根据，他认为这种政策能够促使苏联进行谈判，而这对美国是有利的。黑格认为，通过对军队进行改造并且基于一种“实力地位”而进行谈判，美国的利益将得到保护，世界的稳定将得以维持。黑格实际上是在重申遏制政策，这是一种自 1947 年以来就一直指导着美国对外政策的正统观念，或许福特和卡特当政的几年里可以除外，当时由于越南战争的阴影，美国人民缺少一种坚忍不拔的毅力。在温伯格和阿伦的有力支持下，凯西认为所受到的威胁是更为基本的因素，因此需要采取一种更具有前摄性[①]的手段。凯西说，美国的相对实力还不够强大。问题的实质还在于苏联体制的

---

① 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指回忆时先知资料较后知资料占有优势。——译者注

实力与完好状态，美国实力的增加不会改变所受到的威胁，而是只能阻止这种威胁。美国的目标将不仅是要相对提高美国的实力，而是要绝对降低苏联的势力。阿伦尖锐地指出：“当一个民主制度与一个极权制度作斗争时，前者往往处于一种明显的不利情况，因此我们需要扬长避短。”

这个讨论几乎持续了20分钟，最后凯西发表了一段鼓舞人心的发言：“总统先生，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一直是在遵守游戏规则，而没有越过雷池半步。但是，这种方法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如果他们的后院是可靠的，那么我们做什么并不重要，而只能寄希望于他们的行为脱轨。”

总统出于本能而支持采取一项更具进攻性的政策。早在竞选期间，他就对越南战争以来置于苏联控制之下的国家十分重视。凯西的发言结束后，会场沉寂了大约半分钟，最后里根说话了：“我认为在获得盟国的帮助等条件下，艾尔的想法最有可能在这个公开的竞技场上取得成效，而比尔的方案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一种战略构想。”

苏联人似乎知道了美国政府中存在的这种分歧。苏联问题专家休厄林·比亚勒前不久指出：“苏联分析家确实看到了里根政府内部所存在的不同与分歧，虽然他们起初认为这一点并不重要。例如，他们将前国务卿黑格和更为一般的国务院的反苏立场与国防部和白宫的反苏、反共立场区别开来。他们把前者说成是信奉以实力政策来阻碍苏联势力的扩张；而后者则是超越了这种立场，是一种讨伐苏联的政策。”

这种讨论局限于一种概念上的讨论，但它足以确定行动的初始航向了。总统似乎倾向于采取一项更强有力的政策，不仅要采取击退苏联人的试探性行动，而且要真刀真枪地与他们一决高下。

国家安全规划小组会议还决定，美国政府有必要针对苏联的

心理脆弱性而采取一项隐蔽行动。苏联人关注着罗纳德·里根，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无法预测的牛仔。在政府更迭期间，理查德·阿伦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①。“他们认为他们的手中已经掌握了一些过硬的资料，”阿伦回忆道，“他们对此怕得要命。”

美国新政府看到了培植那种战略构想所具有的价值，至少对于克里姆林宫墙里面是有价值的。阿伦说：“让苏联人认为他有点发疯了，这正是里根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概念是由已故战略家赫尔曼·卡恩②提出的，他把超级大国间的争斗比喻为公鸡斗架。从理论上来说，哪一方都不想失败，但哪一方都不想在对抗中让步。然而，最后必然有一方要让步，以防止全面战争的爆发。卡恩将这种现象简洁地概括为“没有一个人想与一个疯子挑战。”因此，牛仔的设想有其战略优势。这次会议确定了一项虽然不是正式的、却是非常强烈的心理战行动（PSYOP)。

这项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塑造克里姆林宫的思想，使其在心理上立足于防御，因此就少一点冒险的倾向性。这项行动包括在苏联外围采取一系列的军事试探行动。“这是非常敏感的事情，”前国防部副部长弗雷德·伊克尔回忆道，“任何事情都没有书面记录，因此都没有留下纸面上的痕迹。”

“有时候我们的轰炸机飞临北极，他们的雷达就会打开，”前

---

① 苏联外交家（1919—），1957—1960年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1962年3月出任苏联驻美大使。由于能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加上性格愉快开朗、机智敏锐，因而成为华盛顿社交界引人注目的人物。198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年底退休。——译者注

② 美国物理学家、战略家和未来主义者（1922—1983），因出版了《论热核战争》（1960）一书而成为著名人物。后来担任哈德孙研究所所长和研究主持人，主要研究国家安全和政府政策。他的其他著作有：《思考那些难以想象的》、《日本超级大国的崛起》、《日趋繁荣》等。——译者注

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杰克·钱恩将军回忆道，“另外一些时候战斗轰炸机将试探一下他们在亚洲和欧洲的外围。”在冷战的高峰时期，这类行动包括一周内进行好几次演习。他们的飞机也不定期地出没，这样就更增加了不安定气氛。然后，随着我方很快开始未经宣布的飞行，他们的飞行停止了，只有在一周之后才再次开始。

“我们真的与他们接触上了，”负责军事援助与技术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威廉·施奈德博士回忆道，他每次都要阅读有关美国飞行情况的《情况报告》，“他们不知道这类行动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空军中队能够径直飞入苏联的领空，他们的雷达开机并且各个单位拉响了警报。然后，空军中队在最后一分钟脱离编队并且返航。第一次试探性的心理战行动于2月中旬开始，主要是为了制造一种不确定的气氛，进而不让一个苏联人进入波兰。但是，只有整个政府都采取这些行动，才能够适宜地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一种心理信息。

凯西在参加国家安全规划小组会议的几天之后，召集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行动委员会开会。在政府所计划的进攻战略中，隐蔽行动将发挥关键作用。凯西想知道中央情报局采取隐蔽行动的能力以及他们能够更有效使用的试探方式。他向情报处要了几份备忘录。当阅读了这些报告之后，他发现这些报告的观点由于对情况的疏忽大意而变得僵化不堪。在他看来，隐蔽行动在外交政策中简直就没有得到充分使用，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观点。

很明显，在他的机构内部存在着障碍。约翰·麦克马洪是中央情报局负责行动的官员，但是，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这一点与凯西不一样。“约翰在70年代里接受议会调查时受到了伤害，”中央情报局前高级行动官员文森特·坎尼斯特拉罗说，“他非常不情愿冒险。在我们所做的几乎任何事情上，他都能看出萦

绕于我们心头的那些疑虑。”

那个时候，一项主要的隐蔽行动就是支持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反抗苏联的入侵。这项计划是苏联在1979年的圣诞节入侵阿富汗几天之后，应卡特总统的要求，由斯坦斯菲尔德·特纳①制定的，它在加强抵抗苏联军队方面或多或少取得了一些成功。中央情报局在埃及购买武器，在巴基斯坦情报机构的协助之下，将这些武器经由巴基斯坦运抵阿富汗。1980—1981年，向穆斯林游击队提供的武器总价值大约为5000万美元。美国的定期目标就是收集情报，并且批准实施一项旨在对苏军进行“骚扰”的计划。由于沙特阿拉伯担心苏联在该地区采取冒险主义，因此为该计划做出了额外的贡献。沙特人同意为美国分担一定比例的费用。

华盛顿想让送到抵抗组织手中的任何武器都是苏联制造的，这样，一旦苏联人抱怨美国支持抵抗组织时，美国官员就能够合情合理地予以否认。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把埃及作为隐蔽通道，有几方面的原因。开罗同情在阿富汗山区进行战斗的穆斯林兄弟，并且埃及有大量苏制武器，这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与莫斯科进行紧密军事合作时的遗产。另外，中国当时正在生产苏联设计的武器，因此也可以作为一个参与此项行动的可能对象。

但是，当这些武器通过隐蔽渠道运抵阿富汗时，它们的质量不能令人满意。中央情报局所支付的钱是要得到一些对付苏联人的半先进武器——AK—47步枪②、发射器和地雷。然而，送到穆斯林游击队手中的却是老式的拉栓步枪、发霉的弹药以及生锈的装备。“埃及人漫天要价，卖给我们的却是一堆废物，”一位官

---

① 卡特政府时期担任中央情报局长。——译者注

② 又称卡拉什尼科夫1947型步枪。苏联的突击步枪，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肩挂武器之一。首字母AK代表俄语Avtomat Kalashnikov（即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以纪念设计者M.K.卡拉什尼科夫（1919—）。——译者注

员回忆道，“这些武器只能是吓唬吓唬苏联人，却使一些勇敢的穆斯林游击队员丧命。”

穆斯林游击队司令因中央情报局向他们提供质量低劣的武器装备而抱怨了好几个月。但是，兰利对此什么也没有干，因为担心与埃及人对抗会使此次行动公开化。凯西在刚刚走马上任中央情报局长的那些日子里，审查了某些来往于开罗与兰利之间的电报，种种情况使他感到愤怒与憎恶。

在早期的会议上，当新局长专心致志地听取汇报时，麦克马洪和他的助手们围坐在桌子的四周。在简要地汇报了6项隐蔽行动之后，话题转到了阿富汗。麦克马洪向凯西汇报有关送给“穆兹（muj）”（人们在兰利就是这样亲切地称呼穆斯林游击队员）的武器数量，他说苏联人正在为他们的占领而付出代价。麦克马洪汇报完之后，凯西接着话茬儿说道：“我们提供给穆斯林游击队的那些武器纯粹是一堆废物。我们需要送给他们真正的武器。你告诉你在开罗的人，要他们纠正这个问题，我在4月份去开罗时也要向萨达特[①]提出这个问题。我要让苏联人付出代价。”然后，他身子向前倾着，突然语气激昂地说道：“支持抵抗组织，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只能做得更多！我要让这类行动出现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地方，那些我们能够打败他们并且把他们送回老家的地方。那些处于困境的国家便是我们最好的盟友。我们必须要让共产主义者感到难受。我们必需使他们流血。为达此目的，我们在这里要改变一些事情。”麦克马洪忧心忡忡地离开了会场。看来，安全行动官员遇到了“十字军战士”。

---

①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Muhammad Anwar el— Sadat，1918—1981），埃及陆军军官、政治家，1970年担任埃及总统直至去世。1977年对以色列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访问，1978年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79年3月26日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1981年10月6日在纪念1973年10月阿以战争的阅兵式上被穆斯林极端分子杀害。——译者注

比尔·凯西在其局长的任期内，尤其是在第一年里，宣布重组中央情报局，使之恢复生机和焕发活力。在凯西的前任、海军上将斯坦斯菲尔德·特纳的领导下，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缩减了十分之一，给凯西留下了 14000 人和大约 10 亿美元的预算，却没有多少行动。特纳是一个专家治国论者，非常相信卫星与电子情报，而对于人工情报来源或者隐蔽行动的效果则非常怀疑。在这位海军上将作为中央情报局长的 4 年里，共取消了大约 820 个秘密职位，因而导致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情报人员的士气低落。尽管中央情报局在公众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机构，但它在 1981 年初却很虚弱，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中央情报局在我们最需要的地方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一位官员回忆道，“我们在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接壤的地方无法采取隐蔽行动，在铁幕[①]之后的隐蔽行动就更少了。

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上将回忆道：“的确，在早些年，我们对他们的军事能力有一个大概的图像，但我们对苏联的决策过程一无所知，对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的下一步打算一无所知。我们也几乎没有采取隐蔽行动的能力。”

凯西看得很清楚，部分问题出在国会。他于 1 月 13 日在参议院的听证会期间坦率地指出，他计划“减少”加在中央情报局身上的“限制”。他说：“我指的是那些能够对执行任务造成损害的僵硬而烦琐的职位。”毫无疑问，他感到国家已经到了破釜沉舟的时候了。（到了夏天，他引人注目地减少了执行国会委派给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任务的工作人员数量。）

---

① 指阻碍消息和思想交流的无形屏障。现在公认使用“铁幕（Iron Curtain）”一词的人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但此词被广泛使用则始于 1946 年 3 月 5 日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的演说，他在提到共产党国家时说：“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道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译者注

然后就是士气问题。中央情报局已经被攻击好几年了:英国国教会财政管理委员会[1]的听证会、特纳的整肃行动、在越南实施芬尼克斯计划和针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拙劣暗杀行动的失败,还有针对反越战抗议者的国内间谍行动。比尔·凯西想把所有这些阴影统统从中央情报局中驱散出去。“我们已经把过去几十年中的困难抛到脑后了,”他在 1981 年初给一位雇员写信说,“中央情报局现在到了在公众心目中恢复其更为传统的低姿态的时候了。”

当中央情报局的这位新任局长获悉留给他的情报来源甚为有限的情况时,他感到惊奇。“这种情形使比尔目瞪口呆,”他的特别助理赫布·迈耶回忆道,“要知道,我们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我们在苏联却没有一个一流的情报网。根据他在战略情报局的经验,他没有把过去的事情作为不能开展工作的借口。”

战争年代对比尔·凯西关于国家间的竞争、延续的斗争、经济战以及隐蔽行动效力的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4 年秋天,盟军准备入侵纳粹德国,但对于在德国作战会遇到什么事情的情报却极为稀少。在意大利、法国、北非甚至在中欧,他们已经能够招募新的情报人员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了,这些情报拯救了盟军士兵的生命并且有助于盟军更好地对付德军。在德国本土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没有情报人员为他们提供敏感的军事情报,也看不到能够建立一个情报网的前景。盟军的指挥官们开始与战略情报局局长、绰号为“野蛮的比尔”的多诺万[2]商谈这个

---

① 英文为 Church Commissioner, 又译“教牧人员救济委员会”,英国圣公会组织。由安妮女王补助教牧人员资金管理局(1703 年成立)和原教牧人员救济委员会(1836 年根据议会法令成立)于 1947 年合并而成。——译者注

② 威廉·J·多诺万 (William J. Donovan, 1883—1959),美国律师、军人、外交官。1942 年出任新成立的战略情报局局长。1943 年晋升为准将。他虽然最先主张建立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机构,但拒绝在 1947 年成立的中央情报局担任任何职务。1953—1954 年任美国驻泰国大使。——译者注

问题。令许多人吃惊的是，多诺万把这个最为敏感和关键的情报收集任务交给一个年仅 32 岁的前海军上尉，此人便是威廉·凯西。

这位海军上尉于 1943 年开始成为经济战委员会的一名顾问。按照凯西自己的说法，他的工作就是“查明希特勒的经济咽喉，并且研究如何通过封锁、优先购买和其他经济战手段来挤压它”。凯西发现这项工作有点意思，但是他渴望采取更多的行动。因此，1943 年他去拜见战略情报局官员查尔斯·范德布鲁上校。他们相处得很好，于是凯西在雇用合同上签了字，而且仅仅过了一年，他就被多诺万任命为在欧洲战区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负责人。

凯西本人对这个任命很满意，但他的工作却不值得羡慕。这位海军上尉很喜欢这次机遇，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之中。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工作（以及在某些合法手段的掩护下），凯西在纳粹的老巢建立了一个情报网，这是战时重要情报收集策略之一。约瑟夫·佩西科在他的《钻进德意志帝国》一书中写道，凯西能够“招募 200 名第一流的情报人员，渗透到纳粹堡垒的心脏。他们所伪造的文件，其以假乱真的程度足以骗过最严密的审查；所伪造的身份证，其令人相信的程度可以骗过狡猾的盖世太保①；他们设计了一套复杂而可靠的联系网络，并且还从事监督、证据收集与现场分析工作。”

---

① 纳粹德国秘密警察，德语全称为 Geheime Staatspolizei，英文简称为 Gestapo。1933 年 4 月希特勒当政后，由戈林组建并直接领导。秘密警察有“预防性逮捕权”，在纳粹德国时期，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左派人士、抵抗战士及犹太人等都未经法律程序而被盖世太保投入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盖世太保参加特别行动队，随正规部队进驻波兰和苏联，残酷杀害纳粹占领区人民和战俘，是纳粹党对被占领国家人民进行特务恐怖统治的工具。1946 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判为犯罪组织。——译者注

比尔·凯西的所作所为证明，他能够长时间地对敌人进行暗中破坏。由于无法向纳粹老巢空投美国人，因此凯西就在德军俘虏中间招募反对纳粹的志愿人员。这些情报人员讲德语，而且对柏林很熟悉，因此在行动中的配合非常自然。事实上，这种利用俘虏的方式违反了《日内瓦公约》[①]的相关规定，但这位年轻的间谍头目管不了那么多，因为那个时候必须孤注一掷。

1945年2月，凯西与他第一次招募的两个情报人员进入柏林。3月，他已经有了一支30人的情报队伍了。4月，他在德国的情报队伍扩大到58人。他们所采用的方式非常具有独创性。代号为“司机”的柏林情报小组，招募妓女成为间谍。

凯西在战争年代深深地陷入了有关间谍活动的世界之中，这对他产生了毕生的影响。所有的经历牢固地嵌进了他的灵魂深处，积累了对敌人采取必要的冒险行动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既与苏联共产主义有关，又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有关。在他去世之后出版的那本记录其战争经历的《与希特勒的秘密战争》一书中，他写道：“我认为，今天的人们要了解秘密情报、隐蔽行动以及有组织的抵抗运动在击败希特勒的战争中是如何挽救我们的生命财产的，这一点很重要。这些能力可能比用来对付今后出现危机的导弹与卫星更为重要，而且它也是持不同政见者在反对极权势力的控制与安排的斗争中进行联络的一种潜力。”

斯坦斯菲尔德·特纳虽然小心翼翼，但他也确实为他的继任

---

① 1864—1949年在瑞士日内瓦缔结的一系列国际条约，旨在改善战争对士兵和平民所造成的后果。1929年的第三个日内瓦公约即《战俘待遇公约》规定：交战国必须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战俘，提供有关战俘的消息，允许中立国代表视察战俘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一些交战国滥用早期公约中的原则，因此1948年国际红十字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开会，对现有条款加以扩充和编纂，其中要求对战俘给予人道主义待遇，提供足够的食物，发放救济品，以及禁止强迫战俘提供比最低限度更多的情况。——译者注

者留下了某些重要的情报资产。中央情报局在苏联集团高层有一个情报人员——瓦迪斯瓦夫·库克林斯基上校，他是波兰军队总参谋部的一位军官。库克林斯基勇敢地把有关苏联人在波兰的意图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央情报局。他所提供的一些敏感报告也包括一些《华沙条约》组织[①]的作战命令以及在欧洲的行动计划。由于库克林斯基作为一个渗透极深的间谍而处于这样一个敏感的位置上，因此特纳只让中央情报局某几个最高级的官员阅读他送来的报告。在政府里能够接触到这些报告的也仅限于最高层名单中的几个人。在卡特入主白宫期间，这个名单中只有总统、蒙代尔副总统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比尔·凯西维持了这个极小的最高层名单，没有几个人知道有关库克林斯基的功绩。尽管如此，凯西想在整个苏联集团中出现几十个库克林斯基，他也想提高中央情报局采取隐蔽行动的能力。因此，1981 年 3 月初，凯西赴中央情报局设在远东的情报站，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旅行。（在其整个任期内，凯西将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路上，超过他的任何一位前任。）他想会见处于第一线的人们，并且查明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这才是中央情报局的灵魂，而这种灵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见了。在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执掌中央情报局期间，他从前的执行助理威廉·盖茨注意到，“中央情报局蜷缩起来，摆出一副防御的架式。”

对于凯西来说，那种架式必须改变。他多次告诫他的助手们：“情报工作充满了风险，我期望我们与风险同在。我们要设法避免的只是不必要的风险。”

---

① 1955 年 5 月，苏联等东欧 8 国为了对抗北约，在波兰华沙签署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简称《华沙条约》。1989 年东欧剧变之后，该组织名存实亡。1991 年 7 月 1 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召开的华沙条约组织领导人的最后一次最高级会议上正式宣布《华沙条约》组织“不复存在”。——译者注

威廉·凯西是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中央情报局长而来到华盛顿的。由于他与总统的关系以及他在政府中的正当权力，因此他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位关键人物。“比尔·凯西喜爱工作，他对工作极其投入，”凯西的一位长期搭档、中央情报局与白宫之间的临时联络员戴维·威格如是说，“他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是很难低估的。”

凯西在1981年初就着手重建美国开展隐蔽行动的能力。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旨在改变冷战进程和加速苏联垮台的一项战略之下，这种能力最终将付诸使用。

第二章

随着美国新政府入主白宫，克里姆林宫严密地注视着华盛顿的一举一动。在整个70年代，随着苏联在世界上影响的扩大以及美国势力的衰落，莫斯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1979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①公开宣称，从越南到伊朗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预示着一个时代的诞生，在这个时代里“力量的天平正在偏向反对资本主义的一边。”当时美国仍然处于越南战争的阴影之中，而莫斯科却在进行冒险与侵略活动。苏联人通过一系列的外交行动在北非取得了一个立足点。现在他们在中美洲也有了潜在的盟友。1979年12月，克里姆林宫对自己控制局势的能力很自信(实际上是自负)，于是就入侵了它的一个邻国——阿富汗，当时该国政府由于两败俱伤的内讧而摇摇欲坠。

从表面上看，里根的当选被诸如米哈伊尔·苏斯洛夫②这类

---

① 苏联领导人（1906—1982）。1964年10月起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6年改称总书记)，直至去世。在他担任苏共和苏联国家最高领导人期间，苏联的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后期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由于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1967年提出苏联正处在“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旨在纠正前任赫鲁晓夫关于“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提法。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78年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9年出兵阿富汗，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译者注

② 苏联共产党领导人(1902—1982)。20世纪40年代后期进入莫斯科权力中心，此后在苏共领导集团中一直起着关键作用，主要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他主张对各种事件宁可采取强硬路线的政治解决办法也不要诉诸战争，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武力，如1968年的捷克事件和1981—1982年的波兰事件。——译者注

苏联思想家们看作是美国“正处于一种体制危机的困境之中”的证据，“右翼理论家们倾心于战争”，这是美国“即将垮台”的一种迹象。但在私下里，华盛顿的新政府在苏联集团领导人中引发了恐惧。

“中央委员会对里根予以广泛的关注，实际上对他感到恐惧，”后来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高级官员的叶夫根尼·诺维科夫回忆道，“他们在华盛顿想看到有关里根的最新情况。”克格勃将军、负责对外反谍报事务的奥列格·卡卢金赞同诺维科夫的看法：“里根其人和他的观点在苏联政府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忧虑，以至于苏联领导人近乎于歇斯底里了。有一些电报的内容反映了即将来临的危机。里根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克里姆林宫对里根的情况并不是完全不知道。按照惯例，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克格勃以及盟国的情报机构保存着里根及其助手们的档案。东德的“斯塔西（Stasi）”①于1980年在一份有关里根的简介中，将他描绘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共分子”，曾经领导过“一场政治运动，把进步人士从电影界和工会中驱逐出去。”这份材料把里根概括为“具有恶毒的反苏态度”，扬言要建立美国的“军事霸权”，企图“削弱革命成果”，并且扬言要利用“经济战”来反对莫斯科及其盟友。这使苏联领导人感到焦虑不安。这份材料还引用了里根在总统竞选中说过的一句话：“没有人想使用核武器，”他表面上这样说，“但是，我们能够使用这些武器，使敌人每天晚上在睡觉时都要提心吊胆。”最近发起的心理战行动就是为了迎合里根的这种想法。

---

① 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简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德国共产党在苏联帮助下于德国苏占区建立了秘密警察机构，1950年这一机构成为新成立的国家安全部，负责国内政治监视和国外间谍活动。在其巅峰时期，曾在39个部门中雇用了8.5万名专职人员。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以后，该机构被德国政府解散。——译者注

在意识形态的官样文章之外，情报部门的简要材料提供了大量有关当选总统个人生活与习惯的惊人的详细情报。里根喜欢把许多事情委托给下属办理，烟酒不沾，在意识形态方面毫不妥协，妻子南希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份材料甚至包括一份基蒂·凯利几乎在10年前就发表的一项独家新闻：据报道，里根夫妇定期研究占星术。

还有几份令人震惊的报告，它们是有关美国在卡斯帕·温伯格的领导下进行国防建设的情报。前苏联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回忆道："这些报告之所以刺痛了苏联政治局委员们，是因为在（70年代）那段特定的缓和时期之后，华盛顿来了一位新总统——里根总统，他突然决定改变美国的国防政策，开始大搞国防建设。我们在美国的情报机构获得的所有消息与报告……表明美国的基本战略力量已经对苏联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了。"同时，美国进行国防建设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

1981年2月初，比尔·凯西坐在中央情报局总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用手摆弄着领带，一边透过那面40英尺高的落地窗向外眺望着波托马克河及其附近的绿树林。办公室里还有约翰·布罗斯、斯坦利·斯波金以及另外两位助手。凯西的鼓舞人心的目标与想象就是使中央情报局重新焕发出活力，然而他发现中央情报局的许多官僚作风与此格格不入。他早先与约翰·麦克马洪和其他采取行动的助手们所召开的一些会议没有全部收到实效。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给他指出了危险信号。"麦克马洪是比尔·凯西的眼中钉，"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官员回忆道，"在他的整个任期内，麦克马洪可能妨害了比尔的许多倡议：不理睬他的要求、没有贯彻他的指示以及未能及时撰写报告或者备忘录。"

中央情报局行动处是由所谓的"HYPE帮"——即哈佛（Harvard）、耶鲁（Yale）和普林斯顿（Princeton）三所大学的毕

业生所组成（Estabilishment）的一个群体控制着。他们都是情报人员，衣着刻板，极少变化，而且言谈举止非常谨慎。凯西在对待花名册上的一流间谍时，有时候不得不违反规则。这正是间谍职业的特性，至少是战争年代教他这么做的。因此，凯西想要一个能够绕过“HYPE 帮”而完全忠诚于他的行动负责人，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强硬的人，而不是作为死气沉沉的行动处本身的傀儡。他也希望这个人基本上对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方式知之甚少，因而易于控制；当然这个人也不能太不受约束。简而言之，他想要马克斯·休格尔。

当他提到休格尔的名字时，布罗斯和斯波金都表示怀疑。休格尔是一个商人，在里根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曾经是凯西的助手。此人没有任何有关情报工作的经验，但这正好是凯西想要他的原因。休格尔巧舌如簧，并且一诺千金，凯西觉得此人在隐蔽行动中能够帮助他抵挡官僚主义的干扰。“比尔喜欢休格尔的坚韧性格，”行动处的一名雇员回忆道，“他认为马克斯能够与行动处中的那些高级官员进行斗争，因此他自己能够更多地采取行动。”人们希望休格尔致力于为美国情报人员在海外的行动提供商业掩护。然而，精心策划的策略刚刚开始付诸实施，休格尔却于 7 月份以应付商业活动为由提出了辞职，其职务由行动处的一名正式成员接替。

比尔·凯西在 1981 年的头几个月里还采取了几个其他方面的步骤，以强化对隐蔽行动的控制并对这些行动保密。2 月中旬，他请求总统对隐蔽行动的咨询程序进行根本性的重组。传统上，这个程序就是由来自相关机构与政府部门的官员组成一个评审小组并召开会议，对拟议的以及正在进行的隐蔽行动进行评审。自 60 年代以来，这个评审小组的主席就是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成员包括国防部副部长、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负责隐蔽行动所涉及领域的助理国务卿。凯西

建议国家安全规划小组作为独自对隐蔽行动进行评审的执行机构。凯西对总统说，无论是什么事情，只要我们想做时，消息“总是像筛子那样泄露出去。我打算让隐蔽行动真正隐蔽”。

里根对此立即予以同意。新的安排无条件地鼓励保密，不仅由国家安全规划小组单独讨论拟议中的隐蔽行动，而且事先也不通知小组成员所要讨论的内容。会议文件由凯西的助手准备，在会议开始后分发，并且当场进行讨论。由国家安全规划小组单独做出决定，其他人员一律不介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苏联与东欧事务负责人约翰·伦乔夫斯基回忆道：“我们没有听到多少有关隐蔽行动的情况。凯西正在进行他的隐蔽行动，几乎没有什么政策可供讨论。他们不想泄露任何事情。”

对于凯西来说，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安排。但这反映了里根对他的信任，而且也恰恰表明他在确定隐蔽行动政策方面具有多么大的权力。

回到兰利之后，凯西就像对行动处所采取的行动那样，立即对情报处进行大调整。他想要得到有关莫斯科的准确情报。2 月底，他与情报处的领导人召开了第一个冗长的会议。在会上，布鲁斯·克拉克汇报了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但凯西感到不满意。这样一来，就逼着情报处拿出许多报告：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现场评估报告以及有关各种国际事务的经济评估报告，但凯西认为这些报告的大多数都没有什么价值。“对于比尔来说，大多数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相关，”后来成为凯西组建的“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人的亨利·罗恩回忆道，“而且那些相关的报告仍然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些情报总是用诸如‘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结论来掩盖他们的判断。”

中央情报局所做的分析也过于依赖于计算机数据库及其打印出来的数据，这些东西只能起到一种开启思路的作用，而不能当

作一种工具来使用。“真相也能把人搞糊涂。错误的图像连一千个字也不值，”这是凯西向情报处说过的一句空洞的套话，其他的套话还有：“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表面上的事情。”凯西告诉克拉克，他想要情报处制定出更多富于智慧的和一丝不苟的计划，而且要具有想像力。他也想要情报处将精力集中于更多的与传统主题相关的方面。“仅仅知道莫斯科从石油出口中赚了多少钱，这是远远不够的，”凯西说，“要告诉我这件事对于他们的重要性。”

凯西的另一个目标就是引进新人，并且这些人要与他具有相同的世界观——反对共产主义、对经济与战略感兴趣。如果他们看好中央情报局的前景，那么这一点是有帮助的。他在中央情报局的《时事通讯》上撰文指出，谍报系统已经变得“迟缓、笨重，及时提供给决策者的情报相互矛盾，而且所做出的那些经不起推敲的预测，明显是把各种既定观点揉合在一起的产物。”

对于凯西来说，中央情报局进行研究的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就是苏联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情报处每年要卖力地炮制出上千页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但是合适的报告很少。因此，他要引进新的人才，以获取相关的情报。如果他要提出并实施一项针对苏联经济的进攻性战略，那么他就需要他的人在合适的岗位上为他提供必要的情报。

凯西设法引诱兰德公司[①]前经理亨利·罗恩，让他接管国家

---

①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机构。1948年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金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兰德（Rand）是英语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与发展）的缩写。兰德公司是美国的一个非营利性研究组织，也是美国实力雄厚、门类齐全的思想库，主要对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方面的各种问题进行系统的跨学科的分析研究。它在军事、外交和其他领域有很大影响。兰德公司以政策分析著称，研究人员的基本目标是向决策者提供有足够情况作为依据的政策建议，使决策优化。——译者注

情报委员会。他还把《财富》杂志的编辑赫布·迈耶拉过来，作为他的特别助理。这两个人都是关于苏联经济问题的专家，当然这决不是巧合。凯西与白宫之间的联络员戴维·威格也是这样被他拉来的。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他第一次在中央情报局建立了一种对苏联硬通货的流通及其在国外的收入情况进行跟踪的体系。凯西周围的人们所从事的专业，无疑是他的兴趣所在。

自从50年代以来，中央情报局就成为西方有组织地研究苏联经济问题的主要机构。经过年复一年的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是，苏联经济以每年3%的速度缓慢增长。但是，趣闻轶事般的情报与那些数据不相符合。凯西认为，苏联正处于困境之中，因此他要求迈耶本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评估。

中央情报局进行评估的依据是SOVMOD，这是一种利用苏联公布的统计数字、并且通过各种数学计算进行处理的计算机系统。迈耶对这种系统调查之后告诉凯西："SOVMOD是骗人的。"

"中央情报局对苏联所做出的实事求是的乐观预测，反映了克里姆林宫的真实情况，"迈耶回忆道，"现实情况是购买食品的队伍正在加长，存在更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物质更为匮乏，军费的增加引人注目。有许多趣闻轶事支持了苏联经济不再增长的观点。"

凯西还要迈耶承担一系列有关苏联经济问题的敏感研究，以便美国决策者们在制定战略时利用这些成果。这都是一些"脆弱性评估"，是由迈耶从原始资料中摘录而成的绝密报告，它们决定应该以何种方式对苏联进行"挤压"。迈耶在一份报告中断定，莫斯科的经济处于"极度脆弱的状况之中……它应当将如何处理这些脆弱性作为一种最高国策。"

这个程序在许多方面都是中央情报局的一种突破性成就。情报评估报告总是集中到苏联的实力上面：他们的军事实力、黄金储备以及对盟国的援助。凯西想改变这种状况。"比尔感到我们

总是尽力收集有关他们的实力的情报，”迈耶回忆道，“而从来没有收集他们的弱点。如果情报将要成为一种真正的政策工具，那么决策者需要知道哪里是苏联的虚弱之处，以便我们能够以己之长击彼之短。”这位局长阅读了许多这类报告。按照迈耶的看法，凯西每天几乎要花一个小时来研究苏联的经济问题。“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经济战委员会供职时，实际上就发明了美国经济战的概念。他正在寻求制胜之策，没有人对此感到惊奇。”

除了依靠顾问之外，凯西还不断给局外人（一些专家或者分析家）打电话，与他们讨论苏联的经济问题。“比尔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联系，”迈耶说，“他认识十几位大银行家以及许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他经常通过电话开展工作，了解情况，得到他们对某个问题的评论，或者请求支持。”

最初，情报处对凯西、罗恩和迈耶侵入他们的领地很反感。该处苏联科的地位得到快速提升，因而有点自命不凡，该部门特别反对把精力集中到这些领域。因此，到了7月，凯西决定把这个科与中央情报局其他部门的联系隔断。他把苏联情报分析家从兰利总部调到了华盛顿郊外的另外一个地方和维也纳。凯西希望这种调动对中央情报局固定的苏联分析家的影响有限，并且允许他的手下更自由地工作。

中央情报局另外一个重要的、也是容易被忽视的研究部门就是心理科。很长时间以来，中央情报局要求心理学家与精神病学家撰写有关外国官员的简要材料。这些材料经常是来自于传记报告以及与他们有接触的其他官员的叙述。但是，比尔·凯西想为总统提供一些相关的材料。他想知道苏联领导人观察美国方式的“心理尺度”。他们惧怕什么？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如何？他们从挑战中迅速恢复的速度有多快？什么东西能够动摇他们的自信心？“早期的一些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处于困境之中，”为中央情报局提供苏联领导人情况的一位临床心理学家阿伦·惠特克教

授回忆道，“但不是非常明确。我们希望获得更多的明确情报，以供决策者使用。”凯西要中央情报局研究的首批问题就是经济、波兰与阿富汗。

3月份，国家安全规划小组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比尔·凯西在会上力劝大家接受他的一个新思想。由于总统委托中央情报局采取进攻性战略，因此这位局长很受鼓舞，要在发展中国家采取隐蔽行动。凯西说，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的竞争牵扯了我们的大量精力，苏联及其代理人正在到处蚕食我们的盟友。他们几乎在各大洲扩张他们的势力。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一个机遇。第三世界正在发生新的叛乱，它们就像50年代和60年代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以及60年代和70年代共产主义分子的叛乱活动。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与共产主义分子战斗。我们需要在资金与政治方面支持这些运动。如果我们能使苏联耗费足够的资源，那么这个体制就可能产生裂缝。我们需要半打的阿富汗。

凯西的建议后来变成了著名的“里根主义”，在全世界努力资助和支持反共产主义的叛乱。卡斯帕·温伯格、理查德·阿伦和亚历山大·黑格都喜欢这个思想，总统也喜欢。里根要求凯西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以确定美国可以支持哪些叛乱。

第三章

1981年4月初，威廉·凯西赴中东和欧洲进行了一次为期3周的旅行。他乘坐的飞机通常在晚间抵达像中东这类敏感地点，那架巨大的黑色C－141“运输星”飞机滑向机场的隔离区。在飞机到达或者离开时，都没有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去机场迎送。

凯西的飞机总是不断地从华盛顿飞向世界各地。如果有必要，在海外基地的一架KC－10加油机可以在中途为他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机组人员与全体乘客一样，都穿着民航制服。这架飞机的外表没有任何标记，主要是为了不暴露身份。机舱里面改装成一个飞行中的旅馆和通信中心。在飞机的前端，贵宾区装饰得很豪华，有睡椅、安乐椅、床和洗涤设施。飞机的后部装有极其精密的通讯设施，使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可以与华盛顿或者世界任何地方安全地通话，也就是说，局长在中途就可以与中央情报局的某一个情报站进行联络，或者甚至可以与该地区装备有特殊装置的情报人员进行联络。最新的电子干扰装置与雷达能够保护飞机免遭来袭导弹的威胁。安全保卫人员全副武装，一天24小时守候在机舱内，其他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当飞机停在地面上时，由全副武装的警卫看守。

凯西在其跨洋飞行过程中，得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波兰的形势正在急速地变化着。卡斯帕·温伯格告诉他有关穆斯林游击队以及美国军队援助中东的计划。他也得到了通知，要他立即与沙特阿拉伯人会谈。但是，首先要解决的是有关埃及的问题，该国卖给穆斯林游击队的武器质量很糟糕。

开罗这个城市十分肮脏与拥挤，使人感到心情不好。凯西在

埃及停留了两天，会晤了安瓦尔·萨达特、军方人士与情报官员。这位埃及总统与他的客人就广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凯西当面明确地告诉萨达特，当前埃及供应穆斯林游击队的武器不受欢迎。他对萨达特说，这些东西是一堆废铜烂铁。沙特阿拉伯人也为购买这些武器出了一部分钱，但如果他们知道开罗是如何糟蹋他们的金钱时，将会感到不高兴，因为当时沙特国王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以支持萨达特政府。

在与沙特阿拉伯人打交道方面，温伯格是一位老手。早在贝克特尔公司[①]供职的时候，他就多年来与他们做过许多棘手的买卖。他被沙特阿拉伯人看作是一位好朋友，并且很受王室的欢迎。在总统的支持下，凯西想与沙特阿拉伯人谈谈增加为阿富汗购买武器的预付款问题。温伯格提醒凯西，沙特阿拉伯王室是强烈反对苏联的，并且对苏联在海湾的图谋极其敏感。

副总统乔治·布什与沙特阿拉伯人的关系也很亲密，特别是与沙特阿拉伯情报局局长、接待凯西的东道主图尔克·费萨尔亲王的关系很好。布什在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就与图尔克共过事，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于 70 年代末卸任以后，仍然与这位沙特阿拉伯情报首脑保持着联系。布什很喜欢他，加之自己也在做石油买卖，因此这层关系也很有意义。在凯西动身之前，布什向他介绍了他对于图尔克的一些看法，副总统的评价看起来是很准确的。在凯西离开华盛顿之前，布什给亲王寄了一封短信，告诉他凯西将是沙特阿拉伯人的一位好朋友，并且对于他们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很同情。沙特阿拉伯是一个拥有 86.5 万

---

① 世界最大的建筑工程公司之一，由美国建筑工程师、企业界首脑斯蒂芬·贝克特尔（Stephen Bechtel，1900—1989）创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公司建造船只和飞机部件。战后新组建的贝克特尔公司在加拿大、中东及其他各国建造输油管，并在全世界建造核电站。——译者注

平方英里的荒芜国度，全国到处是沙漠与贫瘠的土地，其财富都隐藏在很深的地下。

沙特阿拉伯及其石油财富对于西方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个国家也是非常脆弱的。它的人口仅有900万，被拥有强大而装备精良的军队的敌人包围着，王室在沙特阿拉伯社会中处于隔绝状态。在其北方的伊朗正在与伊拉克进行着一场血腥的战争。伊朗的阿亚图拉·霍梅尼①早就对他的极端追随者们发表过煽动性的声明，认为沙特王室具有腐败的本性。如果伊朗一旦越过伊拉克的防线，利雅得②担心下一个目标就是它自己。

阿亚图拉的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也吸引了沙特阿拉伯社会中许多对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秩序不满意的人。1979年麦加③血案之后，沙特阿拉伯虽然加强了安全保卫工作，但更多的麻烦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沙特阿拉伯人的最大安全隐患并不是以色列国这个公开宣布的敌人，而是海湾对岸伊朗的穆斯林兄弟。

沙特阿拉伯人在他们的右侧也面临着另外一个威胁。一个极端的亲马克思主义政府已经在南也门④掌权，它与沙特阿拉伯的

---

① “阿亚图拉”是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鲁霍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1900—1989)，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他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于1979年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经公民投票后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并成为伊朗政治和宗教的终身领袖。在任期间，奉行反西方的外交政策，并向邻国输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译者注

② 沙特阿拉伯首都。——译者注

③ 公元570年前后，先知穆罕默德诞生在这里，于是成为最神圣的穆斯林城市。后来，这里一直是全世界穆斯林朝圣的中心。——译者注

④ 原南阿拉伯联邦，1967年独立，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民解放阵线成立南也门人民共和国，1970年改名为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1990年5月22日与北也门正式合二为一，但由于两个也门不同阵营之间的继续对抗，使双方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导致1994年5月爆发内战，南也门战败，被北也门完全统一。——译者注

东部接壤。沙特王国感到南也门企图推翻沙特王室的强烈动机有两个，除了意识形态的狂热之外，南也门还觊觎沙特的石油资源，因为石油正是南也门所缺乏的。这两个国家之间没有确定的边界。亚丁[①]已经表示欢迎苏联军队派遣顾问，这就明显地使沙特阿拉伯人感到忧虑。沙特王室的一位成员告诉《纽约时报》："苏联军队在古巴的存在对西方所构成的威胁，没有它在海湾和非洲之角[②]的存在所构成的威胁那么严重。"

沙特统治集团普遍认为，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也是在向波斯湾推进，因为它在阿拉伯半岛上夺取大油田的希望破灭了。沙特阿拉伯情报局的首脑十分清楚地描述了苏联在该地区的目标："答案很简单：为了我们的石油……。此时此刻，我们确实不希望发生一场入侵，但是我们确实预料到苏联人将利用他们的势力，设法使他们自己处于一种能够确保得到石油供应的地位。"

在沙特王国境内，好几个团体与组织正在策划反对王室的阴谋。诸如民主青年联盟、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什叶派主导的IRO(全称为解放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革命组织）等组织，得到了叙利亚和伊朗的暗中支持。

对于凯西来说，沙特对苏联意图的担忧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沙特阿拉伯成为美国的一个强大盟友。石油是工业的乳汁，如果西方要想取得经济复苏，那么就需要稳定、安全的石油储备。在70年代，当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咄咄逼人地联合起来反对西方时，石油价格扶摇直上。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所钟爱的对石油生产的实际垄断已经不复存在了，但该组织仍然具有强大的势力与影响。温伯格认为，最近两年里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使得沙特更加服从美国。将石油价格降

---

① 南也门首都。——译者注

② 指包括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东南部的非洲最东端的凸出部。——译者注

下来，这是美国新政府的一项重要目标，因为它对于美国经济具有极大的益处。

凯西所乘坐的这架飞机犹如一只巨大的黑鸟，从跑道滑进了一个隔离的飞机库中。美国大使馆的一位保安人员与中央情报局驻当地情报站的两位工作人员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设在沙特阿拉伯的情况站很小，而且士气不振。这不仅因为特纳执掌中央情报局时对人员进行了裁减与限制，而且也因为伊朗革命迫使他们小心谨慎。当激进的学生袭击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时，中央情报局在那里的官员被惊呆了，因为中央情报局成千页的报告和电报落到了激进分子的手中。毫无疑问，有些电报包含中央情报局在利雅得情报站的有关资料。

对于凯西来说，这是一段增长见识的时期。他想会见那些参战的战士，以弄清楚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并且想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对于情报站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也是一个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新局长的机会。在凯西看来，中央情报局驻沙特情报站被长期忽视了。美国国务院与商务部在70年代就向沙特派人了，因为利雅得在世界石油生产中处于中心地位，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却没有相应地这样做。凯西把重建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沙特情报站作为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认为，如果美国政府的目标要想取得成功，那么这项举措是至关重要的。沙特阿拉伯人连同他们的财富、秘密以及他们公开宣布的反共立场，将成为反对苏联集团这一进攻性战略的关键部分。“在80年代，沙特阿拉伯人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友，”当时负责中央情报局在阿拉伯半岛行动的阿朗·菲耶尔回忆道，“他们被看作是一个关键，我们与他们保持着完整的关系。他们为许多重要目标的完成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情报站的负责人告诉凯西，他们预测在今后几周内科威特可

能会倒向莫斯科。这个小小的石油生产国的埃米尔[1]已经惊慌失措了。这个富裕的国家紧挨着正在疯狂进行的两伊战争，更糟的是，这个国家谈不上有一支军队。该地区的骚乱是由伊朗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科威特城里存在着成千上万由极端伊斯兰教所壮胆的巴勒斯坦极端分子所造成的，所有这些因素足以使政府陷入混乱状态。4月底，科威特外交大臣谢赫·萨巴赫访问莫斯科，就海湾事务与苏联进行磋商。科威特发出的信号暗示，萨巴赫此行说明海湾地区不仅受到苏联的威胁，而且也受到美国的威胁。科威特之所以向莫斯科让步，是由于它自身太脆弱了。科威特也在积极地讨好沙特阿拉伯，以使它赞同科威特的立场，并且与科威特一道阻止美国向该地区派遣军队。那么，沙特阿拉伯会不会受这个建议的诱惑呢？

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沙特情报站的工作人员告诉凯西，沙特人没有响应这个号召，因为他们知道是谁造成了威胁。里根政府正在提议向沙特出售AWACS[2]，以加强他们的军事能力，但是，他们仍然对美国的信誉表示担忧。温伯格也向凯西说过同样的话。

沙特国王与图尔克亲王基本上是亲西方的。同时，他们隔三差五地发表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言论，他们甚至更为憎恨反穆斯林的宣传，并且反对莫斯科以前在苏联中亚地区、现在在阿富汗的侵略行径。凯西是美国第一位造访沙特阿拉伯的高级内阁官员，并且他的反共倾向已经在沙特的外交圈子中众所周知。

那天下午，一支车队停在美国大使馆的后门，图尔克·费萨尔亲王带着十几个安全官员来这里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相识。两位情报首脑互相握手致意，然后坐进豪华轿车的后座里，车队随

① 穆斯林国家的酋长、贵族或王公。——译者注

② 英文 Airborne Warning and Control System 的缩写，意思是“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译者注

后急驶而去。凯西的这位沙特东道主亲切、大方，而且非常热情。

图尔克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思维敏捷，并且对敏感的西方人具有强烈的影响力。作为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他的脑海里有着特殊的西方观点。他蔑视马克思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而且令人惊讶地与凯西这位同样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相处得很好。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位局长到达利雅得，图尔克就努力使他能够留意一下那些私下里的天主教徒们。在这个国家里，甚至不允许《圣经》的存在，因此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姿态。对于颇为见多识广的图尔克来说，比尔·凯西是一个与他对于苏联的信念不同的人。

他们的车队驶入利雅得郊外的一处安全设施中。那里用椰枣树和其它具有异国情调的植物装饰得华丽多姿，为原本苍白的沙漠增添了些许色彩与绿意。他们来到一间小会议室的门口，首先走进去的是亲王与凯西，他们的助手紧随其后。会议室四周的墙壁上挂着几幅阿拉伯毛毯，凯西询问了几个有关它们的轻松话题。70年代，他从事过一项进出口贸易，将一些波斯尼亚毛毯进口到美国，并且把它们出售给经销商们。

图尔克亲王最为关注的问题就是“苏联对沙特阿拉伯的包围”。据估计，在南也门有1500名苏联军事顾问，叙利亚有2500名，埃塞俄比亚有1000名，伊拉克有1000名。苏联军队在阿富汗几乎有10万人，图尔克预计苏军很快就会进攻波斯湾地区。他告诉凯西，苏联人能够毫不费力地接管从伯尔蒂斯坦到俾路支[①]地区柔软的下腹部，然后径直进入波斯湾的暖水地带。

凯西赞同他的看法，“总统和我都清楚共产主义者的意图。”

---

① 伯尔蒂斯坦（Baltistan），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地理区域，位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巴基斯坦控制区内。俾路支（Baluchistan），西南亚的一个地区，在阿富汗南部和阿拉伯海之间，包括巴基斯坦西南部和伊朗东南部。——译者注

他引用了苏联前外交部长莫洛托夫[①]于 1939 年对希特勒派驻莫斯科的大使所说的话："能够径直通向波斯湾的巴统（Bantum）和巴库[②]以南地区，是苏联所觊觎的中心地区。"凯西说，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他继续说道，我们从未使沙阿[③]失望过。如果他仍然在位的话，我们之间将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将华盛顿的计划告诉了亲王，准备很快扩大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数额，以对付苏联的威胁。他还告诉亲王，他正在美国国内推动对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的援助。"我们要让他们在阿富汗付出血的代价，要对他们进行狠狠的惩罚，"凯西说，"非常感谢你支持我们的阿富汗计划。"他接着通报了他在开罗有关武器质量的谈话。"我打算扩大行动，"他说，"为穆斯林游击队提供更多和更好的武器。"

图尔克提出了一项计划，表明他对美国的行动予以完全支持，并且同意继续在支付购买武器的款项方面资助美国。他还透露，国王认为中亚是苏联帝国的一个薄弱环节。沙特阿拉伯将继续把他们的宗教与反共意识形态向阿富汗和苏联的中亚地区进行广播。他宣布，国王承诺帮助我们那些居住在莫斯科的兄弟，他

---

① 苏联政治家和外交家（1890—1986）。原姓斯克里雅宾，1906 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改姓莫洛托夫。列宁逝世后，他坚决支持斯大林。20 和 30 年代积极参加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斗争。对 30 年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负有一定责任。长斯担任苏联外交部长。因反对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1956 年 6 月被免职。1957 年 7 月被指控为"反党集团"成员，解除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并被开除党籍。1957—1960 年，任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1960—1961 年，任苏联驻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常驻代表。1962 年退休。1984 年 3 月，苏共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译者注

② 巴统（Batum），格鲁吉亚阿扎利亚共和国首都，黑海东岸港口城市。巴库（Baku），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在里海西南岸、阿普歇伦半岛南缘，环绕着巴库湾，盛产石油。——译者注

③ 伊朗国王的称号。巴列维王朝使用复合词"沙·沙"，意思是"万王之王"，即皇帝。阿富汗、中亚和南亚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也都使用过这一称号。——译者注

们正在俄国人的统治之下。他告诉凯西，沙特阿拉伯正在制定一项广泛的计划，向阿富汗偷运《古兰经》，最终将它们偷运到苏联的中亚地区。用图尔克的话说，它是一种与苏联人在精神领域进行战斗的方式，“真主处处与我们同在。”凯西很欣赏这个主意，并且建议同时采取其他办法，比如揭露俄国人在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苏联中亚地区所犯的罪行。

图尔克说，沙特阿拉伯周围的威胁是真实的，因此国王打算扩大在海外已经存在的大规模武器生产。多年来，沙特阿拉伯一直向美国要求得到先进的战斗机。“伊拉克和伊朗每周都要侵犯我们的领空，”图尔克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在空中进行自卫。”他列举了沙特领空被侵犯的众所周知的事例。

图尔克非常清楚，凯西不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而且还是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安全规划小组的成员。他想努力取得凯西的支持，以便从华盛顿获得军火。“总统知道你们的困境，”凯西说，“我也知道。我们打算显著地改变前政府所奉行的武器出售政策。我将向总统建议，我们向你们提供所需要的东西，以满足你们国家的安全需要。”亲王对此感到高兴。凯西还同意要比他的前任与沙特共享更多的情报。然后，正如他经常对其外国同行的做法一样，凯西出示了几份情报。

他带来几份有关南也门的第一手情报，这是亲王从未获得过的礼物，它们是由秘密的国家安全局（NSA）通过窃听所获得的。南也门官员曾经收到一些公报，沙特的一帮分离主义分子正在促进颠覆王室的活动。也门人已经答应与正在沙特首都之外的一个沙漠营地中受训的小组进行协作。凯西将有关行动的情报作为礼物送给亲王，没有附带任何条件。

然后，凯西从公文包里抽出几份其他文件，从桌面上推给亲王。这些文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苏联石油生产情况的绝密报告。这些情报没有任何奇特之处，亲王可能更想要有关世界石油

生产的情报，而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此类情报。但是，这些情报的用处是为了证明凯西的寓意。他首先指出，莫斯科通过出口石油来为其世界帝国筹措资金。这时，他脱掉了上衣，认真考虑他们之间的交易。图尔克的眼睛注视着凯西给他的报告。当石油价格在 70 年代扶摇直上时，他们赚了大钱。每当石油价格上涨 1 美元/桶，就意味着莫斯科一年获得 10 亿美元的硬通货。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了。

凯西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给亲王传递一个信息。世界上没有一个石油生产国能够比沙特阿拉伯对世界石油价格产生更大的影响。那时，沙特的石油产量占欧佩克产量的 40%。与其他石油生产国不同的是，沙特还能够迅速地动用石油储量。这就意味着沙特具有一种石油生产的弹性，能够极大地影响世界石油价格。当时世界石油市场上每天有 200 万—300 万桶的过剩供应量，大多数欧佩克国家强烈要求沙特阿拉伯削减出口量，以便将每桶石油价格从 32 美元增加到 36 美元。

凯西在会谈中同时提出了石油定价与美国—沙特之间安全关系的问题，他实际上是说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这是里根战略的一个要素。“我们想降低石油价格，”温伯格回忆道，“这是我们向他们出售武器的原因之一。”

亲王感谢凯西给他提供了这些情报，并且大概提到利雅得已经宣布了一项更为适中的石油定价政策。“它是为我们的利益服务的，并且有利于美国经济的恢复，使你们更为坚固与强大，”图尔克说，“我们将不会努力争取更高的石油价格。”他向客人保证，利雅得将顶住减少石油产量与提高石油价格的任何压力。

三个小时之后，会谈结束了。这次会谈进行得很好，两人都很满意。图尔克感到对方对他的所有请求与关切似乎都产生了共鸣；凯西感到对方与他具有同样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激情，并且愿意与美国共同采取行动，而这一点在前不久还被证明是不可靠

的。或许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苏秘密战争的基石之一已经开始安放了。脆弱的沙特阿拉伯对自己的生存一直感到担心，但现在它开始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了，美国也愿意向沙特提供这种保障。作为回报，沙特要在世界石油市场上保护美国的利益。

那天晚上，凯西那架黑色无标记飞机从利雅得军事基地悄无声息地起飞，向特拉维夫[①]飞去。飞机在 4 万英尺的高空飞行时，凯西与他的助手谈论波兰的事情。他告诉他们，莫斯科对波兰人感到恐惧。只要团结工会仍然存在，苏联就不会不受影响。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使这场运动向前推进呢?

在吉米·卡特当政时期，美国展开了一项精神领域的计划，在印刷品以及诸如印刷机等其他物资方面支持团结工会。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本人就是一个波兰裔美国人，也是这项计划的助产婆。所有这一切虽然都是不错的精神因素，但其影响范围极其有限。印制并出售亲团结工会的 T 恤衫、支付印刷商与技师的工资以及组织人员分发亲团结工会的资料，这些都需要资金。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波兰境外进行的，因为有人认为在波兰国内做任何事情的风险都太大了。团结工会是百分之百地在波兰土生土长出来的，因此，如果追根溯源的话，那么任何援助都会使这项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武器的运动受到玷污。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团结工会没有真正进行秘密接触。

凯西正在阅读情报处的一份简报，上面介绍了有关波兰的最新情况，事态正在急速地变化着。在凯西看来，波兰将会发生一

① 以色列最大城市，位于中西部的沙漠平原，西临地中海，北起亚尔孔河下游，南到雅法湾。特拉维夫原为雅法市北面的一片沙丘，1909 年为安置涌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沙丘上建居民点，1921 年建成居住犹太人的城镇，后发展成为犹太人的文化、商业和行政中心。1948 年以色列国成立时定为首都。雅法原是一个有 3000 多年历史的港市，居民全部为阿拉伯人。1949 年特拉维夫与雅法正式合并为特拉维夫市。——译者注

场镇压运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时常对他的助手们做出这种预言。面对团结工会的要求，波兰政府越来越软弱，而莫斯科正在竭力阻止波兰共产主义的崩溃。3月初，波兰政府的高级官员被召到莫斯科，听取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指示。波兰党的领导人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①与政府总理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②以及两位政治局委员于3月5日秘密会晤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③、国防部长季米特里·乌斯季诺夫④、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⑤以及五位其他共产党高级官员。会晤结束之后，波兰通讯社发表了一项声明。

波兰党的领导人一致同意需要采取某种“紧急行动”，以对付社会主义的波兰所面临的威胁。声明用最大的篇幅表达了莫斯科对自己这个帝国有可能解体的担忧，它指出，波兰所发生的事件“对整

---

①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1980年8月在格但斯克等城市罢工浪潮中，接替盖莱克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职务。1981年10月，在国内政局动乱中去职。——译者注

② 波兰政治家（1923—）。1980年8月波兰危机爆发后，于1981年2月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同年10月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提出解决危机的“协商和社会主义革新路线”。1981年12月13日，波兰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担任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1983年7月宣布结束战时状态，4个月后辞去国防部长职务，改任国防委员会主席。1985年11月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1989年7月担任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统，后被迫去职。——译者注

③ 苏联领导人（1914—1984）。1967年5月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任苏联国防会议主席。次年6月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他强调苏共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战略任务是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认为苏联正处在这个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译者注

④ 苏联军事家（1908—1984）。从1976年起担任苏联国防部长和政治局委员。70年代苏美限制武器会谈中，他是重要的幕后人物。——译者注

⑤ 苏联外交家（1909—1989）。原来是一位农业经济学家，1939年进入外交界。1957—1985年长期担任外交部长，以精通国际事务和具有谈判才能而著称。1985年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8年退休。——译者注

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将产生重要影响,"资本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希望波兰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使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解放运动受到削弱"。"有鉴于此,必须立即对形形色色的危险企图进行坚决果断地回击。"

声明断言,"社会主义阵营是牢不可破的。它的防御不单单是每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而且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事情……苏联人民坚信,波兰过去是、今后仍将是社会主义阵营中一贯可靠的环节。"

声明也发出了来自莫斯科的那种惯常的宣传号角声,似乎正在为苏联进行镇压或者入侵寻找正当理由而进行铺垫。苏联的新闻机构每天都在发表危言耸听的文章,使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国防部的机关报《红星报》谴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企图通过"求爱"的方式使波兰加入西方同盟。该报谴责团结工会"变本加厉地反对社会主义"。声称"局势的发展不能令人满意。没有迹象表明(波兰)政府正在再次主张对局势进行控制。"2月,《文学公报》谴责西方煽动骚乱,并且给团结工会下达命令。"美国之音(VOA)[①]"与"自由欧洲广播电台(RFE)[②]"被用来

---

① 美国新闻署所属的无线电广播网。最早用德语于1942年2月24日开播,目的是为了抵消纳粹对德国人民的宣传。二战结束时,美国之音以40种语言播音,每周播放3200小时的节目。冷战期间,它的报道针对东欧和中欧共产党国家。每天播放的节目包括新闻报道、关于美国政治和文化事件的报道和论述,以及阐明美国政府政策的社论。——译者注

② 全称为"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自由广播电台(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 RFE and RL)。美国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为广播对象的两座国际广播电台,台址设在联邦德国的慕尼黑,均由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所属的国际广播委员会领导。前者于1950年7月开始广播,使用6种语言。后者于1953年3月开始广播,使用俄语和14种苏联其他民族语言。开播时称"解放广播电台",1963年改现名。后又开办了对阿富汗的达里语(1980.9)和普什图语(1982.7)广播。1971年以前两台主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后改由国会拨款。——译者注

向团结工会的激进分子传达“命令”，让他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及如何在团结工会的标语指引下进行罢工”。这虽然是同样陈旧的宣传样版，但它具有一种更为深刻的含义。通过把矛头指向外来“威胁”，莫斯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军事干涉了。

埋头于五角大楼预算细节的卡斯帕·温伯格，正在密切地注视着波兰的局势。诸如系列 AWACS 飞行的秘密军事侦察行动继续进行，旨在跟踪苏联军队的调动情况。总统向莫斯科发出警告，军事行动将促使美国做出反应，但他没有明确说出美国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4 月 13 日早晨，当凯西的飞机在特拉维夫降落时，他就立即被一位安全官员迅速接到了摩萨德[①]的总部。安全措施非常严密，与往常一样，那里没有外交官迎接他，因为外交官将引起外界太多的注意。

在摩萨德总部，凯西会见了以色列情报局局长伊扎克·霍菲少将，几位副局长也在场。摩萨德是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和最有效率的情报机构之一。它不仅在中东地区具有巨大的势力，而且在中欧地区也发展了一个相当大的情报网络。通过与来自波兰、苏联和匈牙利的流亡者进行合作，摩萨德控制了一条从阿尔巴尼亚到波兰的“情报线”，然后向东延伸到俄罗斯的心脏地带。这条情报线主要由犹太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宗教界名流所组成，当以色列需要特定的情报或者一条使人员或物资偷偷进出苏联集团的通道时，这条情报线就会动起来。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这条情报线取得了不凡的成就。1956

① 全名为 Mossad Merkazi le—Modiin u—Letafkidim Meyuhadim（希伯来语，意为“中央情报安全研究所”）。以色列 5 个主要的情报组织之一，负责在国外进行间谍工作、搜集情报和从事秘密政治活动，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情报机构，其首脑直接向以色列总理报告工作。该组织由哈雷尔于 1951 年创立。——译者注

年，以色列正是通过这条情报线将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①]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性秘密报告偷偷带出了莫斯科。（据传这条情报线是从一位党代会代表手里得到这份文件的。）凯西对人力资源一贯是关注的，因此他想要插手这条情报线。他同以色列同行讨论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中东局势。这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明确告诉东道主，华盛顿新政府坚定地承诺要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他进一步告诉对方，他们能够建设一个新的、令人鼓舞的中央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过去已经与摩萨德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但在70年代末期，这种合作日益不可靠了。凯西强调说，他将彻底改变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时，他想与摩萨德紧密合作。

霍菲少将对凯西的这种态度表示赞赏，摩萨德也想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更好地合作。双方的合作要兑现，并且要充分利用各自所拥有的情报资源。或许这两个情报机构在服务方面也可以进行合作，而且相互可以取长补短。

以色列人需要两方面的帮助。一方面，他们极其渴望能够更多地获取美国的卫星情报，特别是那些与以色列和叙利亚相关的情报。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卫星照片，包括特拉维夫所关心的有关伊拉克核计划的图片。另一方面，摩萨德需要维持其在海外

---

① 苏联领导人（1894—1971）。斯大林逝世后，于1953年9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同年兼任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主席。1956年2月，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此外，在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法制建设、平反历史错案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1958年3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对外关系方面，他提出两个社会经济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原则。他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各国共产党关系上犯有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错误。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解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次日又解除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退休后领取特种养老金，直至去世。——译者注

从事情报活动的资金。“对于我来说，这两件东西很容易给你们，”凯西说，“甚至会毫不犹豫。而你们这里也有我所需要的东西。”

于是，凯西提出了波兰这个话题。他正在设法重建美国在海外的人力情报资源。他在波兰有一些情报资源，但无法接近反对派。他尤其对团结工会以及波兰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感兴趣。凯西想知道，这条情报线是否仍然起作用。他的东道主点头说，是的。只要给予财政援助以维持这条情报线，凯西就可以使用它。他们为此而握手，事情就这样敲定了。

4 月 26 日晚，那架黑色的无标记飞机再次起飞，冲向茫茫夜色之中。这一次飞机朝北飞去，凯西第二天要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罗马情报站的情报人员会面。2 月初，欧洲各情报站的站长们云集巴黎与这位新局长会面时，凯西见到了罗马情报站的站长。凯西此行的目的将更为直截了当，他虽然对罗马情报站处于运转状态感兴趣，但最感兴趣的主题有两个：恐怖主义与波兰。此次凯西将提出第一个主题，因为罗马情报站是一个大站，其任务就是跟踪恐怖分子在南欧与中东的活动。意大利的“红色旅”[①]非常活跃，许多恐怖组织将雅典和罗马作为进入欧洲大陆的入口通道。有一个机构风趣地把意大利首都称之为“恐怖国际”。

正是波兰这个主题使比尔·凯西来到了罗马，因为正在解开有关波兰的戏剧性事件之谜的关键角色之一就住在这里。正是罗纳德·里根建议美国与波兰籍的罗马教皇接近，旨在与其进行地

① 意大利极左派的秘密恐怖组织，自称其宗旨是破坏意大利国家，为“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暴动创造条件。该组织由库尔乔创立。他最初于 1967 年在特伦托大学成立了一个左派思想小组，致力于研究马克思、毛泽东和格瓦拉等英雄人物。1970 年进行了一系列恐怖活动，宣告“红色旅”的存在。在警方的严厉打击下，该组织到 80 年代末已大为削弱。——译者注

区合作。理查德·阿伦回忆道，他与总统坐在一起观看有关约翰·保罗于1979年访问其祖国的新闻报道。“他（里根）当时说，在决定波兰命运的过程中，罗马教皇是一位关键人物。他被数百万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看望他的人们的情感迸发所征服了。他（里根）的眼睛里满含泪水。”

1920年，卡罗尔·沃伊蒂瓦[①]出生于波兰的克拉科夫市附近。他在亚盖隆大学学习哲学，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大学被关闭，教授们被投入监牢，他的学业随即中断。白天，年轻学子们被迫作为非熟练工人而工作；到了晚上，他就去参加秘密礼拜活动。1942年10月，他加入了由克拉科夫大主教亚当·萨佩哈红衣主教组织的地下神学院。从此之后，他就渐渐地习惯于反抗极权主义势力。罗马教皇的个人历史给里根政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1978年担任罗马教皇之后，就对波兰表现出一种持久的兴趣，而且乐于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采取行动。据说教皇于1980年12月给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信，警告说如果苏联真的入侵了波兰，那么约翰·保罗将返回祖国，并且要积极发挥作用，团结人民起来反抗苏联的占领。

罗马教皇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直言不讳的强烈批评。1980年3月，他在墨西哥发表的一篇措辞强硬的演讲中警告说，解放神学（基督教思想的一个分支，将基督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在一起）是危险的。教皇的演讲将梵蒂冈坚定地置于诸如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等国家亲共产主义牧师们的对立面，就这一点而论，也就是把整个拉丁美洲都包括进去了。他的观点使他在克里姆林宫这一共产主义圣殿里不受欢迎。他现在不仅是一位在波兰具有最高道德权威的人士，而且在立陶宛也很受

---

① 即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78年登位，为456年间第一位非意大利籍教皇。——译者注

欢迎，因为他能够讲很流利的立陶宛语。表面看来，教皇出于关切立陶宛人的处境，于1979年（秘密）任命被关押的立陶宛大主教为红衣主教。这一任命的消息迅速在立陶宛传开了，并且为地下教会壮了胆。

苏联通讯社把罗马教皇描述为一种威胁，声称要对这种威胁进行控制或者限制。苏联认为，教皇的观点与信念犹如一种“传染病”，“对于目前的梵蒂冈领导层来说，乌克兰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目标。它正在试图把天主教会这个仍然相当大的放射性核作为一种基础，在乌克兰共和国人民中间扩展宗教影响。”

乌克兰有一份题为《为新法西斯主义者服务》的小册子，其中就有这样激烈的语言：“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复仇主义者与敌人把希望寄托在新的罗马教皇身上……因为他已经达到了他的预期目标，将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合并成为一股单纯反对共产主义的势力。这股势力并不是为人类及其未来而感到焦虑不安，而是受全世界宗教当局所控制。”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罗马的情报人员送给凯西一份有关恐怖主义的简报。他们也向他提供了一些信息，证明局势是相当危险的，而波兰的局势尤其危险。1981年1月，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莱赫·瓦文萨[①]对罗马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并且会见了罗马教皇。接待他的东道主是意大利劳工联合会的新闻发言人路

---

① 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1943—）。1980年组织波兰第一个独立工会——团结工会（Solidarity），并担任主席和首席发言人。1981年12月31日，波兰政府实施《军事管制法》，团结工会被宣布为非法，瓦文萨被逮捕，第二年被释放。198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6月，团结工会在波兰上院选举中赢得绝大多数席位，另外一位领导人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总理。1990年，瓦文萨以压倒多数赢得了波兰第一次直接总统选举的胜利；1995年竞选连任时，以微弱劣势被民主左翼联盟候选人克瓦希涅夫斯基所击败。2000年，瓦文萨再次竞选波兰总统，遭到惨败，这标志着他对波兰政局的影响越来越弱。——译者注

易吉·斯克里乔洛。该联合会的官员曾经于1980年赴波兰旅行，建议瓦文萨组建团结工会，并且为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提供了打字机、印刷机和复印机。但是，斯克里乔洛实际上是为对方工作的。根据意大利反间谍官员所提供的情报，他是为保加利亚情报机构工作的，他的顶头上司是保加利亚驻意大利大使馆的一位官员。这样一个情报来源能够把要害情报送达苏联集团，而且他在意大利劳工联合会内部深受信任。在这种情况下，瓦文萨极易受到伤害。

凯西要求罗马情报站为他安排一次与梵蒂冈国务大臣阿戈斯蒂诺·卡迪纳尔·卡萨罗利的秘密会见。卡萨罗利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教会领导人，他已经担任过四任教皇的亲密顾问了。他有着极高的声望，并且有幸与东欧各共产主义政府保持着亲密的正常关系。他所奉行的东方政策是：以一种缓慢而深思熟虑的方式，在梵蒂冈与共产主义集团之间锻造一种国与国的关系。

卡萨罗利声称他的日程已经安排好了，因此无法与这位情报局长会见。凯西认为，卡萨罗利拒绝与他会见，反映了这位国务大臣的对外政策倾向。卡萨罗利最近会见了萨尔瓦多的左翼叛乱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派的巴勒斯坦领导人。由于没有收到美国总统关于这次会见的直接要求，因此卡萨罗利可以婉言谢绝。他倒是提议派遣一位助手会见这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但是此事需要周密考虑。如果此次会见一旦向外界泄露出去，那么就将对苏联有利，因为苏联可以添油加醋地推测，认为教廷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合谋颠覆波兰政府。凯西从未想到过这一点，于是同意不与卡萨罗利会见。

卡萨罗利建议某些教廷官员随后到罗马的一座大教堂中去，他的助手将从教堂的正门进去，局长从后门进去。他们将在教堂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里会见。

这样一种安排进行得很顺利。卡萨罗利的助手穿着教会的服

装来了，他长着一张娃娃脸，两眼炯炯有神。他热情地向凯西致意，并且为卡萨罗利不能与他会见而感到抱歉。他看起来有点紧张，因为梵蒂冈的官员毕竟不能经常看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等一行人员。凯西试图减轻他这种焦虑不安的紧张情绪，于是开门见山地明确表示，他仅仅想了解一下波兰的局势而已。

这位助手的紧张情绪稍微有点减轻，于是花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向比尔·凯西陈述了对于波兰局势的看法。波兰主教斯特凡·维辛斯基[①]由于癌症晚期而处于弥留之际。作为波兰的教会与政治事务中的一位重要人物，维辛斯基主教以高超的技巧使局势保持了一种稳定，从而使团结工会得以茁壮成长。他对波兰当局具有一种制约作用，因为他威胁说，如果政府采取镇压行动，那么就会出现广泛动荡不安的局势。同时，他要求团结工会中那些更为激进的成员保持克制，以免使政府因被激怒而采取暴力行动，或者邀请他们的苏联兄弟进行干涉。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犹太人亚当·米赫尼克宣称，正是由于维辛斯基主教，“因而……教会变成了极权体制的最强大的反对派。”这位梵蒂冈官员告诉凯西，维辛斯基的去世将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尽管如此，教会将继续支持团结工会，并且反对政府采取镇压行动。

罗马教皇确信，镇压行动迟早都会发生，问题在于政府会采取什么形式，教会与反对派如何进行准备。粮食危机正在扩散，罢工行动将继续高涨。教会希望在不引起波兰政府进行压制的情况下促进改革进程，但是，在没有维辛斯基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

① 波兰格涅兹诺和华沙大主教，波兰首席主教（1901—1981）。在共产党执政期间，他曾经与政府就教会的有关问题签署过协议，也曾经被软禁过。对波兰团结工会持同情与支持的态度。1979 年，他同波兰当局谈判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波兰问题，这是他最后一次重要活动。——译者注

在差不多两个小时之后，凯西对卡萨罗利的这位助手表示感谢，并且向他询问，如果他下次到罗马时，卡萨罗利是否有空。“没有，”这位助手直截了当地回答。主教认为最好不要在这些事情上合作，否则我们将使局势恶化。对于凯西而言，对方的这种拒绝太突然了，但并不要紧。事实上，他们已经帮助美国中央情报局获得了重要情报。在这次会见中，凯西对波兰国内局势的了解超过了他从兰利的所有简报中的收获。

凯西所耳闻的东西进一步证实了他的直觉，里根总统想要做的事情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了。“虽然没有达成任何硬性的协定，但是从获取并分享情报的角度而言，梵蒂冈对于美国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上将回忆道。在此之后，事件的发展不久就使梵蒂冈与美国结成了一种甚至更为亲密的关系，特别是由于双方在波兰的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在凯西离开罗马的几周之内，将出现一种针对教皇的暗杀企图。总统、卡斯帕·温伯格和比尔·凯西将看到苏联这只隐藏在整个事件背后的黑手，罗马教皇也将看到这只黑手。

第四章

1981年5月，克格勃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各个部门的高级情报官员全部与会。此类会议定期召开，党的领导人在会上制定方针政策，并且对苏联所面临的国际性挑战发表重要声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与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在这次会议上作了秘密讲话。他们在讲话中提到了拉丁美洲、阿富汗和中国等问题，而首要的话题则是华盛顿的新政府。

在缓慢升降的特制无扶手步梯的帮助下，老态龙钟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第一个走上了讲台。他在政治局的最高位置上已经呆了几十年了，现在看上去很虚弱。有许多谣传，说他已经生命垂危了。这位濒临死亡的党的领导人透过那副厚厚的老花镜，照本宣科地发表讲话。他说，华盛顿的新政府“正在暴露出极端的复仇主义”，并且正在“使世界局势处于危险的不稳定状态”。里根错误地“进一步扩大军备竞赛……破坏苏联的经济”，美国新总统“不承认各种相关力量现在正在反对资本主义”，他想“通过挑衅……（和）经济战来抹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取得的成就”。

在45分钟的讲话中，勃列日涅夫不时停下来，在讲稿上寻找自己读到什么地方了。当最后几个字从他的嘴里吐出来时，他已经明显地精疲力竭了。然后，他被默默地送回了住所。

几分钟之后，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大步走上讲台。他虽然不比总书记年轻多少，但其身体状况看起来却与总书记大不相同。他的身上透出一种威严、力量与自信。与勃列日涅

夫一样，他在讲话中也为美国描述了一幅更为可怕的景象。

安德罗波夫也对美国新政府进行了连珠炮式的攻击。他说，他一直期待着里根在入主椭圆形办公室之后能够停止其在总统竞选中所发表的那些反苏言论，但是，这些言论仍然在继续着。他告诉与会者，里根在入主白宫之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们（指苏联人）认为自己有犯罪的权利，并且为获得这种权利而进行欺骗。……迄今为止，缓和已经成为苏联达到其目的的唯一路线。"

对于安德罗波夫来说，里根的评论像水晶那样透明。这是一个"危险的时期"，西方在此期间正在制造"挑衅社会主义"的气氛。更有甚者，华盛顿正在准备"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自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官员还没有使用过如此好斗的语言，也没有描述过一幅如此恐怖的景象。

安德罗波夫也许不必纠正他在讲话中的错误，即华盛顿正在准备对莫斯科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但是，"经济战"一词却深深地印在了威廉·凯西和卡斯帕·温伯格等官员的脑海中。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努力争取切断苏联与西方的贸易、技术交流与贷款的通道。他们在无法决策的时候，就试图对决策者进行游说。

5月9日，凯西在西弗吉尼亚州南部的度假胜地温泉镇，对商业委员会发表了一次演讲。他认为，苏联经济"显得越来越虚弱"，国家的"内部不满情绪正在增长"。他虽然没有明确说出美国将利用这一点，但实际上暗示了这个意思。

在私下里，面对着美国这些一流的企业家们，凯西向他们展示了一些统计数字，说明苏联现在的经济状况是如何的糟糕。"苏联的商业投资环境很恶劣，"他说，"如果我想获利的话，那么我就不去那里投资。"特别是，他试图劝说银行家们停止向苏联提供贷款。凯西在其任职期间发表了几十次演讲，其中许多演

讲是对商业组织发表的。凯西坚持不懈地灌输他的主张，即与莫斯科做生意是一个馊主意。有时，他甚至直接给公司经理们打电话，对他们施加压力，或者向他们透露一些敏感的秘密情报，以便使他们相信，某一个特定的项目将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的这种办法有时很有效，有时则无效。

苏联人最大的和最致命的经济风险，就是众所周知的能源项目乌连戈伊—6。在东西方的贸易历史上，这个项目被认为是一笔最实在的交易，凯西与温伯格被这个项目搅得“心神不宁”。这个项目是一条从西伯利亚北部的乌连戈伊天然气田通向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地区的天然气管道，全长 3600 英里。这条管道将联接到西欧的天然气网上，每年将向法国、意大利和西德三国联盟输送 1.37 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这条管道最初的配置是双线，每年可为莫斯科带来多达 300 亿美元的硬通货收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每年约为 320 亿美元的硬通货收入流动量，确实能够为其经济生活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前高级官员叶夫根尼·诺维科夫回忆道：“对于莫斯科而言，这条管道对它的经济生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莫斯科究竟对这个项目的价值寄予多大的希望，则很难估计。”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弗雷德·伊克尔说：“它是一棵摇钱树，真可谓一本万利。”

由于受到外汇短缺的制约以及没有有效地建造与运行这条管道的技术，克里姆林宫于 1979 年向西方寻求帮助。由于欧洲人也急切地想要开辟一条能够代替中欧石油供应的通道，因此当莫斯科以保证价格向他们提供 25 年的天然气时，他们欣然抓住了这个机会。作为交换，克里姆林宫实现了获得财政援助的梦想。与过去一样，西欧银行同意筹措购买铺设管道的设备和其它设备，以低于市场的利率予以贷款，并且由各自的政府提供担保。同时，其它西欧公司提议向苏联出售精密设备，以换取天然气的

供应。由于它有一个长达1700英里的奥伦堡[1]管道项目，因此莫斯科利用乌连戈伊—6来提高其在西方的信誉。实际上，这个项目的某些部分至少需要筹措到双倍的资金。

这个双倍资金的计划就像是与新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联合在一起的严重危险事件，它首先被大通曼哈顿公司[2]负责向苏联、东欧和南斯拉夫贷款的一位副总裁罗杰·鲁滨逊揭露了。70年代末期，正当奥伦堡管道项目处于建造时期，他与苏联天然气部部长共进晚餐。“我问苏联的这位部长是否支持在欧洲美元市场上借钱，以筹措这个项目的建造资金，”鲁滨逊回忆道，“他笑着说：‘我将永远不会争取此类贷款，因为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收入可以用来做任何事情。’苏联对外贸易银行显然未能在这项正在进行的计划中向这位部长下达指令，让他取得用于这个项目的双倍资金。进一步的分析证明，事情确实如此。西方所有的关键进口物品都是为这个所谓的补偿协定或者以直接易货贸易的方式提供资金——用天然气换取管道、压缩机和涡轮机等设备。但与此同时，受莫斯科控制的国际开发银行正在西方信贷市场上的四家大型企业联合组织中筹集约为22亿美元的资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贷款文件上清楚地说明，贷款收入就是用来购买管道、压缩机和涡轮机等设备的。这种傲慢的态度使人感到非常震惊。”

鲁滨逊将他的发现谨慎地通知了中央情报局，但是中央情报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2月初，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高级情报分析员萨姆纳·本森向比尔·凯西送交了一份有关这个项目的备忘录。他也非常关注这个天然气管道项目。如果苏联人一旦以切断天然

---

① 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州，地处乌拉尔山脉南端。盛产天然气。——译者注

② 美国最大的银行。1955年由曼哈顿银行（成立于1799年）和大通国民银行（成立于1877年）合并组成大通曼哈顿银行。1969年成立大通曼哈顿公司。1996年大通曼哈顿公司与美国第二大银行纽约化学银行公司合并，组成了美国最大的银行，名称仍为大通曼哈顿公司。——译者注

气供应来进行政治恐吓，那么西欧将极易受到伤害。这条天然气管道一旦投入使用，那么奥地利、柏林和巴伐利亚对苏联天然气供应的依赖程度将是90%—100%，而这几个城市却没有把这个事实充分地向各自的公众公开。一位美国银行家回忆道，他曾经于1980年与当时西德的经济部长奥托·冯·兰布斯多夫举行过一次秘密会议。兰布斯多夫向一个与会者承认，德国对苏联天然气的依赖程度已经达到60%，而不是公开引述的30%的最高限度。“但也不必担心，”兰布斯多夫说，“德国公众将不会获悉真实的数据。”

“莫斯科将获得巨大的经济实惠，”本森在1980年的一份保密报告中写道，“能源贸易帮助苏联即使面临着持续的严重经济问题时也能够继续从事军事建设。”在卡特当政期间，本森的关注成了耳旁风，卡特政府似乎认为西方能够预先获得各种能源，而不是给苏联人戴上桎梏。不过，现在本森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士的赞成，这些人士中最重要的就是总统、凯西和温伯格。

1981年5月初，在收到罗杰·鲁滨逊的一篇文章之后不久，温伯格与凯西在五角大楼里就若干议题进行会晤，这些议题包括波兰局势与国防预算。然而，天然气管道这个议题继续被提了出来。“我们确实感觉到必须停止这个项目，或者最低限度也要使其延期，”温伯格回忆道，“这个项目将送给苏联人一项巨大的战略优势，以及一笔巨额的现金流量。”

在政府各部门中没有就这个议题达成共识。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反对采取向欧洲人施加压力的办法，以迫使他们停止与苏联人做买卖。他认为，现在已经来不及对这个项目进行压制了。在温伯格的压力之下，他指派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迈尔·拉希什到几个欧洲国家进行一次旅行，说服他们采取能够代替天然气管道的选择方案，比如可以利用美国的煤炭、合成燃料以及挪威的天然气。但是，欧洲人显然不想买这些东西。至

于黑格所关心的事情，更是没有下文了。但是对于凯西和温伯格来说，天然气管道这个项目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在没有战斗到最后一刻时就让它获得通过。因此，凯西和温伯格让他们的情报分析员寻找可行的选择方案。

在国防部内部，将由助理国防部长理查德·珀尔监督这项工作。珀尔是一位老谋深算的防务专家，他千方百计地想建立一条反苏阵线。他拉上了本森，并且开始雇用顾问，提出可以代替天然气管道项目的选择方案。坦率地说，有些主意真是荒唐可笑。一位顾问主张，荷兰的天然气储量极大，因此欧洲的天然气可以自给自足；另外一位顾问建议从阿尔及利亚修建一条横贯非洲的天然气管道；还有人提议修建一条横贯伊朗—土耳其—希腊的天然气管道。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凯西指派情报分析员对项目建设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苏联问题分析办公室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苏联获取硬通货和优惠信贷方面所得到的利益，以及苏联人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自行建造管道的能力；能源分析员则集中力量拿出可能的选择方案。

5 月底，国家安全规划小组在白宫召开会议。里根总统在 3 月底的一次针对他的暗杀中受伤，现在已经恢复了健康，并且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到苏联的经济前景方面。他已经阅读了鲁滨逊的文章。总统的日程中虽然有好几项活动安排，但最重要的活动则是 7 月份在加拿大的渥太华举行的首脑会议，这将是总统第一次与外国政府首脑举行的高峰会议。最重要的是，这次会议的与会者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的盟国和经济伙伴，即西方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很显然，总统需要在这次会议上表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西方由于各种有争议的问题而出现裂痕，而不仅仅只是由于苏联天然气管道项目这一件事。国家安全规划小组的一致看法是，由于西方面临着无数的挑战，因此华盛顿需要再次重申其领导地位。

在凯西和理查德·阿伦的支持下，温伯格认为总统应该在峰

会上主动出击，提出美国的主张。“总统先生，”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必须停止这个项目，因为苏联人可能在这个项目上获得巨大的潜在利益。”然后，他列举了苏联人将从这笔交易中获得的种种好处，而里根对这些情况早已知道了。然后，温伯格提出了一项政策：“我认为我们必须立即以实施制裁的方式迫使这个项目停下来。”

亚历山大·黑格很快介入了。“总统先生，欧洲人不想从这笔交易中脱身。现在已经太晚了，因为他们已经陷得太深了。如果在渥太华峰会上公开提出这个问题，这只能使我们在与西方领导人进行合作之前就与他们发生对抗。让我先在私下里与外交部长们商谈一下这件事，看看他们是否考虑过一个代替天然气管道的选择方案。”

里根按照自己一贯的行事风格，带着两种建议回到了椭圆形办公室。两天之后，他宣布将不会公开向西方领导人发出挑战或者实施制裁，黑格将在私下里向外交部长们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凯西和温伯格不久就得到了另外一个机会。

与此同时，凯西和温伯格在另外一条战线上一前一后地展开工作。莫斯科正在千方百计地试图把手伸向西方的技术，从而有助于缓减其工业领域的瓶颈和增强其军事潜力，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苏联人购买了某些种类的设备，窃取了另外一些设备。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负责这项规模宏大的工作。据估计，在苏联约有 10 万人从事技术文件的翻译工作。“苏联获取西方的技术，就是他们的生命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负责军事援助和技术事务的前国防部副部长威廉·施奈德说，“这就大大地缓减了他们在工业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切断这条“生命线”，是美国早期的一项重要目标。

技术转让使苏联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技术转让机构委员会执行董事什泰夫·哈尔珀认为，情报显示“苏联已经做出一个

战略性决策，在技术研究与开发方面要避免花费更多的资金，而是要通过窃取与非法购买的手段获取西方技术。他们已经组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收集他们的生产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技术，然后决定如何把他们窃取来的技术按照优先次序转交给这些企业。”技术转让或许每年可以为国家节约数百亿美元的研发费用。

莫斯科对它能够得到的东西并不采取窃取的办法。经过专家鉴定，苏联人只是窃取那些能够缓减他们在民用和军事领域瓶颈的技术。凯西和温伯格改变了过去那种集中保护所有技术的做法，而是对前述关键技术加紧追踪，这种办法的效果更好一些。“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瓶颈技术，我们也是如此，”哈尔珀说，“他们寻找那些能够以多种不同方式促进发展的技术。”对于凯西来说，这一点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在从事同样的工作——试图鉴定希特勒的经济脆弱性与瓶颈。“我们可以这样说，凯西凭着他在战争期间积累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美国进行经济战的战场，”凯西的特别助理赫布·迈耶说。在国防部，理查德·珀尔再次率先提出这个问题。在中央情报局，凯西制定了各种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想让一个部门专门追踪苏联的技术基础，监督苏联的进口情况。

70 年代末期，斯坦斯菲尔德·特纳领导的中央情报局开创了秘密的 K 项目，以阻止西方技术向苏联流动。凯西对这个项目进行了彻底的评审，发现该项目的内容很不够，几乎没有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员，也没有一个判定哪些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有必要停止转让的方针。

1981 年初春，有关苏联窃取高技术的间谍活动的敏感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凯西的办公桌上。法国反间谍机构 DST 在克格勃中有一个情报源，代号为“一路平安”。此人是情报机构中负责科技工作的 T 处的精英人物，是该处的首任处长。他是一条非同寻常的情报渠道，他提供的情报表明，苏联人指望通过非法

购买或者窃取西方技术来弥补其工业和军事领域中的不足。“一路平安”总共提供了4000份以上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有关克格勃如何搜寻特殊情报、苏联“公司”和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如何设置以及它们是如何通过向国外派遣代理商来购买或者窃取禁运科技产品的。

美国对苏联在这些领域中的活动早就注意到了，但是在此之前不知道他们有如此大的规模。“一路平安”从来没有向法国要过钱。18个月之后，1982年11月，“一路平安”突然要与DST接近，这个联系渠道随即就停止了。后来才发现，他显然是陷入了一场与妻子的矛盾。当莫斯科民兵组织的一位成员接近他的汽车时，他在惊慌失措之中开了枪。“一路平安”被投入了监狱，后来被处死了。

情报就是凯西的财富，他每次收到情报，就把摘要转给温伯格、黑格和总统。“这些原始材料真正激起了里根的兴趣”，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员回忆道，“他只要看到这些材料，就会说‘我们必须使这个项目停止’。”

“一路平安”送来的情报以及其它情报真实地说明，技术转让对于苏联的技术、军事基础和经济领域的生存能力是多么的重要。各种资料显示，以苏联航空工业部为例，从1976年到1980年，该部通过非法获取西方技术就节约了8亿美元的研发费用，相当于10万人年的科研工作量。

苏联国防生产领域中最有权势的组织——军事工业委员会(VPK)和部长会议主席团负责制定规划，对外贸易部对规划的制定予以协助。这几家联合提出苏联想要获取的西方技术的目标清单，以改善苏联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军事工业委员会控制着一项数额相当于14亿美元的国家基金，专门用于获取西方技术。这笔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硬通货，它是通过向西方出口货物而获得的，主要用于在国外进行采购和支持情报活动。

凯西与温伯格于1981年6月初首次将“一路平安”提供的情报送到椭圆形办公室。凯西通过图表向总统展示苏联人正在获取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的价值。“总统先生，”他说，“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正在获得他们所需要的50%的技术。我们必须把这个数字降下来。他们这样做太安逸了，我们的国家安全面临着威胁。”

苏联人在明目张胆地窃取西方技术的同时，也从见利忘义的商人手中购买设备。这些商人购买西方的敏感产品，然后再把它们转手卖给莫斯科。苏联人以这种方式每年获得1亿个计算机零件，并且还购买生产单元和复杂的生产线。到70年代末期，莫斯科获取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高技术产品，绝大多数是在欧洲成交的。“总统先生，”温伯格插话说，“瑞典、瑞士和奥地利这些中立国就像过筛子那样被我们漏掉了。”

里根点头表示同意，并询问他们有何想法。他们两人都谈到要扩大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①]的权限。（该委员会主要是协调向共产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的贸易活动，由冰岛除外的所有北约成员国和日本组成。）凯西和温伯格相互看了一眼，然后国防部长先开了腔。他说，我们想扩大巴黎统筹委员会所确定的禁运清单上的技术出口清单。许多技术本来需要进行限制，却没有进行限制。我们也想向我们的盟国施加压力，特别是要向中立国施加压力。1979年颁布的《出口管理与控制法》为我们提供

---

① 英文全名为“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译为“多边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这是一个在美国控制下的主要西方国家政府间贯彻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禁运战略物资的机构，总部在巴黎。1949年11月成立，参加国有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加拿大、意大利、挪威、丹麦、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西德和日本。1950年又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1952年9月附设“中国委员会”，作为贯彻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机构。70年代以来，禁运逐渐放宽。——译者注

了一个杠杆。对于那些向苏联集团出口高技术产品的国家，我们可以严格限制向其颁发敏感技术的销售许可证。这一条本来是做了规定的，但没有得到执行。《出口管理与控制法》的第六条是总统手中的一个有力工具，它不仅可以停止美国的出口，而且也可以停止其它国家的出口。这一条款赋予总统一项权力，可以暂停或者限制“在美国管辖权范围之内的任何货物、技术或者其它资料的出口，或者服从美国管辖权的个人所经营的出口业务。”这就意味着，不仅美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在出口时要遵守这一条款，而且美国在海外的分公司以及任何外国公司根据许可证协定使用美国技术而生产的设备在出口时也要遵守这一条款。

里根很喜欢这个主意，于是点头同意了：“OK，现在让我们来干吧，让我们竭尽全力停止这个项目吧。”

夏初时节，温伯格派遣理查德·珀尔到欧洲各国进行秘密旅行，这是一系列此类秘密旅行的第一次，旨在向盟国施加压力，限制他们向苏联集团出口技术。他们最感兴趣的地区是几个中立国：瑞典、瑞士和奥地利。他们带给这些国家如下信息：请加强你们的出口控制，否则就要冒失去使用美国技术的许可证的风险。

一旦技术转让停止后就能对莫斯科产生戏剧性效果的关键领域之一，就是石油与天然气工业。6 月初，凯西收到一份研究报告，这是中央情报局总部兰利的能源分析家根据他的指示撰写的。这份报告描绘了一幅苏联能源领域的图景，很需要注入西方技术。苏联估计其石油储量为 60 亿—120 亿吨，但是如果利用目前苏联的开采办法，那么这些石油将越来越难以开采了。如果要维持产量并且开采新的储量，那么就需要西方的技术。在伏尔加—乌拉尔地区、俄罗斯的欧洲部分、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许多最容易开采的油田，其石油产量直线下降。据报道，莫斯科每年都要花费巨资来维持油田的生存。70 年代初期，莫斯科为了维持

其石油工业，每年要投资46亿美元。1976—1978年，每年的投资超过60亿美元。80年代初期，每年的投资额急速增长到90亿美元。苏联石油部打算通过大量购买西方技术来缓减这些难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报道说莫斯科需要下述技术：

- **回转式钻机**。苏联想对现有的油井进行深钻，穿过坚硬的岩石以维持石油生产。这就迫使他们用美国的回转式钻机来代替国产涡轮钻机。
- **勘探技术**。克里姆林宫早已公开宣布，1985年要把钻探工作量增加2.5倍。
- **海上钻勘技术**。苏联石油部对海上油井的产量十分看好，特别是巴伦支海①的无冰海域里的油井，但当前的产量却令人忧虑。他们希望获得英国的技术与方法，因为这些技术与方法在北海②证明是十分成功的。

据有的报道推测，苏联最想了解的事情就是美国在上述石油钻探技术领域中究竟有多少是居于垄断地位的。今后几年将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莫斯科无法获得这些技术，那么它将耗费数十亿美元进行研发。因此，卡斯帕·温伯格、比尔·凯西以及理查德·阿伦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正在努力采取主动行动，打击向克里姆林宫出口高技术的行为。1981年10月，美国海关开始实施一项旨在扰乱向莫斯科出口美国技术的大规模计划。华盛顿

---

① 位于欧洲北岸与苏联的新地岛、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挪威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之间，是以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支（Willem Barents，1550—1597，曾率探险队到达新地岛，发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姓氏命名的。——译者注

② 大西洋的边缘海。在大不列颠岛和欧洲大陆之间。海水常年不冻，海底蕴藏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译者注

美国海关大楼里的一所安静的战地指挥所负责协调整个行动。

在冷战期间，能源是一个重要的战场。能源市场上发生的战斗是一场“零和”[1]游戏，唯一的问题就是谁可能成为赢家。与其它任何国家所不同的是，沙特阿拉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生产国能够决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因此沙特就成为美国政府制定政策的焦点。

在戴维·朗起草的一份国务院机密报告中，将沙特阿拉伯描绘成为一个由王室所统治的不稳定的国家，极易受到威胁。报告指出：“在一定程序上，由于伊朗人的煽动，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至少有一部分什叶派教徒将像抱怨沙特政府那样，首先会抱怨美国，进而抱怨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MCO）。最近，反政府与反美印刷品已经开始出现在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和沙特阿拉伯东方省的其它地方，而且有报道说什叶派中持不同政见者正在着手组建自己的组织。”

前不久，美国政府承诺支持沙特阿拉伯人，实际上就是充当他们的保护人，以此换取沙特阿拉伯采取使美国经济受益、加重莫斯科经济负担的石油政策。这类行动中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便是1981年围绕出售先进战斗机和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的斗争。

① 英文为zero—sum)，其本意为赌赛双方一方得益，就引起另一方的损失，因而是得失所系的。——译者注

第五章

1981年6月8日下午4点30分，威廉·凯西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告诉他，以色列轰炸了伊拉克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凯西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跳起来去打电话。他命令美国的一颗KH－Ⅱ型“大鸟”图像侦察卫星脱离其正常轨道，越过苏联领空去拍摄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受损照片。在6个小时之内，以色列情报部门直接从卫星上接收到KH－Ⅱ图像侦察卫星所发回的照片。承蒙比尔·凯西的好意，他们完成了任务。

两天之后，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通过一条安全线路与以色列情报部门首脑伊扎克·霍菲陆军少将会见。凯西赞扬霍菲，攻击进行得很精确。霍菲感谢凯西在确定设施目标方面所给予以色列的帮助。“我很高兴这样做，将军，”凯西回答说，“现在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或许也需要得到你的帮助。”

凯西向霍菲重申了美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AWACS）的重要性。他说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履行了对以色列的安全所承诺的义务，现在需要特拉维夫帮助华盛顿渡过难关。美国虽然指望以色列支持其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还为时尚早，但难道不能减轻它对此事的批评吗？

霍菲说，他对此项出售计划仍然予以强烈的保留，但可以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驳回对此事的批评意见。凯西说他对此将非常感谢，并且告诉霍菲，如果他需要更多的卫星照片时，请随时给他打电话。

在以后的几个月之内，特拉维夫对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的交

易的批评，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尖锐程度上，都有实质性的下降。但是，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美国政府，尤其是卡斯帕·温伯格、比尔·凯西和总统，将不得不对议员们进行艰苦的游说工作，为这笔交易作出担保。

那年夏天，班达尔·本·苏丹王子一直呆在华盛顿特区，为的是促使国会通过这笔交易。温伯格与他一道工作，两人由此建立起了亲密的个人友谊。凯西有好几次在宴会中会见了他。王子是亲西方的，并且在其国内很有政治前途。作为国防大臣的儿子，班达尔与沙特阿拉伯的真正统治者法赫德[①]王储的关系密切。在沙特统治集团中，一旦国王哈立德[②]去世后，法赫德将处于接班的位置。温伯格知道，班达尔将在众多的国际事务中出于共同的目的而与美国进行合作。当时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中东负责人的查尔斯·科根建议凯西与这位王子结成一种亲密的工作关系。

7 月底，凯西会见了王子与法赫德的一个儿子沙德。这两位外国客人在华盛顿市区的费尔法克斯旅馆（现在的里茨—卡尔顿旅馆）拥有一个套房，里面有 8 个房间。这个地方正好在杜邦区的西面，因此很受沙特人的欢迎。这里的雇员看起来非常谨慎小心，环境优雅，而且具有世界性的特色。

班达尔长相英俊，衣冠楚楚，富有幽默感，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他喜欢西方的食物与时尚，麦当劳的“巨无霸”是王子最

---

① 沙特阿拉伯国王，生于 1923 年。1975 年哈立德国王即位时，指定他为王储。他是 70 年代和 80 年代沙特阿拉伯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主张对中东的温和国家、主要是埃及给予财政援助，以抵消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1990 年伊拉克入侵邻国科威特以后，法赫德一反其长期以来的政策，邀请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在沙特阿拉伯进行部署，以支持沙特国防军。——译者注

② 沙特阿拉伯国王，生于 1912 年。1975 年其同父异母兄长费萨尔国王遇刺身亡后继承王位。哈立德对中东政治的影响力不大，并且个性孤僻，国家大政多交由其另一同父异母兄弟法赫德王储处理。1982 年因病去世。——译者注

喜欢吃的食物。他是沙特空军的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而且极力反对共产主义。凯西与王子一见如故，两人非常投缘。

会见持续了近两个半小时，主要讨论了有关出售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的争论。凯西暗示，以色列将对此保持沉默，但他无法详细说明。班达尔和沙德对此表示怀疑。美国在此之前已经答应出售这种武器系统，但是由于亲以色列组织的游说，这些承诺经常在国会就流产了。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表示愿意给实业界的朋友打电话，请他们帮助对出售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进行游说。

凯西对拓宽华盛顿与沙特王室之间的关系也感兴趣。他拿出一小部分令沙特人感兴趣的最新情报与他们分享。利比亚与南也门刚刚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这将唤起沙特统治集团对此事予以极大关注，因为人们知道这两个激进的国家支持颠覆沙特王室的活动。凯西出示了一些由电子技术截获的情报和其它关键情报，这些情报都与这笔交易有关。他答应今后要比他的前任更进一步与沙特议会分享情报。中央情报局送给班达尔的一份正式简报马上就准备好了，这种举动确实不同寻常。当班达尔王子想要一份简报时，情报分析员马上就给他送去了。美国政府还提议，当沙特在国会山面临麻烦时将予以协助。

美国财政部每年都要汇集一份清单，对外国在美国的投资水平进行评估。这份清单覆盖了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所有国家，这些报告的机密件包括了沙特在美国投资的详细情报。众议院商业、用户及货币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众议员本杰明·罗森塔尔稍微参与了一些对沙特在美国投资情况的公开记录的清理行动。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和比尔·凯西都通过中央情报局经济研究办公室向罗森塔尔提供了一些有关沙特在美国的金融活动的资料，但关键资料处于保密状态，包括诸如《欧佩克：外国官方资产》、《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在美国进行公开采购活动面临着限制》以及《不断增长的阿拉伯财富所面临的难题》等机密文件。

班达尔希望美国政府保证不公开这些文件。“假如这些文件公诸于世，那么我们将认为这是对我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严重威胁，”班达尔对凯西说，“并且我们将被迫撤回在美国的某些投资。”

这是早在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处于萌芽状态时的一个例子。如果美国政府不能为这些资料保密的话，那么沙特阿拉伯人未必会信任总统及其顾问们。但是，这样做也会冒一定的金融风险。沙特阿拉伯人在美国有 750 亿美元的投资，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无论如何，我们将会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凯西告诉班达尔，“请不必担心。”

然后，两个人又讨论了为保证王室安全而应该在国内采取何种措施。沙特阿拉伯正在内政部之内组建一个国家情报中心，它是一个与法国情报机构合作发展起来的国内安全机构，拥有一个数据库的一台中央计算机与首都的安全机构联接在一起，在所有的机场、港口和其它重要城镇和省份都有终端。凯西说，美国政府准备帮助沙特培训这个系统的操纵人员。班达尔对这个想法表示赞赏。

然后，凯西把话题转到他想要讨论的主题。苏联正在试图增加对西方的石油出口，并且正在取得某些成功。他希望沙特阿拉伯能够提供有关苏联石油出口的准确情报。他想知道苏联人正在进行哪几种生意，正在商谈哪几项合同，以及其它石油生产国对苏联促进出口持何种态度。王子说这都没有问题。过了一会儿，王子把眼镜往上推了推，提议道：“为了我们之间的这种新的和有活力的友谊，干杯！”

那天晚上，凯西带着与沙特王室结成的坚固友谊，早早地离开了。他很快便成为沙特王室在华盛顿最好的朋友之一。

8 月初，从苏联帝国最明亮的闪光点波兰传来了令人心烦的

消息。波兰军队总参谋部的一位军官库克林斯基上校，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方式向他的线人传递了波兰政府即将发布《军事管制法》的计划。他提供了波兰政府所要散发的传单的复印件，这些传单是在莫斯科印刷的，其内容是命令市民保持镇静，并且制定了遵守《军事管制法》的规定。他还传递了有关波兰实施《军事管制法》计划的情报。库克林斯基以前泄漏给西方的情报屡屡得到验证，但是，这次的情报是真实的吗？美国政府的许多人士对此表示怀疑。这个情报的获取似乎太容易了，竟然拿到了传单的复印件。波兰人肯定知道有泄密渠道。他们也许提供的是假情报，或者想使库克林斯基暴露出来？由于对此情报存有疑问，加之国家安全委员会仍然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因此从来没有对这个情报进行充分的讨论。

然而，白宫却对波兰团结工会保持着一种强烈的兴趣。说穿了，总统就是鼓励他的助手们提出创造性的方式，使美国政府能够对团结工会的活动提供援助。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理查德·派普斯怀着一种能够阻止苏联入侵的愿望，正在努力加强美国的外交地位。但是，美国除了对事件做出反应之外，采取其它行动的能力非常有限。

以色列打入波兰的线人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凯西极其渴望与团结工会取得联系。针对罗马教皇的暗杀企图以及一个保加利亚籍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莱赫·瓦文萨在西方的朋友圈子里这一事实，人们推测这位工人领袖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暗杀目标。美国大使馆的官员正在处处受到监视，因此如果通过正常渠道与其接触，那就太莽撞了。团结工会里充斥着政府的特工人员，如果美国中央情报局设法将库克林斯基提供的情报向团结工会泄漏的话，那么安插在波兰内部的“鼹鼠”[1]将会暴露。凯西

---

① 指长期潜伏的间谍（尤指双重间谍）。——译者注

想起温斯顿·丘吉尔①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临着同样的窘境。他决定在纳粹德国空袭考文垂②大教堂时不予设防，就是为了保护盟军已经破译德国密码这一高度机密。如果中央情报局想要提醒一下团结工会的话，那么也只能通过线人来做这件事。

总统早就发誓要阻止苏联入侵波兰，而且他承诺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在温伯格的领导下，美国的飞机编队继续飞入苏联领空。8 月底和 9 月上旬，共进行了 11 次此类飞行，其中包括从中西部的空军基地起飞的轰炸机以及从西德空军基地起飞的战斗轰炸机。特别是后者，在苏联人的心目中造成了疑虑，不知道美国军队对苏联军队的行动作出反应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美国空军编队将从空军基地起飞，只能在波罗的海上空沿着波兰北部海岸线飞行几千英里。苏联防空部队将对其进行跟踪，并且向苏军总参谋部报告。在进入苏联领空之前的最后关头，美国空军编队将返航并飞回基地。

早在 3 月份，温伯格就与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在百事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唐纳德·肯德尔的私人生日宴会上打了一场嘴巴官司。多勃雷宁想寻求与美国国防部长会面，于是肯德尔把这两位约到了一起。事实证明，这位苏联大使的好奇心相

---

① 温斯顿·伦纳德·斯潘塞·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1874—1965），是 20 世纪最负盛名的英国政治家，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多次担任内阁大臣职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领导英国人民取得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被人们推崇为英国的拯救者。英国哲学家艾赛亚·伯林有一段话表达了英国人民对这位伟人最崇高的评价："他是一位高于生活的人，比普通人伟大，而且更质朴，是他这一时代的历史巨人。他胆略过人，坚强而又富有想像力……他的演说才能令人惊叹。他拯救了祖国，使之免于沦亡。他是一位既存在于现实生活、又充满传奇色彩的神话般的英雄，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译者注

② 英国的重要工业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考文垂遭到巨大的破坏，1940 年 11 月和 1941 年 4 月的两次空袭几乎炸毁了城市的大部分，包括圣马可大教堂的尖塔和格雷修士教堂，被毁房屋达 50479 座。——译者注

当大。

“依你之见，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多勃雷宁问道，“为什么现在流传着这么多流言蜚语？”

“我想部分原因是由于华盛顿人民觉得，最重要的是苏联和世界知道美国已经发生了变化，”温伯格说，“本届政府已经并且将要进一步增强实力，而且我们更为坚定、更有决心，同时这里的人们也在强烈关注着苏联在阿富汗和波兰所采取的行动。”

多勃雷宁立即予以回击：“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国家非常清楚美国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好记者。但是，如果我们两国展开讨论而不仅仅是相互发表声明，难道你不认为这是重要的吗？”

“是的，”温伯格渐渐不耐烦地说，“如果具备这样的气氛与环境，那么进行某种有效讨论的前景是存在的，并且这类讨论具有取得成功的某种可能性。如果苏联入侵波兰，那就清楚地表明这类讨论是无益的。”

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迹象表明莫斯科将在波兰问题上做出让步。苏联军队已经沿着西部边界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初级演习了。一位前苏联情报官员回忆道：“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威吓使波兰人屈服。”苏联空军正在波兰的托伦[①]和其它地区进行飞越领空的战斗演习。军用直升飞机和运输飞机正在向波兰运输物资，这表明军事行动已经迫在眉睫了。除了对波兰人进行恐吓之外，苏联飞行员不理睬波兰的空中交通管制，这种行为就对飞行安全构成一种威胁。

早在1980年，华沙条约组织的最高决策层就有动用武力的倾向。根据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召集的一次华沙条约组织紧急

---

① 波兰中北部城市，托伦省省会。著名天文学家哥白尼于1473年诞生于此。该城于1793年被普鲁士夺取，1919年归还波兰。——译者注

会议的备忘录，好几位领导人认为波兰团结工会是对整个苏维埃体制的一种威胁。埃里希·昂纳克[①]于1980年底的高峰会议之前在一份给勃列日涅夫的呼吁书中写道："根据我们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情报来看，反革命势力在波兰正在持续不断地发起进攻。任何的犹豫不决都意味着死亡——社会主义波兰的死亡。昨天，我们的集体措施有可能为时过早；今天，这些措施是很必要的；但是如果在明天再采取这些措施，那就太迟了。"

勃列日涅夫似乎赞同昂纳克的担忧。根据会议备忘录，这位苏联领导人说："波兰的局势以及源于波兰的危险不单单是波兰的事情，而是对我们大家都有影响。"莫斯科的政治地震恰恰撼动了整个苏维埃帝国的根基。但是，勃列日涅夫无法确知华盛顿是如何想的。那么，白宫的这位新牛仔将干些什么呢？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确地认识到，在波兰投入的赌注是多么的昂贵。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及东欧事务负责人理查德·派普斯为总统整理了一份两页纸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内容虽然宽泛并且太过理论化，但它增强了里根认识到团结工会给克里姆林宫造成了何种威胁，因此它对于保持团结工会的活力是多么重要。派普斯写道，下一步对于苏联本身来说，波兰"在华约组织中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国家。"克里姆林宫将团结工会视为一个"传染病毒"，因此需要从社会主义的躯体上予以清除。如果不能

---

① 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1912—1994），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1971年5月3日当选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以后连选连任中央总书记。1971年6月24日被任命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1976年10月起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81、1986年连选连任。1989年10月因健康原因辞职，同年12月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11届12中全会决定将他开除出党。1990年4月进入柏林附近的苏军基地避难，1991年又避难于莫斯科。1992年7月被遣返回德国受审。1993年被德国当局释放，获准前往智利，直到1994年5月去世。——译者注

做到这一点，那么就将苏联集团置于“不稳定”的“危险之中”。现在“病毒”正在“扩散”。在波罗的海地区，发生了与团结工会成立之前的那种状况相似的震颤。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们与他们在立陶宛的天主教兄弟进行联络，而且他们的观点被善意地接受了。1981 年 9 月，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们甚至公开宣布，支持在苏联集团内部组建的任何独立工会组织。团结工会领导人安杰伊·格威亚兹达将团结工会在格但斯克[①]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所作出的决议到处散发，决议指出：“我们支持那些为建立自由与独立的工会组织而踏上艰难征途的人们。”波兰的共产党政府对这个决议迅速进行谴责，其观点十分明确：“这份呼吁书将团结工会置于反对社会主义世界的境地。”

派普斯的备忘录送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部高级成员手中，他们是：里根、阿伦、布什、黑格、温伯格和凯西。这份备忘录产生了刺激效果。“我们愈加认识到，”温伯格回忆道，“团结工会需要生存下去。”

克里姆林宫想通过武力使波兰屈服，与此同时里根政府看到了苏联集团内部出现了可供利用的裂痕。赌注是极其高昂的，但是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想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而采取太过咄咄逼人的攻势，进而冒爆发全球性战争的风险。因此双方采取了一种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隐蔽斗争方式。

波兰的债台高筑，经济状况很不稳定。从 3 月份开始实施的肉类配给体制，已经扩大到包括从尿布到清洁剂在内的所有物品，无法确保老百姓得到足够的食品。这样一来，就发生了更多的罢工事件，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危机。种种灾难使国家在财政上陷入困境。1981 年，波兰需要借外债 110 亿—120 亿美元，

① 波兰中北部的港口城市，波兰团结工会就是 1980 年从该市的造船厂兴起的。——译者注

其中35亿—40亿美元新借的硬通货用来向债务部门提供贷款，70亿—80亿美元用来偿还年底就要到期的三分之一的债务。由于在西方信贷市场上没有信誉，因此华沙只好拖欠贷款。

克里姆林宫一直注视着波兰充满不确定性的事件的进展。8月底，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公开呼吁波兰政府要使其经济复苏，“不要陷入资本主义国家过多的债务之中”。从1980年8月到1981年8月，莫斯科共向华沙提供了4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还增加了诸如石油、天然气和棉花等生活日用品的供应。波兰虽然早已缺乏资金，但它不知不觉地陷入混乱状态的现实才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极大的震动，因而不能对局势等闲视之。

在华盛顿，里根总统指示内阁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保护团结工会和促进波兰的改革。1981年7月初，由11家银行组成的一个指导委员会达成协议，美国金融机构应当与400家国际银行就如何处理波兰债务问题进行谈判。最后决定对此采取果断措施，实际上就是要求华沙立即偿还世界各个银行大约27亿美元的贷款。比尔·凯西和唐纳德·里甘给那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银行家们打电话，怂恿他们支持美国的这一强硬立场。8月7日，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向波兰提供银行贷款的咨询会议，美国代表在会议期间会见了英国、西德和法国的政府官员。这是一次非正式会议，会后没有发表公报。但是，美国却采取促进波兰改革的强硬立场，将波兰在经济与政治体制方面发生某种变化作为提供贷款的先决条件。

里根政府也在尝试把直接提供食品援助作为一种向华沙施加压力的手段。对于因深受经济体制弊病之苦而陷入绝望状态的波兰政府，美国希望通过承诺西方与其进行贸易和对其予以援助，引诱其脱离莫斯科。7月，美国政府同意向华沙提供7.4亿美元的援助。“我们明确希望促进波兰的改革和支持团结工会，”罗伯特·麦克法兰回忆道。

当美国政府公开支持团结工会和促进波兰改革的时候，比尔·凯西也在幕后与波兰的反对派建立某种秘密关系。他首先尝试通过美国劳工组织这个渠道与波兰团结工会取得联系。美国劳联—产联（AFL—CLO）[①]向团结工会提供建议、培训和财政支持。仅在1980年，该组织就送给团结工会约15万美元的经费，同时还提供了印刷机和打字机，并且通过西欧工会组织给予技术和专业知识方面的援助。这类行动使凯西深受感动，因此，他于1981年9月中旬给劳联—产联国际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欧文·布朗打了一个电话。

布朗是一个毫不妥协和锋芒毕露的人。他原来是劳联在欧洲的代表，在1948年的意大利选举中，他充当了美国对非共产党人进行秘密援助的渠道。他还在自己的工会组织中与共产主义作斗争，并且是莱赫·瓦文萨的重要支持者。

“你在波兰所从事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要继续下去。这项事业正在使共产党人陷入混乱，”凯西连珠炮式地说着，他的手臂照例在空中挥舞着，“我始终注视着有关你的伙计们的报道，而且他们是多么地拥戴你。”

在电话里闲扯了20分钟之后，凯西转入正题。他想与团结工会进行接触，尤其是与团结工会中处于决策地位的高级领导人进行接触。他想得到有关波兰内部局势的情报。“我们所得到的一些有关波兰的情报统统是废纸，”他与布朗说这话时，显然没有提及库克林斯基。

“你需要我做什么呢?”布朗问道。

---

① 英文全称为“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译为“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劳联—产联”。劳联（建立于1886年）是以把工人组织成行业工会的原则建立的，而产联（建立于1935年）则是按工业部门组织工人。这两个组织于1955年合并，成为美国独立劳工工会联合会。——译者注

凯西想要劳联—产联提供简报，以获得有关波兰内部局势的情报，因为该组织就在当地参加战斗，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可以如实提供这类原始资料。布朗说他很愿意帮忙。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后来直到 1986 年，布朗才与凯西（或者是他的一位代表）和国家安全委员成员约翰·波因德克斯特见了面。“我过去常常与布朗见面，发现他所提供的情报完全符合事态的发展，从而确信他对美国的政策很了解，”波因德克斯特回忆道，“并且他在欧洲与工会领导人会见时，能够传达我们的政策，也能够收集情报。我们要求他为我们办一两件小事情，但他在大多数情况下却为我们提供了情报。”

然后，凯西问了一个更为直接的问题。他想在波兰找几个中间人，尤其是那些能够与团结工会联络的人员。能不能与布朗“合作”？工会领袖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件事。他立即回答说，不行。“此类合作一旦公诸于众，将损害团结工会的完整性，并且使苏联人得到口实，即劳联—产联就是中央情报局。他们总想得到这样的口实，从而能够指责我们缺乏诚意。”

形势的发展令凯西感到气馁。他在波兰的关键情报源库克林斯基上校提供了一份紧急情报，波兰即将发布《军事管制法》。但是，对于库克林斯基来说，随着形势正在越来越紧迫，他的对手也越来越谨慎了。11 月 2 日，负责军事管制计划的波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耶日·斯卡尔斯基将军召见了库克林斯基。斯卡尔斯基将军告诉库克林斯基、另外两位副官什克拉尔斯基将军和普哈拉上校以及威特上校：“美国人知道我们的最新计划。”这时，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了库克林斯基。他一边飞快地思考，一边保持镇静，告诫自己暂时对此不予理会。但是，他感觉到大家对他已经产生了怀疑。因此，他向中央情报局的联络人发出了紧急信号，并且果断地离开了波兰。美国在波兰的这个最佳的线人就这样断掉了。

在9月中旬的一个炎热的日子里，卡斯帕·温伯格、埃德温·米斯、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卡卢奇以及理查德·阿伦，与总统在白宫讨论所制定的计划。“由于天气炎热，所以我们坐在了露天，”米斯回忆道，“头儿的手里拿着一叠文件。”温伯格领导的五角大楼急速发展，其预算仅1981年就增长了13%，后来的预算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总统在竞选活动中就宣布有必要重建美国的国防，温伯格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国防部长带来了一个目标清单，主要集中在高技术武器系统方面。温伯格想在“新兴技术”、使用微型芯片的奇异武器、激光和先进技术等领域进行大力投资。“我们有必要在高技术方面显示我们的实力，”温伯格对在座的各位说道，“苏联人正在落后，这些新武器系统的某些部分对他们目前陈旧的武器库构成了威胁。”

温伯格所预期的国防建设包括使美国军队全面现代化。他想发展三叉戟导弹项目（D—5）以及建造B—1轰炸机，同时继续发展隐形轰炸机（B—2），以增强美国的陆基导弹能力，并且使常规力量现代化。他认为美国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也应该有一支强大的空中补给力量。里根全面接受了这项计划。如果国会正式通过了该计划，那么五角大楼的预算在短短的几年内就会增长50%。

那年秋天，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这是美国政府收到的好消息。班达尔王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甚至书面向总统、温伯格和凯西表示谢意。不久之后，凯西又进行了另外一次秘密旅行——访问巴基斯坦和中国。巴基斯坦是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援助的渠道以及美国最新战略转变的另外一个关键成分。4月，亚历山大·黑格公开提出，如果克里姆林宫入侵波兰，那么华盛顿将考虑向中国出售先进武

器。克里姆林宫考虑到这一点，不得不退缩了。凯西认为北京将发挥有益的作用，因此他急切地与中国签署了几项有关情报共享的协议。

巴基斯坦是一个四面受敌的穷国，因此热切地希望与美国合作。与巴基斯坦发生过战争的印度在其南面；激进的伊朗和饱受战乱的阿富汗在其西面；巴基斯坦与其正北面的苏联之间仅有阿富汗的一块长条状领土相隔离。

在巴基斯坦，凯西的东道主是巴基斯坦情报机构（ISI）首脑阿赫塔尔·阿卜杜勒·雷曼汗将军。阿赫塔尔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严肃的人，花岗岩般的面庞显出一副冷漠的表情。此人实际上控制着阿富汗境内的抵抗组织，决定着购买何种武器以及哪一位阿富汗领导人将得到这些武器。他正在试图制订一项指导战争的总体战略。简而言之，他的主要目标就是保持阿富汗抵抗组织的活力，并且以此牵制苏联人。

阿赫塔尔将军在巴基斯坦的权势仅次于齐亚①总统，是一位铁腕人物，与印度打过三次仗。对于他来说，印度和苏联究竟谁是巴基斯坦的头号敌人，仍然是一个疑问。曾经于1983—1987年领导巴基斯坦情报机构阿富汗局的穆罕默德·优素福旅长回忆道："他下定决心，要奋不顾身地击败苏联人。"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架飞机载着凯西在伊斯兰堡郊外的查克拉拉空军基地降落。按照预先的安排，美国大使馆当时正在举行一场正式宴会，以分散别人的注意力，从而使凯西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巴基斯坦。阿赫塔尔将军在隔离的飞

---

① 齐亚·哈克（Zia—ul—Haq，1924—1988），巴基斯坦陆军将领、总统。1977年发动军事政变，从布托总理手中夺取了政权，任军事管制首席执行官，同时保持其陆军参谋长职务，1978年乔德里总统辞职后接任总统。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他以在美国援助下加强巴基斯坦军事力量作为回应。1988年8月17日因飞机失事而死亡。——译者注

机库内欢迎他，然后车队就立刻前往美国使馆附近的一所安全住所。在随后的48小时内，凯西要研究向阿富汗抵抗组织运送武器计划的各个细节。凯西经过休息之后，与阿赫塔尔将军在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情报机构总部举行了会晤。阿赫塔尔向凯西介绍了从前线得到的下列最新情报：苏联人的伤亡情况、阿富汗抵抗组织的现状、武器的运送量以及对武器的需求量。凯西全神贯注地听着，然后开始研究使莫斯科为这场战争负出更大代价的方式。“他的头脑非常敏捷，提出要以一种大胆而残酷的方式与苏联人作战，”优素福回忆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因凯西以激烈的言辞反对苏联而著称，他的态度就是“他们必须付出代价”。不久之后，巴基斯坦情报机构送给凯西一个绰号：旋风。

由于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凯西感到非常高兴。但是，他仍然有几个疑问：采取什么办法能够增加苏联人的伤亡？什么武器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阿赫塔尔建议使用地对空导弹来对抗苏联的空中优势。他还认为，某些高射炮也将起作用。凯西答应了阿赫塔尔的所有请求，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当美国的一些情报人员当场提出反对意见时，凯西打断了他们的话：“不，将军知道什么是他想要的东西。我们要满足他的要求。”

凯西与阿赫塔尔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相互协作。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他们相互猜疑。这次行动基本上是由中央情报局主导的一场“现货自运”的行动，即美国提供数千万美元的金钱让巴基斯坦人去打仗。在这场行动中，比尔·凯西是一位积极分子，他的目的是进行战略投入，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伊斯兰堡由于成为阿富汗游击队的一个安全庇护所，因此与莫斯科的关系正在降温。齐亚总统未必愿意让遥远的美国人在规划战争策略的过程中发挥太过重要的作用。

两天之后，凯西所乘坐的黑色飞机离开巴基斯坦，穿过有争

议的克什米尔[①]地区前往中国。在早期的美国政府中，高级官员一致认为，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是美国的一个敌人，但也是刺向克什米尔胸膛的一把地缘政治的利剑。事实将会证明，北京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有用处。

中国与苏联有着很长的共同边界线，被苏联摆在边界线上差不多50万军队捆住了手脚。中国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越来越被美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情报伙伴来对待。当伊朗国王于1979年倒台时，美国失去了一些最为重要和隐蔽的窃听装置。这些装置沿着伊朗的北部边境线安放，成为获取苏联在其中亚地区荒无人烟的平原上进行弹道导弹试验的情报的理想窗口。

然后，凯西把话题转到与阿富汗战争相关的一个更为敏感的主题上，即苏联的中亚地区。莫斯科与北京已经来来回回地相互挑衅了好几年了，双方都企图利用对方境内的民族紧张关系。1980年12月4日，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理苏丹·伊布赖莫夫在他经常去的一个位于伏龙芝[②]东部的小镇上睡觉时被谋杀。这个小镇距阿富汗边境仅有100英里。克格勃官员认为，他是被穆斯林极端分子暗杀的，而且暗示中国参与了这次暗杀活动。中国否认与此次行动有任何关联。但是，问题不仅在于苏联方面。在与吉尔吉斯接壤的中国一侧的新疆，民族关系同样处于紧张状态。

毫无疑问，中国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事实上，他们只是在最近才引人注目地扩大了乌鲁木齐的无线电广播电台的传播范

---

① 全称查谟和克什米尔（Jammu and Kashmir），位于南亚次大陆北部山区，与中国新疆和西藏接壤。1947年印巴分治前，克什米尔原为一个土邦，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穆斯林占人口的77%，印度教徒占20%。印巴分治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因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而多次引发争端并导致战争。目前约2/5弱的地区为巴基斯坦所控制，其余为印度所控制。——译者注

② 原名皮什佩克，也称比什凯克（1862—1926），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1991年恢复原来的名称比什凯克。——译者注

围，使节目讯号能够传播到苏联中亚地区。因此，凯西告诉东道主，阿富汗游击队正在偷偷进入苏联的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是对苏联实施阿富汗计划的一项内容，但是凯西却在考虑对此予以背后支持，并且打开一个或者两个宣传缺口。这件事情很敏感，因为中国人未必喜欢激起民族矛盾的想法。归根结底，他们到头来可能陷入纠葛之中而不能自拔。

在回国的飞行途中，凯西接到了许多有关金融方面的情报。负责起草有关苏联经济脆弱性评估报告的特别助理赫布·迈耶，偶然获得了一些有趣的情报。1981 年，苏联人在市场非常疲软的情况下曾经大量出售黄金。他们在 1980 年出售了 90 吨，这个数字是他们平常的出售量。但是，到了 1981 年 11 月初，他们就将 240 吨黄金变成了现金，而且这个数量还在增加。“对于我们双方来说，这都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征兆，”迈耶回忆道，“这表明他们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第六章

1981年12月9日夜晚，一架苏联重型军事运输飞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降落到华沙附近的一个秘密空军基地。飞机上坐着华沙条约组织军队总司令维克托·格奥尔基耶维奇·库利科夫元帅。他一下飞机，就被一群全副武装的苏联保安人员簇拥着钻进了一辆黑色轿车的后座里，然后风驰电掣般地驶向苏联在华沙郊外的军事基地。在整个1981年，库利科夫抱怨西方对波兰进行“颠覆”，并且公开指责团结工会成为华约的一种“威胁”。

自从1945年以来，波兰就是华约最重要的非苏联成员。不论是从军事力量还是从经济实力来衡量，波兰在非苏联国家中对华约的贡献都是最大的。在苏联的东欧霸权体系中，波兰在地缘政治方面是一个至关重要国家。但是，苏联对波兰渐渐失去了控制。波兰的大街上出现了公开向苏联发起挑战的现象，呼吁在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内实行自由选举和组建独立工会组织。库利科夫要给波兰这口沸腾着的锅盖上盖子，他来到这里就是监督《军事管制法》的发布。

波兰保安部队已经根据代号为“春季行动”的严格要求而演练好几个月了，库利科夫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计划的编制工作。在他到达波兰的3天之后，行动开始了。午夜时分，波兰保安部队在作为苏联代理人的军队的支持下，实际上是侵略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坦克驶过了华沙的街道，全国到处设置了路障。与此同时，有340万条专线电话被掐断。一夜之间，5000名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被捕，与所有邻国的边境统统予以关闭。波兰的国内

安全机构动员了25万人的部队，其中包括摩托化警察部队（ZOMO）以及置于内务部反间谍部门（WSW）控制之下的准军事部队。不到一夜的功夫，所有的反抗行为（或者被官方认为是反抗行为）就崩溃了。上午6点钟，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电台和电视台宣布，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现在国家权力由新组成的救国军事委员会接管。

事件发生之后，几乎全世界都为之哗然。里根政府尽管接到了库克林斯基上校所提供的情报，但还是感到惊愕。在波兰上空的美国间谍卫星没有侦察到波兰军队在12月12日这个决定性夜晚之前的几天和几小时内的调动情况。那几天里波兰上空覆盖着厚厚的云层，间谍卫星什么也没有看见。使人感到惊愕的并不在于那个《军事管制法》的发布，而是它的发布是如此迅速而坚决。

在白宫，当工作人员接到第一份报告时呆若木鸡。然而，这种迷惑状态很快就被一种愤怒的情绪所取代。当时总统正在加利福尼亚，但是，他在电话里作出了很明确的反应。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与东欧事务负责人理查德·派普斯回忆道：“总统对此表现出一种怒气冲冲的情绪，他说：‘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我们有必要猛烈地敲打他们，并且要拯救团结工会。’总统显得信心十足，准备采取行动。”

波兰《军事管制法》的发布，成为美国政府对苏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它坚定地在幕后支持一项击退苏联势力的进攻战略。在几个月之内，总统将签署几项秘密指示，以表明美国政府的政策就是要破坏苏联的势力，并且呼吁发起一场广泛的经济战。同时，要寻找机会在东欧散布与波兰当局不同的意见。

在《军事管制法》发布不久之后，总统与其亲密顾问就波兰局势以及美国所要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讨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许多成员没有在场。“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被认为不能保密，他

（总统）不想冒任何风险，”派普斯回忆道。当时在场的有副总统布什、威廉·克拉克、国务卿黑格、温伯格、埃德·米斯、理查德·派普斯和威廉·凯西。

经过讨论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美国必须向华沙和莫斯科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与会者普遍支持实施经济制裁，并将其作为一种表达美国愤怒情绪的方式。但是，当时派普斯提了几个问题：怎样才能做一些具有前瞻性的事情？怎样秘密资助团结工会，以确保苏联集团内第一个公开的反共组织在这个严酷的政治冬季里能够幸免于难？这个危险行动的幽灵在房间里弥漫着。停了一会儿，亚历山大·黑格的洪亮声音打破了沉默。“这简直是发疯了，这种事情是干不得的，”他说，“苏联不能容忍我们这么做。团结工会已经成为过去了。”布什对此表示同意，他对莫斯科可能出现的愤怒表示担忧，建议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派普斯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唯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而且他本人是一名美籍波兰人），他试图克制自己的怒气。“苏联人所担心的事情就是团结工会的死里逃生，”他反驳道，“他们担心被团结工会传染，因为这股潮流可能波及到苏联集团的其余国家，甚至立陶宛和俄罗斯自身。国务卿先生，您不了解波兰人。团结工会能够幸存下来。”温伯格、凯西和比尔·克拉克在发言中满腔热情地支持采取行动。但是，按照派普斯的说法，总统“不需要任何鼓励”，他立即要求凯西起草一份秘密行动计划。“他不仅想使波兰获得自由，而且还要打碎苏联不可战胜的神话，”克拉克回忆道。

美国政府已经秘密地准备好了一笔资金，但后来没有按照传统的要求对这项行动予以资助。“美国没有采取正式的谍报行动，”派普斯回忆道，“因为担心泄密。这是一次高度机密的行动，完全是‘暗箱操作’。”

在会议之后，凯西心急火燎地返回兰利。在他的那辆奥尔兹

牌轿车沿着乔治·华盛顿专用行车道路飞速行驶时，他就开始在电话里召集自已所信赖的几位助手开会。现在要分秒必争。凯西与6位助手一道制订了一项为团结工会筹资并建立联系的计划。他们从头开始干这件事情。团结工会将需要什么？外部的支持如何才能浸入到团结工会？中央情报局行动处参与制订计划的一位官员回忆道："团结工会是一个具有数百万成员和支持者的平民组织，但是，他们对《军事管制法》的发布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们缺乏指挥、控制与联络的能力，而且内部混进去许多间谍。除了波兰人民的广泛支持之外，可供他们利用的资源非常少。"对于凯西来说，整个事情想必就像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的翻版，所碰到的问题是相同的，即支持敌对阵线中的人民，所不同的仅仅是角色与名称而已。

在中途的某一个地方，凯西用保密电话接通了以色列情报局长霍菲将军。"凯西向他表达了美国对以色列情报机构的严重不满，"一位官员回忆道。摩萨德在6个多月之前就答应要动用在波兰的情报线，然而没有获得任何情报。凯西在一阵咆哮之后，要求对方尽快获取有关情报。他大声叫道："我不在乎《军事管制法》会不会把事情搞复杂！"他提醒霍菲回忆一下以色列曾经共享过美国的卫星照片和其它情报。

凯西气呼呼地摔下了电话，然后给中央情报局罗马情报站打电话，该站负责人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唤醒了。凯西叫他派人与卡迪纳尔·卡萨罗利取得联系。在波兰发布《军事管制法》以后，梵蒂冈的态度或许会发生变化。卡萨罗利在家里接到了电话。凯西得到的响应令人鼓舞：梵蒂冈乐意对此予以合作。针对教皇的暗杀企图与《军事管制法》的发布这两件事情深深地影响了卡萨罗利，因此这位梵蒂冈的外交大臣同意与中央情报局的代表举行一次会晤。

1982年1月底，各项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霍菲将军打

来电话，中央情报局可以立即介入情报线。梵蒂冈的卡迪纳尔·卡萨罗利按照预定安排与中央情报局的代表会面，以努力加强“合作”。教廷从一开始就坚持决不扮演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秘密角色，也不会为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提供掩护。但是，梵蒂冈在提供情报以及与波兰内部进行联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国家安全顾问的首席军事顾问、了解此次行动的少数几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回忆道：“很显然，根据所收集到的有关事态发展的情报，并且站在团结工会以及西方的波兰政策支持者的立场上来看，梵蒂冈发挥了非常有益的作用。”他说，教廷不是中央情报局采取行动的“伙伴”，“而只不过是与我们在波兰问题上具有某些共同的目标。在收集和传递情报这两个方面，只要我们有可能就趁机利用了这一点。”

正当凯西综合他的秘密行动计划时，卡斯帕·温伯格已经在五角大楼里组建了一个经济专家小组。这个专家小组是在兰德公司的赞助下组建的，其职责就是要经过长时间的机密讨论来制定一项战略，以便把本来就不健康的波兰经济彻底搞垮。国防部副部长弗雷德·伊克尔把兰德公司两位很有经验的经济学家亨利·罗恩和查尔斯·沃尔夫以及几位值得信赖的局外人（包括当时担任大通曼哈顿公司副总裁的罗杰·鲁滨逊）召集到一起开会。波兰在有关支付西方国家银行贷款一事时总是支支吾吾，因此，为期一天的会议主要集中到如果采取行动使波兰陷入违约的境地时，西方将获得什么样的利益以及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会议认为，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波兰陷入违约的境地，进而有可能把整个苏联集团推入金融危机的深渊。按照鲁滨逊的说法，“五角大楼一致同意这么办。”

但是，纽约的银行家们强烈反对这种行为。“如果波兰真的陷入违约的境地，那么实际上就有可能减轻华沙花掉宝贵硬通货的压力。”鲁滨逊认为，这种设法使波兰违约的倡议也可能对苏

联有利，尤其是如果苏联感觉到这是华盛顿在金融市场上所采取的一种政治步骤的话，情况将更加如此。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如果波兰突然违约的话，将在全世界引起连锁反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真的冲抵波兰的280亿美元债务，那就有可能令其他许多债务国受到鼓舞，促使他们寻求同样的解决办法。鲁滨逊补充道："从政治上促成一种违约的既成事实，包括造成主权国家的违约行为在全世界'即时重放'的前景，这是从拉丁美洲开始的。对于我们中间那些从1981年就在精心制订波兰重新偿还债务时限的人们来说，这很明显就是一种国际债务危机即将到来的征兆。"

鲁滨逊也认为，波兰一旦违约，将使受到困扰与压迫的波兰人民的处境更加恶化，而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则无关痛痒。通过与大通曼哈顿公司进行商谈，消除了与银行业发生冲突的任何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鲁滨逊公开表明了他的观点。他对五角大楼的官员说："假如你们真想使莫斯科受到损害，那么我们就要把目标指示器偏转好几度，直接对苏联施加金融压力，因为苏联毕竟是波兰发布《军事管制法》的催生剂和发起者。我们要推迟阻挠天然气管道工程第一条管线的建设和停止阻挠第二条管线的建设，而要代之以中断对官方信贷的补贴以及向莫斯科转让与军事相关的高技术。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鲁滨逊的观点获得了大家的认同，温伯格将他的观点向总统作了陈述。

几个月以来，温伯格一直认为美国在乌连戈伊天然气管道项目上要持强硬立场，这一次他在怒气冲冲的总统要采取行动之前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鼓动之下，总统几乎立刻就接受了温伯格的计划。在波兰发布《军事管制法》的3个星期之前，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对温伯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责他反复呼吁西方对苏联进行天然气和石油设施的禁运，声称这种做法"无异于一场经济战"。但是，随着波兰发布《军事管制

法》，美国政府的态度急剧地转向支持发动一场此类战争。12 月 29 日，里根总统在电视里宣布对苏联实施禁运，美国将禁止参与天然气管道项目。这一计划不仅对大约 60 家美国公司产生了影响，而且中断了日本和苏联在萨哈林岛①的周边地区开发石油与天然气田的计划。日本与苏联之间签署的那项协议与天然气管道交易类似：日本对这个项目进行资助，以此换取苏联向日本供应石油与天然气的保证。但是，这项交易只有获得通用电气公司、德雷塞工业公司、施卢姆贝格尔兄弟有限公司和韦尔乔公司的精密海上石油钻探技术，才能开展工作。

已经进行了 7 年的萨哈林岛石油与天然气开采项目处于一个关键时期。该区域已经探明 11 亿桶的石油储量和 25 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储量。总部在东京的萨哈林石油开发总公司，由日本国家石油公司和另外几家私人公司联合拥有，该公司想在海水里的冰块融化的春季开始进行油气勘探，任何推迟都将迫使公司等到 1983 年，并且有可能使该项目完全终止。日本原打算通过加速油气田开发速度来取代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但是西方对苏联的禁运打乱了日本的这一计划。克里姆林宫本来指望每年从这个项目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如今却成了泡影。

当莫斯科获取关键技术的渠道被切断的时候，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尽其所能来阻止银行界对苏联提供贷款。对国际银行界十分了解的鲁滨逊，实际上起到了领导这场行动的作用。伊克尔和温伯格希望采取积极的步骤，公开推动金融界停止向苏联贷款。但是，鲁滨逊指出，政治干预或者强迫命令将在银行界行不通。

---

① 又称库页岛。俄罗斯远东的岛屿，与千岛群岛一起组成萨哈林州。从 19 世纪中叶起，俄罗斯和日本之间长期争夺其所有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 年），萨哈林岛南半部和千岛群岛被苏联控制。北部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是当地主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译者注

他主张采取一种“轻轻触摸”的方式，包括有选择性地与银行家进行私下会见，以阻止向苏联提供不受约束的新贷款。他的这种办法取得了成效。

美国的目的就是要动摇银行家对苏联金融实力的信心。西方银行界对苏联集团的信贷很快就变成了以所谓的“雨伞理论”为基础的活动。在整个70年代里，银行家们热心地向东欧提供贷款，因为他们有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如果任何一个苏联卫星国不能支付贷款时，那么莫斯科就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以一个支付者的身份对该国进行干涉。这种雨伞理论是以下述假设为依据的，即克里姆林宫过分信赖其良好的信誉度，而且具有应付此类危机的金融储备。然而，这种雨伞理论从来没有经过试验。鲁滨逊回忆道：“银行家们对莫斯科的信贷价值和财政偿付能力充满信心。据推测，如果苏联拥有25亿—3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那么就能够确保偿还贷款。问题在于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这些储备或者苏联间接控制的黄金进行过审查，这是一个谜。”

在新任国家安全顾问比尔·克拉克的领导下，美国政府已经做出决定，要阻止西方向苏联提供新的贷款。但是，对于银行家们来说，仅有政治上的或者人道主义的吸引力是不够的，因为银行家们要对股东承担信托责任，他们的职业就是赚钱。某些银行家实际上把《军事管制法》看作是一种使他们容易赚钱的机会。“大多数银行家认为独裁政府挺好，因为这些政府能够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对本国金融市场进行控制，”一位银行家在波兰发布《军事管制法》之后不久就对《纽约时报》的记者发表这一观点，“在拉丁美洲的每次政变之后，必定出现银行家们欣喜若狂的情景，他们主动找上门来向新政府提供信贷。谁都不知道政治体制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唯一的检验方式就是：看他们能不能清偿账单。”

根据鲁滨逊的建议，政府将对雨伞理论进行试验。凯西想阻

止西方向波兰提供短期信贷，因为这种信贷能够使华沙获得支付能力。他认为如果暂缓这些贷款的话，那么莫斯科将被迫插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要阻止银行家们向问题成堆的东欧债务国以及苏联本身提供更多的贷款。这是一种巧妙地利用信贷市场对国家安全目标进行控制的手段，它可以使美国政府不必染指就能够达到目的。

2 月初，比尔·凯西和财政部长唐·里甘分头给银行界的朋友打电话。当时仍然担任大通曼哈顿公司副总裁的罗杰·鲁滨逊回忆道："在对波兰偿还贷款的期限重新进行安排以阻止提供新的和不安全的转期贷款的问题上，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指导思想。如果通过抵押方式转到安全的短期交易，那么就可以使银行家们更好地控制波兰的偿还能力。这种变通的方式降低了华沙和莫斯科在偿还贷款方面的灵活性。"

在这一年中，美国试图使苏联集团的金融市场处于动荡之中的努力从来没有间断过。4 月 26 日，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的副部长莱昂内尔·奥尔默对一群国际银行家们说，向苏联集团提供贷款"充满了风险"。在美国对外贸易银行协会的第 61 届年会上，奥尔默宣布："苏联不断增长的危机将在几年内给债权人带来就像现在的波兰一样多的风险。"

这些行动连同整个东欧的金融危机，使得流向苏联集团其余国家的贷款急剧减少了。1982 年春天，停止向匈牙利提供短期贷款的总额达到 11 亿美元。罗马尼亚受到的打击更为严重，15 亿美元的贷款被撤回。甚至东德也感受到了信贷紧缩所造成的压力，损失了 2000 万美元的流动资产。有好几个国家第一次被支付贷款这个问题所困扰。

凯西和温伯格想迫使莫斯科插手并落入陷阱，否则它就要冒眼睁睁地看着其盟国的信贷价值直线下降的风险。莫斯科选择了后者。"他们迫使我们把手伸向波兰，"当时是莫斯科中央银行的

一位官员的弗拉基米尔·库季诺夫回忆道，“没有证据表明已经到了皇帝没有衣服穿的境地。”事到如今，鲁滨逊给华盛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月初，新任国家安全顾问邀请他担任自己的高级职员。不久，他就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高级主任以及受内阁委托制订国际经济政策的跨部门委员会的执行秘书。能源专家比尔·马丁也是在这一次被延揽进入高级职员行列的，他后来在与欧洲达成旨在限制苏联天然气向欧洲大陆输送的协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经济小组的作用是非常令人敬畏的。当初，规划研究室主任诺姆·贝利曾经指示马丁和鲁滨逊，在国会跨部门委员会内部讨论问题以及与盟国举行会谈时，两人要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

2月中旬，比尔·凯西经过对该计划的审查，最终提议资助团结工会。这项计划由4个主要部分组成：

- 向团结工会提供具有决定意义的资金，以维持其活动。这些资金可以美元和波兰兹罗提[①]的现金形式支付。
- 提供先进的通讯设备，为团结工会组建一个有效的地下 C^3I[②]网络。这将使团结工会即使在《军事管制法》之下也能够进行通讯联络。
- 对经过挑选的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够使用所提供的先进通讯设备。

---

① 兹罗提（zloty），波兰货币单位。——译者注

② 指挥（Command）、控制（Control）、通信（Communications）和情报（Intelligence）的简称。——译者注

● 动用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资源来充当团结工会的耳目，在适当的场合下可以与其分享中央情报局的重要情报。

凯西紧接着就确定了3个机构，计划把它们作为进行这项冒险行动的工具。劳联—产联自1980年以来就成为美国向团结工会提供援助的渠道。他认为通过工会开展工作可能是“最富有成效的”，落入西方圈套的团结工会积极分子也会提供帮助。法国的SDECE①正在将那些想离开波兰的团结工会积极分子偷偷带出国境。凯西希望利用其中的某些人，让他们收集情报和参与美国的行动。最后，一旦与团结工会取得联系，凯西就想利用“美国之音”的无线电广播密码来传递情报。

2月底，凯西在私下里与总统和比尔·克拉克讨论了他的计划。里根认为这个计划有风险，但是它很有价值。他似乎对通过支持工人来破坏这些工人所在的国家这个想法产生了兴趣，于是在这个计划上签了字，但对于是否采取秘密行动则没有做出决定，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了。总统要求凯西将他的这一决定通知中央情报局对外情报咨询委员会主席格伦·坎贝尔博士。凯西照办了，但坎贝尔没有获得太多的细节。“他概括地向我说了一下，”坎贝尔回忆道，“然后就像他平时那样咕哝着不知说些什么。他从来就是对事情的概况说得很清楚，而对一些细节的叙述则不甚清楚。我认为这个主意太棒了，于是说道：‘OK，比尔，干吧。’”后来在提供资金的高峰时期，每年有800万美元的资金

① 法国“外国情报与反谍报署（Service de Documentation Extérieure et de Contre—Espionnage)”的缩写。该组织成立于1947年，是法国政府的秘密情报与反情报机构，隶属国防部。1981年改组为国外安全总署（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Sécurité Extérieure)，简称DGSE，其任务是搜集外国情报，保证国内安全。——译者注

进入了团结工会的口袋。

为了完成行动并且要高度保密，凯西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国际金融机构网络。为了避免被别人觉察，资金流向的踪迹经常发生变化。如果波兰官方发现了资金渠道并且穷追不舍的话，那么团结工会就会遭致灭顶之灾，而且也有可能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国际危机之中。

困难之处在于如何才能使这笔钱在波兰国内流通。波兰的兹罗提不能自由兑换。教廷可以把巨额资金带入波兰，但它看起来又不愿意过深地陷入秘密行动之中。凯西停止依赖欧洲的资源链。好几家欧洲公司在无意之中通过为合法项目建立银行帐户的办法把资金转到了波兰。电子转帐的办法更为可取，因为这种办法可以使资金自动兑换成兹罗提。谢天谢地，这个问题解决了，有一家公司同意为中央情报局建立一个单独的银行帐户。从 3 月底到 4 月初，为团结工会提供财政援助的渠道总算畅通了。

为了配合向团结工会提供秘密支持，里根总统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一份文件，简要地说明美国在东欧的目标。比尔·克拉克认为，明确地说明美国的目标很重要，这与总统的意图是一致的。这份文件是由理查德·派普斯起草的，几周之后由克拉克修改定稿。文件的核心思想就是阐明美国政策的明确目的，那就是“抵消苏联的成就”，从而保持对东欧的控制。“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与《雅尔塔协定》不相干，”后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埃德温·米斯回忆道。该文件由总统签发，变成了国家安全决策指示（NSDD），是从政策上指导高级顾问和有关部门的一份正式的书面命令。“NSDD－32 是一份与过去告别的前瞻性文件，”克拉克回忆道，“在 NSDD－32 中，罗纳德·里根明确指出，美国不会屈从于苏联支配东欧的现状。我们要努力形成一项多头战略，以削弱苏联的影响，加强本地区的自由力量。相对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这几个国家而言，波兰提供

了一次独特的机遇。这并不是说，我们不继续采取行动了。为了使其它国家摆脱莫斯科的控制，我们还要继续采取行动，而不管这些行动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

NSDD-32 概括叙述了美国的下列主要目标：

- 秘密支持该地区为了摆脱共产主义统治而发动的地下运动；
- 加强针对该地区的心理战，尤其是要加强诸如“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无线电广播；
- 寻求外交与贸易途径，使该地区的各国政府抛弃对莫斯科的信任。

美国在天然气管道项目中对苏联实施技术禁运，这使欧洲看到了此种行动的本来面目，那就是宣布对苏联发动经济战。华盛顿对波兰所发生的事情发表声明，这已经不仅是暗示对其敌手进行精神上的侮辱了。但是，欧洲对此却装聋作哑。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①]竟然宣称，如果波兰发生了骚乱，那么发布《军事管制法》就是“必要的”。西欧国家还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对波兰事件视而不见，还要继续与克里姆林宫做生意。

经济现实促使欧洲领导人渴望出口本国的产品。英国的失业率快到 14% 了，法国是 9%，西德几乎是 8%，这是自 1954 年以来的最高点。天然气管道项目可以在全欧洲创造几万个工作岗位。1 月中旬，欧洲盟国两次开会讨论制裁问题：一次是巴黎统

---

① 原联邦德国政治家，社会民主党人（1918—）。1974 年当选西德总理，并因其办事干练而深得民心，于 1976 年和 1980 年两度连任。1982 年国会通过了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后，辞去了总理职务。在总理任内，施密特深受广大西德人的尊敬，是最受尊崇与最具影响力的西欧领导人之一。在外交方面，谋求与苏联集团内的东欧国家和解，而同时保持联邦德国与美国的伙伴关系。——译者注

筹委员会会议，一次是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NAC）[①]会议。在里根总统的坚持下，美国采取了强硬立场，要求欧洲跟着美国切断对莫斯科提供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技术。在巴统委员会即将在巴黎开会的前几天，施密特总理在华盛顿与总统和国务卿进行磋商。德国总理下榻的布莱尔旅馆富丽堂皇，国务卿黑格与施密特在这里共进早餐，他们吃的是水果、烤面包片和鸡蛋。双方谈得不是很投机，黑格指责施密特没有对波兰的镇压行动进行足够严厉的谴责。当时，整个餐厅都能听到两人之间的争吵。会谈没有取得进展。

1月19日，巴统委员会在巴黎召开会议，秘密讨论美国提出的几项议案。巴统组织创立于1949年，该组织在与苏联集团进行技术与战略物资的贸易方面，努力使西方做出一致的反应。这是一个秘密机构，除了少数几个重要国家之外，其他国家无从知晓其内部运作方式。美国赴巴黎开会的代表团由副国务卿詹姆斯·巴克利和国防部副部长弗雷德·伊克尔率领，他们提议，根据目前的现实，巴统委员会的工作程序要做3项明确的改变。首先，美国想更严格地执行有关向苏联出售关键技术的禁令，包括先进计算机及其电子部件、光导纤维、半导体和各种冶金方法。美国也想限制西方在苏联集团境内建设工厂，因为这些工厂将有助于苏联的军事工业以及以先进的方式培训人员，进而帮助了苏联的经济发展。其次，美国建议，所有与苏联签订的价值为1亿美元或者更多的合同，都要自动提交委员会报批，以确保不会导致敏感技术的转让。这实际上是赋予华盛顿一项对欧洲与苏联的贸易协定的否决权。第三，美国提议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紧缩自

---

①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导机构，由各成员国的部长级代表组成，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会议主席由各成员国轮流选出，同时执掌北约国际秘书处这个文职机构。——译者注

该委员会成立以来所制订的禁运清单。美国代表团想要使这个高度机密的清单扩大到最新的技术与产品。法国与英国乐于同意美国的某些要求，但是德国对此坚决予以反对。看来这场经济战不得不推迟了，或者在开始进行时至少没有得到欧洲的合作。

在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会议上，北约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们就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制裁问题找到了一个中间立场。他们同意欧洲继续参与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建设，但不能破坏美国的制裁措施。换句话说，欧洲的公司不能插手和填补美国已经放弃的合同。欧洲的外交部长们没有认识到，这对于华盛顿来说是一次多么关键的胜利啊！他们设想，里根政府再也不会对这项协议叫真了，因为它只是一项纸面上的胜利，是给美国公众做样子的。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真是大错而特错了。

3月15日，巴克利和一个金融专家小组开始赴5个欧洲国家进行穿梭访问，以便紧紧地扣住向苏联提供的信贷。西欧不仅向苏联提供了巨额贷款，而且贷款利率竟然低于市场利率。向克里姆林宫以贴息方式提供的贷款所产生的利益之大，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西欧国家最好的国内顾客甚至也得不到这个利率。法国政府为天然气管道项目筹措的部分资金的贷款利率是7.8%，还不到苏联必须支付当时市场利率的一半。

巴利克领导的这个小组想对此类补贴进行控制，其办法就是根据现有的那个由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①]建立的、由政府作后盾的出口信贷协议，重新把苏联归类为“相对富裕的国家”，以取代原来的“中间借贷国”的地位。这将使苏联对官方

---

① 1961年为促进经济进步和世界贸易而成立的国际组织。1960年12月14日由18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签署，1961年9月30日生效。该组织主要是为了在各成员国中寻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并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另外也协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该组织缺乏强制执行决议的权力，基本上是一个咨询机构，总部在巴黎。——译者注

出口信贷最少支付11.25%的利息。但是，除此之外，华盛顿于3月10日提议，对“较富裕国家”的贷款的所有补贴一律停止。这样一来，莫斯科就面临着要以实际利率支付利息的境地，这个利率大约为17%。

第七章

1982年初，卡斯帕·温伯格及其助手正在对国防部的一项绝密的五年计划指示进行最后审查。这份文件包含了有关破坏苏联势力的最新战役中所涉及到的好几项重要内容，并且成为美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进行最大规模军事建设的指导原则。文件强调了“经济与技术战”在美国政府政策中所要发挥的重要作用。《纽约时报》将这份文件描述为“和平时期对军事战略的补充，这份纲领性文件实际上表明，美国及其盟国要对苏联发动一场经济与技术战。”

这份纲领性文件就是要努力减少苏联采取各种手段从美国和其他非共产主义国家获得技术，这与1981年美国切断向苏联集团出口高技术的努力是一致的。该文件还概述了五角大楼要实施一项复杂战略的意图，即通过强迫莫斯科参与技术竞争，从而侵蚀苏联的经济实力。这项战略的内容包括：

- 把那些对于苏联经济至关重要的技术鉴别出来，并且制定限制其获得这类技术的政策，其中包括抢先购买以及对供应商施加压力。
- 在武器系统方面进行投资，这样久而久之就会使苏联的武器系统过时。

文件反映了温伯格的想法，就是迫使苏联在如何分配越来越有限的资源方面做出越来越多的困难决定。

国防部计划指示中的这些内容，变成了总统针对苏联的绝密

战略的一项核心原则。1982 年 5 月，里根总统签署了一份 8 页纸的秘密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NSDM），提出了美国针对苏联的军事战略。这是第一次给美国政府各个官僚机构统一下达进军令，以落实里根的对苏政策。这份文件是在威廉·克拉克的指导下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强烈地反映了美国要利用苏联经济弱点的意图。克拉克在仅有的一次公开提及这项秘密战略时声称："我们必须迫使我们的主要敌手苏联首先经受其经济缺陷的冲击。"他回忆道："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有意识地反映了总统的战略观点，即贸易与金融在我们的广泛努力中将成为一种新的优先手段，以此来牵制和击退苏联在全世界所采取的行动。"

美国政府官员越来越认识到，苏联经济存在缺陷这一现实具有深远的意义，并且认为美国可以利用苏联的这种战略脆弱性。6 月 16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顾问、总统特别助理托马斯·里德，在美军通讯与电子协会上作了一次引起争议的演讲。他宣称，苏联是一个"经济上残破不堪"的国家，美国"将不与苏联进行贸易，也不向其提供信贷，而这是支撑苏联经济所必需的两项要素。"

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各种情报进行的分析表明，在短期内切断美国向苏联转让技术的途径，这对于天然气管道项目是致命的。莫斯科有意识地制订了一项采购战略，以便从西方获得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中所需要的技术，并且希望通过这项交易来打破西方这种堪称是密不透风的禁运。

克里姆林宫退而求其次，与分包商这个层次签订协议，以确保乌连戈伊天然气管道项目能够在受到华盛顿阻挠的情况下向前推进。然而，苏联方面在无意之中忽略了一个关键环节——分布在 3300 英里管线上的 41 个压缩泵站中用于驱动气体涡轮机的转轴和叶片。这些部件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制造的，现在美国禁止该公司把它们提供给苏联。

苏联人能够找到一种产品来替代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这种转

子，但是如果要去寻找这种替代品，那么就会耽误建设工期，并且大幅度地增加建设成本。莫斯科指派以科隆[①]为基地的一个由30人组成的苏联代表团承担起寻找这种转子的替代品的任务。这个代表团很快就确定从法国的一个大型机械设备制造商阿尔斯通—大西洋公司获得这种转子。该公司是除通用电气公司之外唯一一家能够生产这种转轴和叶片的公司，并且获得了通用电气公司的许可证。苏联方面轻而易举地就获准从法国购买叶片和转轴。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看来，所谓禁运协议都是为了敷衍了事。欧洲对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会议上所达成的协议（于1982年1月终止）是这样解释的：只有当美国公司作为主承包商而退出交易时，欧洲才可以不去破坏美国的制裁行动；而当美国公司是分包商时，则另当别论。因此，法国政府给阿尔斯通—大西洋公司开了绿灯，批准该公司向莫斯科提供这种技术。“很显然，1982年1月至6月，他们（欧洲人）对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上达成的协议不予理睬，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取代美国供应商，”罗杰·鲁滨逊回忆道，“欧洲人原来承诺，在苏联支持波兰的镇压行动期间，他们将不会对美国所采取的制裁行动挖墙脚，但是他们现在却违背了这一郑重的承诺。”

其他的谍报证实，当欧洲人认为利用经济武器可以取得最大效果时，他们就会对天然气管道项目实施制裁。1月2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获取的情报显示，苏联的兑现危机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了。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结算银行（BIS）[②]对苏

---

① 德国第四大城市，是欧洲主要的内陆港口之一。由于地处莱茵河巨大的水路交通干线以及西欧、东欧间主要陆上商业通道的交汇点上，因此其贸易地位十分重要。——译者注

② 1930年在瑞士巴塞尔成立的国际银行，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理德国战争赔偿的机构和各国中央银行之间合作的机构。现在该银行已经成为经济、货币研究和咨询中心，并且是执行某项特殊协定的技术机构。——译者注

联银行在西方的储蓄额进行了汇总，结果表明已经由1981年年初时的85亿美元降到年底时的约30亿美元。苏联的贸易额也在同步减少。1980年，莫斯科与非共产主义的工业化国家的贸易盈余曾经一度高达2.17亿美元，但是到了1981年却变成了30亿美元的逆差。西方在波兰所采取的行动首战告捷，把莫斯科推到了一个作为波兰金融担保者的境地，这个时机掌握得非常好。今后，国际金融界在与苏联集团打交道时将变得更加谨慎。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正在为卢布的坚挺与否直冒虚汗，而天然气管道项目（最低限度来说是被延迟了）则使他们更加苦不堪言。如果克里姆林宫不能增加为采购西方技术所必需的硬通货收入，并且以此来填补苏联经济的缺口和提供支撑其全球帝国的架子所需要的资金，那么西伯利亚的天然气管道以及萨哈林岛周边地区的油气勘探项目就将处于危急关头。“硬通货收入是苏联经济的核心部分，”原苏共中央委员会高级官员叶夫根尼·诺维科夫回忆道，“并且最重要的就是要按期完成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建设，现在已经没有喘息的余地了。”

在比尔·凯西和卡斯帕·温伯格的鼓励下，比尔·克拉克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系列研究任务，探讨破坏苏联经济的其它途径，并且对这场针对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战的生存能力做出评估。在规划研究室主任诺姆·贝利的领导下，研究人员探讨了破坏苏联经济的可能机制，包括组建一个谷物卡特尔[1]（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从而限制向苏联的粮食出口。

在华盛顿与欧洲之间在天然气管道项目上唇枪舌剑地争吵不

---

① 独立公司或者个人为了对某种或某类商品的产销施加某种形式的限制性或垄断性影响而组织的联盟。最常见的是为了控制价格和产量，或是为了划分市场范围而进行的安排。卡特尔的成员在参与制定和执行共同政策的同时，仍然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和财务上的自主性。——译者注

休的时候，西方与地下团结工会残余力量进行了首次接触。波兰的局势很严重，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被波兰保安部队穷追不舍地逐个抓获。各个主要城镇都面临着食品短缺的境况，大街上尽是保安人员。2月2日，波兰煤矿出现怠工现象，这是对当局表示抗议的一种象征性行为。苏联顿巴斯[①]煤矿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它是在苏联本土出现的苏联工人支持团结工会的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如果团结工会的这股烈焰不能被及时扑灭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蔓延到苏联。但是，波兰每天都会冒出新的工会组织。

2月，两位美籍波兰人从维也纳登上"肖邦[②]号"快速列车前往波兰。他们在西方就卷入了团结工会的活动，此次他们携带着假造的身份证与情报，计划与地下团结工会残余分子接头。双方在华沙正西方向的日拉尔杜夫郊外见了面。这个小镇的居民稍稍超过4万人，局势相对比较平静。2月17日，波兰保安部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官方称之为"平静的行动"，数万民兵在两天之内逮捕了4000人，与团结工会的一名积极分子约会的这两个美国人遭到了通缉。

团结工会的代表是团结工会在格但斯克的发言人莱赫·邦德科夫斯基的一位同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邦德科夫斯基居

---

① 欧洲东南部巨大的工矿区，以煤炭储量丰富而著称。煤田位于乌克兰东南部的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以及邻近的俄罗斯西南部的罗斯托克州。已经探明的煤炭总储量达503亿吨，潜在储量635亿吨，可能储量762亿吨。——译者注

② 波兰作曲家、钢琴家（1810—1849）。肖邦音乐的高度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19世纪30—40年代欧洲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总潮流的一个侧面，喊出了受压迫、受奴役的波兰民族的愤怒、反抗的声音。肖邦的音乐具有浓厚的波兰民族风格，形成了一种新颖而独特的"肖邦风格"，为欧洲音乐的历史发展做出了贡献。肖邦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1849年在巴黎的寓所逝世，临终时嘱咐死后将自己的心脏运回祖国波兰安葬。——译者注

住在伦敦，并且在伦敦组建的波兰海军部队中参加战斗。他返回波兰之后，仍然与英国情报机构保持着某种联系。现在他主张，与西方取得联系是拯救这场运动的唯一希望。这两个美国人与团结工会的代表在日拉尔杜夫会面的4天前就离开了华沙，住在郊区的教堂里。教区牧师没有盘问他们，他是外界传说得神乎其神的以色列情报线上的人。

这次会面在波兰境内还是第一次。1月底，中央情报局就已经在西德与波兰流亡者有过接触，这些流亡者已经在“铁幕”的那一边与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取得了联系。他们在会面期间进行了初步的安排，希望能够在波兰境外碰到一位团结工会的高级领导人，并且这个人要能够立刻返回波兰，对各种事项做出安排。但是，临时在波兰境外碰到这么一个人，这是不可能的。这两个美籍波兰人将把这个情报转送中央情报局。

这个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告诉美国人，团结工会已经遭到了重创。在发布《军事管制法》的第一个晚上（12月12日），波兰保安部队围捕了5000名领导人，其中许多人是团结工会的核心人物。这次行动使人们感到非常吃惊，他们原来以为政府不太可能发布《军事管制法》。到了2月中旬，估计有4万人被捕，团结工会的领导层中没有几个人躲过此劫，此次运动的余烟散去了。那些躲藏起来的领导人中包括华沙的兹比格涅夫·布亚克、克拉科夫的瓦迪斯瓦夫·哈尔代克、格但斯克的波格丹·利斯以及弗罗茨瓦夫的瓦迪斯瓦夫·弗拉塞纽克。团结工会的资产被尽数没收。除了传递纸条和粗糙的书信复印件之外，团结工会领导人无法与普通老百姓取得有效的联系。团结工会也许还没有死亡，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活力。

在日拉尔杜夫郊外首次见面的气氛很紧张，团结工会的代表因为遭受通缉而神情紧张。尽管这两个美国人讲一口流利的波兰语，但他们是否值得信赖，团结工会的这位代表觉得心中无底。

这两个美国人也同样神情紧张，担心波兰当局以“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将他们逮捕。

这次会面持续了6个小时，讨论了一系列问题：西方的何种支持对团结工会最有帮助，这种支持的力度应该多大，如何才能使这种支持达到目的。团结工会的代表明确表示，西方应该对团结工会给予“无附带条件”的支持。他们也讨论了具体的技术问题：如何把资金转到团结工会的账户，以及援助通讯工具的可能性。这两个美国人把一位在华沙的欧洲商人的名字告诉了这位代表，通过此人有可能把资金转交给团结工会，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账户。

这两个美国人在返回西方之后不久，就迅速给比尔·凯西写了一份报告。根据总统的几道命令，凯西着手建造一条向团结工会提供资金的管道。“比尔是一位秘密提供金钱的能手，”格伦·坎贝尔回忆道，“他每年能搞到几百万美元，但其他人却从来不知道他是如何把这些钱弄进波兰的。”

人们也可以设想，地下团结工会需要改善自己的技术条件，尤其需要先进的通讯工具。中央情报局探讨了好几种方案，有一种方案设想把通讯工具作为外交物资带进波兰，然后再把它们连同其它物资混起来，偷偷从美国驻波兰大使馆运出去。但是，这种方案是不可行的，因为美国大使馆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四周都是全副武装的民兵。第二个方案就是请求天主教堂把这些违禁品作为正常的救济物品而偷偷运进波兰。但是，凯西不想冒这个险。教堂在与中央情报局共享情报方面似乎不是太方便。一时间，美国对这件事情似乎一筹莫展了。

不久，中央情报局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突破。以色列情报线上有一个联系人，他原来不仅是格但斯克的居民，而且还是造船厂的一位经理。以色列要求此人进行安排，把两船物资运进波兰。通讯工具将从瑞典启运，开始时作为生产拖拉机的机床的一

部分，4天之后作为工程设备运进波兰。此人手里有发货单号码和发货日期，他的任务就是在波兰海关和安全人员对这些通讯工具进行检查之前，把它们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团结工会的安全隐蔽地。这位经理在晚上立即把装有通讯工具的箱子放进贮藏室中，这些东西或许是他经手过的最重要的货物。罗伯特·麦克法兰说，这些工具“使团结工会的领导人能够与他们的全体成员和整个国家取得联系，而且他们相互之间也可以联系，从而避免遭受损害。这是一个 C^3I 计划，给他们提供了一种进行指挥与控制的基本设施。”

秘密分发这些通讯工具，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当克拉科夫的地下团结工会成员翘首以待的时候，本该送到这里的通讯工具却未能送达。有人担心这些东西已经被波兰情报机构截获了。假如这样的话，那么整个行动在开始之前就将处于危险之中，而且团结工会的声誉将受到玷污。幸运的是，几天之后这些迟迟未见到的箱子运到了克拉科夫。原来运送这些贵重货物的卡车，有一只轮胎爆裂了。在处于军事管制之中的波兰，要找到一只备用轮胎，该是多么的困难。

凯西从远方注视着这次行动，坐立不安地祈盼着他所精心策划的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当总统获悉各种资物已经就位，敏感的行动正在进行之中时，他对此也是焦虑不安。因此，凯西在白宫情报室与总统秘密会见。他们讨论了种种问题，其中主要的是波兰局势。里根欣喜地获悉，行动已经开始了。凯西甚至递给他几份地下团结工会的文件，其中有一封信，它是在狱中的团结工会积极分子亚采克·库龙写的。这封信大胆地公开主张进行抗议活动，宣布在波兰发生的“这场大规模的起义”正处于紧急关头，当局的镇压行动绝不会得逞。总统把这封信放进他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办公桌抽屉里。他与凯西一致认为，他们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仅讨论在波兰所采取的秘密行动。当他们在电话里讨论细节时，

凯西将使用家里的或者他在白宫西楼办公室里的保密电话。

毫无疑问，苏联人会估计到发生了一些事情。“如果认为苏联人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想法，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愚蠢的，”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回忆道，“他们有许多告密者，这些人会告诉他们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想到，当我们制订行动计划时，他们就大体上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他们对此高度关切，并且对我们发出威胁，但是这种威胁从来没有达到促使我们考虑改变政策的地步。我们为团结工会所做的事情很有节制，使苏联不至于被我们的行为激怒而对波兰进行军事干涉。

3月底，比尔·凯西把中央情报局行动处的全体人员集合起来，开始实施他对团结工会所制定的支持战略的第三个步聚。由于力量虚弱，因此常常要依靠狡诈的本能与智慧，才能在与强大敌人的斗争中获得生存，因此凯西想让中央情报局作为团结工会的耳目。地下团结工会需要得到来自波兰政府最高当局的情报，这样他们才能预测当局下一步所要采取的行动。团结工会有许多处于重要位置上的支持者，这些人能够获取有关政府下一步行动计划的情报，但是缺乏一种能够维护情报传送渠道的能力与资源。凯西于1981年底向美国驻华沙大使馆派遣了一个由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NSA）[①]组成的联合小组，以迅速在该市开展电子情报活动。

这个小组有4名成员，他们在使用先进电子窃听技术方面具有高超的技能。小组雇员有一个“特殊情报收集单元”的称号，

---

① 美国国防部下属的情报机构，负责美国军事机构和其他政府机构的电码、密码和其他隐语的制订和保密工作，利用电子设备或其他手段侦听、分析和破译密码通信，研究各种形式的电子传输。该局于1952年建立，由于不是通过国会建立的，因此相对而言可不受国会监督，这样就使它成为美国最秘密的情报机构。——译者注

他们是作为美国大使馆正常轮换雇员的一部分而来到华沙的。该小组于1982年1月底开始工作，他们操纵着一个复杂的电子窃听系统，对波兰通讯线路进行窃听。后来，他们显著地增加了对窃听器和其他电子情报装置的使用。

凯西也更加积极地推动对人力资源的招募工作。他想使中央情报局行动处的人员更有效地渗入到各自的东道国中去，尤其是苏联集团。行动处在招募情报人员时必须更加谨慎小心。凯西在刚上任的几个月内，就以新的指导方针取代了中央情报局原来有关招募情报人员的冗长手册。老手册太烦琐，他对助手们说这个东西“碍事”，它所制定的严格的行为守则窒息了情报人员的创造力，并且鼓励情报人员对志愿者不予信任。按照凯西的观点，行动就是要取得成效，而不是执行严格的规则。于是，原来那本130页的手册减少为几个段落。特别是，凯西鼓励在“铁幕”后面的情报人员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

美国情报机构希望成为团结工会的一个早期预警系统。如果波兰重新进行镇压行动，或者引诱团结工会领导人从隐蔽地点出来，那么总统与比尔·凯西就让这个系统发出警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系统工作得相当好。“我们可以随时知道波兰政府正在做什么，以及将要做什么，”波因德克斯特回忆道，“而且把这些情报转给团结工会是适宜的。”

向地下团结工会传递情报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美国之音(VOA)”。美国新闻署由里根多年的老朋友查尔斯·威克执掌。自从总统竞选以及决定把“美国之音”作为情报发送工具以来，凯西与威克相处得很好。“它们将奉命发送情报，”威克回忆道，“因为这是国家利益，因此只要这种情报不损害节目的完整性，我们就将它们播出。”这类情报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密码转播出去的。在特定的时间，“美国之音”的播音将使用特定的代码字或者短语。比如，可能会播放一首特定的歌曲。一次经过精心制

作的节目，可能传递的是一个有关即将发生的镇压活动、一批特殊的货物或者一次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的情报。本来，“美国之音”的章程是禁止向外发送情报信号的，但是当时的局势已经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因此对于凯西来说，即使违背了某些规则，也是值得的。

向团结工会提供资金的渠道于 1982 年 3 月开通了。这笔钱主要是用以支持地下印刷品的出版与发行。《军事管制法》使人们迫切需要获得可靠的消息。当局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紧，因此向外发布的信息就越来越少。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因此地下出版社重新抬头。一些秘密出版人由于没有提高警惕，在《军事管制法》发布之后被捕，设备与物资被警察没收，在地下出版社工作的许多团结工会积极分子也遭到逮捕。

最初，这笔资金也被用来采购无线电广播发射机。团结工会在《军事管制法》发布之前，就把一些器材放置到了隐蔽场所，但这些东西中的大部分已经陈旧不堪，而且广播的范围有限。因此，他们用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资金购买了 15 套便携式无线电广播发射机。4 月 12 日，也就是在镇压行动的 4 个月之后，华沙居民听到了团结工会电台的首次播音。团结工会在华沙领导层中的一名成员兹比热克·罗马谢夫斯基负责这项工作。5 月 9 日，他设法让电台播出一条简短的消息，呼吁人们进行总罢工。

为了防止当局的探测，无线电广播发射机需要不断地转移位置。4 月 30 日，警方从苏联和东德引进了跟踪无线电讯号的特殊设备，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在华沙的大街上，每天都在进行着一场赌注高昂的猫捉老鼠的游戏。警方在华沙挨家挨户地搜查，同时对大部分地区进行封锁，但最终一无所获。

根据那些跑到西方的团结工会积极分子的建议，西方提供的资金主要用于一家名为“诺瓦”的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出版几十种著作，涉及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内容。（另外一家重要出版社

——克拉格出版社，主要出版历史方面的书籍。）诺瓦出版社千方百计地幸存下来，即使经过《军事管制法》的重重压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完好的。这家出版社的主要问题是财政困难，因为团结工会用于资助该出版社的资金也告罄了，而出版成本却在飞速上涨。仅仅印刷成本这一项，就从每页 1 兹罗提上涨到大约 4 兹罗提。1982 年 1 月，这家出版社逐渐涉足其它领域，开始印刷报纸《马佐夫舍周刊》和面向知识分子的杂志《评论》。《马佐夫舍周刊》的发行量为 5 万份，它是团结工会在华沙的喉舌。同时，还建立起一个灵活的秘密发行网络。《马佐夫舍周刊》的出版与发行，需要工人们在全国 37 个秘密场所工作。

西方对地下团结工会所给予的通讯工具与财政方面的支持，几乎立即就产生了影响。1982 年 4 月底，从拘留所逃出去的团结工会的重要积极分子组成了一个名为“临时协调委员会(TKK)”的独立小组，并且发表了第一份声明。这是一个地下组织，希望对反抗《军事管制法》的行动进行协调。这个组织的最初成员有：华沙的兹比格涅夫·布亚克、克拉科夫的瓦迪斯瓦夫·哈尔代克、格但斯克的波格丹·利斯以及弗罗茨瓦夫的瓦迪斯瓦夫·弗拉塞纽克。在第一次集会上，临时协调委员会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准备在全国各地组成一个松散的地下网络。该委员会在其第一份声明中的言辞非常富于挑战性。他们提出的谈判条件就是政府要释放全部被拘禁者，并且对每一个因《军事管制法》而被判有罪的人实行赦免。

西方准备对临时协助调委员会给予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该委员会成员之间继续保持着联系，有时候还就策略问题进行争论。临时协调委员会的联合声明流传得很广，使很多人深受鼓舞，并且使雅鲁泽尔斯基政权极为头痛。地下团结工会在实施《军事管制法》的漫长冬季里竟然幸存下来了，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对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没有发表评论的只有一个地区，它就

是波兰采掘工业的中心卡托维兹。该地区的电话线路仍然有毛病，并且没有把通讯工具偷运进来。作为工会大本营的卡托维兹处于警方的严密监视之下。

5 月 17 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斯坦丁·鲁萨科夫在华沙突然拜访了雅鲁泽尔斯基。他受苏共中央的派遣，来波兰收集有关政治局势的第一手资料。一系列象征性的罢工与抗议活动，继续困扰着波兰。不知为什么，团结工会又缓过劲了，这使得克里姆林宫很不高兴。

雅鲁泽尔斯基政府似乎遵循着一种含混不清的战略，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想对团结工会进行笼络，还是想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予以取缔。鲁萨科夫要求雅鲁泽尔斯基加强国内安全，他说："事实表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所组成的侵略集团，正在奉行一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的政策。在这个政策框架下所进行的颠覆行动，可能会采取更为剧烈的形式。"

莫斯科对美国"干涉内政"的行为很担忧。自波兰出现麻烦以来，克里姆林宫和波兰政府就一直把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归咎于华盛顿。当里根宣布加强制裁时，他所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这就是美国和波兰政府重建经济纽带的问题，要与团结工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现在，苏联和波兰的安全人员正在注视着美国帮助向团结工会提供资金的种种迹象。不过，了解内情的人们都知道，华盛顿确实开始支持团结工会了。"我们这些从事国家安全工作的人从来不大相信有关美国支持团结工会的宣传，"一位前苏联情报官员回忆道，"对于我们而言，这种宣传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是可以说得通的，但是我们没有掌握证据。从 1982 年春天开始，告密者提供的证据越来越多了。他们的资金很雄厚，并且利用复杂的手段来实施他们的行动。于是，我们知道他们正在从有些人那里获得一些东西。"

由于团结工会不仅继续存在，而且看起来正在进一步积聚力

量，因此华沙的安全官员决定对华盛顿发起猛烈的抨击。1982年5月初，波兰官方决定筹建类似于苏联克格勃的组织。

美国驻波兰大使馆负责科技事务的官员约翰·耶罗利斯和负责文化事务的一等秘书詹姆斯·霍华德，在曾经被当局拘禁过的波兰科学院的科学家理夏德·赫尔琴斯基的寓所里与他见了面。波兰官方对这两个外交官进行了谴责，认为他们从赫尔琴斯基身上获取情报。有一天便衣警察与安全官员突然抓住了他们两人，并且对他们进行了粗暴的殴打。这些人把他们塞进了一辆带着篷子的汽车，然后驶向警察总部。波兰官员控告他们支持团结工会，并且"从事有损于波兰稳定进程的活动。"他们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遭到驱逐。大使馆的其他雇员随后也不断受到骚扰，并且受到便衣安全人员的恐吓。

华沙正在与里根政府展开一场神经战。波兰安全人员不顾一切地寻找美国在波兰进行活动的线索，一经发现便予以揭露。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美国大使馆，而实际上美国大使馆在这项计划中只发挥了次要的作用。他们很少知道这些行动是独立进行的，但是大使馆发挥了重要的牵制作用。

随着秘密计划开始在波兰实施以及五角大楼的秘密指示开始得到贯彻，卡斯帕·温伯格在这场针对苏联的经济战中，与一个潜在而有益的盟友加强了联系。2月19日，他在利雅得与沙特领导人举行秘密会谈。温伯格是班达尔王子的密友，并且与显然是王位继承人的法赫德亲王也相处得很融洽。法赫德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把他的儿子们送到西方去上学，其中3个在加利福尼亚大学，1个在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他素有亲西方

---

[1] 英国训练陆军正式军官的军事院校，始建于1802年。1940年，英国政府计划将其与建于1799年的伍利奇皇家军事学院合并，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合并推迟到1947年，新学院仍然叫做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译者注

的声誉，而且据说他反对阿拉伯国家 1973 年对西方的石油禁运，想与美国进行密切的军事合作。他的私生活多姿多彩，年轻时是一个十足的赌徒，曾经有一个晚上在蒙特卡洛[①]输掉了 600 万美元。

温伯格对沙特的访问不仅是一种象征意义，而且与沙特签订了一项复杂的军事合作协议。两伊战争旷日持久，这对于亲西方的沙特王室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迹象。战争拖得越久，伊朗在人力和宗教热情方面相对于巴格达的天然优势就会越大。法赫德把萨达姆·侯赛因看作是一道抵挡霍梅尼主义[②]的防波堤，因为后者对他的王国构成了极大的现实威胁。当温伯格与法赫德会见时，这位亲王明显地表现出焦虑不安的神态。

早在两个月之前，沙特和巴林的安全官员逮捕了 65 个人，其理由是他们阴谋策划推翻这两个石油富国的保守政府。这些人在伊朗接受训练，并且拥有大量的武器。该组织被称为“阿勒达瓦”，或者“呼叫”。地下什叶派组织通过从整个阿拉伯世界招募穆斯林什叶派教徒而得到了发展，并且向波斯湾输出革命。美国情报机构通过某些电子侦察手段，获得了这个计划的一小部分内容，而且中央情报局将这个情报泄漏给了沙特内政大臣纳伊夫王子。

但是，温伯格在沙特阿拉伯挖空心思地想使美国军队得以在波斯湾存在。他的基本目标十分单纯：在波斯湾部署必要的军事

---

① 摩纳哥的游览胜地。濒临地中海，位于法国里维埃拉一带的滨海山脉脚下的陡坡上。1856 年兴建赌场，1861 年开业。5 年后周围地区宣布为蒙特卡洛，为世界富豪寻欢作乐之地。赌场于 1967 年由政府接管，每年收入可弥补国家预算的 5%。——译者注

② 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霍梅尼的思想主张，主要内容就是在伊斯兰国家进行革命，建立神权主义统治的伊斯兰国家，反对亲西方政策，并且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意识地输出到邻近的穆斯林国家。——译者注

力量，以保持石油龙头总是拧开着。这就是说，美国要对波斯湾地区通常的亲西方国家提供军事保护，其中最重要的国家便是沙特阿拉伯。1981年4月21日，温伯格宣布，美国将对快速部署的特混部队（RDF，这支部队是卡特总统提议组建的，旨在使美国具备在必要时能够向中东地区派遣军队的能力）进行显著的升级与扩大。它将变成一个联合司令部，拥有自己的军队、情报系统、通讯系统和自己的联合司令官，负责美国军队在中央地区的部署和行动等各个方面。新组建的美军中央司令部（USCENT-COM）将比快速部署的特混部队大得多，这个司令部自己夸口说差不多有30万人的部队。这对于沙特阿拉伯王室来说，就像是一张很合意的安全毛毯；唯一的风险就是，它象征着利雅得为了自己的安全需要，与美国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沙特的石油对美国又是多么的重要。这个司令部不是诸如北约这类正式军事联盟的组成部分，而且没有任何一个条约能够对它的职责进行约束。美国军队驻扎在沙特领土上，这就存在着一种政治上的风险，沙特对此特别敏感。为了使沙特得到安慰，美军中央司令部的驻地及其所辖的军队将部署在战区之外。

法赫德向温伯格重申了他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谢意。这是唯一的军事威慑力量，沙特王室在充满敌意的汪洋大海中能够指望这支力量。德黑兰对“阿勒达瓦”的支持，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它的意图，就是想通过暴力推翻沙特王室。尽管伊拉克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石油富国获得了大约200亿美元的财政支持，但伊朗还是把伊拉克的军队赶回到自己的边境。除此之外，苏联在叙利亚的军事顾问数量在一年之内已经从2500人猛增到接近6000人，并且目前苏联在阿富汗大约有10万人的军队。

里根政府对沙特的安全做出承诺，并且在过去的12个月内屡次得到证明。白宫为了说服国会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AWACS），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总统投入了

极大的政治资本，才使得这项交易在国会得以通过。他曾经做出口头承诺，将确保沙特政府的完整性，并且防止出现另外一个伊朗。虽然这些言论在沙特王宫的大厅中很受欢迎，但沙特仍然对华盛顿不信任。法赫德并不想从温伯格那里得到一个公开的条约保证，因为那样一来无异于在中东发生了一场极为强烈的政治爆炸。但是，华盛顿究竟能不能以一种更为切实和直接的方式明确表达它对沙特安全的承诺呢？沙特能不能从里根那里得到保证，即如果沙特阿拉伯遭到进攻，美国将奋起保卫其国家呢？

温伯格说，他将向总统提出这个问题。沙特阿拉伯对美军的波斯湾政策很敏感，温伯格对此也要设法进行安抚。五角大楼的新战略——《1984—1988财政年度国防指针》明确指出，美国军队要时刻做好准备，以便在必要时强行进入沙特阿拉伯，而不要等待友好政府的邀请。

第八章

1982年5月，比尔·凯西作为沙特王室年迈的家长哈立德国王的客人，正在沙特阿拉伯半岛访问。哈立德生活朴素，体弱多病，是从前那个时代的产物。他在从沙漠下面获得巨大财富之前，就总是对逝去的岁月进行回忆。从许多方面来看，他都算得上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他与这位朴实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相处得很融洽，这使其他人感到迷惑不解。他们讨论了当今时代的骑士精神与荣誉，这二者似乎都很少有了。哈立德为他过去与贝都因人[①]在一起的生活而感到骄傲，并且向凯西讲述了漫长的王朝家族史。

在对政治与世界事务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之后，国王坚持要向凯西展示他的一些珍宝。他们首先去看他的奶牛群。这些牛是靠进口的饲料喂养的，由一个爱尔兰家庭照看。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感到很高兴，在与这个家庭就“移民母国”的话题进行简短交谈时，突然从嘴里冒出一句爱尔兰土语。时间没过多久，国王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想要他的客人去看他引以为自豪和喜悦的东西——皇家骆驼。它们是一些庞然大物，有好几百头。国王提议

---

① 中东沙漠地区（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等地）讲阿拉伯语的游牧民族。他们在中东总人口中占据很小的比例，却占据着大部分土地。哈立德在14岁时被其父伊本·沙特（沙特阿拉伯王朝的创始者）派往沙漠各部族查访，代表父王倾听他们的苦况。他因喜好沙漠生活胜于政治或外交活动而被称为“沙漠之子”。他一心关注贝都因人的问题，对于利用地下水开垦沙漠的工程特别有兴趣。他于1975年继承王位时受到民众、尤其是贝都因人的拥护。——译者注

凯西骑上一头，但凯西谢绝了。然后，他提议这位局长来享受"一次真正的快乐"，喝一杯浓浓的热骆驼奶。凯西对此也以健康不佳为由而谢绝了。

与哈立德国王一起消磨时光，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凯西来到沙特阿拉伯的真正用意是会见法赫德王储。1981 年，法赫德王储就与凯西局长结成了一种亲热的关系，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凯西和美国政府共同促成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的交易，法赫德为此向凯西表示谢意。他们谈论了许多话题，法赫德与卡斯帕·温伯格在几个星期之前也谈论过这些相同的话题。由于班达尔王子在华盛顿提出了请求，因此里根政府也对沙特在美国的储蓄情况打了掩护。1982 年 5 月 6 日，众议院商业、用户与货币事务小组委员会就这一问题举行了一次秘密听证会。早在 2 月 9 日，该委员会主席本杰明·罗森塔尔就给里根总统写信，威胁要把沙特在美国的金融储蓄详情向外界公布。2 月 17 日，在凯西、唐·里甘、比尔·克拉克和温伯格的强大压力下，总统做出批示："披露这一情况将有可能对我国的对外关系造成严重伤害……避免此种伤害的公众利益超过任何因披露这一情况所产生的公众利益。"

在 5 月 6 日的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之前的一个小时，中央情报局的 10 名官员突然闯入众议院办公楼二层雷伯恩[①]曾经使用过的那个房间。其中 5 人搜查电子窃听器，另外 5 人站岗。即使按照中央情报局的标准来看，这个举动也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它超出了该局的职权范围。只有国会大厦的警察才拥有对国会办公楼的管辖权。不过，一旦听证会开始，中央情报局就没有退路了，

---

① 美国民主党领袖、众议员（1882—1961）。任众议员的时间长达 48 年以上（1931—1961），其中有 17 年任议长。他是罗斯福新政纲领的主要设计者，曾任罗斯福及其后三任总统的顾问。——译者注

因为该局不想让任何数据公开。中央情报局的安全官员说出最后一个字后，就把听证会的速记纸拿在了手上，并且把议会记者护送到三楼小组委员会成员的办公室里，获取另外的抄本复印件。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告诉该委员会，抄本将由兰利制作，而不是由委员会成员来制作。

结果不言而喻，双方出现了争吵。小组委员会顾问班子负责人彼得·巴拉什在办公室里向外张望了一下，看到众议院记者由中央情报局的人环绕着。他立即走出去，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对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说，记录纸是国会的财产，而不是中央情报局的。"这不是中央情报局的一次会议，"他说，"这是国会小组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官员反唇相讥，声称自己接到特殊指示，不能使这些记录纸分开保存。在罗森塔尔来到国会办公楼之前，双方一直处于僵持状态。罗森塔尔明确宣布，中央情报局不能占有这些记录纸。中央情报局的人这才不情愿地让步了。

在这次事件之后，小组委员会成员在私下里与中央情报局的人会面，双方达成了一项妥协方案：只有文件的摘要才能发表。这个结果对于中央情报局来说虽然不是一个完全的胜利，但是美国政府通过艰苦的努力，再一次使沙特阿拉伯的利益得到保护，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胜利。里根总统亲自上阵，努力阻止国会小组委员会将这些资料解密的企图，从而使沙特的金融情报秘密得以保守。这对美国与沙特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考验，美国政府经受住了这个考验。

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在其它方面也有过交锋，对沙特也起了好作用。美国向沙特通报的几份情报，帮助王室避免了严重的国内威胁。美国政府继续按照计划，在沙特阿拉伯周围竖起一道军事屏障。

有一天晚上，凯西和法赫德在王宫里用餐时，在谈话中进行

了一次环球地缘政治旅行。他们讨论了阿富汗、中美洲、西欧和巴勒斯坦问题。但是，这二位旅行者反复把他们的行程转向苏联。在他们的眼里，苏联是许多世界难题的根源。法赫德与凯西一样，被苏联搅得心神不宁。

法赫德向凯西询问美国在石油和天然气技术方面对苏联实施制裁的有关情况。归根结底，苏联在石油生产方面是沙特阿拉伯的主要竞争者。“美国限制苏联获得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技术，这是符合沙特的切身利益的，”负责军事援助与技术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施奈德说，“他们鼓励我们这样做。”凯西告诉法赫德，在天然气管道建设所需技术方面对苏联实施制裁，连同对石油开采技术所进行的限制，都将适当地予以保持。凯西说：“殿下，如果我们这样干下去，那么他们将连 1 夸脱[①]的石油都抽不出来。”法赫德闻听此言哈哈大笑。

美国的制裁至少使这个大规模的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建设推迟了。法赫德对这一事实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欧洲国家把这个项目吹捧为能够可靠地替代中东的石油供应。美国所实施的制裁不仅是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的，而且也是为沙特的石油利益服务的。

凯西对王储说：“殿下，我们打算尽我们所能来阻止有些国家向苏联购买原油。”他重申了美国政府要向法国政府和法国国家石油公司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不要从苏联、而是要从其它国家购买原油。莫斯科通过出口能源来换取硬通货，其重要性体现在它决定把向东欧的石油出口量减少 10%，这将使莫斯科把更多

---

① 英国法定度量衡制与美国习用度量衡制的容量单位。英制的液量与干量使用同一标准夸脱，等于 1136.81 立方厘米；美制夸脱有两种单位：1 液夸脱等于 946.52 立方厘米，1 干夸脱等于 1101.41 立方厘米。英制与美制中皆为 2 品脱等于 1 夸脱，4 夸脱等于 1 加仑。——译者注

的石油卖给能够支付硬通货的西方国家。苏联力争向西方出口石油，使得沙特面临着被挤出某些市场的威胁。比利时和法国都试图对他们与沙特签署的昂贵合同进行重新谈判。法国的国营公司，例如埃尔夫—阿奎坦公司[①]，可以全权去寻找新的原油供应来源，因此购买苏联廉价原油的前景就摆在了谈判桌上。一年之后，莫斯科的投机行为获得了成功，到 1982 年年底，苏联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石油出口额可能增加了 32%。

可以预料，苏联向东欧石油出口量的减少将使该地区产生严重的后果。石油出口量的减少，将使该地区本来就低的经济增长率“显著”降低。《华尔街日报》甚至预言，石油出口量的减少“可能促使苏联控制的许多东欧国家濒于经济破产的边缘，并且有可能在政治上崩溃。”

凯西告诉法赫德，美国政府将继续采取步骤，尽最大努力来限制苏联的能源计划。但是，他暗示美国政府想请沙特以较低的油价作为回报。较低的能源价格将增强美国的经济，这是里根首要的国内目标。一个强大的美国是符合沙特的利益的，尤其是美国正在迅速地变成确保沙特生存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低油价将终止欧洲寻找替代能源的这股急流，例如购买苏联的天然气。这一举措还可以使沙特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伊朗与苏联遭受打击，这两个国家在 70 年代因油价暴涨而大发横财。

王储具有不可思议的商业本领，因此可以毫不怀疑地说，这些美国政府所知道的情况，他也肯定知道。但是，从一个主要的盟国和担保人的嘴里听到这些事情，其意义是不相同的。

---

① 法文全名为 Société Nationale Elf Aquitaine。法国的一家集团公司，1976 年 9 月 1 日由几家石油化工、矿业和其他工业单位改组、合并而成。1994 年以前，其大部分股权为法国国营公司石油研究活动企业公司（ERAP，以其石油商标 Elf 著称）所拥有。1994 年政府出售大部分股票，将该公司私有化。公司总部设在巴黎。——译者注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但是凯西明显担当了对王储进行培训与指导的职责。法赫德喜欢听凯西讲述有关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故事以及由扩张的极权主义所造成的威胁，这种扩张的极权主义最初是在德国，现在则是在苏联。对于法赫德这位名义上的穆斯林和西方的朋友而言，苏联人是真正的"异教徒"。

凯西劝告王储，要注意沙特政权在国内可能面临的其他威胁。有些沙特阿拉伯人在苏联集团的大学里受过教育，而且这些人目前在政府里供职。"您应该解雇他们，"凯西告诉法赫德，"他们很可能是间谍、密探或者破坏分子。最好不要雇用在苏联集团受过教育的人。"王储最后接受了这个建议，于1983年宣布了一项此类政策。

巴勒斯坦人是另外一个潜在的问题。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几个派别正在与沙特阿拉伯的某些组织一道试图削弱国王的统治。凯西说，应该用更可靠的群体（巴基斯坦人或者埃及人）去取代他们。法赫德最后对这个建议也接受了，驱逐了数千巴勒斯坦人，用巴基斯坦人来填补他们所留下的空缺。

最符合法赫德心意的计划之一，便是努力支持苏联中亚地区的伊斯兰运动。这件事主要由属于瓦哈比教派[1]的部落来负责，它是一项绝密行动。"对于瓦哈比教派的人来说，在苏联中亚地区支持穆斯林计划是非常重要的，"中央情报局行动处的一位前高级官员文森特·坎尼斯特拉罗回忆道。

凯西对这个题目当然也感兴趣了，但他是出于地缘战略的原

---

① 伊斯兰教的派别之一，主张谨守传统教规。18世纪由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瓦哈布创立于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内志，1744年为沙特家族所承认，与沙特王朝共盛衰。1932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该派在阿拉伯半岛取得宗教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该派主张，穆斯林国家的建立只能以伊斯兰法为基础。——译者注

因而不是宗教原因。凯西告诉法赫德，对于俄罗斯来说，中亚地区就像是“阿喀琉斯的脚踵[①]”。除非我们在那里发动战争，否则苏联是不会离开阿富汗的。正在吃椰枣的法赫德对此表示同意。他们稍微谈到了苏联在该地区的统治，然后就说起阿富汗的穆斯林游击队。法赫德告诉凯西，在阿富汗所进行的圣战[②]，是一场没有国界的革命，正如共产主义一样。这位局长对此很感兴趣。阿富汗人正在越过阿姆河[③]，与苏联境内的穆斯林取得正常的联系，主要涉及阿富汗抵抗组织会员证的分发、伊斯兰革命著作的传播、举办会议或者进行讨论以及小规模的布雷行动。凯西想做更多的事情，即发起一场有计划的运动，驱逐苏联在中亚的势力。

那天已经很晚了，法赫德和凯西与一位早期生活在沙特阿拉伯的中亚历史学家穆萨·蒂尔基斯坦尼又聚在了一起。这位历史学家向他们讲述了俄罗斯对当地民族所犯的暴行。此人与该地区的一些人仍然有来往。蒂尔基斯坦尼告诉凯西，1980 年 3 月在

① 阿喀琉斯是希腊神话中密尔弥冬人的凡人国王佩琉斯和海中仙女忒提斯的儿子。在特洛伊战争中，他是阿伽门农的军队中最勇敢、最英俊和最伟大的战士。传说他在年幼时，忒提斯曾把他浸在斯提克斯冥河的水中，使他周身刀枪不入，只有他的脚踵没有沾到冥河水。“阿喀琉斯的脚踵”这一成语即源出于此，意思是致命的弱点。——译者注

② 又称吉哈德。伊斯兰教用语，指穆斯林通过战争传播伊斯兰教的宗教义务。广义指凡是为了原则或信仰而进行的斗争。根据伊斯兰教义，圣战可以用心、舌、手或剑进行。用心是指通过与恶魔斗争，净化自己的心灵，抵制诱惑；用舌和手（笔）是指通过支持正确言行、批评错误言行的斗争形式传播伊斯兰教；用剑是指以具体的军事行动同异教徒和伊斯兰教的敌人作斗争。在伊斯兰教历史上，对非穆斯林作战往往由政治原因引起，但也称圣战。——译者注

③ 古代称奥克苏斯河，由瓦赫什河和喷赤河汇流而成，是中亚最长的河流之一。该河是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之间边界的一部分。——译者注

阿拉木图[1]发生了暴乱，这已经超出了阿富汗战争的范畴，那里的地下反抗活动风起云涌。丝毫不用怀疑，沙特人资助了其中的一些组织。

苏联新闻机构吵吵嚷嚷地说沙特正在对苏联中亚地区的事务进行干涉，宣称A·杜瓦耶夫教授挑选了一些沙特人在中亚人民中间散布“谎言”。土库曼的克格勃副主席N·奥韦佐夫少将声称，沙特人正在把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进攻的手段，煽动苏联境内的穆斯林反对苏维埃制度。沙特人在该地区投入金钱，决心要推翻无神论的苏维埃制度。或许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得到外界的鼓励。

1982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团结工会的行动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凯西只是希望不要出现什么差错，他当时正与他的白宫联络员之一戴维·威格在一起。这位局长经常来老行政办公楼，到以前的同伴那里寻求一点智慧。“我们只要在休息厅里落座，”威格回忆道，“他就会开始把许多事情向我倾述。例如，怎样使苏联容易受到攻击，我们怎样才能给他们出难题。”但是，这次会议的议题明确，较少推测，至少在凯西的心目中是这样。威格说：“比尔在就任的第一年里，设法重新判定苏联经济到底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它是如何运行的。1982年春季，他觉得他终于摸准了苏联经济的脉搏。”

“这是一种黑手党风格的经济，”凯西与威格说话时，眼睛仍然盯着天花板，“他们正在丢弃使苏联生存下去所必需的技术。他们能够获得硬通货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以较高的价格出口石油与天然气。苏联的局势是如此混乱不堪，因此只要我们的举

---

① 原名韦尔内（1855—1921）。原哈萨克斯坦首都。1997年12月10日，哈萨克斯坦首都迁往阿克莫拉，阿拉木图仍是阿拉木图州的行政中心。——译者注

措得当，就会使他们自我爆炸。”

威格过去对凯西的直率已经习以为常了，但他对凯西说出这种话而感到惊讶。他在中央情报局花了好几年时间跟踪苏联的资金流动和收支平衡状况，但是他从来没有听到级别这么高的官员说过这种话。比尔·凯西对这个问题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那年春天，有好几份最新报告从比尔·凯西的办公桌上立即转送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手中。这些不是中央情报局的正式报告，他对那种报告不太重视。这是第一批他所珍视的有关苏联的“脆弱性评估报告”，是他要求赫布·迈耶和哈里·罗恩安排人员起草的。这些有关苏联经济的脆弱性评估报告对凯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一贯想法。它们也使罗纳德·里根确信，美国能够使苏联经济遭受严重损害。“比尔过去经常到椭圆形办公室与总统坐一坐，”威格回忆道，“他们对许多题目会进行仔细地审查，包括苏联经济。这种做法虽然不很正规，但它确实帮助里根形成了许多自己的观点。”回想起来，这些脆弱性评估报告具有近乎于先知般的洞察力。它们首先对苏联经济体制的特性做了一个综述。报告的撰写者们指出，苏联经济体制“僵化而顽固”，在资源的重新配置方面缺乏市场灵活性。更有甚者，从西方引进的技术与设备是一种为了缓减瓶颈和保持生产水平的“硬性要求”。因此，一旦把关键技术的转让途径切断，就可以使苏联经济遭到严重损害。评估报告指出：

> 苏联人现在必须依靠西方为其输入资金和技术，以增加和保持某些原料的生产。这些原料很丰富，可以满足向别国捐赠和自己使用的需要。在缓减重要物资的短缺和刺激技术进步方面，西方的进口物品可以起到关键的作用。上帝保佑，苏联现在有巨额能源可供出口。这些原料越来越难以得到了，因此他们的开采成本急剧上

升。苏联的经济体制特别不适合于提高工作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石油生产的增加虽然缓慢，但仍在持续增加。在最近的几年里，甚至非常小的增长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引进西方技术，对于维持这个赚取硬通货的关键经济领域将是极其重要的。

如果苏联石油与天然气的产量降到最低点，加之开采的损耗较大，那么它将不得不在广泛的领域里进口西方的设备，以便在别的地方增加产量，并且帮助勘探和开发新的储量。能够处理大口径管道的安装设备，只有西方才能生产。根据苏联人自己制订的管道建设工期，我们估计在80年代的剩余时间里，他们至少需要进口1500万—2000万吨的钢管。他们还继续需要精密的勘探设备和油田所使用的高负荷潜水泵，或许还需要用于气体压缩机的大马力涡轮机。

然而，苏联为了支付从西方进口物品所需的硬通货，必须设法赚取硬通货，但这种赚钱的能力已经受到很大的压力，而且今后这种能力有可能缩小。这主要是因为苏联的石油产量趋于稳定，并且有可能下降。根据我们的预测，苏联靠出口石油所赚取的硬通货将会减少，而通过逐渐增长的天然气出口量所增加的硬通货，将只能部分地弥补上述减少量。最重要的是，由于能源价格的软化，使得苏联的贸易条件与西方相比，在80年代将比70年代更为不利，当时呈螺旋式上升的石油与黄金价格为苏联带来一笔意外的横财。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成员国将更不会为购买苏联武器而支付现金了。

这些脆弱性评估报告把苏联能源部门当作一个可供利用的领

域，因而对其加以追踪。报告强调，能源部门在维持苏联经济机器的运转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大部分年份中，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所赚取的硬通货占据苏联全部硬通货收入的60%—80%，并且这些收入成为苏联经济体制的“一个支柱”。苏联虽然从西方赚取了硬通货，但它需要用这笔钱从西方购买粮食和技术，以维持经济体制这个庞然大物。有些硬通货又返还给了能源部门，以便从它们身上榨出更多的产品。正是西方的技术才使得苏联的能源部门得以生长和兴旺。在有关能源部门的一个特殊附件中，得出了几条重要的结论：

> 莫斯科渴望经济能够稳定增长，因而需要扩大能源发展规划，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81—1985）”就反映了这种想法。能源出口是苏联硬通货收入的主要来源。向西方出口的收入可以获得苏联经济活动中所需要的各种设备和技术，尤为重要的是，能源部门努力增加石油采收率、运输天然气和开发海上能源。
>
> 最近苏联扩大了向西方的出口，使得苏联开发新能源所需的硬通货收入显著增加了。苏联人用这笔收入的大部分从西方购买用于开采石油与天然气的设备和技术。

莫斯科正在采用一项“增加石油采收率（EOR）”的计划，以便把石油从沉积物中取出来，而采取常规办法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伏尔加地区老油田的产量正在下降，因此苏联希望EOR计划能够利用新技术来增加产量。脆弱性评估报告特别提到：

> 苏联人极大地希望利用EOR技术能够增加老油田

> 的石油采收率，并且对含有重油的未开发油田进行开发。苏联实施 EOR 计划的努力，由于缺乏设备和化学制品而受到了妨碍……苏联人至今还没有能力建造热力采油所需的蒸汽发生器，也没有能力生产用于化学制品和聚合物流计划中的足够数量的表面活性剂或者聚合物。苏联还在继续努力，以获得西方的技术援助和设备，从而促进 EOR 计划。

然后，报告分析了与苏联硬通货收入有关的关键因素——世界石油价格。在 70 年代，当石油价格扶摇直上时，莫斯科从石油出口中获得的硬通货收入增长了 272%，而出口则增长了 22%。迈耶断定，每桶石油的价格增长 1 美元，莫斯科每年就可获得差不多 10 亿美元的硬通货。反之亦然，即如果每桶石油的价格下跌 10 美元，那么莫斯科将付出 100 亿美元的沉重代价。“世界石油市场的价格对苏联经济的生存能力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比尔几乎立即就理解了那份报告的意义，”迈耶回忆道，“对于他来说，这份报告变成了福音。他说：‘我们能够拖垮他们。’”

凯西定期举办战略研讨会。在威格参加的某一次研讨会结束的几天之后，他与总统在印第安人条约屋里仔细审查了种种问题，卡斯帕·温伯格和新任国家安全顾问比尔·克拉克也在场。

那段时间内几乎每天都可以收到内容相同的报告，欧洲人正在对美国的制裁行动进行釜底抽薪。特别是，两个欧洲制造商——英国的约翰·布朗公司和法国的大西洋公司正准备向莫斯科出售那些华盛顿为了切断天然气管道项目而禁止向苏联提供的技术。凡尔赛首脑会议将于 6 月召开，制裁问题有可能被列为第一个议题。凯西随身带着这些苏联经济脆弱性评估报告，克拉克和

温伯格在会议之前就看过这些评估报告了。

凯西把写着摘要的几页纸抽了出来。“总统先生，”凯西以他那典型的杂乱无章的术语开始说话了，“我们押在天然气管道上的赌注是巨大的。我们不只是在谈论可能对他们有帮助的一个项目，而是在谈论一个他们必需继续进行下去的项目。他们孤注一掷地想要获得硬通货，从而使这个规模巨大的项目继续进行下去。一年之内，他们想在这两条天然气管道上获得 150 亿—200 亿美元的硬通货。如果我们能够阻止或者推迟他们的计划，那么他们就将真正陷入困境。”克拉克已经在私下里与总统讨论了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同意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

“这个项目犹如一棵高大的摇钱树，”温伯格回忆道，“我向总统坚持我的意见，我们必需保持制裁。这是一场经济战，将削弱他们的力量。”

里根在会议结束时确信，从经济上削弱莫斯科，这是一项好战略，而天然气管道项目则是一个极好的下手之处。

1982 年春天，美国的外交机器缓慢地转动着。欧洲坚守承诺，继续建造这个双线的天然气管道项目。此外，欧洲国家完全不顾几个月前在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向他们的公司大开绿灯，对美国的制裁进行釜底抽薪。除非欧洲自愿答应减少信贷补贴并阻止向莫斯科提供技术，否则，里根总统只好听任出现取消制裁的可能性。黑格来来回回地对欧洲进行穿梭访问，试图达成某种妥协方案。1982 年 5 月，乔治·舒尔茨（当时仍然在私营部门任职）受里根派遣，与主要的西方盟国领导人会面，讨论天然气管道和其它有争议的问题。他回来后向总统作了汇报，“您关于对俄国人及其卫星国提供信贷的观点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我认为欧洲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情绪，与您的想法一致。没有人对资助苏联经济一事进行辩护。”但是，这个天

然气管道项目在欧洲人的眼里，无异于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生命保障，因此他们会同意断绝或者减少对该项目的资助吗？

6月4日—6日，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凡尔赛，西方七国首脑正在这里开会。里根把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项目和停止向莫斯科提供信贷补贴作为一项最重要的议程。然而，首脑会议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总统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如果天然气管道项目仅限于单线而不是最初计划的双线，而且如果七国同意紧缩对苏联的技术出口，那么它是可以建造的。首脑会议在最后的公报中，有一项“优先阻止协定”，它是专门针对与莫斯科进行贸易的，欧洲同意只建造一条天然气管道。但是，这也仅仅是一个协定而已。法国就在最近与莫斯科签订了另外一项信贷补贴协定。“密特朗[①]和施密特在参加完会议的闭幕式后，向媒体和公众宣布，他们与苏联的金融或者能源关系的模式将不会发生变化，”罗杰·鲁滨逊回忆道。他当时在白宫密切地注视着首脑会议的情况。

6月7日，里根总统飞向罗马，与教皇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会见。他们在梵蒂冈装饰华丽的圣殿里秘密会晤了45分钟。教皇身穿白色法衣，头戴白帽，脖子上挂着一枚银质十字架，他对里根第一次有机会来访表示欢迎。

---

① 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16—1996），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65年参加总统选举，被戴高乐击败，遂致力于左翼力量的联合。1971年任社会党第一书记。1972年和法共签署共同政府纲领。1974年参加总统选举，再度失利。1981年在左翼各党支持下当选总统。任内实行改革，宣布建设法国式社会主义，加速国有化进程，对外继续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88年5月蝉联总统。著有《中国面临挑战》、《不断的政变》、《被死神打断的回忆》等。——译者注

他们两人的身后是佩鲁吉诺①的著名绘画作品《复活》。这次备受世人瞩目的会见是由里根提议的，它真是太适宜了。他们两人都有过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因为他们都遭受过暗杀，而且仅仅相隔几个星期就先后被子弹击中。"他告诉教皇，他们两人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得到了上帝的宽恕，"比尔·克拉克回忆道。那个目标就是使波兰获得自由。

比尔·凯西在动身前往欧洲旅行之前，把中央情报局在波兰的行动向里根和克拉克作了简单的汇报。此次总统只是简单地向约翰·保罗提起了这个话题，"波兰充满了希望。我们一起工作，就能够把希望之火点燃。"教皇敏锐地点头表示同意。

在秘密会见之后，两人站在新闻界的面前，各自宣读正式声明。里根花了很长时间，详细地叙述了波兰的局势。他声称："我们共同关注的地区便是波兰这个惨遭折磨的国度，它是你们自己的祖国。在遭受了几个世纪的灾难之后，波兰在她的勇敢的人民心目中已经成为一个为信仰和自由而英勇斗争的堡垒，而在统治她的那些人的心目中则不是这样。我们正在寻找一条走向和解与革新的途径，这将为波兰人民带来一束崭新的希望之光。"

当教皇与总统会见时，比尔·克拉克正在与梵蒂冈的官员就波兰的局势进行会谈。他没有太详细地探究中央情报局在波兰的行动计划，但是他说如果教廷在一种正常的基础上与华盛顿分享情报，那么它将发挥有益的作用。他也设法说明，华盛顿想与教廷共同制定一个与华沙关系的外交基调，它将是一种灵活的手段。一方面，我们要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立场，即镇压是不可接受

---

① 原名万努奇（Pietro di Cristoforo Vannucci，约 1450—1523），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翁布里亚画派的画家，著名画家拉斐尔的老师。其作品明晰的构图、简练的形式和空间关系的处理，都成为文艺复兴达到鼎盛时期的重要美学原则。——译者注

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立场过分强硬，那么就甚至有可能把波兰推到苏联的统治之下。克拉克也要让梵蒂冈的官员知道，美国拥有把情报传递到波兰的有效手段，而且如果梵蒂冈需要从那里尽快获得情报，那么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在对意大利进行了 6 个小时的短暂访问之后，里根及其助手们乘坐“空军一号”飞向英国。

在凡尔赛会议之后，西方国家领导人在波恩开了一次会。里根总统从座位上站起来，情绪激动地请求大家削减对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项目的经费支持，限制信贷补贴，反对与莫斯科“照常营业”。总统的呼吁犹如对牛弹琴，但是，或许最重要的是，里根说完之后就感觉轻松了。“当（里根）情绪激动地向与会者提出请求时，施密特注视着窗外的花园，这是明目张胆地对他的请求不予理睬，”鲁滨逊说，“他这是在故意冷落总统。里根刚一回到华盛顿，就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此行受到了轻视，甚至是侮辱，被当作一个不能真正理解东西方经济关系精髓的新手。这是一个错误。”

总统被气得七窍生烟，于是在 6 月 18 日召开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这个日子后来被欧洲称为“黑色星期五”。里根想让别人知道他有选择权，并且在行动过程中能够做出选择。比尔·克拉克主持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感觉气氛紧张。事到如今，美国政府内部在制裁问题上产生了深刻的分歧。温伯格、克拉克、米斯和凯西赞同坚持实施制裁，在座的其他人则主张立即解除制裁。亚历山大·黑格这位最有说服力的制裁反对者当时正在纽约，国务院的第二号人物劳伦斯·伊格尔伯格代其出席会议。经过讨论，克拉克注意到，总统有三种基本选择：

- 尽管苏联主使的波兰镇压活动没有停止，美国也要完全解除制裁；

● 美国的制裁即使遭到欧洲的供应商和政府的系统破坏，也要单方面坚持实施制裁；
● 根据《出口管理与控制法》的授权，把制裁扩大到那些获得美国许可证的供应商和美国的海外子公司。

第一种选择意味着美国的政策发生了明显的逆转，这就使得美国一无所获，而西欧各国在凡尔赛首脑会议上为了平息华盛顿的怒气，才不情愿地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即停止向苏联提供信贷补贴。第二种选择意味着单方面惩罚美国的公司，而且接受这样的既成事实，即最初的双线天然气管道项目终于由美国颁发许可证的欧洲公司利用美国技术进行建造了。美国履带拖拉机公司失去了 9000 万美元的定单，通用电气公司失去了 1.75 亿美元的定单。这些定单很快就被欧洲公司填补了。第三种选择意味着美国要动真格的了，即真正发起了一场对莫斯科的经济战。

凯西、温伯格和克拉克准备向总统说明采取第三种选择的充分理由，虽然克拉克照例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定位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期间的一个“诚实的中间人”。他们预计，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中，将对制裁的相对优点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但是，总统似乎从内心里不愿意对这个问题进行冗长的辩论。他告诉大家，施密特是如何以一种蔑视的态度对待他的，还讲了过去与法国人相处的经历。他是把这些当作趣闻轶事来向大家讲的。由于与盟国达成的协议空洞无物，因此他显得有点疲惫不堪。然后，他总结道：“他们（苏联人和欧洲人）可以建造第一条天然气管道，但是，不能使用我们的设备和我们的技术。”

克拉克闻听此言立即插话：“这就是我们的总统对这个问题所做出的决策。”于是，第三种选择，即真正发起一场对莫斯科的经济战，变成了美国的政策。

欧洲对这个消息的反应无异于一次氢弹爆炸。美国总统把制

裁扩大到由美国颁发许可证的欧洲公司，甚至在人们的心目中一向与里根友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①]也被激怒了。西欧所有的重要领导人明确宣布，他们将不服从这项新的规则。在里根总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亚历山大·黑格开始对西欧做出保证，美国政策所涉及到的每一件事情总会得到妥善的解决。他平静地劝说欧洲官员，他们只管挺直身子坐着，等待危机过去。威廉·布罗克被派到西欧各国去处理善后事宜。几天之后，他传来一个坏消息，欧洲不会做出让步。黑格、克拉克、米斯以及其他内阁成员和高级行政官员聚集在白宫情报室，与布罗克一起对这个敏感的问题进行仔细的审查。在讲了几句慷慨激昂的话之后，黑格大发雷霆。他对着克拉克咆哮道："当我在纽约的时候，你们（在白宫的）这些人（在6月18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设计了这个东西。你本来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我在这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黑格大发脾气，这恰恰证明最终他是错误的。在这次会议不久之后，克拉克与总统进行了磋商。"黑格在好朋友面前才会大喊大叫，他作为总统顾问已经20多年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官员回忆道，"里根与克拉克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私人感情和绝对的信赖关系。此后不久黑格就被解职了，其原因很简单。"

---

① 出生于1925年，英国第48任首相（1979—1990），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素有"铁娘子"之称。在担任首相期间，推行以货币主义为主的经济政策，抑制通货膨胀；鼓励企业自由竞争，加速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福利制度；限制工会权力；加强法律，对群众运动采取强硬政策。对外增加军费预算，加强防务，确保独立的核威慑力量，主张对苏联的扩张进行遏制。英国与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中大获全胜，使她的威望在英国大为提高。80年代末，盛极一时的"撒切尔主义"面临种种挑战，保守党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执政十余年的撒切尔夫人被迫洒泪辞职。——译者注

由于美国扩大制裁，因此克里姆林宫与苏联天然气工业部积极配合，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奋发努力，在没有美国技术的情况下完成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建设。不久，由于其它优先项目的需要，苏联的决策又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使苏联的经济变得更加虚弱了。这种重大转变成为激励苏联民族自豪感的因素，促使他们下决心完成这个项目。罗杰·鲁滨逊此时正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他的办公室里对这一问题进行跟踪，他回忆道："在设备和人员方面发生的重要转变，在苏联的经济生活中引起了有害的连锁反应，因为这实际上使其它国家项目推迟或者停止了。在苏联，这个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完成，与当年美国完成'曼哈顿计划'[①]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为了寻找美国设备的替代品，他们在国外花费了巨额金钱，但是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他们的硬通货收入本来就有限，但为了极力建造天然气管道，却草率地花费了巨额资金。他们的技术人员是世界上最聪明的，这些人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但仍然不能完成这个项目。"根据苏联天然气工业部 1986 年所作的估计，国内自己的努力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几乎花费了 10 亿美元的硬通货。然而，苏联最终也未能完成这个项目，他们需要美国的技术。"我们尝试建造一套 2.5 万千瓦的汽轮机，这样就使很多资源突然处于应急状态之中，"一位参加了莫斯科的这个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工程师回忆道，"但

---

① 美国陆军部于 1942 年 6 月开始实施的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由建造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格罗夫斯准将领导。由于初期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在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进行，所以最初是以"曼哈顿工程特区"作为此项计划的代号，后来整个研究计划正式定名为"曼哈顿计划"，也称"曼哈顿工程"。为了先于纳粹德国制造出原子弹，该工程集中了当时西方国家（除纳粹德国外）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动员了 10 万多人参加这一工程，历时 3 年，耗资 20 亿美元，于 1945 年 7 月 16 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按计划制造出两颗实用的原子弹，整个工程取得圆满成功。——译者注

是我们失败了。这个项目消耗了我们的巨大资源，使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当里根政府听到风声，苏联将依靠本国力量来完成这个项目时，凯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们绞尽脑汁，试图拿出使这个项目的状况更加恶化的办法。苏联在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方面的设备部件总是严重依赖于西方的设计，然后再自己制造。这一次虽然国内努力促进这个项目，但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在华盛顿，好几位官员断定，向苏联提供假情报的计划（包括故意寄送错误的和被扭曲的技术数据）将获得成功。然后，美国就着手做了一些工作。

黑格由于天然气管道问题而被解职，因此新任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行事时就比较谨慎。他只是轻微地介入了天然气管道这个问题。“他知道黑格就是因此而被解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前官员说，“于是他告诉欧洲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开不得玩笑。我们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失去了前国务卿。’”

不管如何，舒尔茨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与立场强硬的欧洲领导人取得谅解。撒切尔夫人和密特朗告诉各自国家的公司，在向苏联运送设备时不要遵守美国的命令。所谓制裁，就是美国把自己的法律应用到不受它管辖的地方，因而遭到了欧洲的抵制。撒切尔夫人亲口告诉里根：“你们的法律不能在这里应用。”在巴黎，法国工业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受到美国的威胁，要他“命令”任何法国公司不要把它们的货物运到莫斯科。法国的克万—卢瓦尔公司获得了美国德雷塞工业公司所颁发的许可证，但它可不吃美国这一套，而是我行我素，于这年夏天开始将货物运送到莫斯科。

第九章

1982年8月，比尔·凯西再次乘坐他那只黑色的“机械鸟”，动身前往非洲。他此次要与南非同行探讨几个有趣的问题。他对南非情报机构的坚韧精神、广泛影响及其工作能力深表钦佩。在回国途中，他指示驾驶员低空飞越赞比西河[①]，使他能够好好看一看这里的风光。于是，飞机在空中转了一个弯，从正上方越过壮观的维多利亚瀑布[②]。

当飞机在比勒陀利亚[③]降落时，中央情报局驻南非情报站负责人在机场迎接凯西，并且把他护送到美国驻南非大使馆。经过一番盥洗之后，精神饱满的凯西听取了有关南非国内局势和北部的安哥拉激烈内战的情况汇报。然后，他离开大使馆，前去会见南非情报官员。

---

① 流贯非洲中南部及东南部的河流，源出中非高原，往东注入印度洋。全长3500公里，流域面积130万平方公里。——译者注

② 位于赞比西河中游赞比亚与津巴布韦接壤处。宽1700多米，最高处108米，宽度和高度均比尼亚加拉瀑布大一倍。赞比西河抵达瀑布之前，舒缓地流动，而瀑布落下则声如雷鸣，当地卡洛洛—洛齐族居民称之为“莫西奥图尼亚”（意即“霹雳之雾”）。1855年11月16日，英国探险家利文斯敦抵达瀑布所在地，为第一个见到该瀑布的欧洲人，他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为瀑布命名。邻近的维多利亚瀑布国家公园（津巴布韦）和利文斯敦狩猎公园（赞比亚）都是旅游胜地。——译者注

③ 南非共和国行政首都和德兰士瓦省省会。——译者注

这是一次热忱的会见。南非支持乔纳斯·萨文比[①]与安哥拉的马克思主义政府作战。他们想让凯西帮助他们支持萨文比，此人领导的武装力量给安哥拉以及在其境内的古巴军队造成了重大损失。1981 年初，凯西首次建议美国应实行支持反对共产主义的起义者的政策，萨文比是这种政策取得成功的一个完美范例。

凯西还提出与南非共享情报。正如美国在几个月前向以色列提供卫星照片那样，美国拍摄的安哥拉卫星照片将对萨文比非常有好处。南非人很喜欢这个想法，他们表示十分高兴能够得到这类情报。

然后，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把话题转到了有关对莫斯科发起秘密战争的事情。克里姆林宫正在大量出售黄金。1981 年，苏联人抛售的黄金几乎是他们通常在国际市场上出售量的 4 倍。很显然，他们在现金方面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了。凯西想搞清楚，莫斯科希望通过出售黄金获得多少硬通货，世界黄金价格的走势如何，南非在黄金生产方面会做出何种反应。他还想阻止比勒陀利亚与莫斯科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任何合作。

南非在黄金生产与销售方面是一支决定性的力量，有关官员对世界黄金市场的行情非常熟悉，因此凯西向南非官员询问这个问题，真是找对人了。据传闻，南非长期以来与莫斯科保持着秘密联系，满怀希望要对黄金、钻石、白金和珍贵矿产资源的国际市场进行调节，这样他们就可以逐渐地垄断国际市场。

在安排南非与苏联官员的会面中，克格勃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这些会面通常安排在瑞士，第一次会面就是 1978 年在这里进行的。这些交往都是秘密进行的。归根结底，莫斯科在黑非洲

---

① 安哥拉政治家（1934—）。长期领导游击战争，反对独立后的安哥拉政府。1991 年与政府签订和平协议，结束了内战。在 1992 年的大选中失败后，又开始了武装斗争。——译者注

的亲密盟友都是比勒陀利亚不共戴天的死敌。克里姆林宫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ANC）[①]和南非共产党推翻南非政府的努力。

当国际市场的黄金价格在70年代向上攀升时，比勒陀利亚和莫斯科发了横财。莫斯科寻求与比勒陀利亚进行对话，看看双方是否能够发展互利合作关系，以便对珍贵矿产资源的国际市场进行调节。最初的几次会见几乎没有取得成效，但是到了1982年，随着黄金价格的急剧下跌和莫斯科的抛售，双方在试图稳定国际市场方面又面临着共同的利益。

南非情报机构对凯西的问题没有立即做出反应。归根结底，比勒陀利亚和莫斯科在黄金定价和市场调节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想保持黄金的高价位以及他们控制国际市场价格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南非为什么要与美国共享情报呢？

"很显然，"凯西对他们说，"你们可能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但是他们在别的方面正在压迫你们。我在华盛顿可以在情报方面帮助你们，但是我需要从你们这里得到一些东西。"

南非人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它引起了情报部门的共鸣，因为在南非政府中，它的反苏态度最为一贯。但是，那些负责黄金生产和销售的部门不会以同样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们的职责就是要使黄金的产量多、价格高。如果莫斯科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这个结果是可能出现的。凯西以严厉的语气明确表示，里根政府不想让任何人来操纵国际贵金属市场，尤其是不想使克里姆林宫在缓减现金短缺方面获得好处。

---

① 南非政党和黑人民族主义组织，成立于1912年，是南非最早的政治组织，旨在消除南非白人当局推行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1923年改为现名。1960—1990年被取缔，转入地下并在南非境外展开活动。1990年获合法地位，其主席曼德拉于1994年成为南非首届多种族政府的总统。——译者注

在访问比勒陀利亚之后，凯西的下一站是开罗。自从他第一次访问以来，埃及人在阿富汗计划后期的行为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凯西第一次与埃及新任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①]会见，他们讨论了中东局势、安瓦尔·萨达特被暗杀以及阿富汗计划。然后，凯西把话题转到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的问题上。

“你如何看待阿姆河北岸苏联中亚地区穆斯林的情绪？他们将成为我们的一个强大盟友。”

穆巴拉克停顿了一下。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凯西的真实用意何在呢？

“凯西先生，那里的局势很紧张。我看到了一些报告，提到了那个地区的一些地下组织，它们把一些著作运过边境。”

凯西对这些情况都知道，他还为某些组织提供过资金。但是，他想知道的是，埃及对苏联中亚地区的地下组织知道些什么。他所见过面的埃及情报官员说，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这位表情平静的埃及总统建议凯西与这些穆斯林游击队领导人本人接触一下。

凯西点点头，对东道主的这个建议表示感谢。当他回到美国大使馆时，召集手下进行讨论。4 天之后，他去了巴基斯坦。

当凯西的飞机在伊斯兰堡降落时，仍旧是一系列例行公事式的活动。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充当了一个诱饵，以防凯西遭到恐怖分子任何可能的攻击。凯西被簇拥着坐进了一辆防弹汽车，然后飞速向一处安全住所驶去。他自从上次访问埃及以来，对阿富汗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苦思冥想。总统、比尔·克拉克和温伯格都

---

① 埃及政治家（1928—）。1972 年任空军司令，1975 年任副总统。1981 年 10 月 6 日（1973 年埃以战争开战纪念日）萨达特总统遇刺，他出任总统。在任期间，改善了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冷却和以色列的关系。1987 年和 1993 年连选连任总统。——译者注

要求他提供有关阿富汗的新的正规情报。阿富汗抵抗组织的发展比过去好得多了，各个派系之间进一步加强了合作，而且武器装备也有了改善。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中央情报局专门指派经验丰富的文森特·坎尼斯特拉罗，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对阿富汗计划进行监督。他回忆道："在最初的几年里，基本上就是现代化的军队与平民组成的游击队在丘陵地带交战。游击队熟悉地形，但缺乏武器装备和连贯的战略方针。"双方形成胶着状态，而这正是问题所在。"苏联军队没有造成巨大的伤亡，"坎尼斯特拉罗说，"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但苏军的伤亡人数并不多。"抵抗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大，而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则想使苏军伤亡人数急剧地增加。

运送武器的渠道很畅通。这次秘密行动在历史上是最昂贵和最复杂的行动之一，由中央情报局通过三种途径运送供应品。武器装备是用沙特阿拉伯的金钱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的，中央情报局把这些装备从达兰[①]空运到伊斯兰堡。中央情报局还飞越敏感的克什米尔地区，从中国空运武器装备和弹药。第三种途径就是海运。许多国家（中国、埃及、以色列和英国）都进行了捐助，然后从海上把这些物资运到卡拉奇港口。巴基斯坦情报机构把这些货物装上重兵保卫的火车，运到伊斯兰堡或者边境小镇奎达[②]。每年通过这个渠道要运送 1 万吨的武器装备和弹药。到 1985 年，这个数字将上升为 6.5 万吨。

阿赫塔尔将军在巴基斯坦情报机构与世隔绝的基地热烈欢迎凯西。从埃及和其他地方运来的武器装备的质量有了显著改善，因此阿赫塔尔知道他应该好好感谢比尔·凯西。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兰利向所有参与这个行动的人员打电话，要求他们确保武

① 沙特阿拉伯东北部城市。——译者注

② 巴基斯坦西部城市。——译者注

器质量。这两人现在都想知道他们经过共同努力，到底该如何更有效地给莫斯科“放血”。

苏联驻阿富汗军队有一半被束缚在喀布尔及其周围地区，而且与穆斯林游击队的大多数战斗实际上是由士气低落的阿富汗政府军进行的。阿赫塔尔提议这些军队应该转移到北方各省。他正计划在阿富汗采取更多的行动，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首先，那里是苏联展开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在阿姆河的正北面有好几个基地，苏军的武器装备与物资就是从那里运到阿富汗的。萨朗公路是驻阿富汗苏军的生命线，这是一条逶迤于大山之中的弯曲道路。随着穆斯林游击队在北方活动的日益增多，对苏军这条狭窄而拥堵的供应线构成了威胁。但是，也可以据此断定，苏联将把更多的军队派往阿富汗。“我们判定，苏联无力确保供应线的安全，这是苏联在阿富汗的军队规模受到限制的一个关键因素，”穆罕默德·优素福回忆道。

阿赫塔尔提议在北方采取行动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该地区对于苏联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在北方的席巴尔甘省的朱兹詹附近有一个天然气田，据估计大约有5000亿立方米的储量。这个气田80％的产量被苏联拿走了，而且都是无偿拿走的。在大约150英里以西的萨尔普勒和阿里古发现了石油，在昆都士和马扎里沙里夫还有铜、铁、黄金和宝石等贵重矿产资源。苏联人正在开采这些资源，并且以令人咋舌的低价购买，然后将其运回苏联。克里姆林宫基本上免费得到了这些总价值约为1亿美元的矿产资源。

凯西同意阿赫塔尔的推理。但是，他还认为，阿富汗的北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北方的几个省与苏联的中亚地区接壤。这个地方犹如非洲那样贫穷。边境两侧的居民是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土库曼人，他们具有相同的种族和宗教信仰。阿富汗北部人民与苏联中亚地区人民的共同之处，比他们与南部人民的共同之

处还要多。

苏联在阿富汗的战略，就是通过把制空权与忍耐性结合起来的办法来拖垮敌人。“苏联人总的来说就是满足于占据一系列主要军事基地或者战略城镇以及连接这些地方的通道，摆出一副呆板的防御架式，”穆罕默德·优素福回忆道。他们通过大规模的轰炸（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来削弱和损耗敌人。凯西认为，对于莫斯科来说，这是一场“低烈度”的战争。只有当抵抗活动增加时，才能给苏联军队背上沉重的战争负担。凯西和阿赫塔尔提出两个方案，这或许有助于达到目的。

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正在获得质量上乘的武器，但是他们对敌人造成损害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他们得到的是一些轻型武器、火箭炮以及一些小口径大炮。阿赫塔尔和凯西决定向他们提供一些重型武器，包括122毫米火箭筒和榴弹炮。凯西说，我们要给他们提供一些装备，使他们把事情做得更好。阿赫塔尔特别想向他们提供质量更好的萨姆地对空导弹（SAMs），以抗衡苏联的空中优势，因为现在向他们提供的萨姆—7武器系统的成功率不高。阿赫塔尔对凯西说：“这些武器系统的质量不好。”相反，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的地面人员，没有理会巴方对萨姆—7武器系统质量的抱怨。按照文森特·坎尼斯特拉罗的说法，“在场的美国人说：‘他们是一些愚蠢的游击队员，把这些武器藏进了山洞。因此，这些武器没有发挥作用也就不奇怪了。’”

凯西答应亲自了解一下情况。于是，发起了一场敏感的谍报行动。几周之后，在“铁幕”背后的情报人员澄清了这个问题。这种有缺陷的萨姆武器系统是从一位国际军火商手里买来的，此人是从波兰买到这些系统的。由于苏联人已经发现穆斯林游击队获得了萨姆武器系统，因此他们决定对付它。“萨姆武器系统不是太有效，”坎尼斯特拉罗回忆道，“这是因为苏联人切断了供应渠道，而且故意对萨姆系统进行了破坏。穆斯林游击队的说法一

直是正确的。”

凯西与阿赫塔尔断定，利用中央情报局的侦察能力使抵抗运动更为有效，这是一个好主意。向穆斯林游击队提供远程武器，这意味着他们需要获得卫星情报。直到那时为止，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卫星专门用于对苏联军队受到损害的程度进行评估。现在，它们将被用来为穆斯林游击队提供打击目标。于是，他们立即高效率地直接进行安排。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的专家们将把卫星照片通过信使交给中央情况局在巴基斯坦的情报人员，然后由他们每隔几个月就把这些照片送给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再由他们对阿富汗的抵抗活动进行协调。

事实证明，卫星照片对穆斯林游击队很有益处。“这种帮助是巨大的，”优素福说，“中央情报局向我们展示某一个地区的地图，这有助于我们瞄准敌人的关键部位。中央情报局的卫星情报可以提供精确目标，例如邮局的位置；它还可以显示敌人的实力以及进出某一个地区的可能通道。这种卫星情报对于我们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卫星照片使抵抗组织能够区别阿富汗和苏联军队的设施。凯西和阿赫塔尔决定利用这些情报，把攻击目标从阿富汗的军事目标转到苏联的设施。他们希望对经济目标的某些攻击能够对开采矿产资源的行动进行破坏，从而阻止向苏联出口这些资源。苏联技术人员正在获取阿富汗的天然气、石油和贵金属，而且他们只向阿富汗政府支付极少的钱（这点钱聊胜于无）。根据巴基斯坦获得的情报，苏联人已经对阿富汗北部的矿产资源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断定该地区矿产品的蕴藏量非常丰富，因此他们开始加大投入，对这个地区进行开发。阿赫塔尔和凯西决定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经济目标。

对这些目标的打击将变得猛烈和精确。穆斯林游击队很快就开始把打击目标集中到从阿富汗向苏联输送天然气的管道。“这

些天然气管道的价值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证明：当穆斯林游击队对这些管道进行攻击时，苏联人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当地居民，以此作为强烈的报复手段，”优素福说，苏联的部分地区依赖于阿富汗的能源供应，“当穆斯林游击队对管道进行破坏时，苏联中亚地区的工业生产曾经有两次陷入停顿，每次至少停顿10—15天。”

正当这场血腥的战争在阿富汗的山区和谷地疯狂地进行时，一场隐蔽的神经与意志战同时在波兰进行着。10月，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加大了他的政治赌注，企图进一步削弱地下团结工会，因为这场运动的余烬仍然能够看得见。波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有关工会运动的法律，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这项所谓的《工会法案》的第52条指出：“凡在本法律颁布之前登记的所有工会组织一律撤消，不再有效。”当局大笔一挥，团结工会竟然不再合法了。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已经预料到这一点了，他们认为，这项法律只不过是为军政府采取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而提供了依据，那就是要对团结工会积极分子进行围捕，并且将他们以罪犯论处。华沙对这项法案的通过与颁布，没有进行任何张扬。雅鲁泽尔斯基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

但是，这件事在华盛顿几乎立即就引起了反响。比尔·克拉克与里根商讨下一步应该采取的措施。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一致认为，应该扩大制裁。“我们采取某些行动是非常重要的，”乔治·舒尔茨回忆道，“(对地下团结工会）予以资助只是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在精神上是与他们站在一起的。”10月9日，里根总统暂时停止给予波兰贸易最惠国（MFN）待遇，这是雅鲁泽尔斯基政府与美国之间的最后一座经济桥梁。暂停最惠国待遇，使波兰向美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增长了300%—400%，从而有效地将它们挤出美国市场。

美国政府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以决定美国采取何种经济政

策对波兰进行围攻。美国想给波兰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军事管制法》是不可接受的，并且提高莫斯科因支持军政府所付出的代价。但是，美国并不想使老百姓遭受痛苦。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有效地结束了争论。里根总统就团结工会以及美国与波兰的关系问题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他说："属于波兰绝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的一个自由工会组织——团结工会被宣布为非法，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促进最基本的人权之一——自由加入工会的权利。"

雅鲁泽尔斯基政府的行为成为团结工会复兴的开端，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团结工会获得了西方的资助。尽管团结工会没有产生"传染"的效果，但它本身却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8月31日，波兰国内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以纪念团结工会成立两周年。无论如何，这场运动总算是幸存下来了，而当局却完全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

"美国的财政支持对团结工会的维持起了关键作用，"罗伯特·麦克法兰说。1982年秋天，一套复杂的C^3I系统总算在波兰安装就位了。这套系统是用来帮助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和其他大规模的行动。当团结工会与当局进行猫捉老鼠的游戏时，无线电广播发射机就把这个消息向全世界传播出去了。中央情报局所提供的资金用来购买包括印刷机的油墨和汽油在内的各种物品。

除了秘密资助反对派，里根政府正在试图利用外交机器这一杠杆，将团结工会的生存与波兰政府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挂起钩来。麦克法兰说："制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那就是使团结工会得以维持。"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接到任务，要他们提出一种判断美国政策是否取得进展的标准，它将把波兰政府明确的政治特权与美国的经济特权和经济利益挂起钩来。罗杰·鲁滨逊参加了一部分工作。"我们制订了一项逐步加码的战略，"他回忆道，"实

际上就是做好两手准备，一种是间接的方式，一种是直接的方式。间接的方式就是承诺给予贸易利益和贸易特权，包括最惠国待遇和重订还债期限，但这要与华沙在履行政治诺言方面取得明确而具体的进展联系在一起，即允许团结工会合法化和恢复全国对话。”

根据第32号国家安全决策指示，美国的正式目标就是击退苏联在该地区的势力。里根总统与其顾问不仅谈到要保持团结工会完好无缺，而且还谈到推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分裂欧洲的《雅尔塔协议》。“里根对这个将欧洲分裂为两半的《雅尔塔协议》没有兴趣，”理查德·派普斯说，“对于他来说，这个协议是不公正的。秘密支持团结工会，就是试图改变这个协议的方式之一。”

中央情报局与团结工会积极分子在正常的基础上进行接触。通过在法兰克福与他们会见，以及后来使用发报机，中央情报局把美国的明确政策传播给地下团结工会。“我们把我们的政策简要地告诉团结工会，”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回忆道，“我们想消除他们的惊奇，因为那样可能反过来会使士气受挫。他们相当清楚地知道，他们能够从美国已经宣布的政策中得到什么。”每周在不同的时间，通过“美国之音”的广播，将更新的消息传播出去。

11月，比尔·凯西对西德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旅行，第一次有机会触摸到了他所说的“网络”的边缘。中央情报局负责外国军事情报评估的国家情报官员特德·阿特基森与他随行。凯西打算与美国情报分析员和欧洲情报官员详尽讨论北约—华约之间的力量平衡，不过，他在西德还讨论了波兰问题。中央情报局驻法兰克福办事处被当作在波兰采取行动的临时前方基地。凯西与参加这项计划的人员见了面。“他什么都想知道，”一位官员回忆道，“包括一些细枝末节。‘他们需要更多的新闻纸吗？他们有足

够的和合适的发报机吗?' 他想成为一个内行。"

当地的情报人员与分析人员对前途感到悲观。地下团结工会正在从镇压中得到恢复，而且甚至自信心也在增长。但是，波兰人民看起来似乎精疲力竭了，他们参加反对雅鲁泽尔斯基的大规模活动的激情正在衰退。10 月 11 日和 12 日，地下团结工会呼吁进行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和罢工，以此作为对当局取缔团结工会的反应。参加集会的群众虽然也不少，但没有形成什么气势。罢工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被投入监狱，并且判处长时间的徒刑。波兰的食品供应状况正在恶化。与其它物品一样，甚至就连人们的希望也要定量分配。美国政府的某些人（包括比尔·凯西）所设想的那种即将到来的起义，也未能变成现实。看起来，地下团结工会将要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

对于波兰领导人来说，他们还在继续讨论如何才能使这个政权的敌人窒息。在国内人民的鼓舞和国外的财政支持下，反对派设法度过了难关。

1982 年 11 月 16 日，波兰党的高级官员和军队将领在华沙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卡齐米日·巴尔齐科夫斯基、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弗洛里安·西维茨基将军以及另一位国防部副部长兼总政治部主任 R. 巴拉利将军。他们对一份评估国内政治局势的报告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这些官员对形势做出了过分乐观的判断：

> 反对派已经失去了在主要企业中煽动罢工和示威的能力。政府通过隔离反对派领导人和个别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监督并坚决予以审判，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反对派的传统中心地区。官方的宣传活动和阻止通过传单散布假情报的行动，防止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并且阻止了正在进行的此类活动……官方的宣传必须揭露地下极

端分子的危险性，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国内引发血腥冲突。根据《军事管制法》，已经没收了 1100 支冲锋枪，这些武器有可能被用来反对我们的党、民兵和保安人员。

波兰人反对波兰人的骚乱，正在为中央情报局制造机会，使他们能够收集感兴趣的情报。在 1981 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凯西对中央情报局驻波兰情报站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使其成为中央情报局在世界上设施最全的情报站。结果，对波兰政府的渗透越来越成功了。中央情报局还设法策反了一位国防部副部长，因为他对整个《军事管制法》的实施过程不满。他秘密参与了国防部计划的制定，并且参加了由政府秘密召开的讨论国内安全局势的某些会议。他后来渐渐通过写短信和发信号的方式向中央情报局传递情报，大约每月一次。大多数情报都是与军队的结构与装备计划有关，后来也传递了一些政治方面的情报。最初，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不愿意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因为毕竟是这些人发布了《军事管制法》，并且因此而激怒了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但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甘于冒险，结果获得了成功。不久，接连在波兰发展了许多情报源。

随着美国在波兰和阿富汗的行动势头正猛的时候，延迟第一条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和停止第二条管道建设的努力碰到了麻烦。美国政府面临着大西洋联盟内部出现的严重而广泛的不和谐局面。里根总统既想阻止天然气管道建设，而又不想冒险破坏北约联盟。“禁运有点维持不下去了，”乔治·舒尔茨回忆道，“联盟受到了严重损伤。因此，必须找到某种形式的妥协。”

在美国新任国务卿的劝告之下，国家安全规划小组于 7 月初苦心孤诣地提出一项新颖的战略。比尔·克拉克、卡斯帕·温伯格和比尔·凯西打算采取一项强硬步骤。温伯格劝告总统：“这可能

是我们说服盟国并且切断西方向克里姆林宫提供资助的最佳选择。”但是，总统选择了一项双轨战略，即通过公开与秘密方式，设法与欧洲人达成一项协议。如果采取公开方式，那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将对欧洲采取强硬政策。采取秘密方式虽然意味着里根愿意和解，但那仅仅是帮助欧洲人保全面子而已。

里根总统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它是由鲁滨逊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其他工作人员起草的。这份备忘录概述了美国挫败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的战略。美国将继续对干扰美国制裁行动的任何人采取强硬手段。那些使用美国许可的技术或者获得美国信贷补助的欧洲公司，如果他们继续阻挠美国对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制裁，那么就要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并且要对他们进行进口管制。这就意味着，所有的违反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大多数与此项目相关的欧洲公司将被赶出美国市场。与此同时，里根打算通过谈判与盟国达成某种协议，使他们面对现实，争取时间。他告诉舒尔茨，他不想表现出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与欧洲进行谈判。“总统不想达成一项空洞无物的协议，”罗伯特·麦克法兰回忆道，“他想获得一些实际的内容。因此，他不想表现出美国被削弱的样子。”

幸运的是，正是欧洲首先采取试探性步骤，以便与美国达成妥协。英国外交大臣弗朗西斯·皮姆于 7 月初给乔治·舒尔茨打电话，建议举行一次特别会谈，讨论与天然气管道项目相关的问题。舒尔茨将此事向总统做了汇报，总统指示国务卿可以向前推进一下，但要他严格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所确定的方针行事。于是，舒尔茨给皮姆回了电话，举行会谈的事就这样谈妥了。

9 月 16 日，内阁层次的高级跨部门国际经济政策研究小组(SIG—IEP) 召开会议，确定美国大概的会谈策略。大家确实担心欧洲将联合起来对付舒尔茨，同时也担心舒尔茨会屈服。会谈已经确定于 10 月初在加拿大的拉萨皮尼耶尔举行，会议议程将

全部公开。届时会议将没有助手参加，会后也不会发表公报。因此这个高级跨部门研究小组为此次会谈确定了一条底线。“我们对这次会谈的态度是极其认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助手回忆道，“我们决定要取得结果，这将使莫斯科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拉萨皮尼耶尔，舒尔茨对一项折衷方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只有欧洲同意在与苏联进行贸易以及向其提供信贷时具有一种安全意向，制裁才能够取消。但是，欧洲盟国不是那么好说服的。法国外交部长克洛德·谢松认为，这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会谈因陷入僵局而结束了。讨论没有达成共识，最后形成的文件充满了外交辞令，只是概述了在哪些方面有可能达成协议。

舒尔茨回到了华盛顿，他对自己所取得的进展“感觉良好”。10 月 15 日，他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了此次会谈的结果。温伯格和凯西对此不以为然。“我认为这还不足以让我们放弃制裁，”温伯格说。凯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都一致附和国防部长的意见。

舒尔茨将了他们一军，请他们拿出一种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这些制裁措施不可行，是维持不下去的，”他反驳道，“有什么选择余地吗?”克拉克、凯西和温伯格继续坚持认为，西方对于莫斯科的经济与金融政策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欧洲的谈判应该继续进行。通过与欧洲国家驻华盛顿的大使们商谈，而且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设定的严格条件，舒尔茨苦心孤诣地拿出一个协议。11 月 12 日，人们看到了打破僵局的曙光。11 月 13 日，总统在广播讲话中宣布，制裁正在取消，而且盟国将对苏联集团实施统一的“安全第一”的联合经济政策的问题开始进行磋商。里根说：“第一，每一个伙伴都声明，在对西方能源供应的选择方案进行研究期间，将不会签订或者批准向苏联购买天然气的新合同。第二，在向苏联转让战略物资方面，美国以及我们的伙伴将加强现有的控制措施。第三，我们将

毫不迟疑地制定对与苏联的金融交往进行监督的程序，并且对我们的出口信贷政策进行协调。”

里根在做出上述宣布的前一天，签署了一份以国家安全决策指示的形式所起草的秘密文件，这是在美国历史上涉及苏联经济的最重要的文件。这份指示（NSDD—66）是由罗杰·鲁滨逊起草的，它反映出美国对苏联经济战的战略发生了由制裁向其他关键方面的地震式转变。由于美国在争论的初期不能获得盟国在天然气管道项目方面的合作，因此国家安全顾问比尔·克拉克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经济处草拟一份与美国的一贯政策相符合的指示，使美国可以利用苏联的经济脆弱性。于是，就出现了上述这份指示。甚至在总统签署之前，它就对舒尔茨在拉萨皮尼耶尔所进行的谈判进行指导了。

“NSDD—66 相当于秘密宣布了对苏联发动经济战，”这份指示的主要作者罗杰·鲁滨逊说，“这份文件与美国军事建设和“战略防御倡议（SDI)”一道，描绘了苏联最后死亡的图景。”仅有几页纸篇幅的 NSDD—66，为美国制定了一项政策，就是要设法尽快制订一项“三位一体的贸易战略”，以限制西方向莫斯科提供“生命保障”。

罗伯特·麦克法兰认为，NSDD—66 包括三个核心因素：

- 美国的政策就是要取得欧洲盟国的赞同，不能以优于市场的利率向莫斯科提供信贷。
- 美国不允许苏联利用西方关键的高技术来维持自己的军事与经济体制。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对此要加强管制。
- 美国将努力以一种前瞻性的方式与盟国合作，开发可供选择的能源，以减少欧洲对苏联天然气的依赖。在这方面也要规定一个阈值，其目标就是防止欧洲

对苏联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超过30%（即，不能建造第二条长达3600英里的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也不能签订新的合同）。

这个针对制裁的折衷方案没有获得克拉克、温伯格和凯西的支持。他们想坚持到底，而且甚至要进一步推迟第一条管道的建设。但是，甚至在欧洲因接受“三位一体的贸易战略”的方案而停止对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制裁之后，凯西、克拉克和总统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即必须对苏联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美国政府内部的这种明确论调，正在给有关政府官员发出同样的信息。1982年11月底，国家安全规划小组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会议，其中一个重要议题便是苏联经济。国家安全规划小组的与会者通常只有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但是，那天亨利·罗恩也坐在白宫情报室中，向与会者陈述他对于苏联经济脆弱性的看法。罗恩一开始就系统地叙述了苏联经济的衰退状况，他说：“我们只要维持我们对莫斯科的军事挑战，并且切断西方向他们提供的生命保障就可以了，因为这十年来我们目睹了加在这个体制身上的种种沉重负担，这将有可能促使其发生自我爆炸。”

第十章

1982年11月10日，这一天莫斯科冷得出奇，纷纷扬扬的雪花越积越厚。上午7点30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餐桌上一边阅读《真理报》，一边吃早餐。这位苏联领导人健康不佳，身体虚弱，但他仍然能够独自走动。在附近的一个房间里，坐着这位老人的几位贴身警卫。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亲自指派他们负责总书记的安全，不论他在哪里，他们都形影不离地跟着他。在吃完早餐的20分钟以后，勃列日涅夫登上楼梯，到他的卧室去了。他的警卫人员跟着他，进屋后关上了房门。

几分钟之后，一位警卫走下楼梯，很有礼貌地通知勃列日涅夫的夫人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他的丈夫刚刚去世。彼得罗夫娜闻听此言，眼泪夺眶而出。她竭力使自己保持镇静，并且迅速向卧室走去，但警卫人员把她拦住了。当时没有叫医生来，尸体涂上了防腐剂，而且显然没有进行验尸。直到两天之后在苏联议会圆形大厅里举行的告别仪式上，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才看到了她丈夫的尸体。在她去世之前，她一直坚信她的丈夫是因为身遭不测而死的。

她丈夫的继任者或许证实了她的怀疑。就在勃列日涅夫这位苏联第二个在位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去世5天之后，苏联这艘航船的新船长就坚定地开始掌舵了。为勃列日涅夫精心挑选警卫人员的克格勃首脑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如今成了苏联帝国的守护者。他是一个复杂的人，表面看来充满了矛盾，至少他的说话音调和兴趣爱好与作为一个克格勃首脑是不相称的。他

的这种复杂性从他所珍爱的物品中就可以表现出来。他在克格勃总部的办公室尽管很朴素，屋子里却有两件装饰品：一件是苏联秘密警察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①]的大幅画像，一件是唐吉诃德[②]的雕像。

在走马上任的几天之后，安德罗波夫和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将军和外交部长雅各布·汗，会见地点是克里姆林宫的圣·叶卡捷琳娜厅，这这是一个豪华的房间，里面装满了沙皇统治者的珍宝。安德罗波夫说到阿富汗时情绪激昂，他的那双黑色眼珠冷冰冰地盯着客人。他本来是反对苏联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的，但现在已经事过境迁了。这场战争关系到苏联的自尊与荣誉，而不是为了地缘政治利益。“巴基斯坦是这场阿富汗战争的参与者，”葛罗米柯根据安德罗波夫定的调子对来访的巴基斯坦客人说，“你必须理解，苏联将支持阿富汗。”苏联正是这样做的，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俾路支省的分离主义分子在苏联的背后支持下，正在努力摆脱巴基斯坦的统治。克格勃和阿富汗秘密警察（KHAD）正在进行一场破坏伊斯兰堡的稳定的行动，企图散布不利于齐亚的统治的论调。另外，阿富汗战斗机还飞到巴基斯坦领空去攻击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的目标。

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知道，巴基斯坦是阿富汗抵抗组织的

---

① 俄国革命工人运动活动家，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之一（1877—1926）。彼得格勒10月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917年12月起担任“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主席。1919年任苏维埃政府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任交通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同年6月被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列宁逝世前后，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非常激烈，他站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一边，同托洛茨基反对派进行斗争。1926年6月20日在莫斯科病逝。著作编入《捷尔任斯基选集》、《囚徒的日记和书信》。——译者注

②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人物。——译者注

基石。没有一个外部基地的支持，抵抗运动将会夭折。里根政府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向巴基斯坦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援助，条件是齐亚继续庇护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

巴基斯坦总统没有被莫斯科的这种威胁所吓倒，而是沉着地应付着他们发出的口头攻击。齐亚面无表情地说："巴基斯坦真诚地希望与阿富汗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并且寻求一种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和平的政治解决办法。"这位巴基斯坦将军表现出了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当齐亚从莫斯科返回巴基斯坦后，卡斯帕·温伯格和威廉·凯西都给他打了电话。凯西表示他要尽其所能帮助巴基斯坦。将军后来继续发挥了美国与阿富汗游击队之间的通道作用。

1982 年底，国家安全顾问比尔·克拉克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一份由总统签署的秘密指示，大概勾勒一种里根与莫斯科打交道的战略。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自 1945 年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想发表一些能够青史留名的政策。但是，自 1950 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都是由一些假设以及某一份文件中所阐述的政策来推动的。这份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NSC－68)"的文件是哈里·杜鲁门[①]于 1950 年签署的，它的主要起草人是保罗·尼采，此人当时刚刚接替乔治·凯南，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一职。

NSC－68 是根据一系列假设而起草的，这些假设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长期的影响。这份文件认为，东西方的斗争将持久地进行下去，苏联将持续对美国发起军事挑战。面对这种现

---

① 美国第 33 任总统，民主党人（1884—1972)。1944 年当选为副总统。1945 年 4 月 12 日，罗斯福逝世后继任总统。1948 年竞选连任总统获胜。在任期间发起东西方冷战，提出"遏制"政策，成为其后数十年美国外交政策所遵循的基本方针。——译者注

实，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本质上来说将处于守势。正如凯南在他的那篇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著名文章中所设想的那样，“对俄国人的扩张趋势要采取一种既要长期和耐心、又要坚定和警惕的遏制政策”，最终将促使苏联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大大减小其对西方的威胁。在70年代，历届美国政府都是以这项遏制政策为蓝本，辅之以种种诱惑，希望能使苏联行为发生变化。然而，这项政策似乎很少能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发生转变。

里根及其高级顾问们对“遏制政策”没有寄予太大的希望。苏联所造成的问题不能由（通过利用冷静的手段）“改善其行为”的方式加以解决，这些问题是苏联体制所固有的。里根出于本能而打算提出一项战略倡议，而不想被迫处于一种被动地位。这就需要改变超级大国之间展开竞争的性质与范围。如果单单进行武器数量的竞争，那么苏联就会占据优势。因此，美国政府官员打算扩大竞争的范围，把经济与技术都包括进去。于是，理查德·派普斯就想通过他的那支生花妙笔，把这些自然的概念纳入一项政策之中。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其他成员的修改与润色，这份篇幅只有几页纸的报告就变成了一份极有远见的文件，把里根与苏联打交道的策略变成了所要遵循的“法典”。

派普斯这位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在白宫老行政办公大楼里的那间狭小的普通办公室里花了好几个晚上，撰写和修改这份关键文件。他的努力成为第75号国家安全决策指示（NSDD-75）的基础，这也是里根当政期间有关美国对苏联的战略与目标的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总统指示，并且成为美国政府的最高机密之一。

“很清楚，NSDD-75与过去的政策完全不同，”派普斯说，“问题的要害不仅在于苏联的行为，而且在于苏联体制的本质。第一次对此进行阐述的就是这份文件。NSDD-75指出，我们的

目标就是再也不和苏联共存了，而是要改变苏联的体制。我们坚信，我们有能力通过从外部施加压力来改变苏联的体制。”于是，美国的战略目标就变为通过利用苏联的内部弱点来逐渐破坏它的体制。苏联帝国的政治韧带看起来并不结实，美国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势力“发起反击”，从而探察苏联体制的弱点。较早的 NSDD－32 强调美国有兴趣在东欧击退苏联的势力，而 NSDD－75 则更进一步。

这份新文件的内容很广泛，对于美国在许多战线上所执行的政策，该文件提出了执行这些政策的时效与明确目标。“我们最想在 NSDD－75 中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制定一项能够统筹各个领域所有活动的综合政策，”对这份文件表示赞同的约翰·波因德克斯特说，“依我看来，这是使美国政策发挥作用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这份文件清楚地阐述了美国的“工作原则”：

- “美国不接受目前苏联将其影响范围扩大到边境之外的做法，而且美国将设法击退苏联的这种行为。”
- “美国将不会为他人做嫁衣裳，从而使苏联的经济体制获得利益，并且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限制这种结果的出现”；文件还特别提到苏联通过能源出口而获得技术、信贷和硬通货收入。
- “美国将伺机压制苏联在国外的影响。”

这份关键性的文件重申了美国将设法利用苏联弱点的战略。罗伯特·麦克法兰说：“NSDD－75 并不是说我们将在各个方面与苏联进行对抗，而是说我们将寻找苏联的弱点，并且对这些弱点进行攻击。”

在苏联的所有弱点中，最主要的就是它的经济。与国防部指

示和 1982 年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遥相呼应，NSDD－75 宣布，美国从此之后的政策就是要加重苏联的经济问题，使其经济体制陷入危机之中。“我们确实感到以前忽视了经济领域，也就是说没有用这种经济武器使苏联受到伤害，”波因德克斯特说，“在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中，有许多人对经济领域缺乏信心。我记得有些高级官员认为，美国没有办法可以使苏联经济崩溃。从表面看来，我对此也不大相信，因为它太过武断和不讲究科学了。不过，总体上我认为我们对 NSDD 还是相信的，因为它是总统签署的，而且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通过减少苏联的收入并迫使它增加支出，从而对它的经济体制进行挤压。

“罗纳德·里根想使美国的军事建设(改正几年来忽视这项工作的倾向)、类似星球大战计划的未来国防相关技术以及针对莫斯科的经济安全政策这三者之间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比尔·克拉克回忆道，“坦率地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扭转苏联在资源方面的优势，因为未来美国在这方面的能力是苏联力所不及的，而且要使莫斯科相信，苏联在与美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技术竞争中是不可能取胜的。”过去，美国认为自己的技术优势可以用来抗衡苏联在战场上的数量优势，里根政府想使这种优势更上一层楼。通过加快技术竞赛速度，美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将变成一种强大的武器。

1982 年底，总统在议会失去了一次支持 MX 导弹①的关键投票，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 1981—1982 年间，五角大楼

① 又称“和平保卫者导弹”。这是一种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1971 年开始研制，1986 年开始服役。这种导弹带有 10—12 个分导热核弹头，制导十分精确，能在飞行途中接收导航卫星的信号，射程接近 11000 公里。为了避免遭受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为 MX 导弹设计了 3 种发射基地，但每种方法的费用都高得难以接受，因而在政治上难以行得通。直到 1983 年，美国才决定把这些导弹放在民兵Ⅲ导弹的发射井内。按计划本来需要部署 100 枚，但国会只批准在怀俄明州的沃伦空军基地部署 50 枚。——译者注

建议为这种新式洲际弹道导弹设计 3 种发射基地，但是，这 3 种计划均被国会拒绝了。麦克马兰说："我们的底线是，不能把任何导弹放在地上。"

在对 MX 导弹的表决失败后不久，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上将与麦克法兰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商讨。波因德克斯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海军军官学校[①]，具有一个敏锐的科学头脑。他建议美国政府探索对一种战略防御体系进行研究甚至部署的可能性。自从 1981 年初以来，白宫就一直在思考这个想法。当时一位被称为"高边疆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丹尼尔·格雷厄姆将军在会见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时就提出了这个想法。美国政府有关部门虽然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没有采取后续行动。

里根的好几位助手总是劝告总统，美国要进一步加强战略防御。长期担任总统外交政策顾问的理查德·阿伦，几年来不断地把有关反弹道导弹的争论情况向里根通报。国内事务专家马丁·安德森在与总统候选人里根一起访问（美国—加拿大）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NORAD）时，生动地向大家展示了美国相对于苏联核导弹的弱点。卡斯帕·温伯格反复强调他在刚刚担任国防部长时的诺言，即美国要建立一个高技术战略防御体系。1981 年 10 月 2 日，在白宫举行的战略武器新闻发布会上，温伯格强调"目前出现了一些看起来极有前途的新进展，我们将对此进行研究。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很明显，如果我们有能力摧毁来袭导弹，我认为这不会打破现有的战略平衡。我认为此举将会使我们感到极其欣慰。"

麦克法兰告诉波因德克斯特，他喜欢这个主意，而且事实上他已经顺着相似的方向思考了很多。"我似乎已经思考了 10 年，自从尼克松和福特执政以来，我们就以错误的方式与俄国人进行军

① 成立于 1845 年，校址在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译者注

事竞赛,"麦克法兰回忆道,"我们的相对优势在于武器质量与技术方面。这就促使我对过去进行一番审视。我扪心自问,我们应该如何对我们的投资战略进行重新定位呢?我们应该如何使用我们的资源呢?我认为,我们与其把资源用在进攻性武器系统和增加武器数量方面,还不如把它们用在我们的相对优势——技术方面更为有效。因此,我开始考虑我们可以在哪些领域进行投资,而且我们需要一项在高技术方面的投资战略,而且能够取得成效。"

波因德克斯特把美国军事科学界最具有战略头脑的人士召集起来,探讨美国军事资源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一味强调核武器转到重视战略武器的高技术体系。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鲍勃·伦哈特、理查德·博韦瑞将军、预算管理办公室的阿尔·基尔、TRW公司[①]的约翰·福斯特、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的理查德·德劳尔以及里根总统的科学顾问乔治·基沃思博士。"我们在白宫情报室会面并进行讨论,"波因德克斯特回忆道,"这次会议的结论就是,自从反弹道导弹问世以来,此项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应该对战略防御进行大量的研究。"波因德克斯特把该小组的大体结论向麦克法兰做了汇报,并且转交给他几份有关科学研究和政策方面的论文。

在此期间,麦克法兰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JSC)的保罗·戈尔曼讨论了战略防御问题。戈尔曼告诉他,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战略防御这个概念很感兴趣,其中主要起作用的是詹姆斯·沃特金斯海军上将。沃特金斯曾经是一名条理分明的理科学生,他认为现在的技术水平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改进,因而美国的战略政策应该由相互确保摧毁(MAD)转变到战略防御。

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磋商之后,波因德克斯特和麦克法

① 美国的一家制造各种先进设备与系统的大公司。总部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译者注

兰将情况向比尔·克拉克做了汇报，克拉克想立即采取行动。1982年12月，他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与里根总统举行秘密会晤。这是总统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每月正常会晤的一部分。

那天的暴风雪特别大。克拉克不在城里，由麦克法兰主持了这次会议。由于路况相当不好，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乘坐履带车来到白宫。麦克法兰首先提出了会议所要讨论的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美国要考虑放弃对于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完全依赖，而是要转而研究与开发一种战略防御倡议（SDI）系统。总统对这个主意立即就喜欢上了。根据大多数顾问们的意见，他决定这么干，此举表现出极大的道德信念。“他认为，相互确保摧毁简直是一种相当不道德的行为，”乔治·舒尔茨回忆道。里根询问这些高级军官：“如果我们开始从完全依靠进攻而阻止一次核攻击的战略转向更多地依靠防御的战略，那么情况又当如何呢？”

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次会晤之后不久，克拉克与麦克法兰和波因德克斯特共同商讨，该如何推进这项工作。麦克法兰建议，总统可以在一次演讲中公开主张，美国的战略思想将发生转变。

美国研究战略防御系统的计划是非常秘密的。总统直到要发表演讲之前的两天，才与舒尔茨、温伯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进行磋商。麦克法兰兴致盎然地苦心推敲一份有关战略导弹防御的声明。他使用自己的（而不是秘书的）打字机，以严格保密。乔治·基沃思进行最后的审核工作。

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向全国发表演说。他情绪激动地告诉全国观众，他有责任制订一项新的战略指导方针。美国将开始对“战略防御倡议”（这个术语是由波因德克斯特提出的）进行研究。里根最后指出：“我所要说的是，我将全力推动这项工作。”两天之后，总统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威廉·克拉克

要“认真负责”地制订一项有关该系统的长期研发计划。总统之所以对战略防御倡议感兴趣，主要是他认为世界将不再面临核危险了，而且通过对这个系统的研发，还可以对苏联经济造成更大的压力。例如，在一份国家安全决策指示中，按照“成本效益标准”对这个系统的价值进行了部分评估，认为其价值“要用经济术语来表达，但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这就意味着，该系统的价值不仅要从战略角度来衡量，而且还要从苏联为了对付这个系统而遭受多么严厉的经济惩罚的角度来衡量。

里根的声明在莫斯科激起了强大的冲击波。“我记得那几天的天气相当好，”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回忆道，“在里根当政的最初几年中，莫斯科的气氛相当紧张，特别是因为美国宣布要发展 SDI 系统，使我们感到非常吃惊。”前中央情报局政治心理学处的阿伦·惠特克说：“SDI 把他们吓得要死。他们对自己的研究与开发能力感到极度不安（客观地说就是这样）。他们对我们的技术竞争能力抱着非常严肃的态度。”

对于麦克法兰来说，这不是战略防御的问题，而是一场资源之战。“它确实关系到我们应该如何重新确定我们的投资战略，”他回忆道，“我将它称为一个经济术语而不是一项军事战略，这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资源概念。我是把自己放在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如果美国真的开始对他们已经取得良好进展的领域进行投资，那么他们该如何做出反应呢？当我们向实验室和公司投资 260 亿美元（用于 SDI）时，他们肯定会做出某种反应。”

里根为什么如此强烈地支持 SDI，引起了人们的广泛猜测。他是不是要改变美国的核战略？或者他把由麦克法兰所制订的这个系统看作是一个资源问题？里根的长期同事和前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阿伦说：“我认为里根并不是把 SDI 看作是一个能够保护美国的屏障，因为这个系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我认为他的想

法是，这一举措最具刺激性，因为如果苏联人看到我们把大把大把的美元花在这个上面，那么他们必定会上当受骗。”里根政府的大多数高级官员认为，里根之所以要坚定不移地实施SDI，是因为受到了下述两种希望的激励，一种是要改变美国的核战争学说，另一种是要改变军事技术竞争的条件。

苏联领导人把里根的SDI演讲看作是一种技术挑战。正如《消息报》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想把一场甚至更具毁灭性的军备竞赛强加到我们的头上。他们以为苏联将不会对这场竞赛奉陪到底，因为苏联缺乏资源，也缺乏技术潜力。他们的图谋就是要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拖垮。”

莫斯科对美国大规模的国防建设感到极度恐惧。苏军总参谋部命令国防部制订一项开发新武器系统的五年计划，以代替苏联“过时”的武器系统，而且到了歇斯底里的边缘了。对于莫斯科来说，80年代初期在军事方面是一个“革命的时期”。苏军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元帅于1982年写道：“最近几年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在最近的将来根据新的物理学原理制造出人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更具毁灭性的武器，真正创造了先决条件。”

苏联高级军官认为，技术上的突飞猛进在过去曾经引起两次军事“革命”。第一次革命发生在20年代，当时坦克和飞机取代了骑兵和战马。第二次革命发生在50年代，核武器与弹道导弹的结合取代了轰炸机和常规炸弹。在这两次革命中，军事武器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而且莫斯科都相当紧密地跟上了西方的发展步伐。

现在，第三次军事革命正在到来，可是此次莫斯科却感到焦虑不安。诸如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新兴技术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将对苏联造成更大的挑战，因为它能够提高武器制造的质量，而这恰恰不是苏联的优势所在。由于这种武器很复杂（例如精确制导弹药），因此只要很轻微的制造缺陷就会使这种武器没

有用处。米格—25战斗机的电子设备中只有电子管而没有晶体管。根据国防部的评估，莫斯科在计算机技术方面要落后美国10年，而且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的许多重要领域都是跟在美国的屁股后面，这些领域包括电光传感技术、机器人和智能技术、信号处理技术、隐形技术和电讯技术。

在不久的将来，苏联在这些新系统方面的发展前景看起来不是太好。莫斯科在自己的战略防御系统方面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努力，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耗费了数千名科学家的心血。但是，他们面临着少有的技术与后勤供应问题。苏联的体制并不强调科技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这是高技术经济中的一个致命因素。他们面临着这么大的麻烦，以至于军队实际上放弃了开发新武器系统的任何希望。更有甚者，他们试图把一些现成的技术应用到他们的武器系统中。

从美国这方面来看，事态的发展完全不同。美国突然决定要开发和部署高技术武器系统，这就对苏联所具有的费用昂贵的过时武器系统构成了威胁。为了在军事上取得与西方的均势，克里姆林宫已经花费了巨大的资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在军事上所形成的战略均势，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尤里·安德罗波夫说，“我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努力，才取得了这种均势。”但是，现在这种均势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

1982年，奥加尔科夫元帅在他所著的《永远警惕祖国的国防安危》一书中，表达了对美国“快速”开发军事技术的担忧。他警告说：“面对这种环境，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改变观念，在新武器系统方面的开发与部署停滞不前的话，那么我们将面临着严重的后果。”在K.U.卡尔达舍夫斯基将军的领导下，苏联秘密进行武器试验，并以此作为对上述警告的反应。军方人士想评估一下美国对苏联造成的军事挑战的严重性到底有多大。为了对抗

美国正在部署的或者不久即将部署的新一代高技术武器，苏联的军事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对他们自己的武器库中的每一件武器进行测试。最后的测试结果震惊了苏联当局。

卡尔达舍夫斯基断定，新技术对苏联武装力量的常规支柱——坦克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果美国大量部署所开发的反坦克武器系统，那就会形成一堵不可穿越的防护墙。苏联将以提高自己的坦克的质量作为回应，但是这种竞赛的代价将是非常昂贵的。一位分析家悲叹道："西方宁愿花钱改进反坦克武器，这就使我们有必要经常把我们的坦克部队现代化，其结果就是迫使我们消耗巨大的经济资源。"简而言之，坦克有可能步恐龙灭绝的后尘。

随着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两个超级大国的高技术产业基础将成为军事力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苏联领导人所忧虑的事情就是美国强调高技术的重要性，"叶夫根尼·诺维科夫回忆道，"苏联领导人知道他们对美国的行动奉陪不起，因为我们的技术基础薄弱。他们知道在很多领域中，新技术将使原来的武器系统过时。"

里根政府开发高技术武器的计划，就是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挑战。苏联确定了新的谍报目标，就是对这种挑战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克格勃的海外情报人员接到指令，要他们"优先"收集有关"第三代"军事技术的情报。克格勃的文件"为海外情报机关列出了一个搞清楚美国优先军事战略问题的清单，"这个清单包括"重要发明和发现的利用情况，有关军事技术的构思与设想，因为这些将确保美国个别类型的战略及战术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通过升级改造而真正达到一个新的质量水平。"

美国政府在强化高技术军备竞赛的同时，也试图限制西方向莫斯科出口那些能够帮助其提高竞争力的技术。苏联严重依赖西方向东方的技术转让，这是它的一个严重弱点，里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打算利用这一点。美国政府在秘密的 NSDD - 66 文件中把技术出口概括为"三位一体的贸易战略"的一个部分。自

从本届政府组成之初，比尔·凯西就努力争取中央情报局在阻止向苏联转让技术方面具有更多的权力。1983 年，当秘密的“技术转让情报委员会”以兰利为基地而成立时，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这个委员会的唯一职责就是对苏联集团获取技术的行动进行跟踪，它是联邦政府 22 个部门在人力和其它资源方面的一个情报交流中心。这是美国首次按照系统的步骤收集与传播情报。该委员会所收集到的数据，对于凯西来说真是一座金矿。根据这些数据，他就能够跟踪苏联试图获得哪些技术，这使他能够了解苏联的经济需求。他告诉赫布·迈耶：“现在，我可以摸准他们的脉搏了。”

从美国流失出去的高技术显著减少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防部和国务院（在某种程度上）努力对技术出口所实施的新的限制。1975 年，在美国出售给苏联的全部产成品中，高技术产品占了 32.7%，销售总额达 2.19 亿美元。到了 1983 年，高技术产品的出售量下降到 5.4%，销售总额只是微不足道的 3900 万美元。

在美国政府官员对这些结果津津乐道的时候，他们也清楚，美国单方面进行限制的效果很有限。只有与重要的盟国进行合作，这种技术限制才能收到成效。在本届政府刚刚组成的时候，国防部副部长理查德·珀尔就对盟国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希望得到他们的合作。虽然双边会谈的进展缓慢，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

在这次秘密穿梭外交活动的两年之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就开始实施一项联合战略。1982 年，盟国在拉萨皮尼耶尔举行的会议上就技术转让问题达成了一项暂时性的共识。在过去几年中，巴黎统筹委员会各成员国在有关向苏联集团出口的问题上，已经在美国所建议的一百多个项目上采取了行动。但是，现在美国却打算显著地扩大技术出口控制清单，不再单独向西方有关明显用

于军事目的的货物出口控制政策靠拢了，而是想要对任何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品和技术出口进行控制，甚至对于那些不能准确地确定其应用范围的民用技术也要进行出口控制。美国还想使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控制权同样适用于向第三国的出口，因为苏联特别喜欢以这种交易方式获取敏感技术。

这种更好的控制方式开始取得显著成效。到了1983年秋天，美国海关调查人员在欧洲同行的协助下，没收了大约1400批非法出口货物，价值相当于2亿美元，其中许多是有助于维持苏联工业部门的关键技术。

美国政府在限制苏联向西方出口能源方面也取得了进展。1983年春天，美国官员将一项协议强加给国际能源机构（IEA），这项协议实际上就是限制欧洲进口苏联的天然气，从而阻止西欧从苏联进口超过其能源需求量30%的能源，因此西欧将不得不转而寻找替代能源。这项协议于1983年5月在威廉斯堡[①]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正式签署，它把通向克里姆林宫的潜在的巨额资金流切断了，因而是一种阻止苏联获取硬通货的策略。

美国在国际能源机构的活动结束之后，对苏联的石油出口继续予以关注。石油出口是克里姆林宫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苏联硬通货收入的一半以上。1983年初，美国财政部对于国际石油定价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秘密研究。财政部经常发布有关此类主题的报告，但是这次研究引起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极大兴趣。比尔·凯西和卡斯帕·温伯格也对此进行了评论。这次研究报告的撰写花了6个月时间，篇幅达数百页，它是一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数据汇编。对于美国和苏联的经济状况来说，世界石油价格都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对于每一个超级大国来说，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

① 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南部城市。——译者注

报告认为，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说，最适宜的石油价格大约是每桶20美元，比1983年每桶34美元的价格要低很多。那时美国一年要花费1830亿美元购买55亿桶石油，其中进口量达16亿桶。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跌至每桶20美元，将使美国的经济成本每年下降715亿美元，它意味着现有国民生产总值的1%将转化为美国消费者的收入。“较低的石油价格从本质上来说就像是一种减税行为，”温伯格回忆道。报告断定，如果石油价格降到每桶20美元的水平，“那么国家总体经济状况将会明显好转……石油价格减少的初期效果就是将外国石油生产商的收益实实在在地转到美国的石油消费者手中。这将使美国的收益和购买力明显增加。……较低的石油价格意味着石油收益转向美国这个对世界资源拥有较大支配权的国家手中。”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经济生活中没有几个行业会成为输家，对它们所造成的影响也将是最小的。“美国产业部门中仅有的输家就是采矿业，因为石油和天然气的钻探活动减少了。除此以外，其他行业都将从石油价格的下降中得到好处。”

石油价格的下降要么是由于需求减少（这种情况非常不大可能出现），要么是由于产量明显增加。关于后者，报告指出，如果沙特阿拉伯以及“拥有可采石油储量的其他国家增加它们的产量并因而使世界石油产量……每天大约增加270万—540万桶时，那么世界石油价格将下降大约40%，这对于美国经济的总体影响将是十分有利的。”

石油价格的下降虽然对美国的影响“明显有好处”，但是它对苏联的经济将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报告指出，莫斯科在获取硬通货方面严重依赖于能源出口。根据财政部的计算，石油价格每桶增加1美元，就意味着克里姆林宫获得大约5亿—10亿美元的额外硬通货。反之亦然，石油价格的下降意味着收入的减少。另外，与其他石油生产商所不同的是，莫斯科将不能通过增

加产量来增加收入，因为苏联的石油生产能力早已达到极限了。

与财政部的大部分报告一样，这份内容广泛的报告是秘密的。但是，比尔·克拉克、凯西和温伯格确信总统已经收到了这份报告的摘要。努力争取较低的石油价格是非常诱人的。“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回忆道，“我们努力争取上述两种结果。”但是这个信息对总统没有产生影响。“罗纳德·里根完全明白，能源出口是莫斯科每年获取硬通货收入的核心来源，”比尔·克拉克回忆道，“他同样理解美国经济从较低的、稳定的石油价格中所获得的好处。”

世界石油市场上的石油价格似乎正在下跌。仅仅在这份报告发布的几个月之前，4 位美国石油大亨与沙特石油部长谢赫·艾哈迈德·扎基·阿勒·亚曼尼在日内瓦进行了会晤。亚曼尼召集这 4 位石油大亨（他们是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乔治·凯勒、埃克森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小克利夫顿·加文、莫尔比石油公司总裁威廉·塔沃拉里亚斯和德士古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约翰·麦金利）就世界石油市场的行情，在私下进行非正式会谈。在这位石油部长租用的洲际饭店雅致的套房里，他们一边共进午餐，一边欣赏窗户外面的湖光山色。房间里到处都是电话机，他的办公室里的好几个屏幕不断地向他提出警告，要他改变合同以及目前正在全世界出售的原油价格。

亚曼尼是国际石油市场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欧佩克（OPEC）规则的一位强制执行人。他的职责就是确保对石油产量进行严格控制，保持石油价格的稳定并且相对提高石油收入。为此，沙特阿拉伯充当了机动产油国的角色，调节自己的石油产量以保持石油价格的稳定（要么降低产量以抬高石油价格，要么减少产量以降低原油成本）。亚曼尼没有以王室成员的这把保护伞来保持自己的职位，他是一位商人，完全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爬上社会的最高层，而这种地位正是他们的家族历史所高度重视

的。如果他没有完成使命，那么他就要立刻让位。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过去常常是由亚曼尼来确定与美国石油大亨们达成任何协议的基调与条款，但是这一次是由美国人毫不客气地主导会谈的基调，因为70年代的石油短缺已经让位于80年代的石油过剩了。沙特轻质原油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美国公司因此而赔了大把的钱。“我们可以承受每桶30美元的石油价格，”凯勒告诉亚曼尼，“我们也可以承受每桶34美元的石油价格。但是，我们不能为本来是30美元一桶的石油支付34美元。”会谈不欢而散，美国人的希望落空了。

美国政府官员从这次石油界的朋友聚会中得到了启发，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家们与出席这次会谈的一位石油大亨举行了会谈。

尽管较低的石油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产生了影响，但是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因素能够轻而易举地把石油价格抬高，因为莫斯科喜欢搞一些名堂，这是毫无疑问的。两伊战争使石油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动荡不安，诸如伊朗和利比亚这类激进国家正在试图迫使欧佩克提高石油价格。考虑到这种前景，美国派遣政府官员向有关国家做工作，以保持石油市场的平稳。1983年2月初，美国政府派遣能源部的两位官员赴伦敦会见英国能源大臣奈杰尔·劳森。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力劝劳森降低原油的官方价格和增加北海油田的石油产量。“我们磨破了嘴皮，才说服英国增加石油产量，降低石油价格，”温伯格回忆道，“苏联人很快就会通过管道向西欧输送天然气了。如果石油价格保持在高水平，那么欧洲将改用天然气。这将使苏联人得到好处。”比尔·施奈德同样记得这件事情，“我们把英国人看作是降低石油价格的催化剂。北海油田具有把石油价格显著压低的生产能力。”

凡是能够压低石油价格的办法，美国都采用了，其中一种轻

松的办法就是停止购买用于战略石油储备（SPR）的原油。SPR是1973—1974年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的产物，旨在再次出现石油危机时能够提供石油储备。数百万桶的石油开始贮存在路易斯安娜州和得克萨斯州沿海的地下盐洞中。美国国会规定，到1990年要储备7.5亿桶石油。但是，1983年初，美国政府宣布要大幅度削减石油购买量。美国国会原来要求每天要购买22万桶石油，但是美国政府的预算只能购买14.5万桶。比尔·施奈德在成为副国务卿之前，负责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用于石油储备的预算，他说美国政府减少石油购买量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平衡预算，而且也是为了减少石油需求量，同时也是希望使石油价格能够有所下降。

2月底，沙特阿拉伯的班达尔王子会见了好几位美国高级官员，包括比尔·凯西和卡斯帕·温伯格。班达尔想与椭圆形办公室建立一个独立的联系渠道，他对几位官员说，美国国务院和国务卿舒尔茨过于亲以色列了。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政府新近建立的这种特殊关系，可以保证与右翼人士易于进行磋商。“沙特阿拉伯人总是把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看作是最佳的联系渠道，”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地区高级官员回忆道，“而国务院则被认为不起作用。”

沙特阿拉伯人格外关注有关他们的利益被中东现有局势损害的传闻。黎巴嫩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两伊战争正以血腥的报复方式进行着，使该地区处于达摩克利斯剑[①]的威胁之下；叙利亚和以色列正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霍梅尼主义的威胁正笼罩着整个中东地区。

---

① 达摩克利斯，叙拉古僭主大狄奥尼西奥斯的廷臣。据说此人善于歌功颂德，当他盛赞僭主洪福齐天时，狄奥尼西奥斯安排了盛宴，邀他入座，而在他的头顶上用细线悬挂了一把出鞘的宝剑，以此表示大权在握的人往往朝不保夕，正如达摩克利斯当时的危险处境一样。——译者注

在波兰，地下战争继续进行。虽然波兰政府于 1982 年 12 月 30 日正式结束了对政治犯的拘留，但当局仍然对团结工会积极分子进行监禁。最新的逮捕浪潮是直接针对地下出版社的，目标是破坏团结工会的残余力量，并且防止释放出来的被拘留者复活工会组织。在元旦那天，警察查封了波兹南市[①]附近的一家地下印刷厂，逮捕了 15 名团结工会积极分子。官方在行动过程中嗅到了一点有关外国货币的蛛丝马迹，因为团结工会积极分子缺乏食品供应，只好从西方进口，这就需要一些硬通货。

印刷品的分发变得更加困难了。在格但斯克印刷和分发传单的两个地下组织遭到了重创，华沙的两个印刷中心以及莱什诺市[②]的另外一个印刷中心也于 1983 年初暴露了。但是，随着斯坦尼斯瓦夫·扎布沃茨基（什切青[③]造船厂的罢工委员会负责人）的被捕，或许会爆发最大规模的突然行动。地下团结工会已经失去了另外一位领导人了。每当团结工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被捕时，就会使华盛顿那些了解秘密供应线的人们更为忧虑不安。到底是地下团结工会的哪些人了解来自美国的支持呢？有人会乐于谈论这些事情吗？存在可供波兰当局进行起诉的任何类型的证据吗？在最近几个月内，团结工会的 7 位领导人和国防工人行动委员会中的 5 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先后被捕，波兰当局决定用他们来杀一儆百。当局指控团结工会积极分子要颠覆国家，这就意味着他们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但是，地下团结工会尽管受到了挫折，反而比以前更加有组织了。华沙地区年仅 27 岁的团结工会领导人兹比格涅夫·布亚

---

① 波兰中西部省级市，波兹南省省会，波兰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译者注

② 波兰中西部莱什诺省省会，波兰铁路枢纽、农业和制造业中心。——译者注

③ 波兰西北端港口城市，什切青省省会。主要行业是造船和航运，也是波兰西部的文化中心。——译者注

克，现在负责地下团结工会的资金筹措，并且把外国资助的物品分发到各个团体。他在大华沙地区积聚可供利用的各种资源，同时也与其他地区的团结工会领导人保持联系，以协调反对派的总体战略。维克托·库列夫斯基负责与教师、医生、律师以及出版正规地下报刊的知识分子等组织进行联络。他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能手，帮助编辑获得用于印刷出版物的纸张和购买油墨的资金。在那段日子里，库列夫斯基每天小心翼翼地工作18个小时。

地下团结工会还建立了一个负责行政事务的机构，为地下团结工会成员安排住处、车辆和伪造证件。这个机构由埃瓦·库利克和康拉德·比林斯基负责。库利克当时正打算完成有关威廉·福克纳[①]的博士论文，比林斯基是一位数学家。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反对派已经建立起一个安全而又信息灵通的机构，并且婉转地将其称为“卫生与安全机构”。这个机构由安全与情报方面的专家（有些人在西方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训练）组成，主要任务就是检查有关渗透者以及波兰秘密警察的渗透情况的报告。正是这个机构才使得中央情报局将秘密通讯工具偷运进来，并且对住所进行检查，以确信这些工具处于适当的隐匿处。它是地下团结工会的指挥、控制与通讯机构。

由于中央情报局在波兰的秘密行动计划进展迅速，因此比尔·凯西于1983年要求对整个计划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这次行动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央情报局驻法兰克福办事处的控制下，在华沙情报站的协调配合下按部就班地进行的。但是，这个过程很麻烦，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是一次重大的“黑箱操作”，即向反对派提供资金，每年向地下团结工会偷偷提供数百万美元。但是，仅

---

① 美国小说家（1897—1962）。美国“南方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多以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反映美国南方社会的历史状况，代表作有《喧嚣与骚动》、《村子》等，获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有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如果要想使第 32 号国家安全决策指示（NSDD－32）完全得到贯彻执行的话，情况就更是如此。总统要求提高对团结工会的支持力度，于是凯西就建立了一条向团结工会运送稀缺物资的秘密供应线。这与在阿富汗所开展的供应行动相似，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向波兰运送货物不存在生命危险。除了从春天就开始提供的高技术通讯工具之外，美国政府还想使地下团结工会完全配备上传真机、计算机、先进的印刷设备以及其他更多的设备，因此向劳联—产联提供了一些物资。劳联—产联干得相当漂亮，将这些物资秘密地送交地下团结工会。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定期与劳联—产联官员会面，要求欧文·布朗稍微提供一点帮助，使工会组织在波兰建立起来。

在向波兰境外偷偷转移团结工会积极分子以及向波兰境内运送通讯工具方面，瑞典是一个有效的中转站，因为它与波兰离得不远，而且与波兰有许多商业关系。或许更重要的是，瑞典是一个正式的中立国，因此得到波兰当局更多的信任。

凯西指示中央情报局斯德哥尔摩情报站进行初步安排，以便他在 10 月份的访问期间与瑞典官员会面。“他计划说服瑞典人赞同并协助美国支持团结工会的努力，”一位助手回忆道，“没有一个人认为他能够获得成功。”

向波兰运送物资的途径被设想得很简单。设备与供应品将利用中央情报局的资金来购买，并且在布鲁塞尔完成，因为团结工会最大的、也是最有效的办事处之一就设在这里。战略物资将被运送到布鲁塞尔，并且贮存在好几个仓库。团结工会积极分子在这些仓库中对这些物资进行重新包装，然后运送到斯德哥尔摩。运送这些物资的集装箱一旦到达瑞典的领土上，就对它们用板条箱重新进行包装，板条箱上的标记为“拖拉机零件”、“机床”和“渔具制品”，然后装船运到波兰的港口。在这个共谋的处方中，唯一缺少的成分便是瑞典人的合作。

第十一章

里根在执政初期，将施政重点放在改变人们对于冷战的心理状态上。对莫斯科采取防御措施，将提供一个能够改变目前竞争方向的机遇。由卡斯帕·温伯格改编的这场大规模防御建设的交响乐，是一场直指莫斯科脆弱的心脏地带的技术挑战，莫斯科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从总体上看来，莫斯科认为美苏之间的军事平衡看起来正在向美国一方倾斜，同时也意识到了‘力量相关性’的聚积，”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一位处长谢尔盖·费多伦科回忆道。

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想简单地阻止苏联的军事优势。总统想对苏联的地缘政治利益进行打击，这将在整个苏联帝国的范围之内激起潜在的反响，其中一个可能的场所就是阿富汗。

1983 年 3 月底，比尔·凯西返回巴基斯坦。据估计，苏联在战争中的伤亡人数为 12000—15000 人。春天即将来临，这意味着在阿富汗会发生两件事情：一件是播种季节来临了，另一件是苏联支持的武装力量对游击队进行较大规模的清剿。当积雪融化、天气好转的时候，阿富汗政府军和苏联军队将对穆斯林游击队再次展开行动。

但是，1983 年支持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的秘密行动，尽管包括方方面面的成分，但它还是令人惊讶地被看作是一种有效的行动。从 1981 年初开始，凯西就命令中央情报局行动处寻找和招募生活在海外的阿富汗人，帮助开辟向起义者运送武器的通道。到了 1982 年春天，一百多名阿富汗人在国际武器运送方面

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训练。不久，这些人就在中央情报局官员的指导下，配合有关人员购买武器，并且安排向穆斯林游击队运送这些武器的事宜。

中央情报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阿富汗计划尽可能平稳地进行，特别是在走地缘政治钢丝的巴基斯坦总统齐亚的身上做了许多工作。齐亚勇敢地允许华盛顿把巴基斯坦作为阿富汗抵抗组织的后勤供应基地。莫斯科当然知道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是如何获得供应的，因此对齐亚提出指责。凯西吩咐他的手下："要把他牢牢地控制住。"为此，中央情报局安排6名官员负责整个行动。送到游击队手中的步枪、弹药和火箭装在板条箱里，箱子上面贴着"电视机"和"设备"的标签。一大群巴基斯坦情报机构的官员使用没有标记的卡车，将这些设备运送到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的集结地区。美国希望这种办法能够成为齐亚对这种行动予以否认的一个借口。

1983年，莫斯科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巴基斯坦。"克里姆林宫和苏军总参谋部知道，如果没有巴基斯坦的支持，阿富汗的抵抗组织便会毁灭，"穆罕默德·优素福回忆道。苏联人故意将数百万阿富汗难民驱赶到巴基斯坦，以破坏这个国家的稳定。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颠覆行动，难民中包括数千名阿富汗秘密警察(KHAD)的人员。炸弹在全国各个地方的集市上爆炸，飞机越过边界打击穆斯林游击队的基地和设施，数千种苏联武器分发到那些怨恨齐亚的群体和部落中。齐亚上次在莫斯科的时候，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安德烈·葛罗米柯未能说服他。或许一次更加咄咄逼人的行动将发送一种恰当的信号。

凯西在巴基斯坦最重要的活动就是会见齐亚。当他进入总统府时，齐亚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齐亚请凯西坐在一把镀金的椅子上，这把椅子上面蚀刻的历史性记号来自于巴基斯坦的各个省。齐亚的一名副官拿出两只玻璃杯，为他们各自酌上一杯热乎

乎的甜酒，齐亚请客人尝尝这种酒。宾主开始进行短暂的寒暄，按照惯例，谈话全部在他们两人之间进行。一位是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一位是虔诚的穆斯林将军，两人结成了一种同志式的关系，对所面临的共同威胁进行深入讨论。但是，他们对闲聊既没有耐心，也没有兴趣。

凯西带给齐亚一叠卫星照片，上面显示了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的部署情况以及齐亚的主要敌人——印度的军队部署情况。齐亚一直渴望得到此类照片。这次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他们谈到了阿富汗、印度和中国。

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卡斯帕·温伯格和比尔·凯西对苏联入侵巴基斯坦的可能性越来越关注。虽然没有情报表明苏联即将对巴基斯坦发动一次攻击，但是大家一致认为此类行动很符合苏联的行事方式。凯西要总统做出保证，美国完全支持齐亚。

然后，凯西提出一个“理论性的”军事问题。1983年初，他与总统和比尔·克拉克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讨论了阿富汗局势，然后话题就转到了莫斯科。中央情报局局长建议把战争引向苏联内部，里根很喜欢这个主意。“总统和比尔·凯西决心要让苏联为其在阿富汗所发动的充满兽性的战争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将战争引向苏联自己内部的可能性，”克拉克回忆道。

美国在此类冒险行动中取得巴基斯坦的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总统也鼓励凯西向齐亚提出这个问题。巴基斯坦总统推托了凯西的请求，他解释说这要按照具体情况而定。于是，他们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但以后将重新讨论它。

由于获得了美国的帮助，因此巴基斯坦情报机构有能力大量训练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员。这些人是勇敢的，但是如果认为他们是“天生的战士”，则是一种荒诞的说法。凯西在与齐亚会见之后，又与阿赫塔尔将军讨论了阿富汗战场的局势。两人认为，尽早开始训练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员的计划至为必要，因为这样

可以进一步提高游击队的战斗力。阿富汗抵抗组织需要学习战术，需要知道如何像一个军事单位那样行动，以及如何使他们的武器发挥最佳作用。

由于缺乏资金，因此每月只能有几百个穆斯林游击队员接受训练。阿赫塔尔想知道凯西是否为这个计划筹措了更多的资金。凯西把当时的情形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略情报办公室的经验进行比较，其中训练就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因素。缺乏训练的穆斯林游击队员简直是在白白地送死。凯西答应要筹措更多的资金，并且还将向他们派遣爆炸和电子器件方面的专家，以便在特殊行动中向巴基斯坦情报机构提供咨询。

中央情报局的使命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了，并且抵抗组织将更多地利用高科技的爆炸和灵敏电子设备。尽管穆斯林游击队员所拥有的武器仅仅是宗教信仰和一支 AK－47 步枪，但是这场战争即将成为一场高科技战争。

为了弥补训练有素的穆斯林游击队员的不足，阿赫塔尔和凯西发起了一场敏感而秘密的行动，就是利用由中央情报局直接训练的巴基斯坦专家打击阿富汗纵深地区的目标，尤其是那些苏联人能够获得经济或军事利益的目标。阿赫塔尔把巴基斯坦情报机构的志愿者队伍合并起来，这些志愿者在秘密行动中经受了高强度的训练，因此完全值得信赖。这些小组可以执行危险的任务，例如炸毁燃料库、桥梁、公路和弹药库。凯西答应让中央情报局的爆破专家向参加行动的人员讲授如何使用化学和电子定时装置以及特殊的控制开关。

阿赫塔尔和凯西也一致认为，如果要想获得成功，那么阿富汗抵抗运动中的各种派别和部落应该更加紧密地团结战斗，这样才能产生更大的优势，使抵抗运动的效率更高，战略战术也将更为有效。但是，阿赫塔尔指出，各种派别之间很难进行合作。许多领导人互相讨厌，他们总是争权夺利，而且意识形态也不尽相

同。他们当中有些人属于温和的宗教派别，并且是亲西方的，而另外一些人则是原教旨主义者，并且是反美的。

凯西想要战争不断升级，因而赌注也在逐渐提高。他告诉东道主，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吃了亏，而这次一定要抓住机遇向苏联人进行报复，因此他认为这件事做得对，应该对占领者造成最大的人员伤亡，使其付出极大的代价。“苏联人在越南战争中向越共提供军火，使他们用这些东西与美国作战，并且在战斗中杀死美国人，”优素福说，“因此美国现在要对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做同样的事情，从而让他们去杀死苏联人。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普遍持这种观点，特别是威廉·凯西。”

苏联的伤亡人数还没有达到里根政府所希望的数量。里根对他的助手和同事们说，克里姆林宫能够承受这些损失，这是由苏联体制的封闭本性所决定的。他想要苏联的伤亡人数上升，使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意志进一步消沉。直到最近，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一直缺乏远程武器，因此只能在相对较近的距离内对苏联人予以杀伤。现在，中央情报局正在向游击队交付大炮和火箭，而且数量相当大，因此战争形态将发生变化。有一些情报表明，苏联人为了维持喀布尔政权，正在试图通过引进华沙条约组织和古巴军队来“分摊人力负担”。1982 年 10 月叛逃的阿富汗官员说，他们在战场上看到了身穿阿富汗政府军制服的古巴人和保加利亚人。游击队声称，一个保加利亚人的军事基地已经在马扎里沙里夫南部建立起来了，为燃料供应线提供保护。如果情况属实的话，那么这些报告就意味着克里姆林宫对在战争中所付出的人员代价感到不安了。

在喀布尔，事态也在不断地扩大。抵抗组织开始对苏联的军事目标进行一系列的炸弹攻击，这些行动对苏军指挥官和政府官员起到了麻木其意志的心理效果。以前的战争主要局限于乡村，而现在则引到了城市。就在最近，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在光天化

日之下从喀布尔的大街上绑架了一名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苏联总理尼古拉·图哈诺夫的一位私人朋友 E. R. 奥克里姆尤克是苏联驻喀布尔大使馆的一名顾问，他在去哈贾鲁瓦什的路上遭遇了一场飞来的横祸，轻易成为绑架的目标。他的私人司机是一名塔吉克斯坦人，此人把防弹车停在预先策划好的地点。奥克里姆尤克因遭受击打而失去了知觉，他的车子通过军事检查站开到了乡下。

对于凯西来说，在不断升级的战争中针对苏联领导人的行动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只要苏联的精英人物不会遭到攻击和威胁，他们就会继续支持这场阿富汗战争。但是，当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的儿子们开始装在棺材里运回国内时，事情就会发生变化。凯西告诉阿赫塔尔，将目标对准这些人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那年春天，凯西在出访的途中停留于风景如画的西班牙海滨。此次凯西要去拜访他的好朋友、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他是前不久接替去世的哈立德国王而从王储升为国王的。法赫德刚刚在西班牙海滨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别墅。他们在地中海碧蓝的海水边会面的那天已经是深夜了，满天星斗，微风拂面，使人感觉神清气爽。

动荡不安的石油市场是法赫德所要考虑的最主要的问题。在几周之前，全世界的石油部长们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的问题。一场石油价格的崩溃看来即将发生。在海德公园的洲际饭店里，部长们度过了紧张而又沮丧的 12 天。英国国家石油公司把北海油田的石油价格降低了 3 美元，每桶的价格为 30 美元，由此便导致石油市场陷入了一场危机。有人形容，英国此举可能触发一场石油价格战。最后，欧佩克做出了让步，将石油价格降低 15%，每桶由 34 美元降到 29 美元。这是欧佩

克首次降低石油价格。

当他们二人在法赫德的别墅里谈话时，保安人员在周围地区游动。由于出口石油的收入降低，因此沙特阿拉伯人正面临着一种经济上的危险境地。他们为了保持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而削减产量，这就在国际石油市场上遭受挤压。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的周边国家由于地缘政治的利益而日益增加了对该国的敌意。在海湾发生了对石油供应线的攻击事件，虽然沙特阿拉伯的油船没有遭到攻击，但是德黑兰正在对沙特构成潜在的威胁。

苏联人在该地区正在逐步加强外交努力。1984 年 3 月初，盖达尔·阿利耶夫对叙利亚进行了一次预先安排的访问，这次访问本身就有重要意义。自安德烈·葛罗米柯于 1974 年访问叙利亚以来，这是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第一次来到大马士革。阿利耶夫是一名阿塞拜疆人，具有运动员的高大身材，喜欢英国服装和意大利懒汉鞋。他是苏联领导集团中的中东问题专家，此次叙利亚之行旨在巩固苏联与该国的关系。他的访问也是给沙特阿拉伯施加压力。叙利亚人在海湾地区咄咄逼人地进行反对沙特王室的广播宣传，试图鼓动一场颠覆活动。法赫德对此次访问也十分关注，因为叙利亚在两伊战争中强烈支持伊朗。1982 年初，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①]切断了伊拉克通向地中海的石油管道。据传闻，叙利亚军队在伊朗同伊拉克军队作战。沙特王室不共戴天的敌人什叶派极端分子依靠伊朗的支持为生，并且在巴勒贝克

① 叙利亚政治家（1930—2000）。1963 年担任叙利亚空军司令。1966 年参加军事政变，担任国防部长。1970 年 11 月 13 日发动“纠正运动”，改组复兴社会党的地区领导和政府，自任总理。1971 年当选总统。阿萨德担任总统一职 30 年，长期致力于阿拉伯民族的复兴事业，是一位对中东局势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2000 年 6 月 10 日，素有“大马士革雄狮”之称的阿萨德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走完了自己 70 年的人生旅途。——译者注

和贝卡[1]受到叙利亚的保护。现在，阿利耶夫的来访表明苏联增加了对这一地区的兴趣。这似乎表明所有沙特阿拉伯的敌人共同密谋反对沙特。卡斯帕·温伯格回忆道："苏联人要竭尽全力对沙特阿拉伯人进行恫吓，通过胁迫来影响他们。因此，我们确信沙特阿拉伯人会一心一意地与我们相处。"

国王认识到伊朗人将攻击沙特阿拉伯的运输船只，并且试图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是油轮从波斯湾进入印度洋的一条狭窄通道。法赫德告诉凯西，德黑兰越来越咄咄逼人了，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得出来。凯西同意法赫德的看法。伊朗的激进分子没有自制力，他们的唯一期望就是能够对保守的君主国进行猛烈的攻击，不让这些国家把他们所拒绝的任何东西带进海湾。法赫德向凯西提出一个请求，沙特王国想购买某些"特殊导弹"。法赫德瞩意于"毒刺"导弹[2]，这是一种先进的地对空导弹，被大肆吹捧为美国武器库中最好的导弹，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导弹。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请求。美国的一些最亲密的盟国还没有得到"毒刺"导弹，美国军队只是在两年前才在德国部署了这种导弹。

出售"毒刺"导弹可能在国会引起比 AWACS 的交易更为困难的挑战。伊朗对沙特阿拉伯运输船只的威胁，与其说是由飞机造成的，还不如说是由游艇造成的。毫无疑问，国会的批评也可能增加使这种"毒刺"导弹落到恐怖分子或者某一个激进阿拉伯

---

① 巴勒贝克，黎巴嫩贝卡省的主要城镇及农业中心。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该地成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军队在黎巴嫩的据点。贝卡，黎巴嫩中部宽阔的山谷地带，是叙利亚军队与黎巴嫩军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与以色列军队不断发生冲突的地方。——译者注

② "毒刺"地对空导弹是美国陆军研制的第二代单兵防空导弹，1972 年开始研制，1978 年由通用动力公司生产，1980 年 11 月开始装备部队。现在已经装备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并且已经向许多国家出售。该导弹采取红外和紫外寻的技术，具有"打后不管"的优点。——译者注

国家手中的可能性。凯西答应把这个请求带回华盛顿，而班达尔王子已经在华盛顿向美国政府的其他官员提出这个请求了。

两人讨论了阿富汗问题，凯西提出了使战争升级的前景。法赫德完全赞成这个主意，他提出，如果需要的话，沙特可以为此提供 1.2 亿美元的资金。国王还同意共同发起一场反对卡扎菲的行动，这一行动正在与埃及国防部长阿卜杜勒·哈利姆·阿布·加扎拉进行策划。然后，凯西提出了一个更为敏感的话题。

他问法赫德："您如何看待把阿富汗战争引向苏联中亚地区?"他知道，法赫德以及沙特王室正在向该地区偷运资金，支持那里急剧增长的地下穆斯林运动。有人估计，偷运到该地区的资金有数千万美元。凯西从内心里想发动一场反苏的政治战，在苏联境内燃起狂热的民族主义的火焰。他是从道德和宗教的角度提出这个请求的。华盛顿强烈反共的基督教政府将与同样反共的沙特阿拉伯穆斯林政府联合行动，共同反对无神论的苏联。因此，这将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神圣联盟。

这个主意激起了法赫德的兴趣，于是两人决定在以后的会见中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凯西此行的下一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他上次访问北京以来，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凯西这次渴望与北京讨论某些敏感问题。在 1980 年的总统竞选期间，总统曾经强烈地支持台湾，现在他开始认识到与共产党中国在许多方面进行合作的价值了。凯西的地缘政治观念就是，敌人的敌人便是我的朋友。他的这种观念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形成了，当时西方民主国家在苏联的帮助下击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

温伯格和凯西都认识到了中国在他们与苏联打交道中的价值。温伯格主张与中国进行密切的军事合作。5 月，白宫宣布放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根据这种新政策，中国被归为对美国友好的一类国家之中，因此中国获得美国的技术将变得容易多

了。由于中美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凯西想在情报和秘密行动方面与北京进行合作，双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就是一个例证。在敏感问题上与中国打交道格外容易，因为中国没有国会或者新闻自由的掣肘，因此秘密行动将更容易实施，而且可以保守秘密。

北京与华盛顿已经在许多问题上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事实证明，在中苏边境安装电子窃听装置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美国的技术人员在中亚的心脏地带秘密地安装设备，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惊讶的事情。在实施阿富汗计划的过程中，中国人发挥了非常有益的作用，向美国提供了苏联集团的武器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凯西简要地向东道主介绍了美国在阿富汗所取得的成功和将来的计划。

与此同时，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共同的边境地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两个共产党国家为了本地区虔诚的穆斯林而相互打斗。在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亚洲内陆地区分布着 4000 万—5000 万的穆斯林，这一事实迫使两国各自制定攻守兼备的“穆斯林战略”。苏联在中国的穆斯林民众中大肆散布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而且还进行渗透活动。一个名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张的苏联情报人员和两个汉人最近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一个名叫岳忠固（音译）的中国居民因从事叛国活动而被判处监禁。据报道，此人于 1980 年穿越国界从中国跑到苏联，并且被克格勃招募为间谍。克格勃多次派遣他回到中国，收集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情报。苏联在这方面进行了顽强的努力，这与它入侵阿富汗的行动是一致的。苏联的宣传目标是中国新疆的穆斯林居民，其手段就是利用建造在塔什干、阿拉木图和伏龙芝的广播电台，几乎全部用土耳其语和汉语播送充满反华内容的节目。

在 1980 年之前，苏联在与中国争夺虔诚的穆斯林的战斗中

一直占据很大的优势，因为莫斯科能够为这些人提供较高的生活水准，而中国只能争得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正统地位。但是，1980年由于发生了两件事情，从而使中国变得更具有攻击性，而且在行动中取得了成功。苏联入侵阿富汗，使中国更有理由声称苏联是反穆斯林的国家，从中国播送到苏联的宣传广播不断地重复着这种论调。与此同时，中国对穆斯林少数民族做出了重要的让步，包括停止反宗教的改革运动和重新开放古老的清真寺。北京东四清真寺的阿訇、中国伊斯兰协会主席萨利姆·安思伟（音译）应邀访问伊斯兰堡，并且被选为穆斯林联盟的成员。他甚至就中国建造一座新的清真寺而与沙特阿拉伯人进行接触。对于北京来说，伊斯兰教正在成为一种财富，或者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反对莫斯科的工具。

凯西除了与中国的情报同行磋商之外，还会见了中国外交部负责对美关系的部长助理朱启桢。北京对美国意图的任何关注，都被苏联发出的挑战所掩盖了。显然，莫斯科正试图在地缘政治方面对中国形成一个包围圈。朱启桢认为，越南、柬埔寨的越南傀儡政府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都是苏联这个包围战略的组成部分。

当话题转到阿富汗时，凯西把谈话引到苏联人所谓的“民族问题”。他尽管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还是暗示美国正在对苏联的中亚地区进行着一场宣传战，旨在散布不和。朱启桢认为，此类想法很有价值，并且建议中美之间进行可能的合作。

春天，国家安全规划小组召开了另外一个正式会议，关注焦点集中于中东地区，特别是在该地区展开的外交努力备受瞩目。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暂时停止，紧张状况依然严重。两伊战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该地区的世俗政权所构成的威胁日益严重。

会上，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成了主角，他建议在中东地区实施一项全面的和平计划。凯西和温伯格在会上没有说多少话，因为推动和平进程主要是国务院的职责。但是，他们在会上竭力主张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毒刺”导弹。凯西认为，沙特阿拉伯人需要得到另外一个切实的信号，以表明美国承诺对他们的安全负责。罗伯特·麦克法兰认为可以考虑向沙特出售导弹，但是他也指出，国会不太可能同意毫无限制地向沙特出售导弹。沙特阿拉伯要想获得这种导弹，还需要进行长期的努力。

由于这个方案已经提出来了，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审查。国家安全规划小组会议之后不久，凯西又一次踏上了出访之路，他此次是去欧洲检查中央情报局在波兰的行动，因为总统早就渴望听到来自波兰的好消息了。

里根政府实际上将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逼到了墙角。美国把释放政治犯作为放松制裁的一个条件，波兰如果答应了这个条件，那么这无疑是在鼓励反对派，进而威胁到这个政权的生存；如果不答应，那么美国将维持制裁，这将使波兰经济状况继续恶化，结果使得波兰更加依赖莫斯科。尽管雅鲁泽尔斯基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但是他并不信任克里姆林宫，而且他也不愿意让波兰进一步跪倒在苏联的脚下。雅鲁泽尔斯基的父亲曾经被关进苏联的战俘集中营，因此将军终生都持有一种反苏的情结。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美国的制裁，莫斯科才被迫每年向雅鲁泽尔斯基政府提供30亿—40亿美元的援助。由于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因此这种“援助”将使波兰付出很高的代价。

尽管制裁对波兰造成沉重的压力，但波兰仍然没有选择释放政治犯，团结工会也只好苦苦挣扎。如果将释放被拘留团结工会积极分子的行动置于这样一种具有爆炸性的气氛之中，那么这个主意就将是一场灾难。在波兰政府宣布任何大赦之前，雅鲁泽尔斯基及其同伴将会进一步折腾反对派。

凯西此行的第一站是法兰克福，这只是短短的两小时的临时停留，以便给飞机加油和进行维修。晚上9时30分，中央情报局驻法兰克福和波恩办事处的官员在美国空军基地的一个保密房间里与凯西会面。在场的人中，有6位直接参与了在波兰的行动。有人在房间里准备了用塑料杯盛着的热咖啡。当飞机的喷气发动机发出轰鸣声时，大伙仍然簇拥在桌子的四周。

里根签署的第32号国家安全决策指示成为美国设法削弱苏联在东欧势力的政策。总统的心思是，通向波兰的秘密供应线一旦建立起来，就要予以扩展。现在每年向地下团结工会提供的援助稍稍超过200万美元，总统要把这个数字扩大4倍。他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主要助手也想在这个地区寻找新的机会，使反对派的活动受益于美国的财政支援。最大的问题是，这种机会存在吗？

来自波兰的情报表明，波兰国内的团结工会积极分子与流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团结工会积极分子取得了联系，并且在捷克与波兰交界的偏僻森林里举行会议。这种会议的规模虽然很小，而且看起来似乎是在进行探索，但毕竟开始举行这样的会议了，而且激起了凯西的兴趣。

也有情报表明，保加利亚有一个松散的地下组织，其成员都是亲西方的分离主义分子，得到一些接近保加利亚上流社会的人士的支持。该组织最初的组织者之一不是别人，正是保加利亚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①的女儿卢德米拉·茹可娃。她毕业于牛津

---

① 出生于1911年，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62—1971），国务委员会主席（1971—1989）。1989年11月辞职，12月保共中央全会决定将其开除出党。在职期间提倡实行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提出一系列有关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认为作为整个社会和人民全权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全民财产的所有者，劳动集体是这一财产的经营者。著有25卷本《日夫科夫选集》。——译者注

大学，是保加利亚占据统治地位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她有一个亲密的支持者，他就是保加利亚政府总理斯坦科·托多罗夫。1981年初，克格勃命令保加利亚对政治活动采取压制行动，托多罗夫就被突然解职了，随后可能对茹可娃采取更加严厉的行动。3月，她突然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有证据表明这是一场谋杀，但是由于这起事件无足轻重，因此也就不了了之了。她原先组织的运动失去了往日的光泽，随后又转入了地下。

有关苏联集团内部反对派活动的情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进行传阅，比尔·凯西也读到了这些报告。有时这些报告也呈送总统阅示。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中央情报局驻法兰克福情报站在获取这类情报方面具有最大的优势，因为这里是苏联集团叛逃人员到西方的中转站。中央情报局还向在欧洲的一些流亡团体提供资金，以换取来自东方的移民向他们提供情报。

凯西与一些情报官员对中央情报局在波兰的行动进行了评审，并且索要更多有关“铁幕”背后的地下组织的情报。他喜欢这类事情。里根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要负责制定战略，凯西实施具体的行动。“经验老道的比尔只要有可能就会一直旅行下去，”格伦·坎贝尔回忆道，“他喜欢把事情汇集起来，然后一起办理。华盛顿所有的无意义的活动（比如各种委员会、各类会议以及派系倾轧等），他都不愿意参加。他喜欢到外面去办一些能够使苏联人感到头痛的事情。”

凯西在离开会议室几分钟之后，他的那架KC—11飞机就升空了，在远处只能看见飞机发动机喷出的火焰。

当凯西的飞机降落在罗马时，已经是午夜过后了。中央情报局驻罗马情报站的负责人在机场迎接他，同在机场的还有几位全副武装的保安人员。美国官员在海外旅行时总是担心碰到恐怖活动，当沿途停靠的机场在意大利以及到达的官员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更需要多加小心。威廉·J·凯西的名字早就上了意大利恐

怖组织“红色旅”的暗杀名单了。谁也不敢不认真对待这件事，因为“红色旅”仅仅在两年前就用行动证明了他们的胆大妄为，当时他们绑架了美国派驻意大利的詹姆斯·多齐尔将军[①]。

中央情报局保安人员总是更愿意依赖精心的准备和隐蔽行动，来保卫他们的局长在海外的安全。中央情报局局长通常有一个小型车队，而且从来不事先宣布他的旅行飞机的起降时间和地点。由于担心他此次访问的消息泄漏出去，因此意大利当局不敢有丝毫大意，派出相当的力量来保护他的安全。凯西总算平安无事地到达了，并且于凌晨3时钻进了舒服的被窝中。

第二天早晨，他不到6点钟就起床了，并且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对于凯西个人来说，这是难忘的一天。他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要去秘密会见罗马教皇。里根总统在1982年与教皇的首次会面中，曾经答应教皇，美国政府会将中央情报局在波兰的所有活动情况全部向梵蒂冈通报。包括弗农·沃尔特斯将军在内的一连串外交使节都被指派做这件事情。会谈的主题转到了波兰。

凯西在早餐之后听取了罗马情报站负责人的汇报，然后直奔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私人住宅，与他进行非正式的会见。他们单独会晤了40分钟，双方都没有记录员。以前双方只是在很低的层次上共享情报，而这次会见则是向教皇阐明了美国的政策。约翰·保罗知道华盛顿正在支持团结工会，但并不了解详细情况。凯西这次仍然没有把全部情况向他全盘托出。

凯西在罗马的停留时间太短暂了，但是预先确定的时间表又要必需遵守。离开的那天已经很晚了，下面还有很长一段飞行路程。飞机离开了地中海温暖的水域和具有拉丁风格的罗马建筑，

---

① 有关“红色旅”的情况见第三章脚注。多齐尔准将是美国驻北约的官员，于1981年12月被“红色旅”劫持，扣押了42天之后，被意大利警察从帕多瓦的一个暗藏处安全营救出来。——译者注

向着正北方寒冷的斯德哥尔摩飞去了。

斯德哥尔摩的上空正值多云，天气又阴暗又潮湿，而且还从波罗的海来了一股彻骨的寒流。凯西期望瑞典人对他的欢迎能够使他感到高兴，然而，瑞典人对他的造访没有兴趣。里根政府正在力劝瑞典人向美国提供更多的帮助，以切断向莫斯科转让西方技术的通道。瑞典是一个正式的中立国，公开担心一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来访可能产生严重的问题。首先，瑞典公开支持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①，而里根政府却正在试图推翻这个政府。特别是，里根的外交政策在这个地方并不适用。

促使凯西来到斯德哥尔摩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五角大楼推测，由于政治和地理的缘故，这座城市有可能成为切断向苏联出口技术的咽喉要地。另一个是凯西断定瑞典在美国向团结工会提供支持方面将非常有益。

尽管斯堪的纳维亚人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和中立的官方政策，但是，苏联集团在进口高技术物品方面严重依赖于斯德哥尔摩，这使它得到不少实惠。70 年代末，瑞典是莫斯科获得高技术物品的中转站。许多瑞典公司从美国购买物品，然后转手高价倒卖给莫斯科，他们在这方面简直是行家里手，获取了巨额利润。这种赚钱的方法非常简单，因为美国公司非常渴望向瑞典出售物品，而且不必问瑞典人用这些东西干什么。瑞典的公司在向苏联

---

① 桑地诺（César Augusto Sandino，1893—1934），尼加拉瓜民族英雄。1927 年领导起义队伍反抗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武装干涉。起义军节节胜利，到 1931 年控制了一半国土，迫使美国侵略军于 1933 年 1 月全部撤出尼加拉瓜。这是尼加拉瓜人民反帝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桑地诺于 1934 年 2 月 21 日被刺身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尼加拉瓜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于 1961 年 7 月 23 日成立，并立即投入反对索摩查独裁政权的游击斗争。1979 年 7 月，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人民武装推翻了索摩查·德瓦伊莱的独裁统治，建立了以阵线为主的民族复兴政府。由于美国的干涉，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 1990 年的选举中因失败而成为反对党，但在国家军队和警察部队中仍具有相当势力。——译者注

集团出口物品方面没有什么限制。

卡斯帕·温伯格认为，如果想在高技术领域对莫斯科进行狠狠打击，那么切断斯堪的纳维亚这条线路就是至关重要的。1981年初，美国发起了一场平静而秘密的战役，在战略物资的禁运方面争取得到瑞典人的合作。到底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美国人的信心还不是太足。"瑞典人并没有把他们看作是西方安全体系的一个部分，"什泰夫·哈尔珀回忆道，"他们认为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因此，副国务卿理查德·珀尔成功地把这个问题变成了他们的问题。

美国于1979年颁布的《出口管理与控制法》授予总统一项权利，使他能够限制那些在出口问题上不与美国合作的外国或者公司获得美国的技术。这一点在苏联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斗争中已经得到了验证，即美国政府能够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别国或者公司获得美国的技术。因此，如果美国加强对苏联的出口限制，那么瑞典人将受到威胁。根据国防部于1982年初起草的一份秘密备忘录，美国对于瑞典（以及与其类似的其他中立国，如瑞士和奥地利）的目标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目标，美国想要瑞典保护美国的技术，他们进口这些技术只能为自己所用。第二个目标，美国政府想要瑞典阻止美国产品通过他们的自由港、免税区和海关的保税仓库转移到苏联集团。第三个目标，美国想要中立国拒绝向苏联集团提供他们自己制造的高科技产品。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美国政府正在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政策。一方面，对瑞典的公司（诸如爱立信公司和通用电机公司）进行威胁，如果这些公司被指控向苏联集团出口高技术，那么就要限制它们进入美国市场。另一方面，美国在颁发许可证方面，大方地把瑞典的公司当作盟国公司来对待。这将是一种非常有利的特权。

此外，美国政府还分给斯德哥尔摩一些尖端技术，以便让它尝到一点甜头。瑞典非常需要一些新技术来发展自己正在制造的JAS39“鹰狮”战斗轰炸机。如果瑞典人能够限制向苏联集团出口高技术，那么温伯格将向斯德哥尔摩提供通用电气公司最先进的喷气发动机的设计图纸，以及来自霍尼韦尔公司、利尔·西格勒公司和特莱丁公司的其他宇航技术。

凯西在斯德哥尔摩检查了这些努力，并且对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研究。政治上的事情是无法预测的。托尔比约恩·费尔丁[①]首相的保守政府被赶下了台，对美国外交政策持严厉批评态度的社会党人奥洛夫·帕尔梅[②]现在重新掌了权。在斯德哥尔摩老城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早餐会之后，凯西会见了瑞典政府官员。他与国防部和首相府的官员所进行的一系列秘密聚会，都是空前的。整个形势是微妙的，并且双方都稍微有一点难堪。

令凯西惊奇的是，瑞典愿意与华盛顿进行更紧密的合作，这就超过了美国的预期。国防部长担心重复发生苏联潜艇侵入瑞典海域的事件，迄今为止这种事情几乎每天都要发生。瑞典海军在跟踪苏联潜艇方面正在碰到麻烦，因此对美国所提供的任何情报都感兴趣。凯西表示他将过问此事。

首相府也明确表示有兴趣在技术问题上与华盛顿进行合作。瑞典不同意美国发起针对莫斯科的“经济战”，但是，国内的经

---

① 生于1926年，曾经两度出任瑞典首相（1976—1978，1979—1982）。早年积极参加中央党（原称农民党），1971年成为该党领袖。由于他担任首相，从而推翻了社会党人自1932年以来对政府的控制。——译者注

② 瑞典社会民主工党的杰出领袖、瑞典最著名的国际政治家（1927—1986）。曾经长期担任瑞典首相（1968—1976，1982—1986）。60年代末，他由于抨击美国的越南政策并接纳美军逃亡者，致使瑞美关系趋向紧张。1976年，社会党执政44年后在大选中失败，他继续从事党务工作。1982年再次当选首相，试图在瑞典重新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1986年遭暗杀，凶手尚未查明。——译者注

济状况促使他们与美国进行合作。美国代替德国成为瑞典产品的最大进口国，瑞典在过去的6年里向美国的出口量几乎翻了一番。如果美国严密控制对瑞典颁发出口许可证，那么这种趋势将使瑞典陷入危险之中。帕尔梅不想冒险引发一场危机，从而破坏瑞典的经济。凯西对东道主说，美国政府想与瑞典保持友好关系。瑞典如果阻止向苏联集团出口高技术，那么瑞典将在经济上获得极大的利益。

然后，凯西提出了另外一个促使他来到瑞典的话题。斯德哥尔摩是通向波兰的最佳管道，中央情报局想向团结工会提供“战略物资”，但需要得到瑞典政府的协助。费尔丁政府曾经于1981年帮助中央情报局向波兰走私设备，以便为地下团结工会建立一个控制、指挥与通讯系统。但是，凯西现在想建立一条永久性的联络管道，以便定期向团结工会提供物质援助。

毫无疑问，这个请求对于中立的瑞典来说太突然了。帕尔梅对美国的中美洲政策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并且是支持越共的第一位欧洲领导人。但是，即使这样，凯西仍然冒昧地提出这个请求，这是因为有一些迹象表明他的请求有可能被接受。瑞典人在阿富汗问题上已经与中央情报局进行合作了。虽然他们避免向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提供致命的武器，却捐赠了价值达数百万美元的医疗用品，并且由中央情报局将这些物资运到卡拉奇。

凯西大概还回忆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人向盟军提供帮助的那些日子，尽管当时瑞典的官方政策是保持中立。为了得到纳粹德国的战时经济情报，年轻的比尔·凯西努力招募瑞典商人，请他们在访问德国时收集有关情报。这些商人可以相对容易地进出德国，而且他们熟悉德国的工业状况。或许他还联想到瑞典人甚至有可能帮助他招募一些反纳粹的德国商人。

凯西还将好几封美国和西欧的高级工会领导人撰写的信件带给斯德哥尔摩，这些信件能够起到促进作用。劳联—产联的欧

文·布朗打了一些电话，安排他所信任的欧洲工会领导人给斯德哥尔摩写信。这些信件虽然简短，但非常有用，旨在向斯德哥尔摩表明，其他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凯西的意见是值得听取的。

瑞典国防部和首相府的官员在凯西临走之前告诉他，请他等一个电话。数小时之后，凯西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里面传来了奥洛夫·帕尔梅首相温文尔雅的声音。

凯西在电话里直入主题。他此次来瑞典就是仔细检查已经施行的技术安全预防措施。不过，他告诉帕尔梅，他还想得到瑞典的帮助。他呼吁首相关注工会运动，因为团结工会正在进行挣扎，有可能无法幸存下去。美国政府想时常向格但斯克运送一些物资，但要想使这类行动获得成功，需要获得一个中立港并得到政府官员的协助。他暗示正在尝试不惊动首相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但是如果双方能够进行合作的话，那么行动将会更加顺利。

帕尔梅的答复同样简洁明了，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将尽其所能。他们大约交谈了 10 分钟，后来就再也没有通过电话了。但是，这次电话交谈非常有益，几周之内，向波兰运送供应品的基础设施就准备就绪了。负责出口的海关官员有意把一些运往格但斯克的特定板条箱贴错标签，这样波兰当局就不会怀疑了。

在努力完成不可能的事情（说服奥洛夫·帕尔梅与中央情报局合作）之后不久，凯西就把斯德哥尔摩作为他此行的最后一站，与瑞典的军方官员在中午稍过之后共进了午餐。这顿饭吃得很快，而且气氛相当平静。

比尔·凯西在返回华盛顿不久之后，就看到了一份由赫布·迈耶起草的情报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描绘了苏联经济僵硬而令人绝望的景象。报告开门见山地指出了苏联经济的低劣运行业绩和物资短缺状况，这些都使苏联这个“体弱多病”的超级大国更是雪上加霜。然后，报告概括地叙述了苏联体制的“沉重负担”，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巨额国防开支，在全部经济收入中占据了很大份

额。但是，激起凯西的兴趣的则是报告的结论：由于苏联无法阻止这种势头，这意味着“苏联体制有可能自我爆炸”。迈耶的评估报告与中央情报局苏联处和其他情报机构所得出的结论相反。后者认为，尽管苏联经济体制存在着某些结构上的困难，但是凭借苏联人的传统智慧，或许能够取得适度增长。凯西把这份报告呈送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莫斯科的局势就像俄罗斯的冬天，非常黯淡。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他现在是昆采夫医院里受到严密保护的高级病房中的常客，通过电话和口授备忘录的方式来控制国家。他的一个肾脏虽然被切除了，但是肾脏疾病仍然持久地折磨着他。另外，他还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他整天卧床休息，行动受到限制。当南也门总统阿里·纳赛尔·穆罕默德·哈桑尼于1983年11月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时，安德罗波夫的身体很虚弱，面容憔悴，说话声音无力。他在病床上接待了来访的哈桑尼总统。

正当这位总书记在死亡线上挣扎之时，克里姆林宫全神贯注地关注着华盛顿的所作所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苏联密切关注着美国的反共言论、紧密的技术封锁网、似乎是没完没了的国防建设以及在诸如阿富汗和波兰所进行的秘密行动。将这些方面综合起来，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感到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为了对美国的行为做出反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始在党的干部和普通老百姓中做工作，使他们做好应付有可能发生的严重危机或者与美国进行对抗的思想准备。1983年10月，苏联境内举行了数百次精心选择的会议，1800万苏共党员接到指令，要密切关注“敌人的侵略意图”。国防部据此拍摄了一部粗制滥造的纪录影片，并且在苏联电视台进行播放。影片把华盛顿描绘成一个妄图以军事打击和经济颠覆的手段来统治世界的政府，并且播放了美国核爆炸和美军武器的画面。影片中还有一些在战争中受到严重伤害或者死亡的牺牲者的生动照片。

苏联当局通常以冷嘲热讽的宣传伎两向普通老百姓灌输对西方的恐惧，而上述努力则远胜于这种宣传伎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识到，他们在华盛顿正面对着一个立场坚定的政府，”叶夫根尼·诺维科夫回忆道，“他们看到美国在所有的战线上都展开了行动，这些行动不仅只是对苏联的行为做出反应，而是主动对苏联的实力进行检验。这使苏联领导人恐惧之极。”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回忆道：“我们在美国的情报人员收集到的所有走漏出来的消息和报告……表明美国在基础性的战略成果方面拥有对苏联的压倒性优势。”

与此同时，克格勃正在制定一项计划，以对抗他们已经感觉出的美国在情报方面发起的挑战。这项计划的名称为《1983—1987 年大幅度加强反对美国特种部门颠覆性谍报活动的基本反谍报措施计划》，其中对克格勃海外机构的优先任务做了规定。计划指出：“美国特种部门正在不断增加针对苏联的颠覆性谍报活动，并且正在扩大敌意手段的使用范围，这些手段都是用来破坏苏联的军事与经济潜力的。”结果，克格勃的一项关键性的优先任务就变成了“获取敌人破坏苏联经济体制或者苏联与其他国家在商业、经济和科技领域进行合作的计划与行动方面的情报。”

对于克格勃来说，美国利用苏联弱点的战略和进攻态势向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克格勃的一份报告指出：“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到了对美国每一次大规模行动做出精确预测的时候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设法做到这一点。”

1983 年底，克格勃各部门的头头们在克格勃总部召开了一次特殊会议，对过去两年的工作进行回顾。这次会议是由克格勃的第一号人物弗拉迪米尔·克留奇科夫组织召开的。克留奇科夫(代号为阿廖沙）敢做敢为，其个性近乎于呆板，深得世界各地克格勃工作人员的信任。他是安德罗波夫的一位门生，据传闻每天工作 16—18 个小时，每周工作 6 天。他对英国的情报人员西

德尼·赖利[1]在俄罗斯革命时期的间谍生涯十分着迷，而且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有时使他的同事感到身心交瘁，这有点像电影《凯恩号兵变》中的奎格船长及其手中的钢珠。

克留奇科夫在会上强调，莫斯科正在“一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建设共产主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革命运动正在公开出现。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之间正在各个领域展开激烈的斗争。”但是，克留奇科夫的报告只是集中于里根政府政策的三条主线。克格勃领导人发出警告，军事技术竞争正在日益加强，跟踪美国在技术上所取得的突破至关重要：“重要的是不允许现有的战略均势发生任何改变，也不允许对手通过任何科技突破来获得军事优势。”他明确表示，苏联严重关注美国的“经济战”这一战略。“在情报收集领域，国际经济问题越来越重要了。一方面，这是阻止对手利用‘经济战’的手段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经济体制的图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为苏联经济体制服务的需要。”克留奇科夫最后指出，苏联要密切关注美国的地缘政治“图谋”，特别是关注他们在阿富汗和波兰的所作所为。

对于这位严厉的克格勃首脑人物来说，美国的战略理所当然地会招致克格勃强有力的反应。他的结论是：“这个领域的主要问题就是要争取我们的合作伙伴更加积极地参与反对主要敌人的行动。在这方面必须显示出我们的非凡智慧。我们必须认识到，合作伙伴的利益不会永远与我们的利益相一致。因此，在合作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确定共同的利益范围，并且苏联作为合作

---

① 英国情报机构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间谍（1874—1925），原名西格蒙德·罗森布拉姆（Sigmund Rosenblum）。他的最主要的成就是为英国取得波斯石油特权以及获取德国海军机密。1918年5月赴莫斯科，企图颠覆布尔什维克政权，由于计谋泄露而逃走。1925年9月在偷越苏联边境时被捕，据说遭到处决。——译者注

伙伴的安全机构的领头人一定要果断机智，让我们的合作伙伴明白，与美国特种部门的颠覆活动进行斗争是多么的重要。”

在整个10月份和11月初，克格勃高级官员为这个机构制定了《1984年工作计划》。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概括叙述了苏联的目标，政治局委员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向克留奇科夫作了传达。与上次的会议一样，这份工作计划反映了苏联全神贯注于美国秘密政策的三条主线。特别是，计划强调指出，收集“下述内容的情报是最基本的任务”：

我们的主要对手的工作计划和颠覆活动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破坏个别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波兰）的稳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对手使用经济杠杆和意识形态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

美国企图限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在商业、经济和科技方面的联系，我们要与这种企图进行斗争。

在审查克格勃情报人员前几年的工作时，克留奇科夫特别提到，美国竭力阻止苏联获得高技术：“对手（首先是美国）采用了一些额外措施，诸如加强对秘密活动、物品禁运和科技情报收集方面的控制。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分析当前的形势，找到收集科技情报的最新途径。”

第十二章

198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莫斯科特别关注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基调。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这个问题很关键。令苏联人感到失望的是，里根与理查德·尼克松如出一辙，是一个持反共立场的共和党人。正是那位尼克松与共产党中国缓和了关系，并且还与之打得火热。里根具有较深的意识形态情结以及一种超越实力政策的战略头脑，正是由于他的缘故，美国政府发起了一场针对苏联集团的经济战，并且在一些关键地带（波兰和阿富汗）采取秘密行动。与此同时，一场庞大而强烈的国防建设运动正在兴起。里根不仅在嘴上把苏联称为“邪恶的帝国”，并且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即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而且对此坚信不移。

苏联官员对美国新闻界完全公开了他们对里根的战略议程所做的评价。克格勃的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副所长、克格勃前高级官员拉多米尔·波格丹诺夫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唐·奥伯多弗说：“你们美国人正在试图破坏我们的经济体制，妨碍我们的贸易活动，并且为了在战略领域降低我们的地位而压制我们。”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瓦连京·法林也对这位记者说，里根并不想与莫斯科进行和解，而是要“阉割社会主义”。

克里姆林宫这所圣殿对里根的关注，导致克格勃采取积极行动，破坏里根于1984年1月再次连任的前景。克格勃A局（负责行动）第一副局长L．F．索茨科夫负责制定在外行人中间展开秘密行动的计划。克格勃在全世界散布伪造的文件，并且对里根政府进行敌意宣传，将所有的火力集中于“里根即战争”的主

题上。在一个更为平静的战线上，克格勃认真地工作着，思索如何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美国政党内部存在的政治分歧。

新任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于1983年5月给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写了一封亲笔信，阐述了通过利用反对派来削弱美国政治决策的可能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切布里科夫在信中叙述了他在1983年5月9日和10日与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1]间接打交道的情况。这次活动是他提议进行的，美国前参议员、加利福尼亚的约翰·滕尼在他们之间穿针引线。切布里科夫在备忘录中写道："滕尼成为双方信得过的联系人，参议员要他提请安德罗波夫总书记注意下列情况。"他声称，肯尼迪参议员通过滕尼想要克里姆林宫知道，他对里根政府导致美苏关系这种不正常状态的不妥协立场予以谴责。切布里科夫总结道："最主要的危险在于，里根拒绝纠正这种错误政策。"据切布里科夫说，滕尼也告诉他："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采取措施反对罗纳德·里根的军国主义政策将是有益的和及时的。"在他看来，肯尼迪想要苏联邀请他与安德罗波夫面对面地会谈，"参议员认为，这样将使他了解苏联在军备控制方面的立场，并且增加他在美国关于这个主题的发言权。"

后来没有对中间人采取行动。安德罗波夫似乎对切布里科夫的报告印象不深，认为它把会谈的作用夸大了，企图对政治局施加影响。即使安德罗波夫相信切布里科夫的备忘录是有价值的，但是肯尼迪所提供的信息一点也不清晰。虽然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尽力使美国的政策更多地适应苏联的情况，但他却公开批评苏联的人权记录以及在波兰的镇压行动。然而，即使安德

---

① 生于1932年。约翰·肯尼迪总统最后一个健在的弟弟，自1963年起一直担任美国参议员。他曾经认真角逐1980年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但在民主党大会上退出竞选。因其私生活放荡，当选总统的前景渐趋渺茫。——译者注

罗波夫并不认为肯尼迪可能在无意之中帮了苏联的忙，但他还是相信肯尼迪的意图是要出里根的丑。切布里科夫的报告引起了他的一些思考。安德罗波夫在给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一张打印的便条中指出，他想把里根强硬的反苏立场变成他在总统竞选活动中的不利因素。他写道："我在接待肯尼迪的问题上有疑虑。如果现在正是与民主党人会谈的时机，那么我们最好与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会谈。"

正当安德罗波夫仔细考虑如何削弱里根的政治地位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了。他在总书记的整个任期之内，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到了1月底，这种状况突然变得严重了，他的内脏器官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衰竭。安德罗波夫具有很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据传闻，当他于2月9日下午4时50分逝世时，还在撰写备忘录。

在安德罗波夫的心脏停止跳动的几天之后，比尔·凯西正在进行一次13国的秘密旅程。他要继续充当一个更为强调秘密行动的战略攻势的首席执行人。在这次旅行中，凯西想在反苏战略的各个方面取得进展，迄今为止这个战略的实施基本上是适当的。他将访问巴基斯坦，把冷战中最为敏感和秘密的行动之一——阿富汗战争引向苏联境内，与中国的合作将逐渐使苏联的中亚地区变得不稳定，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将得到加强，在波兰的情报网也将随着向地下团结工会源源不断地提供物资而进一步扩展。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黑色间谍飞机通常是向东飞去，以便在欧洲与盟国进行初步的磋商。但是这一次他是向西开始他的旅行的，把火奴鲁鲁[①]作为中途短暂停留的第一站。凯西在旅馆里以X. 史密斯先生的名义进行了登记，美美地睡了一个晚上，第

---

① 即"檀香山"，美国夏威夷州的首府和港口城市。——译者注

二天便早早地启程了。他在飞机上打了几个电话，然后阅读报告。

凯西此行的第二站是东京，他在那里与日本官员进行了磋商，并且讨论了国际石油价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罗杰·鲁滨逊和比尔·马丁）担心石油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暴涨。罗伯特·麦克法兰要求鲁滨逊和马丁（他是一位能源专家）勾勒一种广泛的联盟战略，向石油市场发出正确的信号以避免石油价格突然上涨。几周之后，鲁滨逊和马丁共同起草了一份制止石油价格上涨的文件。这份文件后来变成了一份国家安全决策指示，由总统在 4 月份予以签署。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份文件及早对盟国发出呼吁，当石油价格开始攀升时大家要进行协调，抛售储备石油。文件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要在这方面获得盟国（西德、法国、日本和英国）的合作。鲁滨逊到好几个国家进行活动，以期得到它们的一致响应。他率领美国的一个小型代表团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好几个盟国顺利地签署了协议，只要出现严重的石油价格上涨的情形时，各国就要及早抛售储备石油。“我们向市场发出一个信号，如果石油价格开始上涨，那么美国及其盟国就将在世界石油市场上抛售储备石油，”鲁滨逊回忆道，“这一次石油市场上的投机者将遭受严厉打击。”另外，苏联人也将得不到好处。根据白宫的指示，凯西在东京与日本政府官员举行的好几次会谈中都强调了这个问题。

离开东京后，凯西直奔北京，这是他热切期盼的一个目的地。他是有关中国历史书籍的一个热心读者，而且可以说是一位有关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方面的专家。凯西与卡斯帕·温伯格、乔治·舒尔茨、罗伯特·麦克法兰和乔治·布什都坚定地认为，中国在美国与苏联打交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砝码。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人对莫斯科几乎不抱任何幻想。自从 1981 年初以来，美国政府就开始平静地与北京调情，然而两国之间对于结婚的兴

趣没有求爱的兴趣那么大。

凯西将在北京停留好几天，与东道主就广泛的问题进行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在他离开美国之前就已经在白宫讨论过了。这些问题包括共享情报和调整对苏联边境地区电子窃听装置的管理、阿富汗战争、越南入侵及柬埔寨内战，并且全面讨论了双方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

有一天晚上，中国外交部长在一个富丽堂皇而又古色古香的餐厅里为凯西举行了一次私人宴会。外交部长坐在凯西的右侧，国家安全部长凌云坐在他的左侧。凯西的正对面坐着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负责人特德·普赖斯。宴会极其丰盛，鸡、鸭、鱼、肉应有尽有，而且每道菜的色香味形俱佳，凯西几乎把桌子上的每样菜都尝了个遍。凯西边吃边高谈阔论，想使东道主感到高兴。中国人很有礼貌地听着，但是对他脱口而出的大多数华丽词藻不太理解。

在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人同意向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提供支持。有人提议为双方共同抵制苏联的冒险主义而干杯，这个令人愉快的晚宴就这样结束了。凯西的身体素质真好，就像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大学生，尽管明天还有大约 12000 英里的行程，但他几乎彻夜未眠。

凯西从北京直飞伊斯兰堡，于黄昏时分到达，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官员按照惯例前往机场迎接。这时巴基斯坦仍然受到莫斯科的挤压，苏联在言辞上对巴基斯坦不断造成威胁，飞机越来越频繁地越过边境，对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的目标进行猛烈攻击。1 月底，两架米格喷气式飞机对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一个偏远村庄进行了轰炸，并且还用火箭进行了袭击，40 位平民被杀，60 人受伤。苏联在阿富汗进行的咄咄逼人的焦土政策，继续将数百万难民赶到巴基斯坦去避难。

双方的会谈就像同胞兄弟之间重新聚会般热情。巴基斯坦参

加会谈的是外交部长雅各布·汗，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为许多政治与世界事务披上了一层理性的光环。他能想到许多领导人所想不到的问题，而且与齐亚一样，也是一位坚定的亲西方的反苏人士。凯西向他说了许多鼓励和支持的话，并且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准备向巴基斯坦提供更多的援助，以解决难民问题。他还表示将尽力击退国会中那种主张减少对巴基斯坦军事援助的论调。“要保持向阿富汗的运输管道的畅通，并且美国将继续提供援助，”他轻松愉快地说。这样，齐亚便有了与苏联人进行战斗的勇气了。他大概需要这种支持。

齐亚还面临着另外一种肮脏的威胁。美国有一位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在一个外交仪式上被告知，克里姆林宫将对齐亚坚定不移地支持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的行为进行“报复”。这是一种相当隐晦的威胁，但凯西却对此予以高度重视，指示中央情报局对齐亚总统及其亲密顾问提供额外的保护。中央情报局官员将来到伊斯兰堡，增强齐亚的安全保卫工作，并且对过去的保卫措施进行评估。凯西还为巴基斯坦带来了另外一叠有价值的卫星照片。然后，他向对方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告诉东道主，1月24日，在伊朗的麦什德[①]外围进行活动的阿富汗游击队向苏联境内发射了火箭。游击队已经进入土库曼斯坦，在公路上埋设地雷，进攻孤立的军事哨所，伏击苏联的边防巡逻小分队。游击队对托戈贡地的一个海关检查站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袭击，杀死了好几个哨兵，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弹药。这就是凯西想要做的事情，即把战争引向苏联境内。“凯西认为把战争引向苏联境内没有任何问题，”弗雷德·伊克尔说，“他清楚地告诉齐亚和雅各布·汗，这是应该做的一件事情。”齐亚点头同意了，他说：“向阿赫塔尔将军提出这件事吧。”

① 伊朗东北部城市，是伊朗的政治和宗教中心。——译者注

从齐亚的总统府出来之后，一支戒备森严的防弹车队将凯西护送到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所属的一个司令部。在那里，他会见了巴基斯坦情报部门阿富汗局局长穆罕默德·优素福准将和阿赫塔尔将军。三个人很随便地围坐在一起，品尝阿富汗茶和精美的食物。

在一张朴素的会议桌旁边，他们开始讨论阿富汗战争的进程。现在向阿富汗运送武器的通道只是偶尔遇到一些小小的障碍，送到游击队手中的武器质量有了改善。穆斯林游击队各派领导人最终同意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某种程度的联合，这要归功于阿赫塔尔将军。现在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各派游击队在战场上要紧密合作。

当讨论的话题转到战争的另一方苏联时，室内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了。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在喀布尔的情报人员发回的情报说，莫斯科正在积极考虑分割阿富汗，将其北部变成苏联版图的一部分。“由于苏联人无法控制阿富汗，因此他们计划把阿富汗一分为二，”优素福回忆道，“他们计划利用阿富汗内部的南北对峙这一局面，声称北方属于他们自己。”为了抵抗苏联的这种举动，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正在计划进一步扩大他们在北方各省所采取的行动。阿赫塔尔打算在一个应急基地中训练数千名额外的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员，并且把他们送回到阿富汗的北部地区。但是，这项工作需要资金，他询问中央情报局能否提供帮助。

凯西与往常一样，同意出钱为阿富汗北部地区训练另外6000名穆斯林游击队员。不过，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提出，不应当只局限于阿富汗北部地区，而应该进一步推进到苏联本土。

凯西走到办公室的挂图旁边，卷起衬衫袖子，松开领带，然后侃侃而谈：“苏联的民族紧张关系不堪一击。它是最后一个多民族帝国，终究会面临民族关系紧张的挑战。阿富汗北部地区是通向苏联中亚地区的一个跳板。”他指着地图，眼睛看着东道主，

然后继续说道："这个地区是苏联柔软的下腹部。我们应该向这个地区偷运印刷品，以鼓动这里的人民对苏联的不满情绪。然后，我们应该运送武器，以鼓励当地人民发动起义。"

房间里安静极了。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建议。优素福回忆道，他对凯西说话时直率的语气以及他提出的建议稍微有一点吃惊，"凯西先生意识到了苏联的严重弱点，而且他也是第一个直率指出这个弱点的人。我清楚地记得，他用了'柔软的下腹部'这个措词。我们知道，凯西是一个具有高超外交技巧、守口如瓶和极富智慧的人，从来不会轻易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他也从来不想掩饰他对于共产主义、尤其是对于苏联根深蒂固的憎恨之情。"

美国与巴基斯坦在苏联境内共同采取一项军事行动的想法，从未得到实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苏联境内从未发生过战斗。如果美国的想法真的付诸实施，那么将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激起强烈的反响。作为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的保护者，巴基斯坦将成为苏联进行军事报复的目标。但是，里根的初衷就是要让克里姆林宫知道，巴基斯坦就是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的保护者。将战争引向苏联本土，这是对莫斯科在阿富汗进行侵略行为的一种绝妙的惩罚方式。美国不会轻易错过这一战略机遇。

居住在阿富汗北部地区和苏联中亚地区的人民，具有共同的种族属性，他们比阿富汗南北方的人民具有更多的血缘关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宗教、文化和历史。自 70 年代末期以来，莫斯科格外关注伊斯兰教在苏联中亚地区的传播。克格勃在苏联的各个亚洲加盟共和国的分支机构承担了这样一项任务，即遏制地下伊斯兰教蓬勃的复活势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阿富汗的圣战，鼓励这些共和国采取蔑视苏联的行动。

第二天早晨，在详细讨论了几项冒险计划之后，比尔·凯西登上了他的座机。他留下了或许是冷战时代最大胆的秘密行动的

锥形，巴基斯坦同意制定计划，对苏联境内的目标进行攻击。

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几乎立即行动起来，研究如何在共产主义超级大国的内部发动秘密战争，并且考虑了好几种可能性。凯西建议首先向苏联境内运送书籍和印刷品，并且随之派出调查小组，以获得对当地局势的感性认识。穆罕默德开始与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心理战专家探讨向苏联中亚地区散发什么印刷品。自从40年代末就一直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一个乌兹别克人建议，首先散发《古兰经》以及记叙苏联对乌兹别克的暴行的书籍。中央情报局出钱印刷了几万册书籍，并且运到白沙瓦[①]。

几周之后，优素福召集阿富汗北部几个省的穆斯林游击队指挥官在他的办公室开会。不久之后，针对开展什么样的行动，开始进行内容广泛的筛选。对苏联进行调查的几项候选的绝密行动，不论是从行动本身还是从政治角度来看，都是完全可靠的。在实施这些行动的过程中，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对各种细节要进行谨慎的分析判断。

在对全部行动方案进行筛选之后，优素福要求几位游击队指挥官与阿姆河对岸的苏联居民取得联系，进行必要的调查摸底，比如《古兰经》受不受欢迎，有哪些本地人愿意参与将来的行动或者收集有关苏军行动和工业设施方面的情报，当地人愿意不愿意当向导。在任何行动开始之前，他需要更多的情报。

与此同时，优素福将一个局外人召到他的办公室。此人名叫瓦利·贝格（化名），年龄53岁，但看上去要老一些。他的胡须雪白，皮肤粗糙，是一个乌兹别克族的农民，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居住在阿姆河南岸的阿富汗。他的家在昆都士省的北端，位于阿富汗的一个古老边境口岸希尔汗的附近。贝格在孩提时代，

---

① 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中部城市，“白沙瓦”意为边境城市。白沙瓦在历史上曾经是来往于阿富汗和中亚一带的商贸中心。——译者注

跟随他的父亲经常到阿姆河对岸去看望住在那边的亲戚——他的姑姑、叔叔、堂兄弟和祖父母。他们采用传统的摆渡方式，由两匹涉水的马牵引着的一只平底船过河。苏联人把贝格从他的家里撵了出来，并且杀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现在居住在巴基斯坦，以织地毯为生。贝格对这个地区的情况非常熟悉，能够独立对局势进行分析。优素福回忆道："我们的目的是，瓦利关于边境地区的知识及其发誓要报复苏联人的行为，使他成为一个把战争带过阿姆河的理想的穆斯林游击队员。"

凯西从巴基斯坦冒险来到沙特阿拉伯，与法赫德国王和图尔基王子秘密会见。尽管凯西飞越了半个地球，但他到达利雅得时仍然兴致勃勃。在东道主的秘密安排下，他整个上午都在为会见进行准备。阿富汗计划正在平稳地进行，这将使法赫德感到高兴。国王喜欢得到有关战争的最新信息以及听到重大胜利的消息。沙特阿拉伯安全计划的进展也令人感到愉快，中央情报局告诫沙特阿拉伯人要小心几种潜在的威胁。

凯西来到王宫，受到国王的热烈欢迎。自他们上次会见以来的几个月是一段困难的时光，法赫德在此期间神情忧郁，甚至有一点沮丧。随着石油收入的急剧减少，沙特阿拉伯的经济陷入混乱之中。为了稳定世界石油价格，沙特削减了石油产量。对于世界上许多工业化国家来说，天然气是一种代替石油的诱人选择。沙特作为一个机动产油国，对世界石油市场的稳定贡献良多。但是，由于许多国家大肆超采石油，使沙特这个机动产油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经济上面临灾难的同时，伊朗人也越来越频繁地入侵沙特的领空。南也门总统哈桑尼于 11 月对莫斯科的访问，再次激起人们对苏联人在该地区图谋的猜疑。在这种情况下，里根政府的许多官员，尤其是卡斯帕·温伯格和比尔·凯西，向沙特重申美国所承担的义务，这样就很快减轻了沙特人在这方面的顾虑。

现在最直接的安全隐患便是伊朗。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里根总统要求中央情报局发起一项秘密行动，推翻阿亚图拉·霍梅尼。由于这项计划刚刚开始，因此进展非常平缓。中央情报局在土耳其为那些反霍梅尼的流亡者建立了一系列秘密避难所，这些人的活动内容就是散发传单和制作用于宣传的广播节目。美国不指望这些人做许多事情以约束毛拉[1]们的权力，而且也不指望他们在安慰法赫德国王方面有什么作为。与此同时，一场劝说其它国家不要向伊朗出售武器的“坚定行动”，在世界范围内全面而迅速地展开了。在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推动下，如果各方面予以配合的话，那么“坚定行动”可以对德黑兰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外交方面的事务由国务院负责，而这次行动中更多微妙的隐蔽活动则由中央情报局负责。中央情报局官员与世界各国的政府官员秘密合作，试图劝说这些国家停止向伊朗出售武器。

“坚定行动”将从容进行，法赫德认为还缺少什么事情。他担心沙特将面临直接的军事挑战。1984 年初，正当这场血腥的两伊战争处于僵持状态时，伊朗军队对伊拉克发动了多次攻击。伊朗的“革命卫队”在靠近巴士拉[2]的南部地区对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或许是一种不祥之兆。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一波又一波地冲向伊拉克的阵地。如果伊朗军队成功地突破伊拉克的阵地，那么他们距离沙特阿拉伯的油田就只有几百英里了。法赫德国王不大相信外交活动或者秘密行动能够取得什么结果，只有美国支持沙特，向沙特提供所需要的军事装备，他才能够安心。

凯西提醒法赫德，里根总统将永远不会让沙特王室垮台。里根于 1981 年公开说过，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在沙特阿拉伯再次称

---

① 伊斯兰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和学者的尊称。——译者注

② 伊拉克东南部城市，为该国第二大城市和主要港口。——译者注

王称霸。凯西提醒法赫德，美军驻中东司令部（USCENTCOM）的建立就是这种承诺的一部分，它是保护沙特阿拉伯领土完整的真正力量。

法赫德在某些方面很天真，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则又非常精明。他不想与美国谈论这个问题，而是想让里根总统明确告诉他，沙特能够依靠华盛顿。班达尔王子要求国务卿舒尔茨以正式的书面形式澄清一下里根总统所做出的承诺。法赫德还想获得他以前曾经提出过的“毒刺”导弹。面对沙特提出的众多请求，美国政府似乎想打退堂鼓了。

凯西告诉法赫德，“毒刺”导弹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它比出售 AWACS 更加微妙。法赫德承认这一点，但他认为只有出售这种导弹，才能表明美国对沙特王室的诚意。他告诉凯西，亲密朋友和盟国必须相互支持。

然后，法赫德建议美国应该考虑与伊朗接近。沙特在历史上就曾经试图与自己的敌人保持关系。法赫德认为对话将是有益的，尤其是要与伊朗的温和派进行对话。凯西对这个建议未置可否。

凯西接着拿出一些对折的文件夹，放在国王的面前。这些是有关阿富汗计划的最新情报，以及与齐亚共同做出的将战争引入苏联中亚地区的决定。凯西告诉法赫德，这个办法能够束缚住俄国人的手脚，并且释放出数百万虔诚的穆斯林的激情。也惟有如此，才能使莫斯科确信，它将在阿富汗问题上付出巨大的代价。凯西想要沙特阿拉伯参与这一行动，并且或许还想说服该地区的突厥人[①]共同采取行动。这件事情还不能过分地炫耀或者夸大，

① 使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中各种语言的任何民族，均可称为突厥人，包括土耳其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和阿塞拜疆人等。——译者注

否则就会鸡飞蛋打。法赫德原则上同意进行合作，但他想了解更多的细节。凯西同意一旦各种行动计划得到完善，就将它们通报给突厥人。

两人还讨论了其它几项联合行动，包括破坏沙特阿拉伯的两个敌人——利比亚和南也门的稳定。中央情报局拥有关于南也门领导层的准确的电子情报，如果还有针对利雅得的阴谋，美国人希望获得这类情报。

离开沙特阿拉伯之后，凯西又飞到以色列和土耳其，然后又飞到西欧，对中央情报局在波兰的行动进行评估。在罗马，他秘密会见了梵蒂冈的一位负责与波兰政府联络的外交官路易吉·波吉大主教。凯西希望再次会见罗马教皇，但是坐在会见桌旁边的是这位大主教。波吉刚刚在华沙会见了波兰外交部长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与他讨论了互派大使的可能性。精通拉丁文和教会历史的波吉，看上去仅仅是一个教区的教士。但是，他是一个敏锐的政治思想家，能够准确地把握外交手段的细微差别，而且很快就把这种坚定的性格表露无遗。

波兰问题也在他们的讨论范围之内。美国政府之所以关注波兰，是因为美国在波兰国防部中的情报人员报告，波兰内政部正在重新组织一场针对地下团结工会的“不动声色的进攻”。这场行动的形式多种多样，最阴险的手段包括杀害某些团结工会积极分子，从而对那些考虑参加反政府行动的人们产生一种心理震慑作用。于是，在波兰国内涌现出一股不可思议的谋杀浪潮。持不同政见的诗人芭芭拉·萨多夫斯卡 19 岁的儿子格热戈日·普热梅克，被警察活活打死。团结工会的一位积极分子安杰伊·格热戈日·贡谢夫斯基被警察逮捕，几天之后在一个铁道路基上找到了他的尸体。团结工会另外一位积极分子扬·萨姆索诺维奇，被吊死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一堵墙上。

里根政府对团结工会的地下领导人布亚克、库龙以及莱赫·

瓦文萨的生命安全感到担忧。凯西告诉波吉，教会领导人也可能成为波兰当局的谋杀目标。他请求大主教向他在波兰的联络人发出一个警告，并且要求他们传播这个消息。波兰军事管制政府如果不能抑制团结工会的地下活动，那么它必定要下毒手。

然后，波吉叙述了他对于波兰局势的看法，形势不容乐观。教会本身分裂成两派，激进的一派主张彻底反抗当局，而另一派则主张与政府进行和解。一位大主教承认波兰政府对其国内宗教事务拥有管辖权，这是非同寻常的。但是，或许他是对的，因为连凯西都承认美国也有局限性和弱点。教会的分裂是在一个工业小镇乌尔苏斯的郊区暴露出来的，当时2000多名波兰人拥入一个罗马天主教堂，向波兰大主教约瑟夫·卡迪纳尔·格亚姆普进行挑战。这位大主教将团结工会的一个直言不讳的支持者、乌尔苏斯教区的米奇斯瓦夫·诺瓦克牧师重新派遣到另外一个教区。此类争吵在波兰全国重复出现，雅鲁泽尔斯基政府及其莫斯科的主人乐于看到这种情景，这是毫无疑问的。

正当教会经历着一场分裂的同时，波兰经济也陷入了困境。波吉想要里根政府知道，经济制裁使波兰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据波兰政府的一项估计，经济制裁给波兰造成的损失达120亿美元），雅鲁泽尔斯基明确表示，经济状况的恶化使他的两个对手占据了优势，团结工会和政府中的不妥协者认为他在对付国内敌人的时候不够强硬。波吉向凯西建议，美国政府应该继续维持对波兰的经济制裁，因为这样可以促使雅鲁泽尔斯基最终寻求某种程度的妥协。

地下团结工会的状况比较混乱。波兰政府总共监禁着大约1000名团结工会积极分子，其中最重要的是关押在华沙拉科夫科卡大街莫考托夫监狱的一群团结工会领导人，其中包括创立了团结工会无线电网络的亚采克·库龙、亚当·米奇尼克和兹比格涅夫·罗马谢夫斯基，以及天主教知识分子亨里克·武耶茨。

但是，这些被拘留的领导人蔑视当局的那种勇气，是不能被栅栏和监狱的围墙所阻隔的。米奇尼刚刚写了一封信，就被偷偷带出了监狱。他真诚地相信，纯粹的意志力能够对抗共产主义的统治。这封信表达了狱中团结工会积极分子蔑视当局的愤怒情绪，充满了胆量和勇气。雅鲁泽尔斯基提议米奇尼和其他被捕的团结工会领导人到法国避难，他的企图就是要把主要对手推出国门。米奇尼在信中对这个提议进行了公开的回答，他向这位将军写道："我们的观点非常明确，那就是我们要在波兰联合身陷囹圄的人民，而不是联合身处高位的人们；我们宁愿在监牢中过圣诞节，也不愿意到法国南部度假。我们的想法会使你深感头痛。"他把狱卒称为"无赖"和"充满报复心理的可耻的下流坯子"。这封信的复印件在数几千名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手中流传着，然后传到"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官员手里。接着，这封信就在东欧迅速地传播开来了。

凯西向波吉重申了里根总统的立场：对波兰的经济制裁不会放松，除非波兰进行内部改革并且释放政治犯。莱赫·瓦文萨在最近几周内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制裁应立即停止，但美国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凯西要求大主教把这个消息传给他在波兰的联络人。

在某种真正的意义上，美国的秘密支持就是帮助地下团结工会度过军事管制这个漫长而残酷的冬天。向团结工会运送物资的管道，是从布鲁塞尔经斯德哥尔摩到格但斯克，运送到那里的物资通过一个广泛的地下分配网络进行分配。2 月 23 日，团结工会电台开始进行自从去年 10 月以来的首次广播。兹比格涅夫·布亚克通过新型的无线电和电子设备，鼓励人民起来反抗现政权，并且呼吁人民联合抵制即将于 7 月份进行的地方政府选举。此次广播很简短，只有 6 分钟，以免被政府的监控装置发觉。但是，这是一次极其重大的精神胜利。

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政府积极分子之间的联络继续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着。捷克斯洛伐克规模很小的天主教会请求帮助。难道捷克斯洛伐克的教会与反对派组织之间有什么联系吗?西方是否“鼓励”向这个教会提供帮助?波吉提议对此进行调查,然后将结果通报凯西。

第十三章

里根政府最重要的优先事项之一，便是更为准确地收集有关苏联的情报。有关苏联的军事情报还算可靠，但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认为，美国缺乏有关苏联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情报。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在“铁幕”后面招募情报人员。比尔·凯西在其任期的头几年内，已经切实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而且对里根总统看重有关苏联的第一手资料这一点非常欣赏。在确定里根战略的下一步行动时，准确的情报至为重要，尤其是美国希望利用苏联的经济、技术和心理脆弱性时更是如此。

但是，到了 1984 年 4 月，情况看起来变得非常糟糕。莫斯科的情报资源枯竭了。几年来一直很安全的情报人员被捕，情报来源随即中断。多年来苦心扶持的 3 个情报人员，最近被苏联当局以叛国罪处死了。中央情报局官员只要一走出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便被苏联情报人员盯梢，他们的行踪完全暴露了。美国掌握的情报似乎表明，克格勃把所有的美国情报人员列入了清单，掌握了美国大使馆每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姓名。紧接着，经过长期努力而建立起来并且屡获成功的情报收集技术设施渐渐地悄无声息了，电子截获程序也受到了干扰。

但是，美国得到的不只是坏消息，还有一些好消息。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位高级军官设法接近中央情报局驻莫斯科情报站，认为自己对美国“有用”。他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并不是为了钱，而是纯属个人原因。中央情报局驻莫斯科情报站精心设计了一套密码，用于与此人联络并且从他手中获取情报。此人在工作之余，

常常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公园里带着狗散步，并且以变换狗的项圈作为联络暗号。

此人是非常值得争取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且在如此不同寻常和困难的时期与中央情报局建立联系，因此有理由怀疑他是一个内线人物。但是，这么高级别的一位官员给中央情报局传递情报，这种前景对于中央情报局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因此凯西赞成继续与他保持联系。终于，此人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在苏联招募告密者并且获得由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回忆道，“我认为我们在苏联获得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尤其是有关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领导人的情报。”

由于里根政府对于经济和技术事务感兴趣，因此与克里姆林宫做生意的美国商人便成为重要的情报来源。他们在这些领域具有专门的知识，而且有着与中央情报局所招募的情报人员完全不同的联络渠道。凯西在商界的一些老朋友，诸如斯图尔特·杰克逊，自愿为中央情报局效劳。其他一些人，诸如阿切尔—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董事局主席德韦恩·安德烈亚斯，也被说服为中央情报局效劳。凡是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的商人们，都由中央情报局给他们取一个代号并且向他们介绍情况。

与莫斯科做生意的美国公司经理们，或许比任何人都清楚苏联的经济需求是什么，他们知道苏联最急迫地需要什么技术，也知道苏联为了获得美国产品而开发外国资源的黑名单。特别是对于诸如杰克逊和安德烈亚斯这样有价值的情报源，在从苏联回国后就为中央情报局撰写报告，拨通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特殊电话号码。然后，一个信使就会应约而来，将报告密封后带给全国情报征集处（NCD）。这些经理们通常会收到凯西的一个简短的感谢便条，作为对他们的工作的回报。特别重要的情报要呈送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甚至要呈送总统。

全国情报征集处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美国的主要城市设立了30个办事处。一些代理商与在海外有业务关系的大公司有联系，中央情报局要求他们进行合作。许多为中央情报局提供帮助的商人被邀请到兰利，听取“情况介绍”。1984年，大约200人到中央情报局总部出席小型情报研讨班，并且听取凯西的演讲。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在讲完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危险之后，为这次研讨会确定了基调：“公司经理们是中央情报局的无价之宝。你们不仅为我们提供情报，而且还使我们与那些可能为我们提供有用情报的外国人进行合作，这些情报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是至关重要的。”他最后以强有力的口吻说：“我个人向你们保证，一定为你们保守机密。”

除了为中央情报局收集情报之外，近200家美国大公司还为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提供掩护，这是凯西的一个关键目标。事实证明，这些代理人在中央情报局执行特定的海外任务时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波兰工作的一些代理人以商务活动为掩护，因而避免了像大使馆人员那样被波兰当局跟踪的现象。NCD每月都要把一份成果摘要报送凯西。

收集情报很有必要，因为这样才能了解和查明苏联究竟存在哪些脆弱性。但是，里根政府还有一个重要的武器，那就是源源不断地为莫斯科制造假情报。1984年初，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共同制定了一项通过故意制造假情报来破坏苏联经济的秘密计划，将目标对准苏联经济的核心及其对西方技术诀窍的依赖方面。这是一个内容广泛的计划，包括改变或者虚构民用和军用领域中的技术情报，由中间人将这些情报转到苏联的技术人员手中。“我们主要是向苏联提供错误的或者部分错误的数据和资料，从而迫使他们做出错误的技术决策，”参与其事的一位官员说，“简而言之，就是要通过这种办法把他们搞糊涂。”这个主意首先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的有关人员提出来的，美国在反

对苏联天然气管道建设的过程中曾经用过这一招，此次就是模仿以前的做法。结果，这项故意制造假情报的计划使苏联经济的效率低下和结构缺陷进一步加剧。

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渠道，协同发表不完善的和容易引起误解的技术数据。中央情报局在海外的一些虚拟公司实际上是在向苏联官员出售被歪曲了的情报，包括燃汽涡轮机的设计图纸、石油钻探技术、计算机芯片以及一些化合物。转到苏联人手中的情报一定要真假混杂，虚实结合：只有足够真实的情报，才能使苏联工程技术人员上当，并且开始消化这些情报，进而应用到他们自己的设计中去；而只有在真实的情报中间混杂足够多的假情报，才能使他们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在第一年里，这项计划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成果”：

- 鄂木斯克[1]的一家化工厂在其扩展计划中使用了容易引起误解的资料。这些设计资料在被证明是完全没有价值之前，苏联专家被引入了技术迷宫。在纠正错误之前，苏联人为他们这种投机行为付出了约800万—1000万美元的代价。
- 乌克兰的一家拖拉机制造厂试图利用中央情报局通过中间人提供的设计图纸来制造机器。工厂以一半的生产能力运行了16个月，直到工程技术人员以采用“新式自动化系统”为名而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
- 1984年初，苏联人获得了燃汽涡轮机部件的设计图纸。根据这些图纸制造出的一些部件安装在了天然气管道上面。但是，这些设计图纸在工程技术上存在着一种缺陷。当这些部件安装在管道上时，就能

① 俄罗斯西伯利亚西部城市。——译者注

使涡轮机出现故障。结果，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推迟了。

- 通过中间人向苏联出售被故意毁坏的计算机芯片，导致好几家苏联军用和民用工厂的设备瘫痪。苏联人为揭开这个秘密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工厂的装配线关闭了好几个星期。

在中央情报局制造民用项目的假情报时，五角大楼在军用技术方面如法炮制。莫斯科通过窃取西方的国防技术并且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武器系统的办法，节省了好几年的研究与开发时间，每年还节约了大量的资金。五角大楼制造了六、七项敏感军事技术项目的假情报，希望引起苏联人的极大兴趣。这些项目包括隐形技术、战略防御倡议和先进的战术飞机。这些行动采取了所有能够采取的措施，包括向外国记者介绍情况。这些假情报包括开发时间表、样机性能、结果测试、生产时间表以及运行业绩。

1984 年初，凯西收到了一份内部备忘录，说明中央情报局的假情报计划取得了极大成功。除了为苏联人制造了明显的难题之外，这份备忘录还特别提到，假情报使苏联获取外国技术的整个计划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苏联人由于无力区分真假数据和资料，因此他们吸收和应用西方技术的正常步伐明显放慢了。”

为了避免在国内发生同样的问题，假情报计划受到严密控制。“这些假情报只能在美国境外传播，”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回忆道，“不过，事实证明这是对付苏联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这一招搞得他们晕头转向，有点找不着北了。”

4 月底，里根总统召集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规划小组会议。会议优先讨论的议题便是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法赫德国王请求购买“毒刺”导弹以及美国对于沙特国家安全的几项书面保证。凯西和温伯格奋力争取美国进一步强化对法赫德的承诺。

温伯格说："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以加强两国关系，并且使沙特人感到我们是他们的坚强后盾。"这就意味着，具有良好的可靠性的"毒刺"导弹成为美国支持沙特阿拉伯最重要和最切实的象征。国务卿舒尔茨想慢慢地促成此事，不想做任何明显打破地区平衡的事情。里根总统对此事没有明确表态。

班达尔王子得知这次会议的相关情况后，感到非常不安。沙特对美国的承诺越来越感到沮丧和不安。伊朗继续威胁着通过波斯湾的运输船只，沙特阿拉伯对此有点不知所措了。温伯格会见了班达尔，对方郑重其事地向他陈述了美国向沙特出售"毒刺"导弹的重要性。由于国会正在威胁要阻止任何出售导弹的计划，因此他们觉得需要做点什么事情。温伯格安排班达尔于5月中旬到椭圆形办公室，直接向里根总统陈述他的看法。班达尔给总统带去法赫德国王的一封7页纸的秘密信件，总统看完之后，安详地注视着这位沙特王子。"我们不会对朋友提出附加条件，"里根轻声说道，"你将得到你想要的导弹以及我们的支持。"几天之后，总统向法赫德国王发送了一封信，确认美国对沙特王室的军事支持。这封信的语气极具个人色彩，它是这样说的："我向你承诺，我将支持你。"

几天之后，里根总统兑现了他的诺言，启动紧急程序，从而绕过了国会。他之所以使用这种非常手段，意在表明沙特急需导弹以保护自己免遭伊朗可能的空中袭击。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过后，400枚"毒刺"导弹秘密运往沙特阿拉伯。这个数目虽然不是法赫德所希望的1200枚，但他还是非常高兴，并且给里根总统发送了一张私人便条以示感谢。

苏联于1984年5月完成了两份《特殊国家情报评估报告(SNIEs)》，从总体上概括了苏联对于美国的态度。应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的要求，凯西下令将1983年起草的有关韩

国航空公司007号客机空难事件①的几份报告公布于众。这些报告的部分依据是由克格勃驻伦敦副代表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此人秘密地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力。这些报告的其他来源是由新近的两位克格勃叛逃者提供的，一位是弗拉基米尔·库济奇金，于1982年10月25日从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出走后逃往美国；另一位是代号为“鲍里斯”的阿纳托利·博加特，一个月前由摩洛哥逃往美国。

这些报告明确指出，苏联人对里根政府越来越感到恐惧。克里姆林宫实际上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的核战争警报系统（代号分别为“拉克特诺”、“亚德诺伊”和“纳帕德涅”），因为它害怕美国可能首先发动一场核攻击。这些名称都是尤里·安德罗波夫于1981年首先叫出来的，他当时仍然是克格勃主席。他认为里根政府极有可能发起一场骇人听闻的核攻击。这决不是说苏联高层领导集团内部形成了一致的看法，但足以说明克里姆林宫提高了警惕，密切关注着白宫的一举一动。SNIEs还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现象，即最近几年的事件对苏联领导人产生了心理震慑作用。

麦克法兰还记得SNIEs的内容以及苏联领导人的心态：“苏联领导人令人惊讶的行为之一，便是违背了他们自己原来的看

---

① 1983年9月1日凌晨3点30分，韩国航空公司KE007号客机因偏离航线500公里而飞入苏联萨哈林岛（库叶岛）的核战略基地上空，被苏联战斗机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机上269人全部罹难。事件发生后，韩国当局发表声明，指责苏联击落它的客机是“一种不可原谅的和非常野蛮的行径”，是“世界航空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最惨的悲剧”，要求苏联就此事件向韩国正式道歉，并给予赔偿和惩罚有关人员。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事件发生的当天——9月1日上午举行记者招待会，称苏联的行动“骇人听闻”，美国将对这一事件“做出强烈反应”。苏联一口咬定，KE007号客机侵入苏联领空“是一次经过周密策划的侦察行动”，这架韩国客机与美国的RC-135侦察机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由于始终没有找到失事飞机的“黑匣子”，此次事件也就不了了之了。——译者注

法，认为美国的经济体制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复苏。在7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衰退之中，他们当时的心情很快乐。当我们开始复苏时，对他们形成了一种反差，这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他们开始失掉自信。当然，我们想把这一点作为我们的战略优势。”

SNIEs也特别指出，苏联领导人开始担心，双方的力量对比正在朝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转化。麦克法兰回忆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对方在心理上还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那么我们是不能够向他们发起挑战的。在处理众多危机的过程中，能够使一个控制严密的政治体制的领导人感到恐慌，因为他们不习惯这种局势。”

双方的力量对比确实正在发生转变。美国正在加强军事建设，尤其是投入巨资建设新一代高科技型武器系统。到了80年代中期，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了苏联，这是自60年代末以来的第一次。在里根当政的前6年中，五角大楼采购了将近3000架战斗机、3700枚战略导弹以及大约10000辆坦克，其费用大约为70年代的一倍。这些新式武器系统比以往更为精密复杂，或许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在苏联体系的外围（波兰和阿富汗），出现了明显的基础性裂缝。苏联也越来越难以获得西方的技术了，因此这种僵化的中央集权经济体制正在经历着一段更为困难的时期。叶夫根尼·诺维科夫认为：“中央委员会内部和克格勃高级官员中间存在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即外部的压力正在破坏苏联的经济体制。有人说，‘我们无法与西方竞争，我们只能与他们合作。’但是，苏联也担心里根的真实意图是要破坏我们的体制。”

尽管苏联在超级大国的竞争中处于基础不牢的境地，但是克里姆林宫在1984年初仍然相信苏联在阿富汗能够获胜。当时苏联人控制着战争的节奏，在战场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阿富汗穆

斯林游击队只能以某种方式对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的设施进行零星攻击。但是，苏联人如何利用他们的暂时性优势，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那年春天，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位高级将领从莫斯科飞到苏军在铁尔梅兹的一个战地指挥所。这座城市位于阿姆河畔，与阿富汗隔河相望，是苏联向驻阿富汗苏军运送给养的交通要道，75%的给养都要经过铁尔梅兹。苏军第108摩托化师师长萨拉多夫少将在那里迎接这位将军。苏联计划在潘杰希谷地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萨拉多夫负责这次行动。苏军建立了一个机载指挥所，总参谋部的这位高级将领在这个指挥所内对这次进攻行动进行监督。这次进攻是苏联迄今为止在阿富汗进行的最大的一次行动。

4月20日，几十架图—16“獾”式高空轰炸机从苏联中亚地区的空军基地起飞前往阿富汗，开始对潘杰希谷地进行地毯式轰炸。地面的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在富有传奇色彩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指挥下隐蔽在山洞中。苏联使用了500磅和1000磅的炸弹，轰炸使大地猛烈地颤抖。但是，狭窄的谷地为抵抗组织提供了大量的山洞。在经过两天的轰炸之后，一列列苏军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开始通过谷地。与此同时，苏联直升飞机将伞兵部队投放到潘杰希谷地的正北面。毫无疑问，萨拉多夫很高兴地看到此次行动进展得相当顺利。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喜忧参半。苏军确实占领了潘杰希谷地的大部分地区，而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却设法躲开苏军的打击，以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来日再战。苏军总参谋部的这位高级将领返回莫斯科，与总参谋长商讨对策。他建议，苏联应该使战争逐步升级，并且设法最大限度地增强苏军的火力，这样就可以宣布在阿富汗获得了胜利。

苏联人正在引人注目地将他们那种能够致人于死地的所谓对阿富汗的承诺在战争中付诸实施。阿富汗政府军在1979年有8万人，而现在减少到了3万人，在此期间还补充了大量的新兵。

随着更多的苏军投入后来的大部分战役，因此这场战争已经“苏维埃化”了。苏联在其境内的中亚地区组建空降部队，并且将其投放到阿富汗去镇压叛乱的士兵，然后再穿过边界回到苏联境内。这支部队训练有素，比从前的阿富汗政府军更有战斗力。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于1984年4月摸索下一步在阿富汗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苏联对阿富汗所做出的承诺越是增加，苏联人在阿富汗的伤亡也就会越多，苏联政府的战争负担也就会越重。很明显，占上风的观点是，事实必将证明，这场战争将是砸向苏联灵魂深处的一只强有力的铁锤。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唐纳德·福捷认为，苏联的战线拉得太长了，存在着较多的裂隙。对阿富汗的占领，意味着要拖住苏联越来越多的兵力。如果美国政府能够提出一种既能够击退苏联的挑战又能够真正获胜的战略，那么就能够对克里姆林宫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他还从历史上找到了佐证，这使罗伯特·麦克法兰回想起，俄罗斯正是由于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①]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损失，因此才在俄罗斯引发了革命。

正当里根政府的官员们争论下一步在阿富汗采取什么行动时，瓦利·贝格第一次偷偷进入苏联的中亚地区。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招募他对该地区的局势进行评估，于是他动身前往孩提时期以及成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所居住的村庄。他希望他认识的两

① 20世纪初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权益而进行的以中国东北为主要战场的帝国主义战争。此次战争以俄国失败而告终，1905年9月5日双方代表在美国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根据和约，日本获得库页岛南部并取得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长春至旅顺间的铁路及其支线的管辖权，并攫取了对朝鲜的实际控制权。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进行的侵犯中国主权的非正义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而清政府竟然宣布把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而自己则是处于“局外中立”的地位，并在日本压力下，承认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为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埋下祸根。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加紧对朝鲜实行殖民侵略，1910年吞并了朝鲜。战败的沙皇俄国危机重重，终于导致1905年革命的爆发。——译者注

家人仍然生活在那里。从前在阿富汗的昆都士省，他要渡过阿姆河到达苏联的领土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的家乡谢尔汗的周围地区很不安全，阿姆河对岸是苏联繁忙的港口尼日尼一皮扬兹，那里到处充斥着苏联的保安人员。因此，他选择从谢尔汗西部的一个地方过河，在那里，阿姆河的两岸有高耸的岩石，河水中有大量的芦苇，可以掩护他过河。

贝格为了不冒被苏联人发觉的风险，没有坐船过河，而是在大约 700 码宽的冰冷的河水中泅渡过去。他搞到一张干燥的山羊皮，扎成一个袋子，里面充满了气，用它来渡河。当他到达苏联境内时，浑身上下又湿又冷。

上午，他花了几个小时步行到达了目的地，碰到了几位老朋友。他在村子里住了两天，这里支持反苏行动的种种迹象使他深受鼓舞，两位村民向他要枪，以便同苏联人作战；其他许多人要求得到印刷品和资料。许多人自发地为他当向导或者提供食物和庇护所。贝格将所有这些情况都向穆罕默德·优素福准将做了汇报。“许多报告表明，人民想要得到帮助，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优素福回忆道，“有些人想要武器，有些人想加入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还有一些人想参加在苏联境内的反抗活动。”

优素福根据贝格的考察结果而撰写的报告，使中央情报局深受鼓舞，于是立即为穆斯林游击队购买了数百只“黄道”牌橡皮艇，供他们运输游击队员和印刷品过河之用。但是，美国不愿意把苏联中亚地区的一些目标的卫星照片提供给游击队，游击队打算对这些目标进行攻击。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不想对穆斯林游击队的行动处处插手。如果游击队进行过于精确的攻击，对苏联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隐蔽目标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有可能提醒莫斯科，美国已经插手了。于是，不向穆斯林游击队提供有关阿姆河北面的情报，成为在苏联境内进行秘密战争的一个不能跨越的雷池。

那年春天，正当阿富汗战争开始传播到苏联中亚地区时，五角大楼千方百计阻止向苏联转让西方技术。通过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协定，许多国家陆续加入了技术控制联盟。与此同时，技术出口清单也在逐渐加长。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非法出口物品设法到达莫斯科，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苏联要想简单地通过采购来获取西方的技术诀窍，则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这种越来越紧的技术出口控制，使莫斯科在资源配置方面碰到了严重的问题，因此迫使一些苏联官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突破西方的限制。他们采取的一项普通策略，就是通过中立的第三国获得西方的先进技术。

美国前不久识破了苏联的这种策略，国防部、国务院和商务部的一伙官员决定通过两条途径来处理这一难题。一种途径，就是美国向这些中立国家施加压力，要他们停止此类行为，以此换取进入美国市场以及获得美国技术。瑞典与奥地利已经照此办理了。另外一种途径，就是美国官员迫使西方公司进行自律，并且要管好与他们做生意的境外公司。这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就像在1982年与欧洲在天然气管道项目上进行斗争时那样，正在更多地利用《出口管理与控制法》。

1984年春天，副国务卿威廉·施奈德领导的“战略技术转让跨部门高级委员会”制定了一套新的技术出口限制规则，从而挫败了苏联从第三国获取西方技术的图谋。新规则建议严格控制许可证的颁发，以此控制美国高技术的再出口。例如，如果北约成员国的任何一家公司想把美国控制的某种产品向任何非北约国家再出口，那么就必须向美国政府提供一份客户清单，以证明这种产品以后不会落到莫斯科手中。这一政策适用于所有美国控制的商品，因为西方有可能将这种商品根据美国颁发的许可证向中立国或者第三世界国家再出口。

美国对“美国技术”的定义很宽泛，这样就能够使华盛顿对

全世界的技术流动进行切实的控制。欧洲对此并不感到高兴，一位德国贸易官员指出："我们发现这种定义很不合理，例如，一家欧洲公司利用来源于美国的技术数据开发计算机软件，到头来自己还要受制于美国的出口规则，而不管美国对于开发这种软件的贡献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随着美国放开手脚进行高技术国防建设，对苏联的技术基础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美国对高技术的重视不仅反映在采购方面，而且日益反映在北约盟国的政策与军事学说之中。这将迫使莫斯科将其有限资源的很大一部分花费在武器系统的研制方面。

1984 年 5 月，卡斯帕·温伯格在布鲁塞尔出席定期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部长们聚集在一个私人房间里，开始讨论联盟的战略与政策。两年以来，温伯格一直静静地等待着，以期获得他的欧洲同行们支持盟国接受一项计划，即集中北约的技术力量来开发新兴武器系统。美国军事技术的发展前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1982 年，美国军队接受了"机降战役"学说，预言将出现一个积极防御的时代，包括打击敌人的纵深目标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用先进的电子和通讯设备。这个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增强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以及各种兵器的联合使用。这个学说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通过奇袭迷惑敌人，而且假定如果防御方一味地防守，那就会遭致失败。这个学说竟然设想美国地面部队进入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领土上进行反击。温伯格希望美国在先进武器技术的开发以及北约新战略的制定方面承担义务。

1983 年 12 月，温伯格向盟国建议，将 30 项新兴武器技术系统列为最优先项目。但是，他的这个建议被盟国领导人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因为这些领导人要么对新兴武器技术的概念缺乏信心，要么就是不想承诺增加他们的国防预算。但是，温伯格仍然不死心，暗地里对他的同行们进行游说。

在5月举行的布鲁塞尔会议上，情况出现了重大转机，温伯格这个颇有争议的建议得到批准。部长们指示独立欧洲计划小组组织全欧洲的力量在新兴技术的开发方面进行合作。这项协议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对这个计划做出初期财务承诺，而在于批准了这个总体概念。

北约盟国达成的这项协议强调，要扩展或者加速已经在一个或者多个盟国进行的各种新兴武器技术开发项目。如果这项计划获得成功，那么预计将在战场上产生一种戏剧性的效果。北约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初步研究的基础上，北约成员国认为，传感器、信号处理技术、数据处理技术和先进通讯技术等新兴技术一道使用，可以为盟军立即提供强大的力量倍增器。"

但是，当北约的国防部长们在1984年批准一项由"机降战役"学说的许多原则所组成的新战略时，他们也铭记着对开发新兴技术所做出的承诺。"后续军事攻击（FOFA)"学说虽然不如"机降战役"学说那么野心勃勃，但它在北约的战略中仍然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不过，苏联国防部还没有完全认同这种变化。

当北约正式将以前的军事战略的重点向新兴技术转移时，奥格尔科夫元帅呼吁苏联要重新努力，以便与美国并驾齐驱。他对苏联的一家军事报纸的记者说："最近几年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真正成为今后几年内出现更多的毁灭性武器以及以前从不知道的武器的先决条件。这些武器都是按照新的物理学原理制造出来的，许多国家正在研制这类新型武器，其中最重要的国家就是美国。在不远的将来，这方面的进展就会成为现实。如果我们现在不对此引起重视，那么我们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克里姆林宫决定不能在这场关键的技术竞赛中落后。在里根当政的前几年里，美国的国防采购费用每年增长25%，1980—1985年间的国防预算翻了一番。对此更为关注的苏联军方注意

到，五角大楼在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方面的费用猛增。1980—1985年，美国的新武器技术研发费用几乎翻了一番。1981—1985年，苏联的国防预算增长了45%，但苏联官方认为这一增长不足以抗衡美国在高技术方面所发起的挑战。因此，1984年春天，苏共中央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①]宣布："复杂的国际形势迫使我们将大量的资源转到加强国家安全方面。"这种政策转变使本来就虚弱的苏联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由于这种政策转变，苏联承诺把更多的资源转到高技术军事部门。据80年代领导苏联空间研究所的罗阿尔德·Z·萨格杰耶夫说，莫斯科花费了数百亿美元，以勉强对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做出响应。"在里根先生于1983年宣布'星球大战'计划以后，这个计划成为第一号的优先项目。"苏联为此安排了资金，从零开始发展科技工业设施。到1986年，创立了16个独立的综合企业，从事诸如激光和基因工程等方面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为了应付这些企业彼此之间的"扯皮现象"，成立了一个新的官僚机构。于是，一个代号为"格拉夫科斯穆斯"的机构在一夜之间便诞生了，它的全称非常拗口，叫做"空间技术在国民经济和科学研究中的开发与利用总管理局"。到1984年秋天，苏联科学院宣布投入1亿美元开发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企图跨越一代技术，在该领域的国际研究中确立自己的前沿位置。苏联加大人员与资金投入，进行下述研究：

● 粒子束武器研究，在高尔基市附近的萨罗瓦进行，

---

① 生于1911年，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于1984年2月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国防会议主席，4月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上台后不久，其健康状况一直不佳，经常不能履行职务。1985年3月10日逝世，其职务由戈尔巴乔夫继任。——译者注

由 H·I·帕夫洛夫斯基领导；

- 质子束和近红外激光束研究，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秋拉塔姆、谢米帕拉京斯卡和克拉斯纳亚·热赫卡进行；
- 在列宁格勒谢弗莫夫研究所建造聚变反应堆。

但是，除了转移资源的使用之外，由美国国防建设所带来的技术挑战，将最终迫使克里姆林宫要想不顾一切地企图与美国并驾齐驱，就要对其经济体制进行结构性的变革。莫斯科将与美国进行一场重视数量的竞赛，而重视创新和质量的技术挑战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苏联的经济体制几乎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它抑制了人们的创造性，产品质量很低劣。苏联武器系统所采用的许多技术都是从西方获得的。对于苏联国防部来说，业绩糟糕的国内经济只要不侵害军队的相关权利，反倒便于管理。但是，由于里根政府承诺要开发诸如“战略防御倡议”这样的高技术武器系统，那么苏联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灾难了。早在 1981 年，苏联国防部就发表了一篇专题文章，明确指出了这种变革的必要性。这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国防力量的经济基础》的文章明确指出，不断衰退的苏联高技术工业部门“可能降低军事实力的基础——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而对国防实力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现在一种落后的经济体制不仅意味着生活消费品的低劣，而且也意味着苏联在军事实力方面已经沦为一个二流国家了。简而言之，在一个高技术得到强化的防御环境中，竞赛规则已经发生了

变化。正如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①]的那张巧嘴所指出的那样，突然之间，“对国家安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武器数量，不如从根本上创造和生产新式武器的能力那么重要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苏联之所以出现改革运动，这是里根政策的必然结果。“从许多方面看来，苏联的改革是一种军事上的主动行为，”叶夫根尼·诺维科夫回忆道，“他们早在1982年就谈论这件事了，并且把它看作是保存苏联军事实力的需要，尤其是在美国进行军事建设的时候更应该进行改革。”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伊利亚·扎斯拉夫娅则是这样认为的：“罗纳德·里根是苏联的改革之父。”

---

① 生于1928年。1985—1990年任苏联外交部长，他是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同僚之一，也是其改革政策的最得力的支持者。1990年12月突然辞职，以抗议他所谓的“独裁的开始”和戈尔巴乔夫政府内保守分子影响的日益增长。1991年苏联“8·19”事件后，他短期复任外交部长（11月19日—12月25日），亲眼目睹了苏联的垮台。1992年3月返回家乡格鲁吉亚，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是年10月当选为议会议长（相当于总统的新设职位）。1993年当选格鲁吉亚总统，2000年连任总统。——译者注

第十四章

1984年的夏天漫长而又酷热。7月，巴黎统筹委员完成了向苏联集团出口技术国际禁运清单的评审，对军需品、原子能和国际合作这三个清单都进行了修改和扩展，增加了有关计算机软件、通讯设备和小型军用计算机的内容，并且进一步加大了强制执行的力度，尤其是要停止向第三国转运物品。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成员国同意加强协调，努力停止向第三国转运物品。因此，苏联集团获取西方技术比以前更加困难了。

莫斯科对里根的不安还没有缓和。6月21日，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向克格勃派驻世界各地的情报人员发出通知，获取更多有关美国的情报对于苏联是至关重要的。他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国际形势的恶化以及部分来自美国的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意味着我们这个机构要与美国这个主要对手展开更加激烈的斗争。"由于里根政府的成立，使国际形势出现了特殊的情况，克格勃的海外机构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克格勃总部严厉要求其所有的海外情报站，每年要提供两份有关美国的情况（以前只对某些情报站提出了这种要求。）

苏联人没有天真地认为他们有能力影响美国的大选，但是，他们显然想要竭力削弱里根的当选机会。叶夫根尼·诺维科夫回忆道："苏联领导人普遍认为，任何人当选都要比里根当选强。"怀着有可能动摇舆论的希望，苏联领导人公开阐述他们对于华盛顿政府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发挥了显著作用。他几乎成为苏联外交界的长青树了，而且许多美国

人都认识他的面孔。7月27日，正在雅尔塔度假的葛罗米柯接待了来访的美国前参议员乔治·麦戈文。1972年，他曾经是美国总统候选人，1984年又获得了一次机会，但竞选初期的欠佳表现使他不得不放弃这次机会。麦戈文的这次来访，是他本人向苏联发出的一种和平姿态。两人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坦率会谈，葛罗米柯向美国客人敞开了心扉。

葛罗米柯告诉麦戈文，他希望里根再次当选，但他无法预见美国政府是否会停止其“反苏”政策。里根及其助手们“总想制造麻烦，”他说，“他们想削弱苏联体制，并且想把这种体制打倒。”

他们在会谈中商定葛罗米柯于美国大选之前的9月末或者10月初访问美国的计划。葛罗米柯拒绝白宫要他把里根描绘成一位更具和平色彩的政治家的请求，因为他认为这是白宫借以挫败民主党攻击里根的一种诡计。民主党说里根正在把超级大国之间的竞赛引向危险的战争。出于一种策略性的考虑，葛罗米柯计划在赴白宫的前一天与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会见。

9月23日，葛罗米柯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这是一次主题鲜明的演讲，描述了里根政府有关削弱苏联的秘密战略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轮廓。葛罗米柯尖锐地攻击华盛顿“干涉波兰的内政”。他在演讲中似乎表明他已经阅读了美国的NSDD—32号文件，声称美国正在企图“动摇波兰的社会主义基础”。他谴责美国政府正在从事一场经济战，“通过向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施加压力，来约束他们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最后，他对华盛顿挑起“军备竞赛”的行径予以谴责。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一口咬定美国集中研发新兴武器技术系统，对苏联的体制构成了威胁。他尖锐地问道：“谁能够相信促使加速新武器研发步伐的行为是对和平的关注呢？”

五天之后，葛罗米柯在白宫讲了同样的话。他直截了当地告

诉里根："透过所有这些谎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就是想让苏联在美国之前耗尽自己的资源，最后被迫投降。"里根极富个人特性地保持了节制，以幽默和微笑避开了葛罗米柯的指责。

正当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参与制定下一步对外政策时，国内的经济状况引起了他们的极大的兴趣与关注。为了维持经济的复苏，他们达成了共识，把降低国际能源价格作为一项重要的目标。很显然，这对美国的工业将很有好处。里根政府中几位更具有战略头脑的决策人物——卡斯帕·温伯格、比尔·凯西、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官员认识到，较低的能源价格还会对克里姆林宫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凯西和温伯格告诉沙特官员，美国喜欢低廉而稳定的石油价格。但是到了 1984 年底，总统竞选活动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变成更为直接的和需要全力以赴争取的目标了。

里根政府已经对沙特王室投入了重大的政治资本。"沙特人是里根战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阿朗·菲耶尔回忆道。除了在好几个重要的地区问题上支持美国之外，利雅得还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和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提供财政支持。不过，对石油定价产生影响也是对美国的一种支持。

美国政府确保让沙特阿拉伯人购买到 AWACS 和先进战斗机，并且最近利用特殊的总统权威将"毒刺"导弹运到沙特。为了满足波斯湾的特殊安全需要，美国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军事司令部——美军驻中东司令部（USCENTCOM)。总统甚至给法赫德国王发了一份正式照会，明确了他对于沙特王室所做出的承诺。1985 年初，美国空军将开始实施"和平盾牌"行动，这将是在北约成员国之外部署的技术最先进的综合防空系统。这是一个通过计算机处理的控制、指挥和通讯系统，能够将沙特的 AWACS

飞机与 5 个地面指挥中心和 17 个远程雷达站联接起来。

“和平盾牌”行动是为了阻止任何地区性威胁。如果威慑失败的话，那么这个系统便会与沙特空军协同做出反应，包括密集地发射空对地导弹。美国和沙特希望“和平盾牌”行动能够在 10 天之内抵挡来自任何方向的攻击，直到美国的援军到达。它也使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军事承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其中包括 400 名沙特的长期工作人员加入驻扎在沙特阿拉伯 1700 名美国军事人员的行列之中。美军战地指挥所将与美国军舰“拉萨尔”号[①]保持永久性的联系，它是美军驻扎在海湾的一支舰队（有 6 艘战列舰）的旗舰，也是美军驻中东司令部所属部队在美国本土的战地指挥所。

美国政府在从来没有把所提供的安全承诺作为一种华丽的装饰品的情况下，其明显的意图就是希望能够影响沙特的石油定价。温伯格认为：“我们向沙特出售所有这些武器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降低石油价格。”

1984 年秋天，在预定访问沙特的前几天，凯西拉上了总统情报督查委员会主席格伦·坎贝尔。他宁可与坎贝尔以及这个规模较小的委员会共事，也不愿意与那个大得多的总统对外情报咨询委员会打交道。他们谈论了好几个议题，然后凯西向他解释了政府的意图。“他正准备为降低石油价格而与沙特人接近，”坎贝

---

① 美国海军的一型杂务指挥舰，原来属于“罗利”级两栖船坞运输舰中的第 3 艘（LPD—3），1972 年改装时加装了旗舰指挥和通信设施，增设了空调通风，并且全舰漆成白色，以减小太阳光的辐射，之后便开赴海湾，成为美国驻中东特遣舰队的指挥舰，舷号 AGF—3。作为两栖运输舰艇改装的指挥舰，“拉萨尔”号基本没有装备进攻性或区域防空性武器，仅有少量软、硬结合的近程防御武器。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它指挥以中东特遣舰队以及增援的 2 艘战列舰、2 艘巡洋舰组成的战斗群（计 12 艘舰艇），在波斯湾内对预定目标实施了导弹攻击，进行了小规模的海上作战。——译者注

尔回忆道，“他没有讲太多的细节，只是咕哝了几句。”

在整个1984年，里根政府进行了一场游说活动，以取得对降低国际石油价格的支持。8月1日，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谢赫·扎基·阿勒·亚曼尼与英国能源大臣和好几个大石油公司进行谈判，以阻止石油价格的下跌，守住每桶29美元的底线。这是一种支撑石油价格的尝试，此举令华盛顿感到不安。在英国与沙特宣布了谈判情况的两周之后，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向能源部长唐纳德·霍德尔发送了一份备忘录，主张美国要“顶住任何为支撑石油价格而加在我们身上的压力”，努力争取较低的石油价格。

其后不久，霍德尔在伦敦召开的一次石油大会上发表公开演讲时发出这样的疑问：“难道（石油）消费者们有目共睹的石油价格已经足够低了吗?”他没有直接回答自己的问题，但他的问话所隐含的意思就是目前的石油价格不是最低的。几周之后，霍德尔采取了一项非常公开和不同寻常的步骤，向美国各大石油公司发了一份电传，批评欧佩克“企图通过人为地抬高石油价格或者随心所欲地限制石油产量来操纵国际石油市场。”美国政府看来正在采取措施“降低”石油价格。

美国经济将从石油价格的降低中获得极大的好处，这是非常合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心意的。国务院在为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准备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重申了财政部的各个部门于1983年在一份有关国际石油价格的报告中所公布的调查结果。“有可能降低石油价格的这一前景，促使财政部对各个部门于1983年所研究的主题进行评审。结论认为，较低的石油价格将对世界经济有好处，这种进展可能会对出口商造成一些问题，但不会对世界贸易或者金融体系产生威胁。”

谢赫·亚曼尼不会对美国的这种努力熟视无睹。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亚曼尼在与美国政府官员和外交官员进行私下磋商之后认为，“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正在发起一场压低石油价格

的阴谋。”一些欧洲国家的官员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法国的一位高级别的能源官员让·西罗塔告诉美国的一位官员，霍德尔的意见是美国高级能源官员首次对石油价格的问题公开发表明确的看法。美国官员在给国务院发回的电报中指出：“西罗塔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来，但他暗示美国可能推迟降低石油价格的行动……”

9月，比尔·凯西在沙特阿拉伯与法赫德国王会见，但此举也没有使美国与沙特之间的关系得到加强。在王宫里，凯西与法赫德就像他们以前经常做的那样，回顾了海湾的战略形势。阿富汗战争正在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凯西向国王明确表述了美国的阿富汗政策中某些更为重要的方面。

然后，凯西提出了国际石油定价的话题。他告诉法赫德，现在的石油价格太高了。如果石油价格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那就会扼杀掉美国经济的复苏。此外，沙特王室会因削减石油产量而蒙受损失，能够受益的只有沙特的敌人——伊朗、利比亚和苏联。由于沙特维持了这么高的油价，因此这些国家正在开足马力生产石油，从石油生产所获得的资金正好维持了苏联在南也门、叙利亚、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的存在。由于石油价格这么高，因此天然气正在代替石油。

法赫德听凯西把话讲完后，不经意地点了点头。他说，他一般地同意美国政府对形势的判断，但他还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形势的发展促使他做出反应。法赫德明确使用了“fee al—wakea”这个措辞，它是一种阿拉伯的表达方式，意在强调凯西所说的都是事实。

现在凯西所能做的只有促使美国与沙特之间在降低石油价格的问题上逐渐加强外交磋商，这个问题自里根政府成立之初就一直存在着。“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且与沙特官员（国防部长、班达尔王子和法赫德国王）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卡斯帕·温伯格

回忆道，“他们知道我们想尽可能地降低石油价格。这样有利于我们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局势，并且不使更多的金钱落入苏联人的腰包。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作为限制苏联获取硬通货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随着苏联的第一条天然气管道建设于 1982 年 9 月向前推进，降低石油价格的努力变得格外有必要了。“降低石油价格变得更为重要了，因为天然气价格是基于石油价格而制定的，”温伯格说，“石油价格越低，苏联从出口石油或者天然气中所获得的金融利益就越少。”

1984 年底，里根政府官员对阿富汗战争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了。从许多渠道传来的信息虽然没有挑明，但是都明确设想苏联将最终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美国的援助充其量也只能是延长一下苏联人所遭受的痛苦。美国安全委员会的一些官员，诸如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和罗伯特·麦克法兰等人还是相当乐观的，相信莫斯科或许会被迫退出阿富汗。但是，对于抵抗组织来说，这是艰苦的一年。由于苏联更多地动用空中力量，因此战斗更为激烈，对穆斯林游击队目标的打击比以前更为猛烈了。苏联在春季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而且在夏季重复进行这种攻势。即使莫斯科在战场上还没有获得胜利，也对抵抗组织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人员伤亡比 1983 年要多得多。苏联采取大规模炮击的策略，使阿富汗的平民人数日益减少，不少人逃到了巴基斯坦或者伊朗。穆斯林游击队极其重要的后勤基地一个个地消失，越来越多的物资供应只好从巴基斯坦的基地通过陆路运进阿富汗，这对后勤供应来说真是一场恶梦。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阿赫塔尔将军强烈地预感到，苏联在来年春天将进行更为猛烈的军事行动。他非常明确地告诉华盛顿：穆斯林游击队将获得胜利，但先决条件是他们必须获得必要的物资支持。

里根政府的官员们与国会中那些同情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的

议员们协调一致，展开艰苦的工作来维持抵抗运动。里根要求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在1984年要赋予阿富汗计划更高的优先权。对穆斯林游击队提供的援助将成倍增加，这要归功于在国会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阿赫塔尔和穆罕默德·优素福以较小的投入部分地控制了战争的进程。每年花费1亿美元，这在美国的历史上是最大的一场隐蔽战争。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苏联在阿富汗存在着大量的部队，而且采取了残无人道的战术。在1984—1985年的冬季，优素福打算在喀布尔发起一系列的攻击。这些计划在军事上是可行的，而且在战略上会取得效果，但是从未付诸实施。“最终归结为一个钱的问题，”优素福回忆道，“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预先运输物资的费用或者购买防寒服装吗？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许多游击队员没有冬季服装。资金的制约搞得优素福每天在购买服装与武器之间都处于顾此失彼的境地。武器总是处于决定性的地位，比起服装来更为重要。

阿赫塔尔告诉华盛顿，也许存在着一个机会之窗。改变对苏战略，是美国做出新的承诺的一种反映，不过也可能是一种绝望的信号。苏联以前能够承受的损失，现在再也无法承受了。中央情报局显著增加的经费将转变为更多的武器、弹药、训练和物资供应。苏联人随着更深地介入战争，其伤亡人数也在上升。

凯西在年初所获得的用于训练的额外资金，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使用。将注意力集中于穆斯林游击队在阿富汗北部各省行动的战略使苏联军队大吃一惊，试图确保供应线安全的数千名苏军士兵陷入了困境，而穆斯林游击队则正在叩击着苏联中亚地区的大门。

穆斯林游击队在经过几个月的特殊训练之后，便获得了某些显著的成功。据报道，1983年有7名苏联高级官员在喀布尔被杀，1984年的被杀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另外，正在接受训练的

穆斯林游击队指挥官被组织起来，对首都的苏联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帮助下，为穆斯林游击队提供了所有的器具。在战斗中使用了中国制造的有效射程为 4 至 6 英里的火箭筒，以及美国提供的详细的卫星照片。1984 年中旬，数千枚火箭落到了苏联境内和阿富汗的军事装置上，也落到了克格勃的办事处和阿富汗秘密警察（KHAD）的头上。因此，苏军高级将领的士气非常低落。

但是，巴基斯坦方面为了确保使喀布尔的苏联官员感到不安和神经紧张，向凯西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阿赫塔尔将军想要一些狙击步枪（“包装箱”），这样穆斯林游击队就可以瞄准苏联军队的指挥官和将军们了。中央情报局早已查明了苏军主要将领们的住所，并且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了跟踪。从莫斯科和塔什干来访的苏军将领也受到了监视。对这类人进行打击需要讲究方式方法，所提供的情报一定要全部可靠。凯西从军事角度来看很赞赏这个主意，但这个问题很敏感：枪支是用来进行暗杀活动的，而美国有一项总统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政府介入针对外国官员的暗杀活动。

凯西于 1985 年初就这个问题求助于中央情报局的律师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律师们认为此议不妥，因为“暗杀”的名声实在是太臭了。凯西有点拿不定主意。他大声疾呼：“这是战争。美国提供火箭在战场上杀死苏军官员与提供步枪杀死他们，这二者之间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律师们告诉他：“二者的区别在于目的不同。如果我们提供步枪的目的是为了杀死苏军将领，那么我们就违犯了有关暗杀的总统指示，你将为此而坐牢。”

据传闻，凯西消除了那些顾虑。他说：“那么，如果任何人问起这件事的话，就不要告诉他们这些步枪是用来搞暗杀活动的，告诉他们这是一些猎枪。这便是我们的目的。至于他们用这些枪猎取什么目标，那要由他们来决定，而不是由我们来决定。”

美国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对这个建议争论了好几个月。最后，大约一百个“包装箱”的步枪发运出去了，并且训练穆斯林游击队员如何使用它们。但是，美国将不让游击队分享有关苏联军事将领的活动的情报。

为了进一步实现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里根政府于1984年底在苏联中亚地区发起了一场激烈的宣传活动。美国与巴基斯坦、中国和土耳其协同行动，鼓励当地居民抵制苏联的统治。“这场行动就是穿过边境向苏联中亚地区分发印刷品，在该地区散布不和，”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回忆道。美国负责对巴基斯坦方面的行动进行指导，这些行动是由阿富汗抵抗组织和巴基斯坦情报部门进行的。“我们扮演了一个支持苏联中亚地区反共运动的角色，”穆罕默德·优素福回忆道，“除了走私宣传品之外，我们还建立了秘密广播站。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广播设备和广播素材。”美国政府火上浇油，希望为克里姆林宫制造更多的国内麻烦。

第十五章

罗纳德·里根在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决定性胜利的6周之后，接待了与他在意识形态方面性情相投的一位好朋友。此人便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她来到华盛顿，要与里根讨论许多问题，在苏联发生的事件是首先要讨论的话题。

他们在美国总统位于马里兰州林木茂盛的丘陵之中的休养地戴维营[①]举行会谈，几位经过挑选的助手也参加了会谈。他们两人之间非常随便，相互直呼其名。撒切尔夫人简要地告里根总统，她于12月16日与苏联统治集团中的一颗正在上升的新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会谈。她告诉里根，此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她所见过的任何其他苏联领导人都不一样。报纸上披露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苏联经济的停滞符合美国的利益。戈尔巴乔夫对此极为关注。他还关注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用撒切尔夫人的话说，莫斯科“想不惜一切代价促使这一倡议停止”。里根从撒切尔夫人的言谈中，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

---

① 美国总统的休养地。在马里兰州北部弗雷德里克县，东南距华盛顿市113公里。休养地为一片景色优美的山林区，面积81公顷，四周有高度安全的围栏，不向公众开放。1942年由罗斯福总统建立，称为“香格里拉”（意为“世外桃源”）。1945年由杜鲁门总统正式定为总统休养地。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其孙子的名字命名为戴维营。休养地由总统军事助理办公室管理，内有总统办公室、宅邸、游泳池和会议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总统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此会晤后，美国总统常在此与外国元首会谈。——译者注

不久，讨论转到了“战略防御倡议”以及美国政府的有关计划。撒切尔夫人这是第一次亲耳聆听里根直接而坦率地向她介绍“战略防御倡议”。她立即就注意到，里根在介绍这个计划时，几乎每句话里都洋溢着一种激情和理想主义。他向撒切尔夫人解释，“战略防御倡议”终究会成为一个国际体系，最后可以与莫斯科分享。它对于全球都有好处。撒切尔夫人虽然表示支持美国的这个计划，但她对此的兴趣并不像里根所想象的那样大。然后，她就研究计划以及有可能对战略核平衡产生的后果方面提出了几个问题。

里根总统放下了他那种高高在上的架子，承认自己不能确定从何处着手这项研究计划，也不知道能否形成一个切实可行的系统。但是，美国确实有理由对此进行研究。此外，他还告诉撒切尔首相，这项计划即使不会取得进展，也会在经济上对苏联造成极大的损害。“(总统）认为，这种损害的程度有一个切实的限制条件，那就是苏联政府究竟要让它的人民过多长时间的紧日子。”

撒切尔夫人的访问为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它关于把主要西方盟国纳入“战略防御倡议”研究计划的意图取得了进展。在盟国的领导人中间，撒切尔夫人与里根的哲学观念最为接近，而且大体上赞同他的这个战略防御系统的设想。曾经是亲英派人士的卡斯帕·温伯格以及罗伯特·麦克法兰和乔治·舒尔茨都感到，只要得到撒切尔夫人的支持，那么就能使主要盟国在接受“战略防御倡议”方面取得进展。在与麦克法兰一道进行了一些案头工作之后，撒切尔夫人感到要得到欧洲对“战略防御倡议”的合作，下述四点很关键：一是在超级大国的战略平衡中不能使“战略防御倡议”取得优势；二是在部署“战略防御倡议”时，要根据现有条约的义务进行谈判；三是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而不是削弱威慑力；四是超级大国应继续进行谈判，设法在双方现有的基础上削减进攻性武器系统。英美双方对这四点达成协

议之后，撒切尔夫人宣布，她“坚信‘战略防御倡议’的研究计划能够向前推进”。

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口头和公开的支持证明，里根总统的“战略防御倡议”可以由梦想向研究计划过渡了，参与研究计划的均为西方世界的主要科学家。在今后数年内，温伯格将进行艰苦的工作，以便与美国的亲密盟国达成协议，在新的体制下对研究工作进行指导。

1985年1月，美国政府获得了有关苏联计划的详细情况，苏联大张旗鼓地要使阿富汗战争升级。这份情报主要是从中央情报局在苏军总参谋部的情报源得到的，它是一份详细、直接和真实的情报。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将这份资料翻译成英文后放在文件夹中，比尔·凯西立即带着这些资料赶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的温伯格那里。

由中央情报局的语言学家翻译的这几十页资料，是从苏军总参谋部的一次会议以及苏联有关阿富汗的军事政策的一份报告中摘录出来的。这些资料都指出，苏军总参谋部要采取新的步骤，以迅速赢得战争的胜利。苏军将领正在计划通过更多的作战方式和高级战术来迅速扩大战争。苏联将派遣更多的受过特殊训练的突击队员（“斯佩茨纳兹”）与穆斯林游击队作战，突击队将使用先进技术，并且以特殊装备进行夜间攻击。几乎四分之一的苏军特种突击队员将被派往阿富汗。与此同时，克格勃的力量也将显著增加，以援助特种部队和正规部队。“鄂木斯克近卫军”具有机动性能的尖端而完整的战场通讯中心将用来截取穆斯林游击队的战场通讯信息。对反叛者的目标进行协同空袭，将成为一种正常的行动，并且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来进一步削弱敌人的意志。

特种武器包括经过伪装的地雷和液态气体炸药，苏军有可能使用这类武器。苏联在这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中，或许最为重要的

行动就是派遣了一名新的战地指挥官米哈伊尔·扎伊采夫将军，他是苏军中战功卓著的将领之一。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是苏联驻德国军队中很有声望的指挥官。他在阿富汗的出现，表明苏军提高了活力，将采取新的战略。一些文件显示，苏军总参谋部正在受到来自苏联国内强硬派的压力，要他们尽快赢得战争的胜利。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两年内取得完全的军事胜利。

在美国向穆斯林游击队提供的大量援助中，将包括更多的武器和供应品。但是，如果苏联重新发动猛烈进攻的话，那么就需要对战略与战争目标进行根本性的转变。莫斯科显然已经决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如果华盛顿对这一点办不到的话，那么抵抗组织的失败可能很快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在中央情报局把这份情报送出的几天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的官员就已经行动起来了。由军方人士和专家组成的一个秘密小组开始仔细研究苏联在战场上所采取的策略，并且提出了有效的对策。国家安全委员会通常在星期五向总统呈送有关苏联的情报资料，此次这份摘要就作为这种情报资料的一部分而直接呈送总统。里根接到这份摘要后很快就看完了，他要凯西、温伯格和麦克法兰尽快采取行动。“总统甚至要我们的行动再快一些，”麦克法兰回忆道。

1985年1月底，国家安全规划小组召开了一次会议，第一个议题便是阿富汗以及苏联使战争升级的最新计划。总统通常都是友善地坐在那里倾听助手们的争论，而这次则一反常态，一开始就使会议充满了火药味。他严厉地说：“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不仅要使穆斯林游击队生存下来，而且还要他们获得胜利。”他要求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制定一项新的战略，并且把它搞成一份秘密指示，以便总统签署。

麦克法兰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文森特·坎尼斯特拉罗、唐纳德·福捷以及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上将一道，整理出一份重

新确定美国战争目标的文件。1985 年 3 月，里根总统以第 166 号国家安全决策指示的形式签署了这份文件，它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美国关于阿富汗战争的特殊目标，并且把这些目标提到战略的高度。美国政府的整个外交机器都要支持这一努力。“所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都感觉到，我们必须改变参与阿富汗战争的途径，”麦克法兰回忆道，“我们觉得，我们已经造成了一种僵局。如果我们能够击败新的挑战并且增强对穆斯林游击队的支持，那么我们就能够获得胜利。”

这份新的国家安全决策指示分为七个关键部分。首先，对穆斯林游击队的武器供应与分发应该更加有效。要特别注意为他们提供更先进的高技术武器系统。其次，美国情报部门要收集更多有关苏联军事行动的情报，要特别注意苏军的战场命令、战术和军队建制等方面的情报，还要对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政治与军事意图进行评估和监视。

第三个关键部分就是这场战争的国际政治代价正在提高。通过与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进行合作，美国将对苏联施加最大的政治压力，以促使它撤军。苏联一方面要占领阿富汗，另一方面又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二者之间也将存在着一种关联。

但是，NSDD—166 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这份文件的一个很长的附件的一段话，它清楚地阐述了里根政府的目标。当卡特政府于 1980 年开始实施秘密援助穆斯林游击队的计划时，就做出了一项搜集情报的绝密决定，并且描绘了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那就是对苏联占领军进行“袭扰”。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胜利并不仅仅是一种遥远的幻想，而且是一个残酷的玩笑。美国政府还担心如果在阿富汗太过咄咄逼人，那就有可能激怒莫斯科。最后，美国制定了一项适可而止的秘密援助计划，而且也没有明确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五年来，里根政府一直深受这项决定之苦。不过，NSDD—166 中那项新的附件改变了美国的目标，那便是在

阿富汗彻底击败苏联军队，从而获得最后的胜利。

由于美国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NSDD—166 就成为一个重要分水岭，标志着美国要努力把苏联军队赶出阿富汗。“在里根入主白宫之前，美国没有一项协调的（秘密）计划，”70 年代和 80 年代供职于中央情报局的文森特·坎尼斯特拉罗说，“我们在 1985 年之前对阿富汗战争没有一项连贯的对策，NSDD—166 成为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当然，由于在这个转折过程中很容易出错，因此也不能对此估计过高。如果我们注意一下 1985 年之前战场上的军事形势，双方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僵持状态。穆斯林游击队所能做的就是发动一场‘打了就跑’的游击战，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挡住苏联军队的高科技武器。在里根总统签署 NSDD—166 文件之后，形势很快就改观了。”华盛顿制定了新的政策目标，阿富汗战场上的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阿富汗是莫斯科在 1985 年初所面临的两个地缘政治挑战之一。苏联每年要为这场战争付出 30 亿—40 亿美元的代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向穆斯林游击队提供了武器装备。“我们总感觉到这对于莫斯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钱，这笔专门用于战争的金钱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经济，”罗杰·鲁滨逊回忆道，“在阿富汗和其他任何地方耗费苏联宝贵的硬通货，这是我们的‘三位一体贸易战略’所取得的成功。”美国对波兰的制裁，迫使莫斯科每年拿出 10 亿—20 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来支持雅鲁泽尔斯基政府。在苏联帝国的这两个前哨阵地，美国的政策就是制造危机。

但是，莫斯科能够应付这些挑战，或者它相信能够应付得了。苏联可以应付这种决斗，因为它设想波兰和阿富汗的抵抗运动最终将遭致失败，或者至少会衰退为一些无足轻重的小麻烦而已。苏联于 1985 年初最为关注的事情就是“战略防御倡议”。当许多西方科学家怀疑这个计划能否付诸实施的时候，莫斯科却以为美国能够取得成功，因而立即行动起来了，把资源大规模地转

向军事工业部门，不顾一切地企图保持苏联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力。

里根政府很清楚克里姆林宫对这个计划是如何地关注。克格勃驻伦敦的一位官员、同时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劳的双重间谍奥尔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了有关苏联反应的报告。这些报告的摘要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中间进行了传阅。根据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情报，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陆军武官 A·I·萨任上校对一群外交官和情报官员说，苏联军方人士认为，“战略防御倡议”系统的有效性有可能达到 90%。他还认为，苏联几乎不可能与美国并驾齐驱。

苏联对“战略防御倡议”的关注，还明显表现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向他的接头人提供的克格勃于 1985 年 2 月起草的一份报告中。在这份报告中，克格勃警告说，里根政府“正在努力获得对于苏联的军事优势”；“战略防御倡议”“被广泛宣扬为一种在核战争中保护全体美国人民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美国希望“把苏联拖入某些领域中代价昂贵的军备竞赛，美国估计在这些领域中苏联落在美国的后面。”这个系统给苏联敲响了警钟，报告列举了一系列克格勃做出的重大反应，包括“苏联方面可能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反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并且在日内瓦会谈中坚持原有的立场。”

1985 年初，针对克里姆林宫的秘密经济战开始打响了。苏联预期从西方获得的出口信贷、硬通货和技术，有的被停止了，有的则被砍掉了。在苏联获取硬通货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项目虽然继续进行，但其规模被削减了一半，而且比原计划推迟了 2 年。虽然美国的制裁取消了，但它严重阻碍了项目的施工进度。“情报表明，制裁至少使工期延迟了两年，”罗杰·鲁滨逊回忆道。苏联石油部从前的一位专家奥尔格·季科夫也认为：“当我们指责美国的制裁导致工期推迟时，这

并不是找借口，而是事实。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首先，我们没有涡轮机，于是想自己制造，并且打算以后可以重复使用。然而，一切都是那么的混乱，工作计划全被中断了。这种状态长达两年之久，浪费了我们数十亿美元的金钱。”

里根政府想通过故意散布假情报的计划使工程建设进一步复杂化。“比尔·凯西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某些人，不要过度担心天然气管道项目，即使工程全面恢复施工也不必担心，”罗杰·鲁滨逊回忆道，“他们面临着许多难题，包括管道与涡轮机的断裂、控制装置着火，等等。所有这一切到底是归咎于苏联的无能呢，还是归咎于运气不佳呢？我们对此有理由表示怀疑。”

项目推迟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是一个突然的打击。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原来被设想为一棵摇钱树，帮助莫斯科度过这段经济困难的时期。1980 年，苏联计划这个项目或许到 1985 年就可以每年获得 80 亿—100 亿美元的硬通货收入；到 90 年代，在第二条天然气管道修通之后，每年可以获得 150 亿—300 亿美元或者以上的硬通货收入（取决于石油的价格）。但是，由于里根政府不屈不挠的立场，结果第二条天然气管道无法建设了。加之美国的制裁，莫斯科眼睁睁地盼望着巨额硬通货的来临，却白白地等待了额外的两年时间，使得经济陷入混乱状态。此外，由于第一条天然气管道建设的推迟，他们或许损失了另外 150 亿—200 亿美元的硬通货收入。

与此同时，西方技术在苏联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现在这些技术向苏联的输入却急剧地减少了。虽然不可能计算出美国严密限制向苏联转让技术的法令使苏联经济到底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是某些报告指出，苏联每年的损失为数十亿美元。1984 年 12 月，美国发表了一份题为《国防部综述报告：技术转让对美国和西方安全的总体影响》（在非正式的场合下称其为《总体评估报告》）的正式报告。一个工程师小组对近

几年来美国拒绝颁发的 79 项技术出口许可证进行了审查，试图确定这些出口项目对于苏联工业经济基础所具有的价值。据估计，除了研发成本和人力费用之外，这些技术本身在 12 年内每年的价格就是 5 亿—10 亿美元。美国政府每年拒绝颁发数千个出口项目，因此总成本可能会更高。“我们必须顽强地推行这项政策，”什泰夫·哈尔珀回忆道，“因为这项政策显然使苏联人无法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技术。他们可能需要从西方获得某些机床，我们应该压制这些交易。这样一来，苏联的一家工厂便会停顿数月之久。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摸到了苏联人的脉搏。”

美国仅仅在一条途径上完全执行了对莫斯科发起经济战的策略。1985 年，获得较低的石油价格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关键目标。美国在许多方面都占据了优势。“我们想降低国际石油价格，这对美国经济将具有极大的好处，”当时的白宫律师埃德温·米斯说，“事实上，这点麻烦对于莫斯科来说仅仅是蛋糕上的那层糖衣。”但是，有个别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它与莫斯科不稳定的经济形势息息相关。罗杰·鲁滨逊回忆道：“比尔·凯西几乎每天都在密切注视着石油价格，我们也是如此。它是苏联获取硬通货的主要来源，也是军事工业联合体的主要资金来源。”有人认为，只要简单地使市场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就可以获得较低的石油价格。而其他一些人，诸如凯西和温伯格，则认为沙特阿拉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需要得到美国的鼓励和支持。

1985 年初，一位外国政要在这种背景下对美国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国事访问，此人便是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他是里根总统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时来访的首批外国政要之一。对于沙特阿拉伯人来说，大幅度提高石油产量并不困难，而且油价相对便宜。沙特人从沙漠下面开采石油的成本仅仅为每桶 1.5 美元，因此他们可以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产油国更有条件从较低的市场价

格中获取丰厚的利润。

美国政府为了降低石油价格而不动声色地进行活动。温伯格一般性地向沙特阿拉伯提出了这个问题，凯西在9月份访问沙特期间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能源部长约翰·赫林顿公开表示要千方百计降低石油价格，因为他认为目前的高油价是欧佩克的政策所致，并不能真正反映市场的真实情况。

石油价格的降低，将立即对经济产生影响。每桶石油的价格下跌5美元，将使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4%，同时还能够减少通货膨胀和增加个人收入。较低的油价还降直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这对我们的各方面都有好处，”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上将回忆道，“尽可能降低石油价格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我们把降低石油价格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目标。”石油定价是总体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显然已经成为美国的政策了。波因德克斯特说：“如果在此之后发布的一份国家安全决策指示NSDD—75或者一项秘密行动中发现沙特阿拉伯人一般性地提出那个问题，比如‘美国的目标就是降低外国石油价格，因为它不仅对自由世界的经济、而且对苏联经济也产生了影响’，那么我将感到惊讶。”

法赫德国王的访问日程中将包括若干秘密会谈。当国王与总统会见时，沙特石油部长谢赫·亚曼尼将与舒尔茨、麦克法兰和能源部长赫林顿进行磋商。几个月以来，亚曼尼总能听到美国人为降低石油价格而进行的鼓噪。在华盛顿进行的这些会谈则有所不同。1985年2月9日，国务院为舒尔茨准备了一份简要的秘密备忘录，大概勾勒了美国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备忘录暗示世界石油价格太高了，美国将从价格下跌中得到好处。列入会谈的关键目标是：“讨论目前世界石油价格的形势：欧佩克和沙特阿拉伯努力守卫欧佩克的官方价格体制和产量限额，而且声言美国正在操纵石油市场。”备忘录指出：“包括亚曼尼在内的欧佩克石油

部长们谴责美国正在制定一项秘密计划，想把石油价格降到某一个预先设定的水平上。”亚曼尼只说对了一半，因为美国并没有预先设定一个价格水平。

法赫德国王的此次访问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政治影响。在国王来访的几天之前，罗伯特·麦克法兰会见了班达尔王子，以确保美国方面对法赫德予以特殊的注意和应有的尊重。国王将与总统举行一对一的会谈，而且他想谈多长时间就谈多长时间，与其他美国官员举行的几次私人会谈也是如此。

2月12日，国王的车队到达白宫。穿着阿拉伯传统服装的法赫德由助手们簇拥着，进入一间私人房屋里与总统会见。里根对他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会见开始后，现场没有一个助手，也没有人做记录。

法赫德国王有几项他所特别关注的事情，里根总统也是如此。两位领导人相互钦佩，都认为对方是一个相当有胆识的人物。对于里根总统来说，法赫德在一个日益充满敌意和好战气氛的地区正在支持美国。他每年还向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数千万美元的资金，这是里根总统在实施其对外政策中所钟爱的两项计划。法赫德把里根归入在许多场合中为沙特的利益而艰苦工作的一类人当中。

两人讨论了地区问题，特别是来自伊朗的持续（实际上是正在制造的）威胁。在说到某一个问题的时候，里根正视着法赫德国王，向他无条件地做出保证，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确保沙特阿拉伯的领土完整。这正是里根的过人之处，他用这种方式表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个人外交姿态。法赫德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两人还讨论了国际经济事务以及由于美元的坚挺和美国外贸逆差所产生的问题。然后，里根总统提出了国际石油价格这个话题。里根告诉法赫德，作为沙特阿拉伯主要保护者的美国，其经

济从较低的石油价格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一个强大的美国符合沙特阿拉伯的利益。沙特阿拉伯的主要敌人（利比亚、伊朗和苏联）是高油价的受益者。里根说，美国希望与王室建立一种合作关系。他对温伯格和凯西以前与沙特官员谈论过的一些话题进行了补充和重申。里根总统以其特有的气魄控制了这个敏感的话题，对方没有进行讨价还价，甚至也没有提出一个特定的价格。这就好像是一对夫妻中有一方想离婚，却给另一方发了一封描述他们的美满婚姻的信件。但是，法赫德得到的信息却是明确的，即向沙特阿拉伯做出承诺的美国总统想降低石油价格，从而使他们这两个国家受益，使他们共同的敌人受损。

法赫德国王在与里根总统举行会谈并且与其他高级政府官员进行了一系列会谈的两天之后，在华盛顿市中心的J·W·马里奥特饭店举行了一次宴会，出席宴会的亲密朋友和支持者共有600人。法赫德邀请了一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政府官员以及对利雅得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他人士。这次盛会进行得不很顺利，有人把座位签搞错了，客人只好自己去寻找他们所在的餐桌。但是，宴会非常丰盛，气氛十分融洽。据报道，法赫德为这顿饭花了将近30万美元。出席这场欢宴的美国政府官员热情地赞美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第十六章

1985年，处于苏联帝国心脏地带的波兰仍然是两个超级大国进行角斗的战场。莫斯科正在以经济、情报和军事援助等方式支持雅鲁泽尔斯基政府。华盛顿继续以提供秘密资金和物资的方式支持地下团结工会，同时也向团结工会提供有可能起作用的关键情报。

雅鲁泽尔斯基政府于1984年7月22日颁布的大赦令，对地下团结工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数百名积极分子虽然获得了自由，但是仍然受到警察的骚扰，而且这种骚扰甚至进一步加强了。波兰政府试图以这种方式诱骗外界不要继续支持反对派。当局声称，如果波兰公民立即停止反政府活动，那么将不对他们进行起诉，否则将予以逮捕。到了1985年1月1日的最后限期，大约300名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对政府的意图提出质疑。不过，团结工会的领导层保持完好，而且勇敢地坚持斗争。莱赫·瓦文萨在新年前夕的演讲中做出承诺，地下团结工会将“坚持斗争，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波兰政府颁布大赦令这一精心策划的伎两遭到了彻底失败，从而迫使当局付出双倍的努力，依靠武力来摧毁反对派的活动。波兰警察千方百计地捣毁地下团结工会的印刷所和秘密会议。2月13日，20名便衣警察冲向格但斯克市扎斯帕区的一处住所，当时莱赫·瓦文萨正在那里与几名地下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开会。政府精心进行的情报工作获得了成功。在被捕的人当中有5位团结工会的地区领导人，他们是：格但斯克的波格丹·利斯、弗罗

茨瓦夫的瓦迪斯瓦夫·弗拉塞纽克、克拉科夫的斯坦尼斯瓦夫·汉泽里克、波兹南的雅努什·帕卢比茨基以及华沙的亚当·米赫尼克。当时他们已经开了两个小时的会，讨论行动策略以及组织另外一次重要罢工的可能性。两天之后，警察扣押了米赫尼克、利斯和弗拉塞纽克。1985 年 11 月，他们共逮捕了 340 名地下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

1985 年初，波兰保安人员对地下团结工会发动了一场战争。波兰和苏联的情报官员竭尽全力揭露了切断西方向地下团结工会提供资金和物资的渠道。克格勃不仅盯着中央情报局，而且也盯着梵蒂冈。他们的这种关注体现在 1985 年初的一份绝密备忘录中，这份文件是为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准备的，并且送给波兰内务部长一份。在这份备忘录中，切布里科夫命令内务部以最大的努力“揭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地下团结工会提供的物资支持。”这位严厉的克格勃首脑指责波兰正在成为苏联集团中“最薄弱的环节”，而且对颠覆活动逆来顺受。他鼓励波兰秘密警察渗透到地下团结工会之中，而且通过向积极分子行贿的方式获取情报。他还承诺要动用更多的克格勃资源来揭露“挑衅者”，这些人正在对波兰构成威胁，并且“资助颠覆活动”。

克格勃还认为应该加强对梵蒂冈的监视。苏联情报官员谴责“圣座”本身就在东欧从事颠覆活动。一份报告指出：“梵蒂冈充满反社会主义的偏见，明显来源于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他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敌意来源于他个人的反共与反苏的信念，而且深受天主教神职人员中极端保守派以及西方国家中（特别是美国）反动政治人物的影响。”克格勃警告说，梵蒂冈正在设法扩大它在东欧的影响。“梵蒂冈的主要兴趣集中于东欧最有‘希望’的国家，它认为这类国家是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根据罗马教廷的政治倾向及其在波兰的所作所为，克格勃决定要优先考虑“揭露梵蒂冈和罗马教廷组织的代表与中央情报局的合作情

况。”

里根政府中了解秘密援助计划的官员们总是担心，这个计划万一被莫斯科揭露的话，那将产生严重的、甚至是戏剧性的反响。当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时，白宫就会陷入一场暗流涌动的困境。1985年2月底，当波兰的流亡者亚采克·克纳皮克刚刚从西方回到国内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此人是一位激进主义者，也是团结工会的支持者，因此，当他抵达机场海关时，他的行李受到了彻底的搜查。警察声称在行李中发现了“团结工会的海外人员”与波兰境内的地下团结工会以及“西方情报机构”进行联系的“线索”。警察展示了一封团结工会驻布鲁塞尔办事处负责人耶日·米莱夫斯基写给格但斯克的团结工会领导人波格丹·利斯的信。这封信大概描述了团结工会官员与国防部东欧局的联系情况。克纳皮克否认自己参与了任何形式的颠覆活动，并且公开抨击整个事件是一起阴谋。后来波兰当局没有逮捕他。

但是，这次事件说明，一个信使在中途是多么容易受到当局的拦截。团结工会驻西方办事处、劳联—产联和中央情报局过去经常靠信使向具有正规基地的地下团结工会转送情报和资金。这种办法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海关中能够对这类事情帮忙的官员同情地下团结工会。信使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工具，但是从1985年开始，西方更多地是通过“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向地下团结工会传递情报。

波兰内务部认为，美国送到波兰的外交邮袋是这个情报传递链上的一个环节，因此在华沙的外交人员以及美国驻克拉科夫领事馆的外交人员成为波兰的重点监视目标。“他们坚信，只要一走出大使馆便会受到监视，”一位情报官员回忆道，“他们对进出大使馆的任何人和任何物品都进行跟踪，包括垃圾在内。他们确实感到灰心丧气。”2月，波兰当局声称美国驻华沙大使馆的武官从事间谍活动，因此将他驱逐出境。5月初，美国派遣到克拉

科夫领事馆的两名外交官受到了粗暴对待，波兰当局宣称他们参与了反政府活动，因而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为了千方百计地破坏西方对地下团结工会的支持，波兰内务部还切断了美国大使馆信使的空中通道。美国空军的飞机定期飞往华沙已经有好几年了，通常携带邮件和食品。波兰官员认为，这种飞机或许携带了超出大使馆所需供应品范围的其他物品。事实证明，这一行动比其他任何行动对团结工会造成的挫折和威胁都要大。

1985 年初，流进团结工会腰包里的现金最多时达到 800 万美元，这笔钱维持了地下团结工会的生存。这年的初春时节，许多领导人身陷囹圄，但反抗活动仍然继续进行。5 月 1 日，是政府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官方节日，华沙有 15000 多人、格但斯克有 2000 多人走上街头，支持团结工会。这是自从 1981 年波兰发布《军事管制法》以来最大的一次抗议活动。

与此同时，秘密文学活动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地下团结工会出版了数千种报纸、书籍和专题文章。一位直言不讳和深谋远虑的建筑师切斯瓦夫·别莱茨基撰写了一本题为《小小阴谋家》的书，此人在他所参加的所有反政府活动中都表现得勇敢。他在这本书中告诉人们如何暗中从事反政府活动，甚至在许多细小的地方都进行了描述，告诉人们如何确保自身安全和避免被捕。身高 6 英尺 5 英寸的别莱茨基以马切伊·波莱茨基的笔名撰写的这本书，由一家名为 CDN（波兰语中“坚持不懈”一词的首字母缩略词）的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出版了许多小册子和专题文章，甚至出版了一份团结工会面向波兰军队的报纸。美国政府向这位从不为人所知晓的别莱茨基提供购买设备和物品的资金，帮助他开办企业，并且维持企业的生存。提供资金的秘密渠道与其他类似的计划一样，就是每天越过波兰边境的数千名人。

1985 年 3 月，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正在卢森堡出席一系

列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联盟当时处于一种相当好的状态，从部署潘兴Ⅱ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1982年与苏联天然气管道项目进行斗争时所引发的风暴中幸存下来了。温伯格自从上任以来一直在进行努力，鼓动欧洲盟国向美国在武器系统和联盟战略的立场靠拢。现在，他仍在进行最艰苦的游说活动，说服欧洲同行们支持“战略防御倡议”，甚至要他们参加美国的研究计划。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支持，有助于避免在大西洋两岸之间形成对这个问题进行争论的局面。

在会议期间，温伯格充满激情地向与会者描述这个战略防御系统的潜在利益。“战略防御倡议”将不会削弱欧洲（即不会将欧洲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推开）；它将增强而不是破坏核威慑；它将促进而不是削弱超级大国的稳定。但是，或许最具说服力的理由还是经济问题。里根政府正在计划安排研究课题和签订合同，事实将证明，这对于许多欧洲制造商和科学家是非常有利的。此外，有关这个系统的研究工作将获得许多科学技术方面的副产品。难道欧洲真的要丢掉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利益吗？温伯格在卢森堡对欧洲盟国面对面的游说活动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使美国政府与许多重要盟国继续开展秘密的双边会谈。最后，签署了一系列在“战略防御倡议”中进行协作的协议。先后签署协议的有英国（1985年12月）、德国（1986年3月）、以色列（1986年5月）、意大利（1986年9月）和日本（1987年7月），这些国家都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参与研究计划的科技实力。“战略防御倡议”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研究计划，有些项目是莫斯科永远也难以忘其项背的。

正当温伯格在卢森堡进行游说活动时，来自莫斯科的情报表明，有一种不安的气氛笼罩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几个月以来，美国情报分析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一直注视着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这位老态龙钟的苏联总书记的健康状况，他现在已

经是疾病缠身了。华沙条约组织预定于1月中旬在莫斯科召开一次会议，有人预计这是一次紧张而又重要的会议，它将鼓励东欧卫星国（尤其是波兰）挖出国内的敌人并予以摧毁。但是，由于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这次会议在最后一刻宣布取消。有些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打赌说契尔年科可能去世了。

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告知比尔·凯西，契尔年科已经去世了，克里姆林宫将这一死讯推迟到苏联挑选出新的领导人之后再进行宣布。这份报告通过特殊的信使立即送到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和五角大楼的温伯格手里。三天之后的上午6点钟，苏联方面正式宣布了契尔年科的死讯，他的继承人出现在全世界面前。年仅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新的总书记。契尔年科的去世与戈尔巴乔夫的当选几乎同时宣布这一事实表明，分析家们的预感是正确的。

戈尔巴乔夫继承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帝国，在阿富汗和波兰面临着地缘政治的挑战。对苏联摇摇欲坠的经济体制起着支撑作用的硬通货收入体系，因美国发起的经济战而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并且处于混乱之中。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经受不了美国高科技国防建设的冲击，这将迫使他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军事领域。当他开始为苏联这只航船掌舵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们正在努力扩大美国的优势。

在这年的春末，凯西进行了一系列的出访，以阻止苏联采取的几次主动行动。他首先在欧洲进行巡回访问，对团结工会的行动进行观察，并且在东欧寻找新的机会。然后，他飞到巴基斯坦，视察向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提供援助的秘密供应线。美国在那里采取新的战略以及加强供应线的行动，意味着战争的节奏与性质正在发生着变化。凯西打算对战场上所取得的进展进行评估，而且努力把战争引向苏联。此次访问的最后一站是沙特阿拉

伯，他将与东道主谈论许多主题，其中包括石油定价。

在法兰克福，凯西会见了一些驻扎在欧洲的美军军官，与他们探讨了一系列问题。他还与瑞典首相府的一位官员共进了午餐，对于瑞典向美国政府提供了援助团结工会的通道一事向他表达了谢意。与美国初期的担心相反，瑞典人在准备运到波兰的供应品进行伪装方面表现得相当老练。波兰官员试图对来自西欧的全部物资进行监督，但是他们未能发现运输通道。为了报答瑞典的合作，凯西答应向他们提供更多的海军情报，尤其是有关苏联潜艇经常出没地区的情报。在宴会结束之前，他要求瑞典逐渐增加对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营的药品援助。

凯西在法兰克福还收到了几份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有趣的报告。西方情报官员认为，有几个反政府的地下组织将受益于美国的秘密援助。里根总统总是想象美国的支持已经渗透到好几个苏联集团国家的地下活动当中了。他签署的第 32 号国家安全决策指示明确指出，要在美国正在考虑支持此类地下活动的地区建立一个宽阔的网络。对地下组织进行确认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如何援助它们则是另外一回事情。凯西把这些报告送交白宫，然后指派一些人员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第二天早晨，凯西的飞机离开法兰克福，向伊斯兰堡飞去。在长途飞行过程中，他阅读了一叠有关阿富汗的情报资料，这些资料摞起来足有 5 英寸厚。美国政府密切地关注着那里的局势。苏联军事行动的水平正在快速提高，特别是正在采取一致行动以切断巴基斯坦向穆斯林游击队提供物资的供应线。苏联的军事力量正在增强，据估计现在苏联驻阿富汗军队有 12 万人，有 3 万多人刚刚渡过阿姆河来到阿富汗，准备对穆斯林游击队在北方各省的目标进行特殊攻击，这些攻击也越来越改进了。“斯佩茨纳兹”的武装力量所进行的一些额外的夜间攻击，使穆斯林游击队深感头痛，他们由于缺乏夜视设备，因此没有能力对夜间攻击做

出反应。地雷以及其它的新型爆炸物也运进了阿富汗。因此，在前几年里，穆斯林游击队的人员伤亡几乎翻了一番。

但是，在悲观与担忧的气氛中，某些美国政府官员的头脑中闪烁着一种希望。从苏联传来的报告表明，战争越来越不得人心了。据海外人士在苏联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有25%的人反对战争，比例相当高的人们认为只有政治上可靠的精英分子才有机会到国外去旅行。玩世不恭的苏联老百姓似乎认为，苏联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比西方的估计多得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罗伯特·麦克法兰认为，即使苏联的费用损失和人员伤亡出现很少的增长，也会对苏联所承担的义务产生与这种增长不相称的政治影响。

当凯西到达伊斯兰堡时，这座城市的局势比他以前的任何一次来访都要紧张。苏联在巴基斯坦边境的行动正在逐步升级，既想切断穆斯林游击队的供应线，又要对齐亚政府进行胁迫。对作为穆斯林游击队基地的边境城镇白沙瓦的无端轰炸，也变得越来越平常了。

巴基斯坦情报部门获得的情报表明，苏联发动了直接针对穆斯林游击队供应基地的颠覆活动。巴基斯坦进步党（PPP）、民主复兴运动（MRD）的各个派别、俾路支学生组织（BSO）以及巴基斯坦国家党（PNP）都得到了苏联的资金援助，要他们散布对巴基斯坦政府的不同意见。基地设在阿富汗之外的恐怖组织佐勒菲卡尔向阿富汗境内派遣人员，在平民中间制造恐怖。阿富汗秘密警察（KHAD）和克格勃似乎已经与两个边境部落阿夫里迪和欣瓦里套上了近乎，并且向他们提供了武器。这两个部落不守规矩，而且唯利是图，对任何中央政府都怀有敌意。苏联对穆斯林游击队的空袭还在高涨。

齐亚总统和凯西局长的此次会见与他们在以前的许多次会见中一样。但是现在对于齐亚来说是一段更为困难的时期，国内的

政治反对派正在崛起，军队也肆无忌惮地批评政府。齐亚对于美国的阿富汗计划是十分关键的，使他保住权力至关重要，因为巴基斯坦国内的大多数政治反对派反对与美国进行合作。

中央情报局为了帮助齐亚保住权力，正在实施好几项计划。齐亚得到了大量的情报，包括极有价值的卫星照片以及截获敌人的电子通讯信息。中央情报局还在巴基斯坦总统周围组织了一个安全小组，并且将此事通知齐亚总统。为了报答齐亚对美国的阿富汗计划所做出的贡献，华盛顿正在准备向巴基斯坦提供新的军事和经济安全援助，其价值将比上次援助多出几乎 10 亿美元。美国有好几位政府官员也应齐亚的要求，努力帮助巴基斯坦获得诸如“毒刺”导弹这类高技术武器。但是，巴基斯坦长期以来总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这是因为苏联的威胁与捣乱把齐亚搞得筋疲力竭，种种诱惑有可能使他倒向苏联一边。

1985 年，随着战争进入一个新的、甚至更为危险的阶段，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对数百名穆斯林游击队员进行特殊训练，以便让他们深入苏联境内展开军事行动。在莫斯科发现这一精心策划的策略之前，唯一的问题便是时间。因此，这一策略将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从齐亚将军的办公室出来之后，凯西钻进中央情报局的一辆防弹汽车里，在武装人员的护卫下来到伊斯兰堡郊外的一所军事设施，阿赫塔尔将军与优素福准将等候在那里。他们对美国的阿富汗政策进行了热烈地讨论。美国将提供最大的一笔秘密援助，基本上比以前翻了一番。这笔钱将解决抵抗组织所面临的许多后勤问题，但是他们也需要更多的精密装备：先进夜视装置、特殊爆炸物和精确制导弹药。对战争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或许就是让穆斯林游击队使用美国高技术的计划。

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好的技术情报装置，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这些装置来获得情报。美国新政府的战争已经在第 166 号国家安全

决策指示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那就是充分利用这套系统以赢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这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因此只能节俭地使用。一颗 KH—Ⅱ间谍卫星改变了正常的运行轨道，以收集更多有关阿富汗的情报。中央情报局每周向巴基斯坦情报部门送一份卫星情报，使其了解苏联军队的调动和行动情况。这类情报将有助于确定打击目标和制定行动计划。合成行动（协同性与精确性相结合）第一次变得有可能了。到了仲夏季节，卫星照片的涓涓细流汇集成了一条川流不息的小溪。

与此同时，间谍卫星改变了监视方向，美国的全球电子情报网络同时转向收集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情报。国家安全局重新调整了电子窃听资源，第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到阿富汗和苏联中亚地区。1985 年夏天，国家安全局的专家来到伊斯兰堡，组建了一个专门对情报进行挑选、分类的小组，并且把相关的情报送交优素福。情报网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以至于苏联的战争行动很少能够逃脱美国人的眼睛。例如，苏联军用飞机在空军基地周围的通讯情况都受到美国国家安全局技术人员的严密监听，对每一名飞行员都做了“记号”，即通过口音、音调或者语言模式对他们进行鉴别。这些记号都输入计算机，因此如果日后发现他们来到了阿富汗，那么国家安全局就知道哪一个军事单位进行了轮换，以及他们的战斗力如何。

美国的军事专家和分析家所具有的专门知识，是国家安全局打算介入战争的另外一种资源。1985 年中期，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对卫星照片进行了分析，并且把他们对于苏联战略战术的评估向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部门进行了通报。因此，抵抗组织对苏联军队及其指挥官的情况了如指掌，甚至能够预测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抵抗组织的指挥官能够预见到苏联规律性的行动。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战略，中央情报局还向巴基斯坦情

报部门和穆斯林游击队提供先进脉冲发报机，苏联不可能中途截获这种发报机发出的信息。战场通讯（确切地说现在还没有）已经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了，通常需要几周、有时要几个月才能为战地指挥官提供一些情报。穆斯林游击队的各个单位仅仅相隔几英里，就很难准确地传递情报。新的设备在抵抗组织之间进行协调方面真是帮了大忙。

为了与急剧提高莫斯科为占领阿富汗而付出代价的目标相一致，阿赫塔尔将军与优素福准将向凯西扼要描述了他们要改变目标与方法的计划。对苏联在阿富汗的天然气与石油设施进行的一系列攻击行动，将认真地予以执行，因为穆斯林游击队并不喜欢搞一般性的破坏活动，爆破天然气管道的效果并不显著。这种行为真使那个宣布圣战的人感到厌恶，他认为为了他们的理想而献身是一种最高的荣誉。然而，优素福仍然努力使一般性的破坏活动增加。从西伯利亚通向苏联边界的一条主要天然气管道，成为一个格外诱人的攻击目标。这条管道埋在地下 3 英尺深，并且从阿姆河底下穿过去。由于它为苏联中亚地区的工厂提供燃料，因此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目标。穆斯林游击队查明了这条管道的位置后，在好几个地方将它炸毁，而且还用火箭攻击了几处天然气设施，在两个地方引起的大火烧了好几天。优素福说：“据报道，使用天然气的所有工厂因此而关闭了两周。”

当讨论完战术之后，阿赫塔尔、优素福和凯西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到了硬件方面。穆斯林游击队已经拿到了阻击步枪，并且向他们提供的更多的先进火炮也正在运输途中。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穆斯林游击队对苏联的空袭缺乏有效的响应，过去向他们提供的地对空导弹已经全部无效了。萨姆—7 型导弹很糟糕，英国的“吹管”导弹和中国的“红箭”导弹也好不了多少。凡是与穆斯林游击队的游击战相适合的武器系统都试过了，结果效果都不好。90％的苏联飞机都是在地面攻击中损失的。如果不

能与苏联的空中力量相抗衡，那么获取胜利的新战略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按照阿赫塔尔的说法，如果有某一种武器系统有可能获得成功，那么它一定是一种“神奇的武器”。伊斯兰堡准备在7月份接收第一批“毒刺”导弹。那么，如果把这种导弹分给穆斯林游击队一部分，结果又将如何呢？凯西认为穆斯林游击队需要“毒刺”导弹，而且几个月来他一直为此努力。在扩大战争的进程中，对苏联的空中力量进行打击是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凯西告诉他的助手们：“当我们开始把价值2000万美元的飞机从天上凑下来的时候，莫斯科就会感到头痛了。”然而，这个建议在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某些部门碰到了阻力，他们担心这类导弹有可能落入敌人的手里。

凯西向阿赫塔尔保证，包括总统在内，美国政府有许多人将会对此予以认真地考虑。他答应直接向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和总统提出这个问题。

当凯西飞到沙特阿拉伯时，探讨了里根战略的下一个要素。现在的沙特王国与他在1981年来访时的情形相比，已经是今非昔比了。石油生产一落千丈，从那时候每天1000万桶的高峰跌到现在的200万桶，石油收入比3年前减少了700亿美元。在利雅得，只有60%的办公楼装满了在此办公的人们。

5月中旬，穆斯林极端分子在利雅得搞了一系列爆炸活动，使沙特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威胁。这些爆炸案是一个叫做“伊斯兰圣战”的组织搞的，该组织拥护伊朗革命，致力于推翻沙特王室的统治。有一家通讯社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我们的组织正在沙特阿拉伯采取行动，我们开始把目标指向反动的沙特王朝，其目的就是要推翻它。”这个打电话的人指责沙特家族“通过武力和欺骗夺去了伊斯兰最神圣的土地，因此我们将真诚地与其他穆斯林信徒共同奋斗，夺回我们的权力，赶走这些暴君。”这些抨击使沙特王室感到极度恐惧。

凯西与国王详细地谈到了对阿富汗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所做出的新的承诺。他们还讨论了两伊战争以及解决问题的前景。萨达姆·侯赛因似乎真得有兴趣与霍梅尼进行和平谈判，这是因为他在战场上的处境很不妙。但是，德黑兰对和平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毛拉似乎要让侯赛因彻底蒙受战败的羞辱。

伊朗极端分子点燃的这把火没有烧尽，他们顽强地坚守着破坏波斯湾守旧君主政体的使命。凯西告诉法赫德，里根总统对苏联不断介入该地区尤其是南也门和叙利亚的事务十分关注。考虑到恐怖分子最近在利雅得进行爆炸活动，他提议中央情报局技术服务办公室向沙特王室提供额外的内部安全。法赫德充满感激地接受了这一提议。

在会谈见到曙光的时候，凯西再一次提出美国政府的观点，即获得稳定而基本上较低的石油价格将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进展。他甚至还向法赫德提供了一些可能对沙特阿拉伯有益的信息。一位前国际银行家告诉法赫德，美国财政部正计划在大约12个月之后慢慢使美元贬值。这个计划就是使美国产品以其他国家的货币形式出售时的价格比较便宜，因此它是一场推进美国出口运动的一部分。这个消息对法赫德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因为沙特的许多境外资产是非美元的货币。当美元贬值时，这些资产将突然增值。这个信息在改善沙特王国困难的财政状况时将非常有益。按照沙特阿拉伯人的风格，法赫德显然没有直接提出石油定价与石油生产这个话题。但是，沙特阿拉伯人现在十分感激美国向他们提供安全与某些经济方面的帮助，这是十分明显的。

7月29日，凯西在纽约与几十位美国的公司首席执行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这些人都在苏联有着重要的商业利益。他们当中有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的德韦恩·安德烈亚斯、西格拉姆公司的埃德加·布朗夫曼、海湾与西方工业公司的马丁·戴

维斯、百事可乐公司的唐纳德·肯德尔、美孚石油公司的路易斯·洛克菲勒和罗利·华纳以及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乔治·钱皮恩。会议地点是位于东 62 大街 36 号的联合俱乐部，这里是高消费阶层经常光顾的地方。

这是一次非正式的聚会，里根政府的高级内阁官员定期与美国公司老板举行这类聚会。这次会议的主题与苏联的状况有关。凯西对这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的政治局势所作的预测，能够对东西方的贸易产生巨大的影响，要么动摇、要么建立起美国公司的商业信心。安德烈亚斯在休息室里向凯西致意，然后他们一同来到三楼的餐厅，在一张 U 型餐桌旁就坐。安德烈亚斯与凯西的关系很好，两人相互直呼其名，而且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的这位董事局主席在苏联有一个很好的情报源。在凯西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前，就与在坐的一些经理们相识好几年了。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与国家情报收集处进行合作，提供他们对于苏联的看法。好几位经理允许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境内和海外利用他们的公司作掩护。

午餐之后，安德烈亚斯与坐在他旁边的凯西在餐桌前站起来，把凯西向来宾作了一番热情洋溢的介绍。他特别强调了凯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经历以及在纽约金融界的工作情况。他还说起凯西在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任职以及担任国务院经济事务负责人的情况。“你们现在只知道他是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而我现在把一个完整的比尔·凯西介绍给大家。”当凯西走上讲台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即使是世界 500 强的公司经理们，也会对亲耳聆听中央情报局局长向他们秘密介绍情况而抱有浓厚的兴趣。

凯西在讲演一开始就向大家介绍新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这些人都是商人，因此凯西主要谈论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与政治计划。这位新总书记承诺要稳定步履蹒跚的苏联经济。他将采取某

些激进的解决办法，但是这些办法很可能失败。凯西神情严肃地告诉大家，党的官僚机构反对戈尔巴乔夫，军队也反对他。苏联经济处于混乱状态，存在着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结构性难题。苏联试图改善经营环境，使西方公司更容易接受，但是这种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表面文章。凯西提醒听众，莫斯科由于硬通货短缺，不得不于2月暂时停止向其外国供应商支付款项。与苏联做生意的公司要多多留神。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个信息令人感到悲观。

在政治领域，凯西显得更乐观一些。由于苏联帝国持续不断地向外扩张的代价太过昂贵，莫斯科的手头太紧，因此今后这种扩张步伐将会放慢。苏联帝国向外扩张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没有得到经济实惠。戈尔巴乔夫被逼削减军费开支，以渡过经济危机。

在演讲结束的时候，凯西说他过去经常与企业家们举行秘密会议，让他们与政府共享情报。“苏联到底将发生什么事情，我请各位提供线索，因为你们能够摸到苏联经济的脉搏，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苏联心脏跳动的频率了。”

在演讲结束并且回答了几个问题之后，听众向他热烈鼓掌。凯西在离开的时候，拍拍一些人的后背，并且与更多的人握手告别。

1985年夏天，华盛顿对苏联的这位新任总书记议论纷纷。在他们的眼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谜。他比契尔年科整整年轻一代人，年轻时在西方进行过广泛的旅行。他的行事风格比他的前辈们更具西方特征，而且当他们在所谓的“停滞年代”里任职的时候，他就已经获得了相当好的口碑。

1985年6月2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老行政大楼召开会议，讨论大量的安全问题。会上的气氛相当热烈，与会的这些知

识分子们互不相让，对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引用安德烈·葛罗米柯的俏皮话，说戈尔巴乔夫的微笑很迷人，“但他的牙齿是铁制的”，而且他们还注意到，作为那位铁腕克格勃主席和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门生，不要指望在戈尔巴乔夫身上看到苏联的显著变化。另外一个人强调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幸存者。他曾经当过农业部长，这个职位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如同一座政治坟墓。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当上了总书记。里根总统显然同意下述说法，即“戈尔巴乔夫是新型苏联领导人，他是实际上把夫人看得很重的第一个苏联领导人。”

当注意力转到有关美国政策的问题时，里根与往常一样仰靠在椅背上，倾听其他人的讨论。自从就任总统以来，他对于苏联的看法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理解通讯与外交的价值，而且认为有关“苏联偏执狂”的陈词滥调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根据这种现实，他已经命令沿着苏联外围进行侦察的军事飞行活动要大幅度地减少。大约20分钟之后，里根加入了讨论。“戈尔巴乔夫先生也许是、也许不是一个新型的苏联领导人，”他说，“只有时间才能说明一切，可能用不了10年。但是，我想保持对苏联的热情。我不想停止我们正在做的任何事情。”

乔治·舒尔茨继续努力促进美苏之间的外交对话，甚至还想搞一次超级大国之间的高峰会谈，这个建议是布什副总统在契尔年科的葬礼上第一次向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但是，由于别的原因使这件事情耽搁了。“总统理解外交手段与战略攻势这二者的价值，”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回忆道。

到了夏末，有两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对苏联本来就已经陷入混乱的经济体制造成了可怕的影响。第一项政策是华盛顿制定的。在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的指导下，美元开始逐步贬值，将在今后的12个月里贬值四分之一。美国这样做的动机，几乎完全出

于国内的需要，希望通过贬值来推进出口，使美国商品在外国市场上的价格更便宜。但是，与此同时，按照实数计算，美元贬值实际上使苏联的出口额减少了四分之一。莫斯科通常将出口能源获得的外汇兑换成美元，这是苏联人所钟爱的货币。当坚挺的美元允许苏联将其在欧洲和亚洲的购买力达到最大限度时，那么这种政策是有益的。但是，当美元疲软时，情况则正好相反。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克里姆林宫为美元贬值付出了大约 15 亿美元的代价。

另外一种政策则出自利雅得，它对苏联经济体制的死亡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85 年夏末，沙特阿拉伯正式向里根政府发出警报，沙特希望增加石油产量，从而使国际石油价格急剧下跌。“他们预先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看到石油产量将会猛烈增加，”温伯格回忆道。出于多种安全与经济方面的原因，沙特阿拉伯人暂时按照美国政府的劝告行事了。沙特此次将自己的决定通报华盛顿，这与它在 70 年代做出令人吃惊的减少石油产量的决定截然相反，这是对美国与沙特阿拉特之间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加强合作的一个佐证。

由于对即将给苏联带来损失的金融风暴缺乏任何知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与他的重要顾问与助手开会，研究制定经济改革计划，以便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实施。苏联经济体制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了。新任总书记第一项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加速发展，从而把苏联作为一个经过复兴的超级大国而带入下一个世纪。现代化是一个新的目标，而不是一件产品，因为它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大幅度增加在机械制造方面的投资，尤其要增加在技术领域（仪器设备、机器人、电子学和计算机）的投资，并且要尽快取代陈旧的设施。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戈尔巴乔夫需要几样关键的东西，即西方技术、硬通货以及结束地缘政治的挑战，

而这几样东西只有在里根政府改变政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获得。

戈尔巴乔夫向西方决策者和商人们发出强烈的呼吁，扩大相互间的贸易。他发出这个呼吁时把技术贸易与政治合作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上，我们不能完全忽视在贸易与经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这种稳定关系，我们没有权力这样做，”他对他的听众说，“如果我们想真正建立一种能够使和平得到保证的牢固而稳定的关系，那么就必须发展商业关系。”

戈尔巴乔夫需要优先考虑的一件事就是石油与天然气领域，这是苏联硬通货的主要来源，用这些钱从西方进口谷物和其他商品。新任总书记所确定的目标就是把输送到西方的天然气从1985年的22.59万亿立方英尺/年增加到1990年的30万亿立方英尺/年，这部分增加值将从西西伯利亚的新天然气田获得，该气田直到最近才投入运行。石油产量也要大幅度增加。在下一个五年计划（1986—1990）期间，戈尔巴乔夫批准对石油工业注入515亿美元的资金，以改进石油生产设施，并且要创下在1986年这一年中使16个新的油田投入生产的纪录。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能源出口来赚取数十亿美元的硬通货收入。

但是，除了从西方输入技术、硬通货和贷款之外，戈尔巴乔夫也希望减轻军事领域的负担。到了1985年底，美国自60年代以来生产的武器首次多于莫斯科。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研究与发展预算翻了一番，这使得苏联军方高层人士和戈尔巴乔夫感到忧虑。当时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说：“我们非常坚定地认为，各种相关领域的力量转向对付我们，其中包括军事技术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领域。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以阻止美国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进而对美国的挑战做出恰当的回答。”

苏联军方诸如前国防部长S·L·索科洛夫这样的高级将领威胁说，苏联要以自己的方式与美国在军事领域的发展进行竞赛。戈尔巴乔夫为军事竞赛的性质发生转变而描绘了一幅不祥的图

景，这或许就是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使他感到困惑的原因。在他看来，这个世界的核心问题就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科学技术由于被广泛地应用而取得了新的成就，尤其是在军事领域，能够把军备竞赛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莫斯科正在面临着一种它无法进行响应的技术挑战，因而感到恐惧。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认为，美国由于进行军事建设而强加给苏联的军事负担中的“经济因素”是“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头等大事。”戈尔巴乔夫在外交事务方面的私人顾问阿纳托利·乔尔纳亚夫回忆道：“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必须结束冷战，这样我们就可以实质性地削减国防预算，从而对军事工业联合体进行某种限制。事情明摆着，他将无条件地与里根总统进行谈判，而且他与里根总统在实质性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中可能走得非常远。”他最为关切的或许就是“战略防御倡议”。别斯梅尔特内赫说：“当我们谈论‘战略防御倡议’时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们是否陷入了由这场‘战略防御倡议’所导致的军备竞赛，因为我们正在试着做一些美国正在做的事情，比如使戈尔巴乔夫感到恐怖的空间计划和空基武器系统等。”

1985年6月，戈尔巴乔夫召集了一次有关科技进步的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要加速发展机床工业、现代化计算机技术、仪器制造、电子技术和电子工业。这些都是苏联加速发展的“催化剂”，也是撑起苏联这座大厦的关键领域。在会上，这位新任总书记宣布，促进科技进步是他最重要的使命。他问道，改变经济体制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产品通过科技获得了更新，并且达到了世界最高技术水平。”

苏联共产党正在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反映了苏联对加快科技进步的急迫而关切的心情，将发展电子学作为非常优先的项目，以缩小与西方的差距。计划要求将工业机器人的产量由13000个提高到28000个，机床开发中心由2500个增加到10700

个。在新的计划的头两年里，对工程部门用于设备的研发、试验和评估的投资，将超过前5年总投资的50%，并且尤其要把研发资金集中于高科技项目上。

苏联的麻烦在于把最好的资源集中到军事工业领域了，半数的机床集中在国防企业里，而且还雇用了最好的科学家。至少有一半的研发费用花在了军事领域。里根的国防建设（尤其是强调新兴技术）意味着需要把更多的资源转到国防领域。

里根政府承诺要把新兴技术应用于常规武器和“战略防御倡议”，苏联军队总参谋部对此有一种不祥之兆。叶夫谢耶夫将军在苏联军队的一份期刊上撰文写道，新兴技术所造成的威胁，就是使资本主义具备了对我们发动突然袭击的能力，这与纳粹在1941年6月对苏联的入侵相类似。国防部副部长加列耶夫将军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将西蒙诺夫的小说《生与死》中的一位老工人和英雄人物波普科夫作为苏联公民的楷模。他在文章中希望苏联公民面临资本主义的新威胁时，应该像波普科夫说的那样：“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甚至会放弃这所公寓，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里以面包和水为生……因此，红军将拥有所需要的一切。”苏联共产党发誓绝不允许资本主义再次获得军事优势，但是如果他们真要兑现诺言，那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戈尔巴乔夫想信守誓言。对于他来说，苏联在军事技术领域落在美国的后面，这将威胁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我们别无选择，”戈尔巴乔夫告诉党的忠实信徒，“在科技进步的冲击之下，竞争将更加剧烈，这对于那些落伍者所产生的影响甚至更为残忍。”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战略防御倡议”是美国想进一步加重苏联经济负担的一项计划。“美国想在更现代和更昂贵的空间武器竞赛中拖垮苏联的经济，”他在莫斯科电视台对苏联人民说，“它想为苏联领导层制造各种各样的难题，包括社会领域，妄图破坏苏联提高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标准的计划，从而激起人民对领

导层的不满。”

形势的发展促使戈尔巴乔夫比过去更加投身于国防建设。新的五年计划要求在先进武器方面花更多的钱。正如戈尔巴乔夫将在后来所承认的那样，1986—1990 年间国防开支的计划增长率几乎是每年 8%，是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一倍。在下一个五年中，国防开支总计将增长 45%，这是令人惊讶的。

戈尔巴乔夫指望西方、尤其是那位反共的美国总统在反对苏联的运动中有所缓和。

第十七章

1985年8月，一场针对苏联经济心脏的赌博静悄悄地展开了。虽然效果不会立即感觉得到，但沙特阿拉伯已经拧开了石油笼头，淹没了世界石油市场。现在回想起来，沙特阿拉伯做出的困难而重大的决定，就是后来石油部长谢赫·亚曼尼反复宣称的，沙特阿拉伯要与欧佩克成员国一道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在里根总统提到这件事的6个月之后，在雄心勃勃的“和平盾牌”开始取得进展的4个月之后，沙特的石油产量急剧增长了。任何人都在猜测，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沙特阿拉伯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卡斯帕·温伯格认为：“沙特阿拉伯的内部原因导致它于1985年决定增加石油产量，降低石油价格。但是它也知道，这个决定能够改善沙特与美国的关系。”

在沙特增加石油产量的头几周里，日产量由不足200万桶猛增到大约600万桶。1985年秋末，原油产量将攀升到每天大约900万桶。

对于美国来说，石油价格下跌是一种实惠，相当于把数百亿美元交给了美国消费者。而对于莫斯科来说，石油价格的任何下跌都会给其经济造成损害。但是，1985年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硬通货储备的增加受到了限制，只好通过出售黄金来保持硬通货收入处于一个必要的水平。犹如苏联硬通货制造机器的面包和黄油的能源（几乎占到80%），对苏联经济状况的影响要比任何其他日用品重要。1985年7月，中央情报局在有关苏联经济状况的一份绝密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苏联出口创汇的能力

很虚弱。苏联与西方的贸易差额已经由 1984 年第一季度 7 亿美元的顺差变为 1985 年第一季度 14 亿美元的逆差。

或许更重要的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正在指望通过出口能源来获得硬通货，筹措购买技术和生活消费品的资金，以实现他的改革计划。苏联指望用这笔钱来进口西方的物品和食品。"石油价格的下跌使这一计划毁灭了，真的毁灭了，"叶夫根尼·诺维科夫说，"这是一场灾难性的事件。数十亿美元打了水漂。"

在沙特阿拉伯提高石油产量之后不久，国际石油价格就像一块石头沉到了池塘里。1985 年 11 月，每桶原油的售价是 30 美元，在不到 5 个月之后便跌至 12 美元。对于莫斯科来说，超过 100 亿美元的硬通货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几乎是其硬通货收入的一半。苏联经济因此而更加奄奄一息了。

正当莫斯科独自对付金融风暴的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集中到两个超级大国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高峰会谈。乔治·布什在出席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葬礼期间，就向戈尔巴乔夫提议两国举行峰会，苏联新领导人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里根政府已经发出了邀请，对建立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信任满怀希望。里根总统与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认为，两国首脑面对面的会谈有可能在军备控制方面取得进展。罗纳德·里根并没有把他的目标限定在常规军备控制方面，他的理想是消除核武器。在击退共产主义的同时大幅度地削减双方的核武库，这是他为之倾注了极大热情的目标之一。

如果里根所提议的峰会能够缓和苏联领导人对他的武断政策的担忧，那么戈尔巴乔夫就会抓住这个机会使苏联陷入混乱的经济状况得以缓解。美国向苏联体制施加的压力是巨大的。在阿富汗和波兰，苏联人无法完全控制局势。苏联国内反对阿富汗战争的情绪高涨，戈尔巴乔夫深知这种情绪将对苏联社会产生腐蚀性的影响。在波兰，地下团结工会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正在茁壮成

长。雅鲁泽尔斯基政府的士气衰落几乎与其经济衰落的速度一样快。除了提供资金在阿富汗和波兰培植本土力量以摆脱苏联的霸权统治之外，里根政府正在通过拉紧技术限制的索套、限制苏联的能源出口以及加快超级大国之间军备竞赛的步伐等办法，在苏联社会中重新制造使其难以逾越的障碍。特别是“战略防御倡议”，把戈尔巴乔夫逼到了墙角。

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设法主动说服苏联方面接受他们为总统制定的日内瓦峰会的议程。他们想让对方明白，峰会的注意力不能仅仅集中于军备控制，超级大国过去就这个问题已经进行过很多次会谈了。为了与第75号国家安全决策指示和美国政府“击退”苏联势力的目标相一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唐纳德·福捷提出了一个“地区倡议”的设想。这项提议将把注意力集中于5个地区性热点，在这几个地方，都有苏联支持的政权与反共起义者进行战斗。美国提议，在超级大国的支持和监督下，交战各方自己进行谈判，各方共同努力来排除外国的军事援助。当然，经济援助还是要提供的。福捷并不存幻想，他知道莫斯科不会接受这类建议。但是，这在谈判桌上是一个有用的反击手段，以阻止戈尔巴乔夫在整个峰会期间对“战略防御倡议”进行严厉抨击。

在“战略防御倡议”这个问题上，比尔·凯西和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主任肯尼思·阿德尔曼提出一个相似的倡议，它虽然不会取得成功，但事实将证明是非常有用的。他们两人认为，总统提出“开放实验室”的概念，用于“战略防御倡议”研究，这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于30年前提出的“开放天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开放实验室”可以使两个超级大国的研究实验室相互交流。当然，莫斯科可能永远也不会赞同这个建议，但是它可以堵住苏联攻击美国的嘴。

在日内瓦峰会之前，里根总统研究了许多有关苏联经济的原始资料。“他恰好喜欢阅读这类资料，”唐·里甘回忆道，“每逢周

末，他就带上一大堆这类资料，然后一份接一份地阅读。他对有关苏联经济和军事局势的了解，要比许多人认为他所了解的还要多。”里根从这些资料中了解到，苏联的局势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物质匮乏状况更加恶劣，工业生产中遇到了更多的瓶颈，硬通货短缺危机越来越严重。里根知道，他手里即使没有掌握所有的牌，也至少掌握了几张对于苏联最为紧要的关键牌。

1985 年，超级大国就像是两个相互碰撞的地壳构造板块，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瑞士的日内瓦这座庄严的城市十分好客，成为两位领导人举行第一次高峰会谈的场所。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将面对面地一争高下，他们相互争吵的目的显然就是为了占上风。根据计划，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与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举行了一系列外交会谈，讨论的主题有阿富汗、人权、军备控制与“战略防御倡议”。

戈尔巴乔夫几乎在峰会一开始就把攻击的矛头对准“战略防御倡议”。他告诉里根总统，这个倡议将导致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这将使两国都破产，并且会陷入不稳定的境地。这位总书记两眼平视着里根，警告说他能够、而且打算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通过开发更多的进攻性武器与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相抗衡。他继续说道，“战略防御倡议”是美国企图获得战略优势和第一次核打击能力的证据。戈尔巴乔夫然后含而不露地发出威胁，除非美国在今后的 18 个月内对于“战略防御倡议”做出正确的决定，否则前景将会非常黯淡。

里根对戈尔巴乔夫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他是根据自己的信仰力量而不是根据美国国务院为他准备的简短备忘录而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戈尔巴乔夫精神抖擞地对里根的话做出回答，于是两人你来我往地打起了嘴巴官司。戈尔巴乔夫费尽了口舌，也未能说服里根在“战略防御倡议”问题上做出让步。

在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会谈又转到了其他话题，戈尔巴乔

夫此次又是故伎重演。在里根总统承诺对战略防御系统的试验和开发进行限制后，戈尔巴乔夫希望美国在最终部署这个系统时具有某种灵活性。他要里根相信，取消“战略防御倡议”并不意味着里根或者他的政府“丢脸”。里根总统试图避开这个话题，于是对戈尔巴乔夫说，“战略防御倡议”是不可谈判的，这使戈尔巴乔夫感到愤慨，声称总统并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尊重。他草率地告诉里根，如果不取消“战略防御倡议”，那么军备控制是不可能的。里根对戈尔巴乔夫的指责一笑了之。

当峰会的日程转到讨论地区问题时，轮到里根指责戈尔巴乔夫了。里根的话语比以前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对任何一位苏联总书记所说的话都要刺耳，他在阿富汗问题上对戈尔巴乔夫发起了连珠炮式的攻击。他说，莫斯科正在进行种族灭绝。苏联飞机投下一些玩具，实际上是一种饵雷，一个对国家没有任何威胁的穷孩子由于去拣这种玩具，因而被炸死。在别的地方（波兰、尼加拉瓜和安哥拉），苏联正在与一些民族主义组织进行战斗，这些组织仅仅想得到他们的自由而已。他大胆地问了一个使戈尔巴乔夫心烦意乱的问题：“难道你仍然想接管全世界吗？”

这次峰会没有使美国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最后以典型的壮观场面而告终。对外交细节没有什么兴趣的里根，带领美国代表团心满意足地回国了。戈尔巴乔夫对“战略防御倡议”进行了十分猛烈的抨击，表现了他的绝望心态。里根总统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在谈到阿富汗问题时，他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日内瓦没有实现自己目标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返回莫斯科后又要面临着前景黯淡的经济状况了。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回忆道：“对于苏联来说，我们已经感受到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压力了。戈尔巴乔夫想把改革继续进行下去，而持续不断的军备竞赛则对这些改革的前景构成了巨大的障碍。”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所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很清楚，他明白经

济复兴与苏联势力之间的联系。经济的强大决定着苏联的地缘政治实力。5 月 23 日，他在外交部对外交官们说："没有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加速发展，就不可能保持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他坦率地告诉大家，经济危机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不可能继续参与国际活动，除非我们的经济状况发生好转。

据苏联军方新闻机构报道，仍然处于发展之中的西方新的高科技武器系统将用于战场，它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苏联军方感到担忧。经济和技术进展（也许只能通过激进的改革才能取得）是国家安全的一种需要。一份军方期刊指出："只有一个强大而现代的经济基础，才有能力维持和改进军备竞赛，并且为军队提供足够数量的现代化武器、军事技术和各种津贴。"改革不仅是使苏联的民用经济现代化以及缓解使普通居民的生活陷入痛苦境地的日用消费品短缺状况，而且还要使相关力量对比发生翻转。德米特里·亚佐夫将军（后来担任国防部长）声称，改革就是"在科学技术取得最新成就的基础上加紧生产。"他是出于军队的需要而支持改革的。

对于华盛顿那些认真对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努力的人们来说，这个计划产生了一个令人恼火的问题。一个更少一致性的社会，因其更为开放和自由而更少侵略性，当然也就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如果戈尔巴乔夫以某种方式设法创造出一个更有效率和技术先进的帝国，而且披着过去 70 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形呢？如果他只是把改革作为获得西方贷款的一种诡计，又会出现什么情形呢？

随着戈尔巴乔夫开始他的十字军东征，把技术推动力注入苏联的经济体制之中，里根政府对苏联集团进行技术封锁的世界性战略开始奏效。自从 1981 年以来，美国在结构上和法律上对出口控制制度进行了许多改革，比以前的历届政府更加注重制度的执行。带有许多吹嘘成分的"大规模移居国外行动"比以前更具

有侵略性。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只有二、三起盗窃技术案件受到了起诉。而仅在1986年的1月份，美国司法部就起诉了100多件此类盗窃技术的案件。在里根当政期间，《物品控制清单》进一步扩大了，在1983年10月到1987年9月期间，清单上增加了26个技术项目。

但是，最具实质性的变化或许发生在1985年，当时两党统一行动，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对1979年颁布的《出口控制与管理法》进行了修改，从而第一次赋予美国出口管制官员一项权力，对美国境外的非法出口行为进行调查，代理商可以对技术出口现场（诸如香港、瑞士和印度）进行跟踪。由几个中立国签署的一些双边协议规定，这些国家要对自己的出口行为进行控制。海关官员还获得了其他的额外权力，他们现在无须批准就可以对可疑货物进行搜查，并且可以对这些货物予以没收。对非法运输的货物的处罚变得非常严厉，以判处监禁代替罚款。

1986年，美国全力实施技术封锁战略。巴黎统筹委员会成员国加强了各自的出口控制，堵塞了瑞典、奥地利和瑞士这几个国家的漏洞。大约40%的美国制造商在出口商品时需要取得某种类型的出口控制许可证，实际上使莫斯科不可能合法地购买到美国先进的高技术了。在4年的时间里，里根政府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安全机构，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跟踪向苏联集团的出口。设在中央情报局的“技术转让委员会”利用先进计算机对全世界的技术输出进行跟踪，并且史无前例地在全世界对高技术贸易流量进行监控。由于华盛顿不断施加压力，因此好几个主要西方盟国尽管执行的力度比较小，也按照美国的做法对出口进行控制。1984年，英国国防部将技术专家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技术转让小组，对高科技出口情况进行跟踪。巴黎和波恩也制定了类似的计划。

莫斯科对西方技术如饥似渴，但无法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数

量。西方令人窒息的出口限制迫使克里姆林宫孤注一掷，铤而走险。1986年，克格勃与格勒乌（GRU）[①]的情报人员试图大肆窃取西方的技术。“在整个80年代，随着西方对出口限制的加强，他们的工业间谍活动异常活跃，”什泰夫·哈尔珀回忆道。但是，间谍很难对技术情报做出恰当的选择，窃取来的技术（相对于合法购买的而言）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苏联的技术人员得不到培训、指导或者技术支持，而这类服务经常是对方在出售技术时一并提供的。

由于估计到克里姆林宫在追寻西方技术时会不顾一切地派遣工业间谍，因此凯西和美国政府其他高级官员扩大了制造假技术情报的计划，朝着苏联经济引擎的齿轮上抛沙子。兰利的情报分析人员对戈尔巴乔夫的五年计划仔细进行了剖析，以确定哪些经济领域将更需要西方的技术输入。将分析结果与苏联叛逃者所提供的报告结合起来，技术专家们列出一份苏联集团的代理商可能最感兴趣的技术清单。然后，专家们有针对性地在这些领域编造有缺陷的情报，在欧洲的第三方与美国把这些情报转给、或者甚至卖给对此毫不怀疑的苏联代理商。

石油与天然气方面的技术，尤其是新的提炼工艺，是苏联感兴趣的一个领域。面对美国的禁运，苏联的石油与天然气工业部门的官员显然想在国内开发一些用于近海石油钻探的部件。西方设计的这类部件很有价值，已经成为西方的一种优势了。在石油工业专家的帮助下，中央情报局计划把苏联的行动彻底搞乱。苏联工程师花了几个月时间，深入钻研了美国对墨西哥湾使用的近海石油钻探平台进行完善的相关文献，试图模访美国的设计。根据一项估计，苏联工程师为了拷贝美国的设计，或许已经花费了

---

① 俄文 Glavnoe Razvedivatelnoe Upravlenie 的缩写，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Chief Administration for Intelligence)。——译者注

数千万美元了。“这一招很有效，”一位专家回忆道，“我们在石油和天然气技术方面把他们搞糊涂了，以至于他们还没有摸着门道。”

中央情报局所属的国家情报收集处说服好几家硅谷的小公司为计算机和先进卫星设计有缺陷的主机。“工程师们为此而欢欣鼓舞，”一位官员回忆道，“对这些家伙来说，在一项秘密计划中工作，而且目的是为了攻下设计难关，这是一件非常急迫的挑战。”利用其他制造商报废的设计，工程师们搞出一系列“先进设计”，并且以大约15000美元的价格卖给苏联的代理商。据传闻，直到1989年，苏联仍然对某些设计进行分析和利用。一位官员说：“某个不准确的数据一旦进入研发这个环节，那就很难把它弄出去了。”

里根政府还把假情报当作促使苏联关注“战略防御倡议”的一种手段。克格勃官员奥尔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因其为英国秘密效劳而于1985年叛逃，据他所提供的情报表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逐渐达成共识，一致认为“战略防御倡议”要真正付诸实施了，这将对苏联的武器库从根本上构成挑战。比尔·凯西、卡斯帕·温伯格和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想把苏联人的这种关注作为他们的一种心理优势。这场战役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美国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的技术专家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已经远远超过现有的状况。“战略防御倡议”使戈尔巴乔夫感到困惑不安，它已经成为苏联所要面临的一种严重挑战了。

如果技术竞赛损耗了苏联的力量，那么地缘政治的挑战就有可能动摇苏联帝国的根基。根据里根总统的指示，比尔·凯西正在全球范围内部署许多秘密行动，以击退苏联的势力。凯西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这盘国际象棋的比赛中信心十足，不是要吃掉对方几个小卒子，而是希望把对方彻底将死。

日内瓦峰会结束的几周之后，凯西在兰利的办公室里与阿朗·菲耶尔共进午餐。菲耶尔在阿拉伯半岛工作了很长时间，现在被派往中美洲。两人讨论了中美洲的局势以及凯西关于在全世界支持反共起义的设想，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想在某个地方取得胜利。“如果我们赢得一场胜利，”他告诉菲耶尔，“那么看起来好像不切实际的整个计划就会起死回生，并且在整个苏联帝国产生连锁反应。”1986 年初，尽管苏联屡屡受挫也毫不让步，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阿富汗那样能够为美国提供一个击退苏联的绝好机会。

随着 1986 年冬天降临到饱受战乱之苦的阿富汗，战场上的枪炮声几乎停息下来了。当天气开始下雪时，苏联和阿富汗军队就像过去 6 年里的一贯做法那样，撤离了山岗和山谷，住进了防御工事或者城里。苏联自从一年前发起闪击战以来（目前苏军由扎伊采夫将军指挥），并没有取得多少成效。苏军在东线出动了 2 万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但未能封锁与巴基斯坦接壤的边境，也没有切断穆斯林游击队与其供应基地之间的联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美国对抵抗组织做出的承诺开始付诸实施，并且取得了成效。正在运输途中的武器数量猛增，1985 年穆斯林游击队获得 1 万枚火箭推进榴弹和 20 万枚火箭，比过去 5 年间的总数还要多。每年总共获得的武器弹药有 5 万吨，而两年前只有 1 万吨。

当凯西于 1986 年初访问巴基斯坦时，他与阿赫塔尔将军和优素福准将在靠近阿富汗边境的一个前沿基地对战争形势进行了评估。他们查看了卫星照片和大比例的阿富汗地图，检查了军队的部署、人员伤亡和来年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他们最为关切的事情，就是抵抗组织在未来的 5 年内如何改变自己。穆斯林游击队现在正在采用先进战术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每过一个月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5 年前，穆斯林游击队的装备是拉栓步

枪，步行在阿富汗境内寻找软弱的攻击目标，而现在则是鸟枪换炮了，利用高科技武器攻击苏联的空军基地。他们现在使用新式无线电通讯系统，有效半径可达600英里。随着通讯站在阿富汗腹地（帕尔万、帕格曼、马扎里沙里夫和坎大哈）的建立，阿富汗抵抗组织的地区基地也建立起来了，一些精密设备的安装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美国发射的卫星将覆盖阿富汗，并且把图像发送给华盛顿的情报分析人员和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在边境地区的官员。利用这些情报，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官员就可以把指示发送到这些地区基地。然后，这些基地就可以利用跳频无线电（有效半径为20—30英里）把命令发送到穆斯林游击队的战场指挥官的手里。

穆斯林游击队的战士们在使用先进武器方面也变得更加熟练了，这要归功于1985年建立的许多学校，专门培训战士们如何使用武器。为期两周的课程包括反坦克炮、高射炮、布雷、扫雷、破坏、巷战和怠工，数千名游击队战士参加了这些课程的学习。每年有2万名游击队战士从这些学校里毕业，获得了“中央情报局U类人员”的技能。

1985年，美国所承诺的胜利显然已经到了收获的时候了，穆斯林游击队在这一年当中取得了壮观的成就。素有“潘杰希谷地雄狮”之誉的游击队司令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夺取了佩什戈尔由一个营的兵力在地堡里防守着的防御重地，抓获了450名俘虏。在其他地方，穆斯林游击队领导人把苏军的机场以及停放在机场的飞机作为攻击目标。在整个1985年夏天，游击队用火箭对坎大哈机场进行了猛烈攻击，迫使苏联放弃这个机场，把大批飞机转移到更加偏远的地方。对于莫斯科来说，或许更加不吉利的事情就是，穆斯林游击队在阿富汗北方各省沿着苏联边境也进行了大量活动，当苏联的运输艇横渡阿姆河时，便会被击沉。英国情报部门（军情六处）提供了一种小型附着水雷，可以正好在

船的吃水线以下夹住船舷。经过特殊训练的穆斯林游击队员可以泅渡过河，在苏联境内安放几枚地雷之后再游回阿富汗。

但是，最严重的战争升级形式，就是穆斯林游击队计划在苏联境内展开攻击行动。这个建议最初是由白宫于 1983 年提出来的，阿赫塔尔和优素福接受了这个建议。1985 年底，美国政府却临阵退缩了。当他们想让攻击继续进行下去时，凯西决定美国最好不要把有关苏联境内的卫星照片让穆斯林游击队分享。这种照片可以使攻击更为有效，同时也直接把美国牵连进去了。“如果你们的联合火箭攻击进行得很精确，那么苏联人就知道你们使用了美国提供的卫星照片，”一位官员回忆道，“我们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提供这类情报的国家。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太过分和太明显了，苏联人就有可能进行报复。”因此，优素福只好在没有美国卫星照片的情况下组织进攻。

不过，美国可以其他方式进行援助。在苏联境内经过特殊训练的小组可以装备中国的火箭发射器，以及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高科技爆炸物。他们选择苏联的民用和军用目标进行破坏，可以攻击苏联的工业场所，使某些火车出轨，并且用火箭攻击苏联的军事设施。

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技术培训，也有助于改变抵抗组织的战略战术。1985 年底，穆斯林游击队几乎成功地暗杀了阿富汗秘密警察首脑穆罕默德·纳吉布拉。一名穆斯林游击队指挥官在喀布尔的一名同情游击队的阿富汗秘密警察的官员协助下，凭空设想出一项秘密计划。他使用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设备，并且从中央情报局学习了一些技能。1985 年 8 月，他把爆炸物和定时装置偷偷运进喀布尔。阿富汗秘密警察的代理商以一个伪造的名字购买了一辆旧汽车，在车上装满了爆炸物。有人透露纳吉布拉将于 11 月底拜访印度驻喀布尔大使馆，于是此人把这辆旧汽车停在前面的街道上。由于缺乏摇控雷管，他使用了定时装置。然而，

纳吉布拉几乎迟到了1个小时，因此定时炸弹的爆炸没有对他造成伤害。

阿赫塔尔、优素福和凯西这三驾马车在对地图和卫星照片进行分析之后，对新的战略进行了讨论，三个人微笑着预祝成功，又把讨论转到对未来战争的指导方面去了。阿赫塔尔将军提出了“毒刺”导弹的问题。这个请求由于美国方面不予理睬而胎死腹中了，这位巴基斯坦将军想得到一个解释。优素福回想起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个请求时说：“这是唯一能够扭转战争局势的武器。”凯西说他与其他政府官员也为此而感到沮丧。但是，总会有峰回路转的时候。罗伯特·麦克法兰已经于1985年底将这个问题向总统做了汇报，总统似乎准备同意这个请求。如果乐观的话，那么穆斯林游击队在夏天就可以见到部分“毒刺”导弹了。阿赫塔尔深受鼓舞，他告诉凯西，这将永久地改变战争进程。

阿富汗战争接连不断地取得成功，主要依赖于巴基斯坦的支持。美国驻莫斯科的一名高级外交官被苏联官员告知，巴基斯坦总是支持阿富汗的抵抗组织，因此克里姆林宫打算“给齐亚一点颜色”。凯西告诉阿赫塔尔，美国要尽一切可能去保护巴基斯坦总统。安全保卫措施已经很严密了，但还需要在一两个方面予以加强。3年之后，当载着齐亚总统的一架飞机在半空中爆炸时，间接证据表明克格勃或者阿富汗秘密警察插手此事了。

在会谈之后，比尔·凯西想去看一看穆斯林游击队员的射击示范。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有一个焰火计划，包括枪、迫击炮、火箭推进榴弹炮和无后座力步枪射击表演。1986年初，有些新兵就要开赴阿富汗与苏军作战了。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年似乎是一个好年份，穆斯林游击队在战场上开始取得主动权，苏联军队的状况看起来很不稳定，在苏联境内的军事侦察活动不久就要开始了。

第十八章

1985年底，沙特阿拉伯迅速增加石油产量从而使石油价格跌到谷底的决定，不会不引起克里姆林宫的注意。面对着史无前例的硬通货收入下降，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签名的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件，于1986年初送交法赫德国王。苏联外交部中东局局长奥尔格·阿列克谢耶维奇·格里涅夫斯基和政治局委员、阿拉伯学者盖达尔·阿利耶夫，将苏联的信息转达给法赫德，并且伊拉克和叙利亚协调对此做出反应的立场，这两个国家也是沙特阿拉伯这一精心策划的策略的输家。

这封信显然是警告沙特不要硬性降低石油价格，并且提议在日内瓦举行秘密会谈以稳定石油价格。伊朗出于自身的利益而对沙特进行公开威胁，因为石油收入的损失将使它被迫取消对伊拉克发动进攻的计划。由于伊朗和伊拉克几乎都违反了每一条由来已久的战争法则，因此导致波斯湾的局势紧张状况进一步加剧，油轮连同炼油厂和油井一道遭受了攻击。由于缺少零部件，伊朗的空军开始在战争中消失，因此伊朗的“革命卫队”正在熟练地用一种危险的新方法把攻击目标对准伊拉克的石油贸易，即使用游艇对油轮进行袭击。这些游艇满载着充满激情的士兵，他们装备有火箭。波斯湾里的油轮处于危险之中。

1986年初，由于美国表示将继续保护海湾的石油安全，因此沙特阿拉伯有点放心了。虽然伊朗攻击油轮的行动对沙特产生的威胁没有对其他产油国（诸如科威特）产生的威胁那么严重，但美国不允许伊朗对海湾的石油运输进行控制或者胁迫，法赫德

国王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欣慰。班达尔王子在华盛顿已经把他的这种关注转达给了卡斯帕·温伯格和比尔·凯西。1986年4月，当副总统乔治·布什访问阿拉伯半岛时，将与东道主直接商谈这个问题。

1986年初，沙特的石油产量差不多是每天1000万桶，石油价格持续下跌。对于沙特来说，石油产量爆增所带来的收益多于价格下跌的损失，预期总收益将增加三分之一。即使石油价格跌至每桶8美元，沙特的石油收入也超过了1985年。法赫德所警惕的美元贬值，是另外一种巨大的经济推动力。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一项秘密备忘录，由于最近美元的贬值，使沙特人“发了一笔较大的横财。”仅在1985年的下半年，这笔横财总计“差不多有100亿美元。”沙特人期望在1986年得到相似的收获。

1986年2月，当资金开始流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下组织时，美国击退苏联在东欧势力的行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第32号国家安全决策指示和总统的愿望，美国已经与西方的捷克逃亡者接上了头，谨慎地建立了一条与捷克地下组织进行联络的渠道。然而，捷克的地下组织每年只有几万美元的资金，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范围来看，都无法与波兰的行动相比较。捷克的反对派仍然处于萌芽阶段，主要还是受知识分子中的人权组织（诸如“宪章77运动”）或者天主教会所支配，通过西方的流亡者组织获得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资金，这类组织常常秘密把资金带进来。每次偷运的资金数量虽然很小，但可以积少成多。团结工会已经采取了一些大胆行动，在苏联集团内部支持反对派的活动。捷克与波兰这两个国家的反对派领导人在沿两国边境森林中的偏远地带，已经就此问题多次进行过协商。如果两国的地下组织采取联合行动，那么苏联在该地区的势力将面临着更为不利的挑战。

在"铁幕"后面进行地下活动，这是一项冒险的事业，确定提供援助的渠道都不容易。比尔·凯西交给新任中央情报局行动处处长克莱尔·乔治一份备忘录，打算在确定反对派活动方面做一些工作，以及如何更好地给他们一些帮助。"比尔想知道我们在支持该地区反对派活动方面能够做些什么，鼓励他们与反对派进行合作，"熟悉这份备忘录的一位官员回忆道。

另外一个问题便是计划有可能暴露。苏联集团的情报机构有可能揭露这个计划，进而对地下组织进行破坏。早在20年代，布尔什维克的秘密警察就已经建立了好几个虚构的地下组织，并以此为工具，抓获苏联政权的反对者。其中最有名的组织便是"俄罗斯中部君主制主义者协会（MOR)"，该组织的代号"信任"则更为出名。"信任"成功地渗透到了其他反共组织之中，并且破坏了这些组织在俄罗斯进行的几起情报活动。

但是，如果把波兰算作一个例子的话，那就证明外部支持能够起到极大的作用。除了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资金之外，团结工会每年从海外获得的捐助大约为50万美元，其中有30万美元来自劳联—产联。不过，这种援助并不是不间断的。1986年初春，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港口城市于斯塔德运来的好几批物资就被中途拦截了，其原因是联络渠道中的某人或者某处向官方告了密。只要运输线路被破坏，物资供应就有可能中断。不过，地下组织还有另外的选择。

在整个行动中，大多数的怀疑都转向瑞典。团结工会积极分子对运输船只一路进行押运，直到货物到达瑞典。虽然在西方的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有可能被敌人的情报人员渗透进来，但并不确实。只有最受信任的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才能介入秘密运输供应品的行动，新来的人是不能插手的。但是，在瑞典的联络渠道则取决于可靠的码头工人和港口官员。如果有人知道板条箱中的秘密，那么他有可能受到诱惑而向波兰当局告密，并以此换取钞

票。2 月中旬，比尔·凯西从他在白宫的办公室里向一位熟悉秘密行动的瑞典官员打了一个电话。整个联络渠道在瑞典出现了漏洞，凯西要求他堵住这个漏洞。

美国的一些情报人员被派到瑞典，协助调查此事。这个联合小组花了两周半的时间，对整个行动在瑞典的各个环节进行了仔细检查，包括观察、检查记录以及对工人们进行监督，但是他们一无所获。最后，根据一个码头工人的告密，他们才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个小组对于斯塔德海关的一个报关代理人进行跟踪，发现他正在给格但斯克的一位海关官员发电传。该小组通过检查他的银行帐户记录，发现他每告密一次可以得到大约 200 美元的酬劳。

即使发现了罪犯，该联合小组仍然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论是逮捕他，还是解雇他，新闻界都会进行报道，这样就会暴露整个行动。瑞典方面决定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将此人重新分配工作，而且给他增加工资，从而使他得到实惠。对于一名政府雇员来说，由于与一个华沙条约国分享情报而促进了自己的事业发展，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例子。此人的工作变动很平稳，漏洞就这样堵上了。

正当里根政府对“铁幕”后面的地下活动增加秘密财政支持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坐在了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在为期 10 天的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领袖齐集莫斯科，绘制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在主席团中，戈尔巴乔夫坐在叶戈尔·利加乔夫的旁边。坐在他们身后的是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和埃里希·昂纳克。

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对某些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开始揭露苏联在过去所犯的罪行。他还发出了重建苏联社会的感人号召。戈尔巴乔夫的讲话铿锵有力，充满激情，谈到了许多重要问题。他告诉与会者，技术进步对苏联的未

来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技术上取得进展，才能够使党实现自己的目标，使国家的“经济潜力”翻一番。新的五年计划把技术进步放在了中心地位。他说：“党要求把资金和资源投入到那些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获得巨大利润的领域，不要增加工人，但要创造出从根本上看是新的和高效率的设备与技术。”五年计划号召把“高科技部门”作为重点投资领域，超过 2000 亿卢布的资金将分配给这个领域，从而实现工业现代化。这个数额比前 10 年所投入的总数还要多。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为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希望。

戈尔巴乔夫还对美国的意图发出警告。他谈到了他对于“卸掉‘星球大战’以及常规军备竞赛的负担的真诚愿望。”他警告说：“美国及其军事工业机器保持着军国主义的火车头，迄今为止不想放慢它的行驶速度。”他还谈到“经济安全的基本原则，那就是美国要放弃任何歧视、封锁和经济制裁。”他公开指责美国干涉别国尤其是波兰和阿富汗的内政。他警告说，帝国主义势力妄图“颠覆波兰”。他告诉与会的共产主义信徒们：“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正在使阿富汗流血。”

1986 年春天，国际石油价格的猛跌不仅使全世界感到极大的恐慌，而且美国政府四分之一的官员也感到担忧。副总统乔治·布什正在为令人关注的为期 10 天的波斯湾之行进行准备。作为得克萨斯的一名石油生产商，布什从最近石油价格的急剧下跌中看到的是危险，而不是希望。石油高价对于他的政治基地——美国的西南部有好处。副总统在非公开的场合下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4 月 1 日，在出发之前，布什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石油市场的稳定是十分重要的，我将根据我国的利益努力宣传这种观点……这种利益涉及到我们的国家安全……我认为我

们谈论市场稳定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不能使石油价格像没有降落伞的伞兵那样自由下落。”

这些意见与美国政府的言行不相符合。总统、卡斯帕·温伯格、比尔·凯西和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在没有征求国内事务顾问的意见时，就认为石油价格的下跌对美国是一件大好事。在布什发表上述评论之后，这种观点不同寻常地遭到了公开反驳。一位白宫发言人说：“使石油价格保持稳定的途径，就是让自由市场发挥作用。”他还明确指出，布什将向法赫德国王强调，市场力量将决定石油价格水平。

布什在公开发表上述言论的几天之后就来到了利雅得，一头扎进了美国新建的大使馆。在那天的晚宴上，副总统与包括谢赫·亚曼尼在内的好几位沙特部长进行了交谈。他们就许多主题进行了坦率的讨论，而且突出讨论了石油价格问题。布什警告说，如果石油价格仍然处于最低点，那么美国的石油生产商将给国会施加压力，对进口石油课以关税或者对他们自己的利益进行保护。亚曼尼对副总统的警告并没有放在心上，这样就加剧了沙特的混乱。几个月以来，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一直在说服沙特降低石油价格。先是温伯格和凯西，最后是总统，一直鼓励沙特增加石油产量，停止任何支撑石油价格的努力。现在，布什却在利雅得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副总统从利雅得来到了达兰[①]，这里有法赫德国王的临时住处——东宫。国王在这里举行了盛大宴会，侍者身佩步枪、刀剑和手枪。在盛宴结束之后，布什与法赫德进行了秘密会谈，而且很快就变成了一次深夜会议。伊朗军舰正好袭击了沙特的油轮，法赫德对德黑兰表面上不断增强的侵略性感到担忧。情况似乎表明，伊朗正在通过夺取伊拉克最南端与科威特接壤的法奥半岛，

① 沙特阿拉伯东北部城市。——译者注

来支持它在伊拉克南部的阵地。法奥可以成为通向弹丸小国科威特甚至沙特油田的通道。法赫德对此忧心忡忡，沙特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布什重申，在伊朗进攻沙特时，美国将坚定地支持沙特王室。美国军队在没有做出反应之前，将不允许伊朗进攻科威特或者沙特阿拉伯。美国海军在海湾的军舰将监视伊朗的行动，华盛顿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清二楚。

当讨论转到石油这个话题时，布什告诉国王，他正在期待着“石油市场的稳定”。现货市场上的石油价格已经由 1985 年秋天的 30 美元/桶猛跌到 1986 年 4 月的 10 美元/桶，有人预测还会跌到 5 美元/桶。布什告诉法赫德，他早已对亚曼尼说过，美国将承受极大的压力，要对石油进口进行限额或者课以关税，因此沙特议会最好采取措施支撑石油价格。法赫德对此显然十分关注。对于布什来说，发表这种明显背离美国政策的言论，是极其不寻常的，因为以前的事实证明，副总统在里根执政的头五年里是一个诚实的人。这是他第一次越过了美国政府的雷池，但是他的意见被一位外国元首接受了。

当布什对法赫德所说的话传回白宫时，里根感到不得不采取某些行动。他采取了以前很少有过的做法。该地区的一位大使说：“他对布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里根明确告诉布什，当总统与高级内阁成员持一种观点，而副总统则持另一种观点时，这看起来不是什么好事。

在西方的某些圈子里有一种声音，要求对国际石油市场进行干预，以保持某种程度的“稳定”。1986 年春天，在国际能源机构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好几个国家努力争取成员国的最高级别的能源官员们做出支撑石油价格的决定。美国代表团根据美国的政策，声称此类安排是不能接受的。他们甚至主张将任何有关“价格稳定”的字眼从这次会议对当前较低石油价格的声明草案中删掉。

中央情报局在1986年5月的一份题为《苏联：面临着硬通货短缺的窘境》的秘密报告中开始披露，石油价格下跌是如何摧毁苏联经济的内部结构的。这份报告的摘要指出："能源的低价格、石油产量的下降以及美元的贬值，将极大地削弱苏联在10年内从西方进口设备、农产品和工业物资的能力。正值戈尔巴乔夫指望获得西方的援助以实现他的复兴经济的计划时，莫斯科获取硬通货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很可能下降三分之一或者更多）。"这份报告继续说道："这一年世界石油价格的急剧下降显著改变了莫斯科的收益状况……在1985年时，苏联向硬通货国家出口石油时，首当其冲的就是使世界石油产量下降。随着短期内很少有机会能够在本国加快节约能源或者寻找石油代替品的步伐，因此在戈尔巴乔夫努力推动经济增长的节骨眼上，如果减少向普通用户的能源供应量，那么将有可能使石油生产陷入混乱状态。"该报告重申了1984年8月9日的一个结论，即情报表明，每桶石油价格下跌1美元，莫斯科的收入每年将减少5亿—10亿美元，而这笔硬通货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石油价格下跌，使苏联每年的总收入减少13亿美元。天然气价格与石油价格是平行的，因此苏联出口天然气的收入也减少了数十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元的贬值使莫斯科的收入每年减少大约20亿美元，这是因为苏联的出口是以美元来结算的，而大部分的进口则是以欧洲货币结算的。

但是，石油价格暴跌给苏联带来的全部损失只是刚开始统计。军火是苏联继能源出口之后的第二大出口商品，大部分军火曾经出口到了中东国家，以换取石油美元。在70年代的石油繁荣时期，苏联出售给中东国家的军火增加了五倍，而且在整个80年代在苏联的总出口中保持着最重要的份额。但是，由于石油价格的暴跌，苏联军火的大多数富裕而稳定的客户现在所拥有的现金捉襟见肘。1986年上半年，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石

油收入减少了46%。结果，苏联军火销售量在1986年减少了20%，另外20亿美元的硬通货从克里姆林宫的金库中流失了。当苏联最需要硬通货时，其损失也显著上升了。这真是雪上加霜。

紧步里根国防预算的后尘，苏联的财政收入如此剧烈地摇摆，因此很难对后果进行推测了。70年代石油价格较高时，克里姆林宫感到极大的幸福。1973—1982年期间，苏联出口能源的收入增长了14倍，而出口量甚至没有翻一番。在那个时期，苏联的"进出口比价"增长了65%，即一定数量的出口物品能够换回比这个数量多出大约三分之二的进口物品。但是，世界石油价格令人吃惊的下跌，使得这个过程发生了剧烈的反转。因此，从西方进口的许多能够勉强维持这个体制生存的物品（食品、机床和日用消费品），变得极其昂贵。到了1986年7月，苏联要从西德购买一台特定的设备，所需要的石油出口比一年前多出5倍。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利用硬通货进行改革，不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了。

苏联的硬通货风暴引起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反响。由于缺乏资金，苏联的几十个大型工业项目都取消了。雷诺汽车公司计划搞一个12亿美元的汽车改装厂项目，却停在那里了。在西伯利亚的内尔尤戈里煤田，由于不能支付资金，从日本和美国进口的设备突然停止了。约翰·布朗股份有限公司和英国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0亿美元兴建的两个化工厂也废弃了。

石油价格的暴跌使克里姆林宫对西方贷款的依赖性更加严重，将其作为所需现金的一个重要来源。由罗杰·鲁滨逊整理的某些有关里根政府初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相当重要的报告指出，苏联及其客户的巨大财务利益来源于它们能够使用西方的同业存款。某些类型的准备金经常帐户满足了克里姆林宫的短期现金需求，使莫斯科通过骗取存款来避开财政问题。同业存款是银

行界的一种陈旧传统，无法在一夜之间将其消除。但是，美国政府在银行界的许多场合下提出过这个问题，希望对这种惯例进行某种限制。

有一次，比尔·凯西到纽约参加与银行界高层人士举行的一次私人（甚至是秘密）会见。这次聚会在金融区的一家难以形容的餐厅里举行。凯西本人就是一位国际银行家，他在午餐中见到了一些老熟人，得到了许多忠告，他也给这些人一些忠告。对于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困境，他向与会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他们知道要想与我们竞争，就必须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领域取得进步。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放松对平民的政治控制。美国应该推动苏联经济自由化的进程呢，还是应该使自己保持技术与经济的领先地位呢？这是华盛顿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凯西没有回答他自己提出的问题，而是继续讨论苏联当前的财政形势。他语气强烈地说道，由于严重的经济拮据，以及最重要的硬通货资源（石油、天然气和军火）的价值大幅度下降，因此莫斯科将逼着西方提供更多的贷款。但是，他很自信地认为，银行家们将不会冒这种信贷风险。由于苏联在偿付债务时碰到了麻烦，而且硬通货收入急剧减少，因此向苏联提供更多的贷款将没有什么意义了。然后，他向这些金融大亨们转达了美国政府的担忧，即克里姆林宫可能利用同业存款和其他计谋，从西方的资本库中提取资金。

随着苏联帝国的金融核心接近彻底垮台，在这个帝国遥远的外围地带挑战共产主义权威的组织越来越多，这些组织具有独立的愿望，并且得到了美国的援助。在波兰和阿富汗（这两个地方对苏联构成了最大的挑战），反对克里姆林宫的活动持续高涨。1986 年 6 月 5 日，波兰当局偶然发现了团结工会地下领导人兹比格涅夫·布亚克，他们已经对他搜寻 3 年了。他负责团结工会

的组织工作，对包括来自西方捐款的银行帐户进行监督以及分发资金。他的被捕表明反对派的活动遭到了极大的挫折。他曾经通过变换住所和伪装（利用头发、化妆品、假胡须和帽子，这些东西是由大学戏剧系里同情团结工会的学生们偷偷给他的）来躲避当局的搜捕。

在1986年的头几个月里，另外320名团结工会积极分子被捕，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的才干超过布亚克。在基层还有许多积极分子，但是组织和管理反对派活动的指挥与控制系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反对派的活动仍然像以前那样进行，但已经开始失去国人的注目了，”一位官员回忆道，“布亚克的被捕使反对派的活动遭受了极大的损害。”由于失去了布亚克，地下团结工会暂时处于混乱之中。团结工会临时协调委员会群龙无首，因此没有几个领导人知道其他人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职责、日常活动和地址等。这种组织状况虽然能够防止当局的渗透和自身的漏洞，而且能够保证被捕领导人无法向当局透露更多的情报，但是也无人能够代替布亚克的作用。

但是，布亚克的被捕并没有就此为止。在这场深刻的经济危机中，由于美国进一步加强经济制裁，因此波兰与西方的贸易几乎停止了。1980年的贸易额为75亿美元，1986年已经下降到了10亿美元。不久，来自西方的外国贷款也下降了。波兰由于不能向西方出口，因此就得不到贷款。在1980年之前，华沙每年还能够借到80亿美元的钱；到了1985年，这个数额就下降到了3亿美元。结果，波兰被迫向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借钱，而这些国家几乎无法提供贷款。波兰所欠“同志们”的债务迅速增加，接近50亿美元的转帐卢布了。

布亚克的被捕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象征，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波兰保持制裁的理由。根据目前的经济状况，雅鲁泽尔斯基担心出现动乱，因此把他的顾问召到他的办公室，宣布释放布亚

克。此外，波兰政府不得不满足里根政府的一些要求，以便取消制裁。华盛顿提出了 3 项先决条件：开始与教会进行实质性的对话；进行全国和解，向反对派做出让步；释放政治犯。

雅鲁泽尔斯基很难接受这些条件。但是到了 1986 年夏天，结束美国制裁已经成为政权生存的关键因素了。7 月 22 日，仅仅在布亚克被捕的一个半月之后，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实行大赦，全部政治犯都获得自由。波兰政权的敌人又回到了大街上，重新自由地加入地下团结工会。粉碎团结工会的策略失败了。

华盛顿对此保持沉默。华沙基本上满足了美国提出的 3 项先决条件，但是白宫却表现出一种不依不饶的气势。凯西、温伯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建议总统对波兰保持适当的制裁，对雅鲁泽尔斯基继续保持压力，或许会对地下团结工会做出更大的让步。华沙政府的反对者显然恢复了活力，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里根要求与梵蒂冈进行磋商，以便了解他们的观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波兰地下团结工会渴望制裁立即结束。莱赫·瓦文萨和团结工会的其他 9 位高级领导人发表了一项声明，要求里根改变他的强硬立场，因为波兰日益恶化的经济条件“威胁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且还威胁着下一代”。卡萨罗利红衣主教也向里根提出了同样的建议。罗马教皇感到，波兰人民遭受的痛苦已经足够了。里根政府一直推迟做出决定，总统直到 1987 年 1 月才对这个建议引起重视。对团结工会的秘密资助继续进行。

波兰政府的特赦令使团结工会各个阶层的信心大增。现在资金状况良好，领导人安然无恙。西方的财政、后勤和物资支持源源不断地送到反对派的手中。10 月初，团结工会领导人在格但斯克开了两天会，根据目前所拥有的极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他们对今后的战略重新进行评估。在格但斯克和华沙同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团结工会领导层发表了一项引人注目的声明：他们即

将公开活动。瓦文萨宣布："我们不想秘密活动了。"

这是一次极富勇气的大胆转变。反对派准备公开对波兰中央政府进行挑战了。团结工会领导层中的某些成员把他们即将发表的声明泄露给里根政府，因此华盛顿已经有所准备了。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因德克斯特证实，波兰当局十分清楚，对团结工会进行镇压将意味着美国继续进行制裁并且进一步紧缩对波兰的贷款。雅鲁泽尔斯基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温和的立场。有些人所预料的严厉镇压行动终于没有发生。

波兰当局切断西方对团结工会秘密援助渠道的努力仍然继续进行。在什维诺乌伊什切港口的码头上，一批货物被没收了，这是波兰当局一次重大的收获。一辆载重量为40吨的卡车被没收，上面装有价值20万美元的物资：23台胶板印刷机、49台复印机、60台传真机、好几台IBM牌计算机、9只磁盘驱动器和12只打印计算器。但是，尽管遭受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暂时挫折，向地下团结工会提供物资的行动一直在进行。

中央情报局还对欧洲和美国的一些捷克和匈牙利的流亡者小组提供支持，希望他们能够提供有关他们祖国的情报。里根的第32号国家安全决策指示要求采取地区性行动，将东欧从苏联集团中解放出来，因此颠覆活动的范围进一步放宽了。1986年中旬，有人在一封由"铁幕"背后的持不同政见组织起草和签署的信件中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出警报。信中呼吁采取联合行动，与苏联的镇压行动做斗争。凯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决定对此提供帮助，将2.5万美元交给了信中提到的进行活动的组织。

1986年10月底，有一个组织向人民发出大胆的呼吁，在东欧推翻苏联势力。这虽然只是由那些持不同政见者起草的一封寥寥数语的信件，但绝不是一封容易处理的信件。这是一场政治地震，它是在匈牙利平静地庆祝华沙条约组织成立30周年的时候，由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持不同政见者联合发出

的呼吁。

东欧各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联合行动是苏联集团的一场恶梦。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起义易于容忍，因为它们的发生是间歇性的。但是，一场地区性的危机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当团结工会于 1981 年呼吁其他东欧国家组织自己的自由工会时，再没有比这件事更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恼怒的了。这封信使当局对普遍的不安状态感到担忧。这封信有 122 人签名，其中包括一些反对派的重要人物：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韦尔[①]、匈牙利的乔治·康拉德以及波兰的莱赫·瓦文萨。这封信的观点是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自己提出来的。进出多数欧洲国家传递情报的西方流亡者将这封信传遍了东欧，最后，“自由欧洲电台”播发了这封信。

这封信成为第 32 号国家安全决策指示的核心内容。团结工会在波兰安全地渡过了一场风暴，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第二批现金（5 万美元）已经于 10 月初寄出，并且安全地到达了团结工会的手中。波兰陷入不安宁的状态，里根政府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当波兰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继续通过集会、文学作品和政治抗议来一点一点地蚕食共产党当局时，巴基斯坦士兵于 7 月初在伊斯兰堡的一个空军基地开始打开一些非常精巧的货物箱。在这些看似普通的板条箱的里面，装着穆斯林游击队等待已久的

---

① 生于 1936 年。捷克著名剧作家、诗人，共产党执政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东欧剧变后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89—1992）。他是参与 1968 年自由化改革（即“布拉格之春”）的主要人物，同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镇压行动之后，他的剧作遭查禁，护照也被没收。70 与 80 年代一再遭逮捕，并且因为争取国内人权的不同政见活动而入狱服刑 4 年（1979—1983）。获释出狱后仍留居国内。1989 年 11 月，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在布拉格爆发后，哈韦尔成为“公民论坛”的领导人物。12 月上旬，共产党与其共组联合政府，他出任临时总统，并于 1990 年 7 月再次被联邦议会选举为总统。1992 年捷克斯洛伐克联邦面临解体，他辞去总统职务。——译者注

"奇异武器"。里根政府正在兑现它的诺言，将第一批"毒刺"导弹运来了。从战争初期以来，苏联在没有任何防空担心的情况下，对穆斯林游击队的目标进行了猛烈轰炸。穆斯林游击队手中为数不多的地对空导弹就像罗马焰火筒一样，起不了太大的作用。"穆斯林游击队最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文森特·坎尼斯特拉罗回忆道，"低空攻击是苏联最有效的战术。'毒刺'导弹的引入是一种实质性的变化，改变了战争的动力。它使苏联处于守势。"

阿富汗的战争趋势经常发生转变。1986 年对于莫斯科来说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苏联军队新的进攻速度，使穆斯林游击队在国内最重要的基地扎瓦尔失陷了，抵抗组织只好向科乌斯特开进。但是，事实上苏联所取得的这些成功只是暂时的，穆斯林游击队比以前更有力量了。苏联以前使用飞机很普遍，而且事实证明在扎瓦尔和科乌斯特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这种战术即将结束了。

"毒刺"导弹非常珍贵，因此受到了严密保护，美国的盟国都没有得到这种导弹。作为世界上最好的地对空导弹系统，"毒刺"导弹具有发射出去就不用管的特点，因此无需一种暴露的装置对它进行引导。这种导弹的最大上升高度为 15000 英尺，携带高能弹头，飞行速度为每小时 1200 英里。它使用了一种复杂的红外线热寻的探测系统，一旦锁定目标，就不会受制于对方的防范措施了。

对于向穆斯林游击队提供"毒刺"导弹这个决定的主要担心，就是这种武器系统有可能落到恐怖分子或者极端分子的手中。西欧或者中东的民用客机将很容易成为这种武器的牺牲品。但是，总统本人决定即使冒险，也要向穆斯林游击队提供这种导弹。

随着"毒刺"导弹的到来，穆罕默德·优素福准将具体负责

对使用这种导弹的穆斯林游击队员进行培训。凯西希望中央情报局能够指导培训工作，但遭到了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拒绝。美国军队送来了一套模拟器，在中央情报局当地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装在拉瓦尔品第的奥吉里军事基地。穆斯林游击队的指挥官被带到这个地方，为期3周的培训立即开始了。每年采购250套“毒刺”导弹，总共1200枚导弹。

在新任“毒刺”导弹部队指挥官的领导下，穆斯林游击队组织了一个导弹袭击小分队。一旦导弹把苏联的飞机击落，这个小分队就将飞行员干掉。这是一项令人恐怖的任务。在经过几个月的培训之后，“毒刺”导弹首次出现在阿富汗的天空。

9月25日，穆斯林游击队的一个小组隐藏在距离贾拉拉巴德机场很近的一座小山上。指挥官加法尔受命指挥携带着3枚“毒刺”导弹的一支部队和一个精干的袭击小分队。他们静静地坐在矮树丛中，所有的眼睛盯着一个适宜的目标。下午3点钟，8架苏联“雌鹿”战斗直升机降落在贾拉拉巴德机场。“雌鹿”直升机是一种特别不起眼的飞机，低劣的视域常常造成士兵和平民的重大伤亡。

“毒刺”导弹系统的操作十分容易，这真使人有点不可相信。它可以自动锁定目标，通过轻微的震动声音来表示已经准备就绪。操纵“毒刺”导弹的专门人员慢慢地瞄准几个分离的目标，这些目标就被锁定了，然后手指不安地扣在了扳机上面。另外一个穆斯林游击队员拿着一架摄影机坐在矮树丛中，注视着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

当“雌鹿”战斗直升机在飞机跑道上空只有600英尺的高度上盘旋时，指挥官加法尔下达了攻击命令。随着“真主保佑”的呼喊声，3枚导弹呼啸着冲向天空。其中一枚导弹由于发生故障而坠地，没有对人员造成伤害，另外两枚导弹击中目标后发生爆炸，两架飞机顿时着火，从空中一头栽了下来。穆斯林游击队员

非常兴奋，大声叫喊起来，并且围着“毒刺”导弹转圈，其他人也转起了圈。接着发射了另外两枚导弹，而且都击中了目标。苏军剩余的战斗直升机忽忙飞走了，机组人员目击了这场令人恐怖的惨剧。穆斯林游击队以此向外界证实，他们已经拥有了新式武器，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进程。很显然，这种“奇异武器”的威力极大，首次发射了200枚“毒刺”导弹，其中75%击中了飞机。

在指挥官加法尔首次指挥穆斯林游击队使用“毒刺”导弹的几周之后，相关的录像带送到了白宫，供里根总统私下里观看。大部分的图像都很模糊，这是因为激动的摄影师来回奔跑着庆祝胜利，导致图像不稳定，只有烟雾和飞机残骸的图像还算稳定。除了录像带，总统还收到了在阿富汗第一次发射“毒刺”导弹后留下的电子管。

在随后的几周内，使用“毒刺”导弹对苏联飞机进行了多次攻击。不久，这类消息就开始在苏联的飞行员中传开了。美国的情报（在阿富汗中途截获苏联军队的通讯信息已经有好几年了）表明，苏联飞行员中间开始出现了一种狂乱的不安情绪。飞行员因拒绝以特定的队形飞行而受到上司的严厉指责，说他们在空中飞得那么高是一种失职行为。飞行员在完成轰炸任务或者运输货物后返回机场时，在机场附近采取蛇行飞行的方法进行着陆。“他们开始从很高的空中往下投弹，”看过此类情报的文森特·坎尼斯特拉罗回忆道，“这就使他们的轰炸效率很低。从那以后，他们开始遭受无法接受的损失了。最低限度来说，阿富汗正在变成一个血流如注的地方。”“‘毒刺’导弹的使用使战术平衡向我们一方倾斜了，”穆罕默德·优素福说，“随着成功一个一个地接踵而来，穆斯林游击队的士气高昂，而敌人则士气低落。”这种“毒刺”导弹对苏联人造成的精神创伤不能估计过高。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主要外交政策助理谢尔盖·塔拉先科回忆道：“我陪

同谢瓦尔德纳泽去过6次阿富汗……而且说实在的，当我们进入喀布尔机场时，很担心遭到‘毒刺’导弹的袭击。那种感觉真不好受。当我们在回国途中飞越边境时感到很快乐，飞机扩音器里会说：‘我们现在在苏联的领土上。噢，上帝啊！我们回来了！”

穆斯林游击队的“毒刺”导弹攻击部队咄咄逼人地部署在苏联空军基地的周围。第一支部队部署在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周围，第二支部队部署在北方与苏联接壤的地区。穆斯林游击队在边境地区不仅打算攻击阿富汗机场上的飞机，而且还打算攻击那些在苏联境内飞行的飞机。为了鼓励穆斯林游击队指挥官主动使用“毒刺”导弹，而不要把它们储藏起来，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提出了一项灵活的奖励计划：在完成每一次经确认的导弹攻击后，指挥官将得到额外的两枚“毒刺”导弹作为奖励。

由于“毒刺”导弹对阿富汗的天空构成了威胁，美国迫切要求把战争扩大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并且以此作为一种对苏联的威胁手段。秋天，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弗雷德·伊克尔在国会山上作证时提到了美国的阿富汗政策。在回答一位议员的问题时，他的话在莫斯科引发了一场大风暴。他回忆道：“我当时说，如果苏联不遵守联合国的决议，那么战争将扩散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归根到底，这些都是入侵。”凯西一直怂恿进行入侵，而伊克尔则以战争将扩散到苏联境内相威胁，试图哄骗莫斯科撤军。报道听证会有关情况的一名塔斯社记者将此消息发回莫斯科，苏联外交部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强烈抗议。国务院马上就找伊克尔的麻烦了。“国务院认为这太过分了，指责我走得太远了，”伊克尔回忆道，“但是，我们还是以此作为对苏联的威胁。我们要尝试各种各样的努力。凯西对这个战略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我们也全力支持他。”

1986年年底，有关穆斯林游击队在苏联境内活动的报告传回华盛顿。阿富汗北方各省的穆斯林游击队指挥官当时都装备了

中国的107毫米火箭筒和埃及的122毫米火箭筒，它们的射程大约为10英里。到了晚上，这种武器系统就架立在阿姆河的南岸，隔河向北岸射击，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苏联的土地上并爆炸。由巴基斯坦情报部门进行特殊培训并且由中央情报局提供装备的小分队，越过阿姆河去攻击苏联的边境哨所、埋设地雷以及拆除输电线。在苏联边境小镇皮亚纳兹正北方的一个机场，受到穆斯林突击队的反复攻击。这些攻击是从朱兹詹和巴达赫尚秘密发起的。他们只要越过边境，苏联居民就会偶尔碰上他们，并且加入他们的行动。1986年12月初，大约30名穆斯林游击队员乘坐“黄道”牌游艇渡过阿姆河，对塔吉克斯坦的两座水电站进行了攻击。在到达水电站的途中，他们捣毁了苏联的两个哨所。当穆斯林游击队发动攻击时，18名苏联军队的穆斯林士兵跑过来加入了抵抗组织。水电站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使得该共和国的居民断电好几周。

1986年的最后几个月，穆斯林游击队计划在来年春天对苏联境内的目标进行一系列的攻击。这些行动将更加雄心勃勃，经过特殊训练的武装人员甚至潜入到共产党超级大国的纵深地带进行侦察活动，而且使用更加精密的武器。计划还包括对吉利亚姆博尔村附近的一个名叫东舒尔博的机场进行猛烈的火箭攻击。然后，一个20人的小分队将埋伏在铁尔梅兹（苏联境内一个古老的亚洲城市）东面的一条边境公路两侧，他们使用的武器有反坦克地雷、火箭炮和机关枪。这个小分队在公路上埋设地雷，等候苏联军车的到来，在地雷爆炸之后他们就一齐开火。另外一个拟议中的行动甚至更加雄心勃勃，它要瓦利·贝格率领的一个小组渗透到苏联境内几乎15英里的地方，对伏罗希洛夫巴德这个敏感的空军基地附近的一个工业目标进行攻击。

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这些攻击直接威胁着苏联的领土完整，他们对此感到极度恐惧。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正在酝酿一场风暴。在对苏联领土开始攻击之后不久，就使他们开始付出代价了。“毒刺”导弹的引进以及在苏联境内采取的行动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都大为增加，从而足以迫使苏联撤退。苏联在 1986 年 11 月初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要开始研究从阿富汗撤军的方法。在冷战期间，这是苏军历史上第一次被打败。12 月初，巴基斯坦任职时间很长的外交部长阿卜杜勒·萨塔尔应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尤利·沃龙佐夫的邀请访问莫斯科。苏联副外长非常坦率，认为战争是一个“流血的伤口”，而且断然表示“我们准备离开”。沃龙佐夫强调指出，战争的代价对于莫斯科来说简直太高昂了。他要萨塔尔提供帮助，以保证在苏军撤退过程中不要导致一场大屠杀。萨塔尔表示伊斯兰堡将尽其所能保证苏联军队有条不紊地撤退。

在萨塔尔回国的几周之后，阿富汗新任总统、前秘密警察首脑穆罕默德·纳吉布拉被戈尔巴乔夫召到了克里姆林宫。阿富汗共产党政治局的许多其他委员也随纳吉布拉一同来到莫斯科。应苏联邀请而举行的这次会谈表面上看来是一种例行的磋商，但真正的目的则是非常严肃的。12 月 12 日，访问者来到大克里姆林宫的圣凯瑟琳宫，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房间，墙上挂着昔日俄罗斯帝国的许多圣像和肖像。当纳吉布拉和他的同事落座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走进了房间，随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克格勃首脑维克托·切布里科夫以及老牌外交家安纳托利·多勃雷宁。

戈尔巴乔夫省掉了客套，开门见山地直入主题。这位总书记直截了当地告诉客人，苏联军队将在两年内撤出阿富汗。莫斯科将不再继续支撑这场战争了。戈尔巴乔夫告诉与会者，他仍然坚信共产主义将在阿富汗取得胜利，他将力所能及地为纳吉布拉政府做任何事情，包括为他们提供获得胜利的机会。苏联军队在撤退之前将继续进行攻势作战，而且将把大量的武器装备送给阿富

汗政府军。戈尔巴乔夫告诉阿富汗政治局委员们："不过，你们要单独作战。"

现在这场血腥的战争每年使克里姆林宫付出40亿美元和数千条年轻生命的代价。由里根政府扩大的这场战争使苏联简直无法获胜。克里姆林宫感到精疲力竭，因此无法避免伤亡。苏联在冷战历史上被完全打败，这是绝无仅有的。正如这个帝国的前统治者在1905年和1917年的失败那样，这次失败将对苏俄产生革命性的后果。

但是，正当克里姆林宫准备有条不紊地从阿富汗撤军时，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数百名市民走上街头，发动了一场反对俄罗斯的暴乱。在阿富汗开始的这场风暴清楚地表明，国际公认的边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从表面上看，这场暴乱是由被放逐的哈萨克共产党领导人丁穆罕默德·艾哈迈多维奇·库纳耶夫及他的继任者、俄罗斯人根纳季·科尔宾发动的。但是，因民族和宗教问题而出现的这场暴乱引发了这么大的狂潮，就成为改组政府的一个方便借口了。

这场民族主义暴乱波及的范围很广。很显然，暴乱者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了，而且为发动暴乱进行了准备。哈萨克斯坦成为美国和巴基斯坦在苏联中亚地区联合进行反苏宣传的核心，无线电广播、文学作品和其他宣传资料都送到了这个地区。中国也做了很多同样的事情。这种活动的效果无法衡量，但是，在暴乱期间反政府群众的情感是很明显的。抗议者的旗帜上写着："我们要加入中国"以及"美国是我们的朋友"，这类信息使莫斯科感到很恐惧。

正当苏联势力从波兰和阿富汗撤退时，美国"战略防御倡议"这个幽灵继续萦绕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到了1986年年底，这项计划在技术上取得了某些显著成果。自1985财政年度以来，研究经费翻了一番还多，1987财政年度达到33亿美元，好几个

国家的政府与里根政府签订了合作研究的协议。事态的发展使戈尔巴乔夫感到格外头疼，因为这个计划除了有更多的科技人员参与之外，美国政府还会将其进一步合法化。

克里姆林宫正在展开一场公开活动，以反对美国的同盟国，警告他们不要参加“战略防御倡议”研究计划，而且着重强调这个系统表明里根政府企图在世界上获得战略优势。但是另一方面，苏联支持的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恐怖组织对“战略防御倡议”的研究设施和过境欧洲的科学家发动军事攻击。1986 年 7 月到 1987 年 3 月，参加秘密合作谈判的 3 位外国政府高级顾问遭到暗杀。1986 年 7 月 6 日，西门子公司研究部主任、“战略防御倡议”的课题负责人卡尔海因茨·贝克胡尔茨和他的司机在慕尼黑郊外被一枚遥控炸弹炸死。1985 年 6 月，他与美国政府官员举行会谈，讨论实施“战略防御倡议”研究计划的可能性。1985 年底和 1986 年初，在波恩与华盛顿就“战略防御倡议”的合作研究问题进行谈判期间，贝克胡尔茨充当西德政府的顾问。“红色军团（RAF)”[①]在犯罪现场留下了一封信，指出贝克胡尔茨之所以被暗杀，是因为他介入了这些“秘密谈判”。

10 月 10 日，西德外交部的一名官员杰拉尔德·冯·布劳恩米尔在其波恩住所的外面走下出租车时，被一名蒙面枪手杀死。在“战略防御倡议”的合作谈判期间，冯·布劳恩米尔是西德外交部

---

① 联邦德国左翼恐怖组织，1968 年成立，其俗称为“巴德尔—迈因霍夫帮”，由早期两个头目的名字构成。该组织成立之初即在联邦德国从事抢劫银行、安放炸弹、纵火、绑架、谋杀等恐怖活动。70 年代中期，该组织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恐怖组织。1989—1990 年民主德国共产党政府垮台后发现，许多逃亡的该组织成员在民主德国受到原共产党政权秘密警察的庇护。若干人后来被捕。——译者注

长汉斯迪特里赫·根舍①的主要顾问，《法兰克福汇报》说他肩负着“重大责任”。“红色军团”也声称对这起事件负责，而且从他们的声明中显然可以看出这起事件涉及到“战略防御倡议”的谈判，“今天，我们通过英格丽德—舒伯特突击队射杀了参与秘密谈判的外交官冯·布劳恩米尔。”调查这起枪杀事件的德国联邦检察官库尔特·雷布曼称他们是反对西方、尤其是反对“战略防御倡议”的“帮凶”。

在“战略防御倡议”合作协议的谈判中献出生命的第三位高级官员是意大利国防部的利西奥·焦尔杰里将军。1987 年 3 月 20 日，这位国防部空间与军备采购局局长被两名刺客枪杀。与贝克胡尔茨和冯·布劳恩米尔一样，在“战略防御倡议”合作谈判期间，这位将军充当意大利政府的主要顾问。意大利“红色旅”的一个派系“共产主义者战斗联盟”宣布对这起事件负责。在一份洋洋洒洒的 14 页的声明中，这伙人说焦尔杰里“之所以被专门杀死，这是因为他紧紧追随意大利政府，参与‘星球大战’计划。”

参与“战略防御倡议”研究计划的西欧科学家与公司领导人，也是暗杀的目标。1986 年 7 月 24 日，西德亚琛的夫琅和费研究所受到了炸弹袭击。这个研究所承担了与“战略防御倡议”相关的高能激光项目，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欧洲激光项目。7 月 25 日，一颗 15 磅的炸弹爆炸，伊尼门斯塔德的道尼尔公司总部受到了严重破坏。道尼尔公司与美国的斯佩里公司在武器瞄准系统方面进行合作，这是一个用于空间目标的装置。1986 年 8 月，

① 生于 1927 年。西德自由民主党主席（1974—1985），并任内阁外交部长。1982 年自由民主党转而支持接管政府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根舍继续担任外交部长。他强烈赞成与苏联及前东欧集团改善关系，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坚持西方必须为缓和而利用这一历史机会。1989—1990 年为德国的统一而多方奔走，成为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任外交部长。1992 年辞去外交部长职务。——译者注

法国汤姆森公司仅仅在签订了一项“战略防御倡议”研究合同的两个月之后，它在巴黎的办事处就遭到了炸弹袭击。该公司参与自由电子激光的研究，按照“战略防御倡议”研究主任詹姆斯·亚伯拉罕森将军的说法，这项技术将使“战略防御倡议”系统取得“显著的进展”。据报道，汤姆森公司也在为“战略防御倡议”计划进行镓砷集成电路方面的研究工作。这种电路将缩短防御系统的反应时间。1986 年 11 月 16 日，IBM 公司在西德海德堡的研究中心内部因炸弹爆炸而遭到了破坏。“红色军团”声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原因是 IBM 承担了 4 项“战略防御倡议”研究合同。

与此同时，许多其他独立的恐怖组织也开始对“战略防御倡议”的目标进行攻击，这就有点奇特了。更为奇特的是一些左翼恐怖分子，因为他们的传统攻击目标主要是一些政治目标或者作为资本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象征的目标。此时的莫斯科成为东柏林和苏联集团其他地方的恐怖分子的安全港湾，毫无疑问，它认为这类攻击对自己有益。

在外交战线，戈尔巴乔夫的最大希望就是想方设法搞掉“战略防御倡议”，然后向里根总统提出一个使他无法拒绝的建议。1986 年 10 月的雷克雅未克[①]高峰会谈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时机。

戈尔巴乔夫期待着里根政府做两件事情。正如他于 1986 年初在一次演讲中对苏联外交官所说的那样，苏联的外交工作“必须为国内发展做出贡献。”他对与会者说，苏联的最高外交政策目标就是为改革“创造一个最佳的外部环境”。这就意味着要获得西方的技术与贷款，并且停止由“战略防御倡议”和里根国防建设所强加给苏联头上的技术挑战。

从许多方面来看，雷克雅未克高峰会谈都是一个分水岭。在

---

① 冰岛首都。——译者注

这次峰会上，两个超级大国快要走到消除所有核武器的边缘了，但是苏联希望首先尽快取消“战略防御倡议”研究计划。雷克雅未克是超级大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第二个地方。如果日内瓦为双方提供了一个相互试探的机会，那么雷克雅未克就是两位有远见的领导人的战场，他们两人的目标与价值观具有本质区别，但都希望坐下来商谈。

在此次峰会的几周之前，据走漏的消息说，这位总书记计划在会上对里根总统进行突然袭击。这个消息是一位印度官员从苏联驻美国前大使、后来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多勃雷宁听说的，戈尔巴乔夫计划提出一个有可能使里根总统中圈套的建议。白宫明显感觉到戈尔巴乔夫需要得到安慰和帮助。“他们特别渴望达成一项有关‘战略防御倡议’的协议，”唐·里甘回忆道，“他们的处境很困难，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但是，总统并没有屈服。”

消除所有的核武器，这是戈尔巴乔夫于 1986 年 1 月提出的一项引人注目的建议，也是他的一个借口。克里姆林宫深知里根对于核武器的厌恶及其理想主义的本性，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可以起到一种推动作用，并且希望看到这样一种结果，即这个建议太有诱惑力了，以至于里根无法拒绝。

在所有的峰会中，雷克雅未克峰会是最没有计划性的。以前的几次峰会刚一开始就很快陷入了一场高层的政治游戏之中，双方为了争得上风而讨价还价。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都不能对会谈结果做出预测，但都希望早点把日程确定下来，并且努力使对方满足自己的要求。峰会地点在霍夫迪宫，顺着滨海望去显得孤零零的。据谣传，这里常常闹鬼，但是此次把这里作为峰会地点倒是很合适的。

第一次会议于 10 月 11 日上午 10 点 30 分开始。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连同各自的翻译，围坐在小餐厅的桌子旁边。这位总书记

几乎立即就宣布，他在涉及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都有积极的建议，尤其是在军备控制领域。在发表一些评论之后，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与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主动参加到两位领导人的会谈中来了。苏联的建议集中在3个领域：战略核武器、中程核力量和空间武器。这些确实都是根本性的建议，即双方在战略核武器领域全面裁减50%，在中程核力量方面都要进行裁减。但是，在空间武器方面，戈尔巴乔夫强调，"战略防御倡议"要限制在实验室范围内。

在第一次会谈结束之后，里根与他的高级助手们簇拥在一起，这些人包括舒尔茨、约翰·波因德克斯特、保罗·尼采、肯尼思·阿德尔曼和理查德·珀尔。总统仍然保持他的那种罕见的良好品格，一边倾听助手们的讨论，一边仔细考虑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尼采对这位总书记提出的建议感到非常兴奋，而里根却说："他提出了许多建议，但我担心他主要是冲着'战略防御倡议'来的。"

会谈于下午2点钟重新开始，里根、戈尔巴乔夫、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相互面对面地坐着。里根对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做出了反应，大概阐述了美国对于军备控制的建议。在霍夫迪宫的二楼，双方代表团的成员非正式地闲聊。约翰·波因德克斯特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坐在角落里的沙发上交谈。波因德克斯特几乎立即就清楚地感觉到，元帅在军备控制方面是真诚的，但他也对"战略防御倡议"感到担忧。他警告说："它是一种想把力量对比向有利于你们的方面转变的企图。"他们两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当波因德克斯特起身站起来时，两个战略性的判断已经蚀刻在他的脑海里了："他在达成协议方面是真诚的，我确信这一点。他们需要一项协议。但是，他极其关注'战略防御倡议'以及它对莫斯科提出的挑战，这一点也是非常清楚的。只要能使这个计划停下来，他们准备做任何能够做的事情。"

在为期两天的峰会上，双方都同样出现了情绪急转突变的情形。苏联在战略核武器和中程核力量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但是，戈尔巴乔夫说，这主要取决于“战略防御倡议”是否取消。苏联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军事力量，而戈尔巴乔夫同意大幅度削减苏联的军事力量，并且将这种力量与战略防御联系在一起，这就充分说明莫斯科是多么急迫地想与西方缓和关系。

里根顽强地坚持他对战略防御系统的观点。他非常生气地离开了冰岛，而且对这次峰会深感失望。但是，据波因德克斯特说，一个月之后，“总统理解了我们在‘战略防御倡议’系统中有些什么，它对克里姆林宫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后　记

1986年年底，由于众所周知的伊—尼事件①，里根政府面对着一场政治大旋涡，国家安全委员会立即陷入了混乱。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身患重病，于1987年初去世。随后，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辞职。在对苏联展开战略攻势方面技巧娴熟的一个小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名存实亡了。那些保留下来的人，或者其他打算坚持下来的人，不久就自顾不暇了，面对伊—尼事件的风暴，一个个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然而，这项战略的关键部分仍然存在。

直到1989年的大选之前，美国继续在财政和后勤方面支持波兰团结工会。这些援助对地下团结工会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即使在苏联于1988年5月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之后，美国继续对穆斯林游击队提供军事和情报援助。在苏联于1991年

---

①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违反国会的禁令和政府公开宣布的政策，进行秘密武器交易和其他活动的政治丑闻。1985年初，美国为了使伊朗穆斯林什叶派恐怖组织释放在黎巴嫩扣押的美国人质，向伊朗出售武器。经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上将批准，诺思中校将伊朗支付的4800万美元购买武器款的一部分转交给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诺思等人还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募集私人捐款。这些活动违反了国会于1984年通过的禁止美国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进行直接或间接军事援助的法律——博兰修正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些非法活动于1986年11月被揭露后，立即在公众中掀起轩然大波。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因而去职，并被起诉。里根总统的公众形象受到玷污，美国反对恐怖主义的可靠性受到严重损害。美国新闻界将此次事件与尼克松执政时的“水门事件”相类比，将它称为“伊朗门事件”。——译者注

解体之后，美国继续限制向苏联集团出口技术。直到今天，能源价格较低和硬通货收入的减少仍然困扰着莫斯科。美国在80年代中期的国防预算实际上达到了一个高水平的稳定时期，而且在国防建设方面继续推进新式先进武器的研究计划，其中包括“战略防御倡议”。在里根执政初期建立起来的超级大国进行竞争的战略与资源参数，一直完整地保持到苏联解体。

苏联不会由于美国的渗透而解体，也不会由于时间对我们有利而解体。如果不是由于克里姆林宫面临着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和国防建设、在波兰和阿富汗的地缘政治挫折、在能源出口方面遭受了数百亿美元的硬通货损失以及无法获得西方技术等综合因素所产生的累积效应，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会渡过难关。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并不是一种在任何国际环境中注定要自我毁灭的有机体。美国的政策能够而且也确实改变了苏联的历史进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西方观察家从前坚持苏联的经济体制可与美国的经济体制相媲美，认为对抗政策不会取得成效，反而会使苏联的地位相对增强；今天，他们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认为苏联帝国的衰弱与垮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避免的。

在里根时代的初期，苏联的终结就已经开始了。虽然当时还没有迹象表明苏联的死亡正在向我们走近，但那个时期苏联这个本来就有病的躯体承受了史无前例的重压，被迫花费宝贵的资源，与一个强壮的敌人进行军备竞赛。苏联没有能力从外界获得能够使其起死回生、或者至少可以缓减某些症状的药物，而是眼睁睁地看着疾病在自己的躯体里发作。在80年代初期，苏联最初的几个步骤成为自己的死亡行军。

在那个时候，美国政府中没有一个人（罗纳德·里根除外）清楚地看出苏联这座大厦会倒塌，美国的目标就是削弱和损耗苏联体制。但是，美国所制定的削弱苏联体制的政策，最后变成了威胁苏联生存的因素。在苏联的这口棺材上钉下第一颗钉子是在

80 年代初期，到 80 年代末期就把苏联埋葬了。

1989 年，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赢得了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胜利。在 1985—1991 年期间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主要外交政策助理的谢尔盖·塔拉先科认为，这次重要事件使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相信，苏联体制就要崩溃了。但是，如果没有里根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团结工会不太可能在 10 年之后再次复活。如果美国政府在欧洲以波兰为界，不要强迫西方对波兰实施制裁，在财政、后勤和情报方面不要向地下团结工会提供秘密支持，不要以制裁要挟波兰政府就反对派的复活问题进行谈判，那么波兰的镇压行动有可能非常成功。

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在共产主义阵营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这说明，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①（即不会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拱手相让给”西方）实际上是空洞无效的。但是，如果美国不采取进攻性政策，那么苏联局势是否出现逆转就值得怀疑了。勇敢的穆斯林游击队面对着一个在军事力量上压过他们的对手，而且事实证明这个对手冷酷无情。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他们肯定会失败。穆罕默德·优素福准将说：“在最终打败俄国人的过程中，中央情报局的援助是必要的和决定性的。”美国的秘密援助计划最初是由卡特政府在 1980 年带有试验性地发起的，在整个 80 年代得到了发展。当然，武器的质量和精密度也在提高，而且与反对派分享详细的情报。穆斯林游击队原来的目的是不断袭击苏联军队，这个目的于 1985 年变成了争取获得胜利，而且甚至把战争引向苏联境内。这些主动行为的累积效

① 1967—1968 年期间，当捷克斯洛伐克在杜布切克领导下进行改革时，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一个论点，即“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的共同利益受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时”，苏联有权干涉。这个论点被西方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1968 年苏联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这个主义就成了入侵的理论根据。——译者注

应，就是使苏联遭受了极大的人员伤亡，最终迫使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充分利用苏联集团内部的地缘政治裂缝，从而有效地使苏联的资源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国防建设是一个明证，其直接的目的是加强威慑力，但美国政府还有一个更加本质性的目的。正如在《国防部五年计划指示》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国防建设并不只是为了提高美国相对于苏联的军事力量，而且还要使苏联的经济实力完全衰退。这是经济战的一种形式。

国防建设不是简单地增加预算，如何使用资金也是同等重要的。对于莫斯科来说，把高科技先进武器系统（包括“战略防御倡议”）突然纳入军备竞赛之中，这就给军备竞赛注入了一种危险的动力。克里姆林宫在很大程度上喜欢进行一场数量上的竞赛，因为这样就可以胜过美国的技术优势。但是，当竞赛引入质量参数时，莫斯科就处于明显的劣势了，而且有力不从心之感。正因为如此，戈尔巴乔夫才对“战略防御倡议”和美国其他高科技国防计划感到担忧。

与此同时，里根政府不断地挤压莫斯科的钱包。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只完成了原计划规模的一半，而且在进度上推迟了两年，这就使苏联损失了一大笔财政收入，而美国不断地压低国际能源价格更是使莫斯科雪上加霜。在他们最需要硬通货的时候，却白白流失了数百亿美元。西方技术出口限制的进一步加强，也阻碍了苏联的经济发展。

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美国的国防建设是由吉米·卡特于1980年开始而于1983年结束，或者没有“战略防御倡议”这回事；苏联可以持续得到西方的技术；在能源价格相对较高时天然气管道带来大笔硬通货收入，那么苏联的能源危机将容易应付得多。

使克里姆林宫陷入深渊的并不是哪一个事件或者哪一项政策。里根政府的总体战略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威力，是各种政策的综合效应。这些政策就像一阵阵强烈的飓风吹进虚弱的苏联体制之中。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死亡消灭了冷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的历史学家给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高的荣誉，认为正是他才使人们看到了冷战后时代的曙光。战败者获得了比胜利者更高的荣誉，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最为奇特的一幕。

致谢

我要感谢那些与我谈论本书所涉及到的各个主题的人士，他们是：卡斯帕·温伯格、比尔·克拉克、乔治·舒尔茨、唐纳德·里甘、罗伯特·麦克法兰、约翰·波因德克斯特、理查德·阿伦、赫伯特·迈耶、亨利·罗恩、威廉·施奈德、弗雷德·伊克尔、格伦·坎贝尔、埃德·米斯、罗杰·鲁滨逊、约翰·伦乔夫斯基、什泰夫·哈尔珀、阿朗·菲耶尔、戴维·威格、杜威·克拉里奇、艾伦·惠特克、杰罗尔德·波斯特、叶夫根尼·诺维科夫、奥列格·卡卢金、穆罕默德·优素福、查尔斯·威克、杰克·钱恩将军、文森特·坎尼斯特拉罗、马丁·安德森、奥列格·季科夫以及弗拉基米尔·库季诺夫。还有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我对他们也表示感谢。上述人士中有几位（卡斯帕·温伯格、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比尔·克拉克和罗杰·鲁滨逊）还审阅了初稿，我对他们的真诚表示感谢。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非常慷慨地为我撰写本书提供了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稳定职位。极富分析头脑的汤姆·亨里克森博士和温迪·明金在许多方面向我提供了帮助。在写作过程中，我还得到了刘易斯·甘恩和彼得·鲁滨逊在知识方面的帮助。胡佛新闻奖学金计划对于任何作者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资产。

我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鼓励。我庆幸自己有一位极贤惠的妻子罗谢勒，她对我撰写本书给予了忠贞不渝的帮助，扮演着编辑、第一读者、助理研究员以及啦啦队长等多重角色。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本书是她的努力结果。我的父母（这

本书就是献给他们的）总是给予我支持、鼓励和爱。伊夫琳·吕布为我指出了广阔的前景，并且提供了一些常识；理查德·吕布还成为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乔·达弗斯和玛丽亚·达弗斯夫妇总是对我说一些有益的支持性话语。

好朋友可以使我们的生活与工作变得非常轻松。我有幸结识了许多朋友，他们是：罗恩·鲁滨逊、赫尔曼·皮尔基纳、詹姆斯·泰勒、吉姆·梅尔尼克和卡伦·梅尔尼克夫妇、保罗·维维安、吉姆·林赛和莱斯利·林赛夫妇、比尔·马托克斯和吉尔·马托克斯夫妇、德怀特·希莫达和阿德里安娜·希莫达夫妇、内奥米·吕布、布拉德·吕布和丽塔·吕布夫妇、戴维·赖德诺尔以及弗里茨·G·A·克雷默博士，我对他们所给予我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我要感谢我的经纪人乔·巴列利和詹尼斯·巴列利夫妇，也要感谢《大西洋月刊》杂志社的的摩根·昂特勒金和科林·迪克曼。在当今的图书市场上，摩根在出版最引人入胜和思想深刻的书籍方面，已经多次表现出他的才能。

笔者独自对本书的内容负责。

“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探求真理，而真理将使我们获得自由。”